美国人看《古墓丽影》　中国人看《古墓贼影》

超值金版
29.00

古墓贼影

沧海满月◎编著

中国盗墓史全记录

一部考据详尽、云谲波诡、震撼人心的中国盗墓传奇

全景展示从古到今的盗墓史实　深度披露历朝历代的盗墓谜案

讲述盗墓贼的前世今生　窥探古墓中的玄机秘闻　演绎墓内外的惊天真相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沧海满月编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04-1809-9

I.①古… II.①沧… III.①盗窃—陵墓—历史—中国 IV.①D691.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4286号

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

作　　者：沧海满月

责任编辑：杜　力

特约编辑：陈荣赋　孙良珠

排版设计：赵　雪　丁　娟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河北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550千字

印　　张：23.75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809-9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前　言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地下埋藏中就葆有着她的身姿，有人甚至感叹，地下中国比地上中国更为璀璨。有序的、研究性的考古发掘，可以向世人展示一个更为丰饶、博大的中国。然而，贪婪、无知的盗取，使无数遗存遭到破坏，没有挽回的余地，令人遗憾，更令人痛惜！

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墓葬被有意破坏的事件。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被盗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此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我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多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髑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外，逐一被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纵观古今，盗墓者可谓多如牛毛。翻遍盗墓强人的花名册，里面既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有出身于草根的流贼，甚至还有墓主自家人。官盗者明火执仗，民盗者聚蚁成堆，监守自盗者防不胜防，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在盗墓者中曾经流传甚广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获取墓中财物。

盗墓者在盗墓的过程中，对陵墓进行野蛮地盗掘，这不仅破坏了陵墓建筑，还把陵墓主人的陪葬珍宝盗为己有。一般情况下，盗墓者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但在盗掘的过程中，因为他们的野蛮行径，遭到毁坏的历史遗存不计其数。更有许多盗墓者，因为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无法带走的壁画，遭到他们的野蛮损毁。众多陵墓在被盗之后，都会有尸骨遍地、瓷器碎片撒满陵墓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至，盗墓者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盗墓行径，竟然放火烧掉整个陵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洛阳盗墓风潮曾经产生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湖南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众多宝贵文物流失海外，与盗墓者的盗取、贩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官方墓葬考古开始于1921年，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组织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也一度偃旗息鼓。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盗墓再度猖獗。

昔日墓葬排布密集、“无卧牛之地”的洛阳邙山，在盗墓者长期的盗扰下，如今已经是“十墓九空，甚至百墓九九空”。在周公庙遗址发掘之初，已经探明的22座西周大型贵族墓和14个星布其间的车马坑遗址区内，形成于各个时期的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盗洞随处可见。如今，历代帝王陵除始皇陵地宫和明清一些帝王陵之外，没有被盗扰过的已

经很罕见了。

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最大的不敬；对生者来说，会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对文明来说，是巨大的祸患。

面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在中国华北地区，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

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说过："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墓葬文化、盗墓史实，我们搜集了相对全面的史料、有关研究，以及一些野史、传说，经过精心梳理，编撰成书。唯愿读者在痛斥可恶、可悲的盗墓现象的同时，能有所警示，唯愿地下的亡灵能够得到安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第一篇　话说盗墓缘起

第一章　中国墓葬文化——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墓葬何时到人间

坟墓雏形为封土

墓葬盛行坟包起

都是厚葬惹的祸

盗墓贼觊觎宝物

第二章　盗墓与风水——“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

墓葬风水有奇书

名臣调包争墓地

一支响箭定皇陵

好风水难保稳固

魂归北斗明孝陵

明陵锁定天寿山

不吉之地明定陵

皇陵中挖出泉水

顺治亲选清东陵

不入祖坟有隐情

第三章　盗墓者的前世今生——盗墓者都是哪些人

冠冕王侯也盗墓

明火执仗为官盗

聚蚁成堆即民盗

军阀盗墓最凶残

乱世土匪无顾忌

第四章　盗墓派别之分——北派南派，难分高低

分派别南北相当

北派粗放器精良

南派集约技为先

第五章　盗墓者动机揭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盗取财物为首选

盗墓只为取墓材

发墓掘坟占墓圹

政治惩罚显威严

挖祖坟破坏风水

僵尸药用极另类

打旱骨桩以祈雨

病态盗墓成嗜好

鞭尸挫骨以泄愤

挖墓只为认血亲

第六章　盗墓工具曝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盗墓工具面面观

紧跟时代日益精

盗墓奇兵洛阳铲

铁斧蜡烛老鼠衣

妇孺皆知分土剑

招摇炸墓最得力

第七章　盗墓者的技法——手眼通天，鬼蜮伎俩

盗墓手段屡创新

盗墓技术渐成熟

闻土辨味识古墓

堪舆风水成依据

占卜问卦亦可为

听风听雨知墓穴

第八章　严刑峻法下的危险游戏——历代对盗墓者的惩处

盗防正邪不两立

盗墓者永不赦免

挖五脏烹而祭之

少数民族用重罪

盗错墓赔尽家财

大清律例定绞刑

盗墓严惩有例外

第二篇　盗墓风潮大历史

第九章　先秦两汉的盗墓史事——盗墓风潮第一波

先秦被盗名墓记

西楚霸王盗秦陵

超级变态广川王

汉武大帝墓多舛

盗两汉墓奇事多

第十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盗墓高潮——盗墓风潮第二波

民间盗墓已成风

为寻解药得咒语

专业盗墓曹孟德

一代奸雄求薄葬

集团盗墓最疯狂

好奇盗墓堕马亡

太守盗墓命归西

第十一章　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盗墓风潮第三波

开国皇帝要薄葬

暴虐帝陵被盗掘

太宗薄葬骗世人

温韬盗遍十八陵

最为愚蠢的黄巢

为寻秘籍挖董冢

第十二章　宋元时期的盗墓活动——盗墓风潮第四波

盗墓风愈演愈烈

北宋皇陵惨兮兮

永昌皇陵不永昌

盗墓只为皇帝过

刘豫盗墓不仗义

盗墓毁容朱漆脸

西域恶僧盗皇陵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的盗墓惨事——盗墓风潮第五波

陈奉盗墓最大胆

乾隆帝偷梁换柱

第十四章　民国近代的盗墓破坏——盗墓风潮第六波

六骏被盗现裂痕

土匪夜盗万娘坟

斗鸡台古墓遭掘

垂帘女皇惨遭劫

十全老人墓不保

土匪光顾清东陵

圣祖景陵遭劫难

黄金仲再盗东陵

不明兵匪盗崇陵

第十五章　死灰复燃，重新升温——近年来的重大盗墓事件

群贼共盗唐恭陵

千年古尸遭毒手
三彩牵出盗墓案
战国宝马遭盗掘
陪葬陵墓难幸免
蓟县古墓被盗记
第三篇　盗墓与反盗墓
第十六章　盗墓是危险的死亡之旅
盗墓活动凶险多
挖坟盗墓遭报应
第十七章　反盗墓技术——黑暗中隐藏的杀机
绞尽脑汁防盗墓
防盗绝招是薄葬
迁户守陵最有效
石椁铁壁齐上阵
塞石流沙效果好
伏设暗箭与刀枪
水淹墓穴设机关
作秀装穷巧掩饰
诅咒恐吓也上场
为防泄密用哑巴
殉杀工匠最残忍
防盗无毒不丈夫

第十八章　虚墓、假墓与疑冢——墓中有墓，冢中有冢
遍设疑冢乱视线
虚冢设疑是烟雾
孔明秘葬无踪影
第四篇　盗墓惊天奇闻
第十九章　中国盗墓史上的“活见鬼”现象
诡谲无比鬼吹灯
二百年后仍如生
尸体变异长指甲
盗掘陵墓遇诈尸
第二十章　中国盗墓史上四大文化传奇
不準盗出“汲冢书”
西楚霸王藏《孝经》
失而复得《兰亭序》
书法大家盗《笔势》
第二十一章　中国盗墓史上的挖祖坟真相
寻地误挖自家坟
一统天下占周墓
秦皇改名断王气
一把大火断龙脉
隋炀帝挖土掘坟
火烧水灌太原城

风水宝地难享受
李朱之争清得利
南京定都短命亡
掘祖坟以绝后患
挖祖坟绝断起义
为称帝自扒祖坟
中国龙脉有几何
第二十二章　中国盗墓史上耸人听闻的辱尸事件
伍子胥鞭尸雪耻
大汉皇后遭奸辱
盗墓贼奸尸救人
悲情皇后难安息
第五篇　盗墓之外传
第二十三章　盗墓者攻不破的陵墓——撼山易，撼墓难
防盗最强南越王
元朝秘葬无迹寻
穿山为陵很牢固
七次遭盗仍未遂
清孝陵未被盗掘
第二十四章　让盗墓者垂涎不已的帝王陵墓
举国之力修秦陵
武帝茂陵陪葬多

最大最牢属乾陵
第二十五章　楼兰古墓群盗掘沧桑——遗失的灵魂
大漠文明骤消失
楼兰古墓难安宁
参考书目

第一篇　话说盗墓缘起

不知从何时起，盗墓之风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盗墓的缘起，是因为有墓可盗，并且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也就是说，盗墓是因为厚葬的兴起。厚葬之风越浓，盗墓活动越发猖獗。盗墓活动并非简单的掘人祖坟，撬开棺材，它也有相当的规矩与技术要求。比如，如何选择大型墓地，如何确定墓内有丰厚的陪葬品，这些都是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的。

一般情况下，盗墓者盗掘陵墓，主要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的陪葬品，也有一些盗墓者是为了窃取墓葬中的墓材，有些人是为了进行政治打击、压迫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历朝历代都对盗墓者进行严厉的打击、制裁，但盗墓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其原因何在，也许盗墓人群口口相传的这句话比较能回答这个问题："要致富，去盗墓。"盗墓能取得巨大的利益，墓葬中的陪葬品引诱着一拨又一拨人甘冒风险，奔向墓地……

第一章　中国墓葬文化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墓葬何时到人间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指现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古代文献中对“墓”这个字的解释与“没”字相同，即埋在地下就没有了。远古时代，人死了只是在地下随便挖一个坑掩埋而已，有的甚至不加掩埋，那时没有墓葬这个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古人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了，但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还会回到人间来降福祸。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柴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后人对死者的崇拜和信仰，人们对逝去的人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人加以保护和庇护。死者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灵魂也应该有一个安居之所，他生前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他喜欢的装饰品也应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氏族成员、妻子儿女死后也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同他欢聚。这个死者灵魂的安居之所、亲人死后同他团聚的地方，就发展变化为墓葬或墓葬群。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但这样也只是将死者的墓穴挖得更大一些，随葬

的物品更多一些，埋葬死者的方式更隆重一些而已，因为当时还没有产生把死者的墓穴作为永远祭祀地点的意图，所以，地面上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地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这种挖坑掩埋死者的方式，在目前发现的夏、商、周代遗址中已得到证实。如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在这里建都达300年之久，现已发掘出商王墓11座，而墓的地面上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标志。这种埋葬死者的方式，经过了夏代、商代，一直到周代的春秋时期，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古代墓葬有各种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亚”字型墓是最高级别的，是古代天子和皇帝的墓葬；“甲”字型墓是大臣级的墓葬。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

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余件。

到了西汉时期，棺椁的用料及规格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黄肠题凑的出现。

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题凑这种椁室的构筑形式，榫（sǔn）卯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880根黄心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带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秦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墓葬中，随着墓主人一起下葬的，不仅仅是主人的尸体，还有一些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做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做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即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郑玄注中说：“土之高者曰坟。”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春秋前后开始的，

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地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地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辨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ōng）》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ū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得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做墓葬名称的有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国君赵绁（xiè）（前349～前326年在位）。《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五年（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它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

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000万，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像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11241375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170130000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嵕（zōng）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无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从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做到，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被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圆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昪、李璟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成都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圆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

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得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

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的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ǐ）辛。

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两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两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上》所言：“古也墓而不坟。”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达了信息。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出现在战国中晚期。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这就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

西汉的11个帝陵较为集中，有9个在今咸阳塬上，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塬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塬上。除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皇帝与皇后合葬也是有规定的。他们合葬后，虽然同茔，但不同陵。皇帝陵在西，皇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墓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一般在帝陵之东建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象征死者对墓地拥有所有权，东汉墓葬中，开始流行“买地券”。随着货币经济的冲击，一些地区的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的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南北朝的“潜葬”之制相比，唐陵平面布局更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形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不再像当年珍珠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真正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成熟阶段的布局风格是明陵。明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

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被誉为“地下宫殿”的明神宗定陵玄宫，该陵墓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

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位于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都是厚葬惹的祸

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魂会庇护后人，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著的变化。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达百余人。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yì）臧之”。汉陵中的藏品，可以从赤眉军盗墓时的情形窥见一斑：当年，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

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同样地，因未开掘而尚未得知其珍宝数量的，还有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陪葬墓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乾陵的藏品是多么丰盈。



汉武帝

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累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衣带上的饰物）的珍品，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这些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的宝花，令人叹为观止，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还有数千件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

在清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了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5000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

正是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盗墓与反盗墓之间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

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的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与盗墓是呈咬合发展趋势的。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风潮愈高涨。也许，历代帝王将相并没有想到，他们在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正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的猖獗，它令死者尸横于野，令生者不寒而栗。

盗墓贼觊觎宝物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狼。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这说明，古人对于厚葬的危害，早有所认识。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被盗的最早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此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盘，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北宋时的陕西转运使李朝孺盗得商末名臣比干墓，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

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出现了。《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lí）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在现代被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比如有：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在该墓中，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的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1928年夏天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导致墓坑下陷。当时正好有一个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破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的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1933年被盗掘的著名的楚幽王墓。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盗得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

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后来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古墓也没有得到安宁。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但是，挖出的器物并没有像盗掘的官兵想象的那么多，他们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实在窝火，便在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在前两次的盗掘中都毫发未损。因其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让盗墓贼得手。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因体积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的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

蔡侯墓封土虽然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我们无从得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它们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各方学者对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这一说法基本认可。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现出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个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入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的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yìng）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一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现代发现被盗掘的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还比如有：

一处是魏君墓。它位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有三座大墓在固围村，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1929年时，墓地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9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但这一论断似乎是太过牵强，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何许人也，成了历史悬案。

第二处是中山王墓。该墓位于河北平山，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者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钁（jué）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了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时盗掘该墓的应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

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guó）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到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luò）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楚顷襄王墓。该墓位于河南淮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秦汉时期，中原大地逐渐实行大一统，国家实力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再度刮起。虽然墓主人极力奢华，大加装

饰，但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出土了因高超的防腐术而保存完好的女尸的马王堆汉墓让世人感到惊叹，众人皆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但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曾经就连考古大师夏鼐（nài）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

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震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名人墓都被盗掘过，这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掘。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龑（yǎn）墓等。

宋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盗墓贼的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对生者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明清两代的王陵，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与毁坏。

第二章　盗墓与风水
——“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

墓葬风水有奇书

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坐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我们国家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相传，晋代郭璞（pú）为《葬经》的作者。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到处可见郭璞的注释。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lǎn）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隋书·经籍志》录有集十七卷，明人辑有《郭弘农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一看便知道不是真名。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葬经》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著，对各种地相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的墓址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

《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都是按照《葬经》中提出的吉凶为依据进行墓葬选址的。

《葬经》中云“地贵平夷”，就是说墓地最好选择在平坦之处。在中国，一般的中小型墓葬都会在平地选址，这当然是因为平地容易修建墓葬的缘故。但《葬经》一经问世，平地起墓似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平民的墓葬都是修建于平地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人的墓不是建于平地的，那就是帝王陵和一些贵族的高等级墓葬。

“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这说的是山中墓葬的埋藏深浅问题。如果墓葬选址在干涸的地方，那么可以埋藏得浅一些；如果选址在山中平坦的地方，则要埋藏得深一些。唐代末年，爵封秦王的军阀李茂贞的墓葬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北坡公园，距市区2.5公里，其周围为低矮的小山。李茂贞墓所在之处为山顶的平坦之处，正是《葬经》中所说的“坦夷”之地。在这种地方安葬，需要深挖墓，李茂贞墓墓室距地表竟然深达20余米，做到了深浅得宜，也只有这样才能“风水自成”。

在古代，很多帝王、贵族的陵墓设于山间，因此《葬经》中对山中如何选择墓址有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明确提到了“葬山之法”。山有巅和谷，那么，墓葬究竟是要建在山巅还是山谷呢？“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这就是说，如果在山脉上选址，则要建在山脊上，如果是在山谷中选址，不能建在山谷最低处，而要建在山腰处。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那里山势蜿蜒，陈国公主墓便坐落在龙山的山谷中。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山谷的山麓处发现辽代墓葬特有的青砖，经过勘察，确认为一处辽代贵族墓。其墓葬所在之处便是“垄葬其麓”的典型代表。

接下来的问题是，适合修建陵墓的山是什么样的呢？哪种山更适合建墓呢？《葬经》中言“若乃断而复续，去而复留，奇而异相，千

金难求”，意思是说，山脉断了之后又起伏延续，延伸远去，却又蜿蜒而回，这种奇特的山势为风水宝地，千金难求。又说“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内外表里，或然或为”，意为草木繁茂的地方有吉气。当然，奇特的山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山中如果有溪流经过，那是最好的。“山来水回，贵寿而财。”有这样一种说法：山主贵，水主财。也就是说，山中有流水经过，才能给子孙增寿添财。这也就是历代帝王陵墓为什么都选在背山面水之处的原因了。李世民的昭陵位于关中九嵕山，其山纵横起伏，巍峨壮美，松柏丛生，更有山溪环绕，正是《葬经》中所描绘的绝佳安葬之所。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嵕山，便被这里的山势地形吸引，当即下旨，选九嵕山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所在地，据史料记载，也是在一个有山有谷、有泉有溪的风水宝地，经考古调查最后确定，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的山中，那些地表遗留的石像生、石墙等遗迹正在群山环抱间。

人活着的时候，家是休憩之地，死后，墓葬便是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需要慎重选择，不光是下葬的地点，还有下葬的时间等。这些风水堪舆之说并非先人杜撰，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所生，绵延万世。

中国古代帝王对于陵墓选址是极其重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皇帝本人来讲，选择一个万年吉地是一大心愿，他希望死后继续享受帝国的荣华富贵和皇帝的威严，希望他的威严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其次，对于整个皇族而言，这是关系到龙脉兴旺的重大事情，所以不得不慎重。最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般来说，政府会设立专门负责修皇帝陵墓的机构，比如，在明朝主要是工部负责，而负责的大臣，主要是内阁大臣。主持修陵工程不但是一种荣誉，而且也是被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表现，主持者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会获得丰收。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生在苏杭，葬于北邙。”意思是说，苏杭一带是人世间的天堂，最适宜人居；而洛阳的邙山，自古汇聚帝王将相之陵冢，最适宜穴居。北邙，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亦作北芒，也叫郏山、北山）。西起三门峡，东止伊洛河岸。旧说此山是陇山之尾，乃众山总名，连岭修亘四百余里。自东汉城阳王祉葬于此后，遂成三侯公卿葬地。后因之泛称墓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通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在邙山发现九处大型墓地：西郊三山村东周陵区、东周王城陵区、东郊金村东周陵区、邙山东汉陵区、邙山北魏陵区、偃师万安山东汉陵区、偃师首阳山西晋陵区、偃师曹魏陵区、偃师景山唐代陵区。正如唐人诗中

所描述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邙山之中处处皆有王陵，此地堪称中国墓葬第一风水宝地。

中国人认为，墓地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果是帝王陵选址，则又牵扯到国运兴衰、百姓苍生。

相传，唐高宗李治早年命大臣长孙无忌为自己百年之后选择安身之地。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主峰高耸、两川环绕的梁山。但这一提议遭到当时著名星相学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认为梁山与唐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嵕山有一水相隔，阻断了皇室龙脉的传承，因此李唐王朝三代之后恐有亡国之厄。而梁山本身北峰为高，整个山形看似少妇平躺，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帝王，恐怕李唐王朝会被女人所控制。然而，唐高宗并未听从袁天罡的意见，终于还是将陵寝建在了梁山之上。后来，武则天代唐，建立武周政权，也恰恰印证了袁天罡当初的预言。

这个传说虽是后人为武则天称帝之事穿凿附会，但却从反面说明古人相信帝王陵寝的风水关乎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墓葬的重视，才会产生墓葬风水之说，《葬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先人们在通过风水选择墓地的同时，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告诉后世的盗墓者们，此处有墓，好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千百年后，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坟墓被盗殆尽，甚至暴尸荒野时，他们可能无法想象，当时奉为风水宝地的墓址，会被后人盗掘、毁坏，假如他们地下有知，定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名臣调包争墓地

古人把墓地的风水看得很重，具备好风水的墓地谁都想要，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一处墓地两家争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曾经就出现在汉代名臣东方朔与汉武帝之间。

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其母是皇后王娡。前156年生于长安，3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6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5岁登基，在位54年（前141～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曾用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号“孝武”，后葬于茂陵。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可见汉武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汉武帝生前威猛无比，死后也风光无限。茂陵北依九嵕山，南望终南山，建筑宏伟，风景秀丽，陵墓本身就是一座高高的土丘。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称“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瘞臧之”。当时在陵园内还建有祭祀的便殿、寝殿，以及宫女、守陵人居住的房屋，设有5000人在此管理陵园，负责浇树、洒扫等差事，而且在茂陵东南营建了茂陵县城，许多文武大臣、名门富豪迁居于此，人口达27.7万多人。茂陵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陵周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茂乡为什么成为汉武帝的陵墓所在地呢？这与一个传说有关。

传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有一次，打猎经过茂陵墓址的地方，立即被这里的风水所吸引。正当他赞叹的时候，一只麒麟状的动物朝他走来，他高兴极了，马上搭弓一箭，嗖的一声，利箭呼啸而出。以汉武帝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射中猎物应该毫无悬念，结果出乎意料，那只麒麟状的动物不见了，倒是突然长出一棵长生果树。汉武帝不明所以，立即找来当时的风水大师东方朔询问。东方朔来到汉武帝打猎的地方，但见地上平旷，绵延不尽，南望秦岭，北依群山，气象开阔，气脉极佳。他立即大呼宝地：“此地气息所集，风水乃千百年来第一吉壤，而且又与渭北诸陵连成一体，则西、北龙脉相连。另外，此地土大盛，您名字里的‘彻’中间有土，居于此，可居中以震四方。”

汉武帝龙颜大悦，立即下令在此建一亭舍。回宫后，汉武帝下令在此营建陵墓。汉武帝的陵墓前后修建了53年，才最终大功告成。陵墓的选址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也反映了汉武帝长寿的愿望，以及希望万年吉祥的意思。

汉武帝选择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之后，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之所以说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是因为只实现了他长寿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大汉王朝绵延子孙的愿望。他死后不久盗墓贼就将坟盗掘，西汉王朝也很快覆亡。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可以说很差，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东方朔判断有误。

而事实上，还有另一个传说在佐证这个事件。

传说，东方朔看到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之后，也想把它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安息地，但皇帝看上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来了一个调

包计，占尽了茂陵的风水。原来，东方朔在给刘彻看陵址时，发现这里的风水确实很好。他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飞黄腾达，瞒过汉武帝，把陵址故意向上移了一段，而将真正的宝地留给了自己。为了日后能顺利找到这块宝地，他在这里种了一棵小树作为标记。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甚至决定了整个西汉王朝的兴衰。因此，东方朔一直将这个秘密隐藏在自己的心底，直到咽气之前才将儿子叫到面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在茂陵下面靠塬边上的那个地方找一棵树，那棵树已经60多年了。找到后一定要把我埋在那里，切记！切记！"说完就断了气。

东方朔的儿子按照他的遗言找到了那棵树，并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埋在了那里。东方朔被埋在了宝穴后，陵墓疯长。第二天，墓就长高了5丈；第三天，又长高了5丈。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要高过茂陵了。天神看不过去了，拾起一块石头就扔向了他的坟，坟被压住，不再长了。后来人们把东方朔的墓称作"压石冢"，并说这儿的风水的确比茂陵好，在压石冢这儿可以"卧看长安"，而在茂陵那儿就只能"坐看长安"。

英勇神武的汉武帝也许不会想到，他生前看好的风水宝地，竟然被他的臣子东方朔占了去，但此时，他对此事也鞭长莫及了。

一支响箭定皇陵

从河南巩义市出发，沿郑洛公路西南行40里，再徒步南行约七、八里，就到了一个名叫"龙洼"的地方。这里，四周台地层层，远处是簇簇青山，中间是一片平川。就在这平川上，有一座古代陵墓高高隆起，它就是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提及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宋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墓地——"永昌陵"。

永昌陵统领着北宋皇帝的陵寝群——宋陵。整个宋陵区的规模不小，散落在巩义市区和下辖的芝田、西村、回郭三镇。北宋有七帝葬于此，分别为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统称"七帝八陵"，还有后妃、功臣如包拯、寇准墓，据考证有300多座，是一个巨大的陵墓群。

北宋定都开封，为何要将陵寝建于远离国都的巩义呢？这还要从

开国之君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长期驻军洛阳，所以赵匡胤出生地是在军营——洛阳夹马营。他在洛阳度过了童年，当了皇帝后，常到各地巡视。开宝九年（976年）春，他又到洛阳视察，顺便回到夹马营旧居参观，忆起儿时嬉戏情景，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指着一处地方对随从人员说："我幼时有一心爱玩具小石马，后来把它埋藏在这里，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说罢命人去挖，果然找到了小石马。赵匡胤拿起来爱不释手，就带在了身边。当他返回东京的途中，行至巩县时，又亲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祭奠（赵弘殷死后，原葬于开封东南隅，赵匡胤即位后，于963年迁葬于巩县西南40里的訾乡邓封村）。祭毕，他又登上陵园神墙的西南角楼向四处遥望，当看到远处的不老青山、近处的悠悠流水时，顿时引发了今昔之思，不禁一阵唏嘘感慨。于是，赵匡胤抽出一支响箭，搭上弓向着西北方向射去，那箭直飞到400米以外才落下。赵匡胤长叹一声，对随从大臣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终须有归宿之地。你们记住，今日箭落处，就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又亲自拟了名称——永昌。

就在这年的十月二十日，赵匡胤独坐宫中太清湖畔，细观夜色，只见星光璀璨，和风微至，宁静清幽。可是不久，天色大变，他赶忙回到宫中，传旨召弟弟开封尹（京城长官）赵光义入寝宫相见。光义来到后，命令后妃、宫女、宦者等侍候的人，一律退往外院，两人酌酒低语，谁也听不到在说什么。只从窗外透过窗纸"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状"，又见皇帝手持大斧嗵嗵拄地，大声说："好做！好做！"随后就倒卧床上，"鼻息如雷霆"。光义当晚陪宿屋内。天将黎明时，万籁俱寂，忽听有人报说："皇帝晏驾了。"

史学家们认为，宋太祖之死是因其弟赵光义做了某种手脚，但事隔千年，今天已难以澄清真相。而"烛影斧声"也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赵匡胤死后，灵柩停放于万岁殿，由皇弟、后妃、皇子、文武大臣每日致祭。第二年四月，灵柩运往皇陵——今巩义市芝田乡安葬。护送灵车的官员、卫士、仪仗队伍及皇宫妃嫔等共3000多人，来到这片太祖早已选好的陵地。

宋陵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皇陵群。现地上所存700多件精美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北宋皇陵的诸帝陵园建制统一，平面布局相同，皆坐北朝南，分别由上宫、宫城、地宫、下宫四部分组成，围绕陵园建有寺院、庙宇和行宫等，苍松翠柏，肃穆幽

静。西村陵区位于西村乡北的常封村和滹沱村之间，包括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蔡庄陵区位于蔡庄北，有永定陵；孝义陵区位于县城西南侧，包括永昭陵、永厚陵；八陵陵区位于八陵村南，包括永裕陵、永泰陵。

好风水难保稳固

在我国，风水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祉。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000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在选址时进行了充分的考虑，比如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

地，就像故宫一样。

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并不是以人的意志或者风水的好坏来判定的。所以，纵然十三陵是风水宝地，也无法保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明朝统治者内部已经腐朽无能，统治机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驾驭当时的时代，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明朝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既然这样，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魂归北斗明孝陵

明孝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周边的常遇春墓、仇成墓、吴良墓、吴桢墓及李文忠墓等5座功臣墓也同时被划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

明孝陵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已不存在，但陵寝的格局仍保留了原先恢弘的气派，地下墓宫完好如初。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再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里，护陵驻军有5000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神烈山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xièzhì）、骆驼、麒麟、马和象六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国帝王陵中唯一不呈直线的，而是环绕建有三国时代孙权墓的梅花山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下马坊至文武方门的神道长达2400米左右。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额枋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陵寝建筑都是按中轴线配制，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孝陵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现仅存下马坊、禁约碑、内红门、碑亭中壁、石像路、方城明楼下部等砖石建筑。陵园纵深2.62公里，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状布局。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别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规，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规、传统办事的帝王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神道加深延长，便于布放石人、石兽。还有人说，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时，有人建议挖平孝陵对面的孙陵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认为让东吴孙权大帝为自己守陵更显气概。

后来，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为农民军起义将领时，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雄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既然费尽心机择址建陵，在陵墓的设计上一定会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风水学认为，朱元璋留存孙权墓并非简单像传说那样仅因孙权是好汉，而是因为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孙陵岗还在古地貌学上是一个“近案”，通俗地说，就像一张茶几。这样一来，明孝陵背倚钟山，从整体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龟蛇合体），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许，朱元璋这才称心如意。

明陵锁定天寿山

明长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它是十三陵中的祖陵，于永乐皇帝建北京皇宫的第三年（1409年）开始修建。明长陵的修建工程浩繁，营建时日旷久，仅地下宫殿就历时4年。

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其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其制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已拆除并封塞）。院内，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之前建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代中期，碑亭则保存至今。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祾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4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稍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祾恩门”三金字。门下承以汉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云腾浪

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祾恩门两侧还各有掖门一座，均作随墙式琉璃花门，门上的斗拱、额枋，门顶的瓦饰、椽飞均为黄绿琉璃件组装，在红墙的映衬下格外分明。院内，北面正中位置建有高大巍峨的祾恩殿。这座大殿在明清两代，是用于供奉帝后神牌（牌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

第三进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

“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风水相士袁珙：“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幕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永乐皇帝之所以选中现在的天寿山，也是经过不少周折的。“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在南京称帝，当时他为了政权的巩固，已经决定迁都北京了。在永乐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407年，朱棣的徐皇后去世，当时朱棣为了表示自己迁都北京的决心，就派礼部尚书和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前往北京选择“吉壤”。据说曾选了好几个地方。首先选中的是屠家营，但因为皇帝姓朱，与“猪”同音，而“屠”是宰杀的意思，猪进了屠家必死无疑，所以犯忌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猪和羊本能和睦相处，可是偏偏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旁有狼更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也不吉利。因为古代皇帝死亡，除了叫“驾崩”以外，也叫“晏驾”。潭柘寺的景观虽好，但山间幽深狭窄，不利于子孙万代的发展，也不宜采用。后来才来到了现在的天寿山。天寿山那时候叫做黄土山，永乐皇帝亲自视察以后，觉得非常满意，当时就下旨，定黄

土山为他的“万年吉壤”。这一年也正是他五十大寿之年，所以封黄土山为“天寿山”。

不吉之地明定陵

在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长陵，二是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建于1584年至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明楼檐下石榜刻有“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明楼内石碑上刻有“大明”和“神宗显皇帝之陵”。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体——地宫。

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定陵地下宫殿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地上陵宫由宝城、明楼、祾恩殿（重檐7间）、祾恩门（5间）、左右廊庑（各7间）及外罗城内外的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万平方米。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四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

定陵的地宫全部用石砌成，多为青石，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地宫中有7座4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设计巧妙，开闭灵活。地宫中又分为正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陈列着祭器，三个汉白玉石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葬品的26个红漆木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被发掘。1958年，在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糊涂昏庸，好酗酒，每餐必饮，每饮必醉，醉酒后还经常杀人。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

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30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特别讲究风水，他的子孙当然也就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美德”。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只是定陵在选址上，在当时看来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如今这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闰二月，神宗亲赴天寿山，又到东山口游览了圣迹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后，对钦天监提供的几处吉地不甚满意，八月，又令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官员再赴天寿山各处审视。视毕，徐、申二人认为，原择各处吉地，石门沟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峰高耸，叠嶂层峦，上峦圆润秀丽，水绕山脉动如蛇游，错落有致，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其余诸处位次参差，砂水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议：用形龙山，陵园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见只能供皇帝参考。神宗于九月初九借秋祭之机，亲赴陵域审视了形龙山、大峪山两个地方，初步选定营陵地点为大峪山，但他还要请示母后最后定夺。万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两宫圣母之命，率后、妃秋祭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相当有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

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做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

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距神宗葬入定陵不过才24年。

皇陵中挖出泉水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初八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六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逝于乾清宫，死时35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杖，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溥、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三十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

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事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顷。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初五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

卫大狱。

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辩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鐩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春秋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泰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在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更为严重。

顺治亲选清东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内，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清代帝王在选勘陵址时，以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为依据，刻意追求“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山川形势，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意象。清东陵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陵区东侧的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势皆西向，俨然左辅；西侧的黄花山似白虎雄踞，势尽东朝，宛如右弼。靠山昌瑞山龙翔凤翥（zhù），玉陛金阙，如锦屏翠障；朝山金星山形如覆钟，端拱正南，如持笏（hù）朝揖。案山影壁山圆巧端正，位于靠山、朝山之间，似玉案前横，可凭可依；水口山象山、烟墩山两山对峙，横亘陵区之南，形如阙门，扼守隘口。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夹流，顾盼有情；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这天然造就的山川形势，对于镶嵌于其中的陵寝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的地址是顺治皇帝确定的，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会在河北遵化建造陵墓呢？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夏，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军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抵达北京，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马兰峪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1651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顺治携大臣、侍从来到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狩猎。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名为狩猎，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它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基业——就是为自己，也为未来的大清帝王，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造一座皇家陵园，让大清龙脉延续，一统江山万年。

有野史记载，当顺治一行人来到马兰峪镇凤台山一带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缥缈。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帝不禁对周围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随行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昌瑞山以北为“后龙”；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弯曲流过，环抱有情。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于是，对顺治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冈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魁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恍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于是，顺治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陵墓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孝陵在修建时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

顺治帝虽然亲自选定了陵址，但并未马上动工修建。因为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

朝，才将陵寝建成。

落成后的清东陵从选址、设计，到布局、结构都非常周密和讲究，殿宇、陵墓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既体现了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又具备了科学性和艺术性。难道这一切都始于顺治皇帝的那枚扳指吗？这一疑问在康熙年间终于有了答案。据史料记载，康熙六年七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要去看守孝陵，康熙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回答说："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幸甚！'苏克萨哈又说：'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这段史料证明，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

清东陵以她无可辩驳的魅力，以她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11月30日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陵区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轴线，依山势呈扇形东西排列，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各陵按规制营建了一系列建筑，总体布局为"前朝后寝"。"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审美思想贯穿于每一座陵寝建筑中，使各单体建筑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空间组合。远望时，殿宇、城垣、门坊、道路、桥涵，金黄碧绿、丹红雪白，气势恢宏而深沉。由远及近，步移景易，变化丰富，秩序严谨，相得相济，引人入胜，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典范之作，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在这庞大的建筑群体中包容了中国明清两代宫廷建筑的基本形式，运用了最先进的工程技术，采用了最为珍贵的建筑材料。陵区的580多座单体建筑中，有经过两次大地震、300多年岿然不动的全国现存最宽的石牌坊，有全长5.5公里的孝陵主神路，有叩之声若金钟的"五音桥"，有被誉为"石雕艺术宝库"和"地下佛堂"的裕陵地宫，更有采用最为珍贵的黄花梨木建成并以黄金装饰的慈禧陵三大殿，以及"凤在上，龙在下"的丹陛石。

清东陵是一部用砖、木、瓦、石写就的清王朝盛衰的历史。孝陵的建筑反映出清朝定鼎中原初期财力不足，但是雄健古拙、规模庞大的石像生则反映出八旗子弟以武力征服中原，靠弓马开创天下的雄姿。景陵、裕陵则反映出"康乾盛世"天下太平的时代特征。定陵和惠陵则是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写照。慈禧陵则是权力的象征，反映出慈禧两度"垂帘听政"的那段特殊的历史。

不入祖坟有隐情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的梁各庄西永宁山下，距北京140公里，距保定约100公里。清西陵是清朝皇室的陵墓群之一，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3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等园寝。陵区西依紫荆关，南临易水河，与狼牙山隔水相望。陵区的四周层峦叠嶂，松柏葱茏，景色清幽，十分雅致。

西陵的建筑保存完整，共有房舍1000余间，石质建筑和石质雕刻一百多座，建筑面积503万平方米，占地100平方公里，陵区的围墙长达21公里。雍正帝及帝后的泰陵和泰东陵位居陵区的中部，西侧是嘉庆帝、后的昌陵和昌西陵，再西是道光帝、后的慕陵和慕东陵，泰陵的东侧是光绪帝、后的崇陵。在帝后陵的旁边还陪葬有妃子、王公和公主园寝共7座。整个清西陵埋葬帝后、嫔妃、王公、公主等共计76人。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和忌辰，清廷都会在东陵和西陵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称为“大祭”；每月的朔、望则举行小祭。祭祖活动耗费巨大，仅东陵的祭祖活动，每年就要耗费银两103万两。

西陵的建筑形式和布局与东陵大体相同，都是按照清代严格的官式标准建造的，等级森严。后陵小于帝陵，园寝又小于后陵。帝陵、后陵有红墙环绕，建筑都是用黄琉璃瓦覆顶；妃、公主园寝虽有红墙环绕，但都是以绿琉璃瓦盖顶；行宫、衙署则是灰色的砖墙，都用布瓦盖顶。各陵的主要建筑有碑楼、神厨库、朝房、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明楼等。

雍正皇帝的泰陵是西陵建筑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陵墓，雍正帝和一后一妃葬于此陵。陵入口处的标志是三座巨大的石牌坊，过了石牌坊是一条宽10米、长2.5公里的神道，神道将中轴线两侧的建筑贯通起来。进入大红门后，北侧是具服殿，殿北是30多米高的圣德林功碑亭，重檐歇山顶，亭内的碑石上记载了雍正帝一生的功绩。碑亭的四角各立有一座汉白玉华表，满刻云龙纹浮雕，气势庄严。由此过七孔石桥，神道两侧排列的石兽、石人等皆垂首肃立，神态恭谦。再往北蜘蛛山后就是龙凤门，四壁三门，上有用琉璃制作的云龙花卉装饰。门的两侧是碑亭、神厨库、井亭等建筑。再北是主殿隆恩殿，殿内明柱沥粉贴金包裹，顶部饰旋子彩画，梁枋装饰金线大点金，殿宇金碧辉煌。殿后依次是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等建筑，宝城的下面是地宫，雍正帝和后妃就合葬于此。

从此，清朝的帝陵在关内分为两地，遵化陵区位于京城以东，称为东陵；易县陵区位于京城以西，称为西陵。

“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根据这样的记载，雍正皇帝显然违背了昭穆之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雍正皇帝违背昭穆之制而另选陵址呢？对于这个疑问，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说雍正帝嫌东陵风水不佳而选西陵为自己“万年吉地”；一说雍正皇帝觉得易城离北京较近，尤其是距离出产石料的曲阳县非常近，明清两代修建皇宫和陵墓所用的汉白玉石料都是产自曲阳太行山区，因此，决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西陵，可以节省许多人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死后不敢去见他父亲，才在西陵另建坟墓。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雍正帝的真正意图呢？

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即位后，政权日益稳固，建造陵寝一事业已提上了日程。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干练忠诚的心腹重臣允祥，命另一位心腹张廷玉辅助，工部、内务府负责具体办理建陵事务。

因为顺治、康熙二帝陵墓都建在遵化，所以允祥等人把遵化一带奉为寻找吉地的首选。他们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仔细寻觅，终于在第二年四月，在九凤朝阳山看中了一块陵地，雍正帝也点头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允祥等人转而又到别处寻找，经过四处踏勘，确认遵化一带再无中意之地。于是，朝北京西南方向踏勘，总算在易县永宁山太平峪找到一块上好陵地。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永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不便马上表态，只说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暗示臣僚们为自己违背“子随父葬”之制寻找依据。

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

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干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

对于雍正为了节省人工，而修建清西陵，最直接的反证是两广总督在奏称采办情况时，雍正帝说：“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也就是说为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费钱粮多少可以在所不计。

而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崇仰佛教的他害怕死后灵魂遭康熙报复而不敢葬于东陵不过是后人妄自揣测罢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泰陵工程历时8年之久，征用舟车，运载数万辆次，役使民工上千万人，死亡人数不可计数。泰陵落成后，乾隆皇帝为兼顾东西两陵区的盛衰，决定把自己的陵寝改建在东陵区，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在谕旨中言明：“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为防止有子孙在东西陵之外另选陵址，乾隆还在诏谕中硬性规定了“兆葬之制”。也就是说，若父葬于东陵，则子在西陵；若父在西陵，则子必在东陵。不过，令乾隆没想到的是，他的孙子道光帝又违背乾隆的规制，埋葬到了西陵。这一违规之举竟逃过军阀孙殿英一劫，使其免遭盗陵暴尸之厄运。

2000年，清西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第三章　盗墓者的前世今生
——盗墓者都是哪些人

冠冕王侯也盗墓

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统治阶层——王侯。在古代社会，王侯就是身份地位、荣华富贵的象征。对于这些人来说，钱财似乎只是个符号，毕竟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在尽享荣华富贵之时应该什么也不缺了。然而，王侯由于处于尊贵的地位，所以做起事情来也与众不同。即便是最无耻的勾当，也会被美化得非常正确，甚至温情脉脉。以盗墓为例子，最能说明王侯的冠冕堂皇。

项羽发掘秦始皇陵墓，据说是为了报复秦始皇对天下百姓的暴政。

曹操更是设立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来专门盗墓，说是为了统一中国。

明朝天启皇帝发掘金陵，说是要断掉女真人的王气。

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则借着修缮十三陵的名义，盗取了永陵大量的上等楠木用于建造自己的陵寝。

王侯的盗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总结我国历史上的王侯盗墓行为，他们的盗墓目的大抵有四个：即为泄私愤、为钱财、为满足变态欲望，或这几者兼而有之。

一部皇帝盗墓史应该是相当精彩的。而且，历史就是如此真实，神秘的古墓就像一个妩媚动人的美艳女人，哪怕是帝王，同样也会迷恋于欲望之洞。

先从王侯盗墓是以泄私愤为目的来说，以这种盗墓目的实施的盗墓行为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开始时期，或军阀混战时期。



曹操

盗墓为泄私愤又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可以归结为国恨。此种盗墓行为是因国家的仇恨而实施的。无论一个灭亡的王朝最后社会多么黑暗，统治者多么残暴，都仍会有一批遗老遗少存在。这些人大都受过统治者的恩惠，因此对这个王朝极为忠诚，哪怕这个王朝最后多么腐朽，他们都希望它永世长存下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个新朝代产生的初期，必然会有前朝的人来反对它，甚至想推翻新朝代，恢复旧朝代。那么，新朝代为了加强新生政权的统治，必然会出台一些非常严厉的政策。这些王侯在前朝的统治者死后也不放过他们，于是，就出现了鞭尸鞭坟的事情。

第二种情况是民族恨。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或是汉族政权把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时发生。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少数民族中尤以北方游牧民族最为显著。当中原的汉族政权统治比较黑暗或是势力比较羸弱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和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

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有天然的条件，在马背上作战是他们的

强项，这就使他们在战争中赢得了很大的优势。一旦这些少数民族抓住战机，就会率领骑兵大军长驱直入，给汉族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少数民族战胜汉族政权入主中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元朝和清朝的统治。

但是，汉人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怎能轻易地屈服于少数民族呢？于是，他们就会不时给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制造些麻烦，有时这种反抗可能贯穿整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比如清朝从建国开始，反清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正因为这样，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才会用偷坟掘墓的方式来震慑汉人，以加强统治。同样地，一旦反抗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汉族政权也必然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发泄对他们的愤恨。

第三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家恨。这多是由于一个新生政权的统治者因其自身曾经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迫害或是其祖先遭受过前朝统治者的凌辱、杀害，从而对前朝统治者恨之入骨。他们励精图治，在取得政权后就必然会报仇。有时因为前朝统治者已经死去，他们就只能找那些陵墓中的枯骨复仇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历史时期，各路诸侯之间为了争得最终的统治权而互相混战、争霸。胜败乃兵家常事，因此经常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这些混战中的诸侯国之间必然会结下很多仇怨，因此他们在打败一方后可能就会掘开对方祖先的坟墓来复仇，同时向天下扬威。

从王侯盗墓是以敛财为目的来说，这种情况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能发生。虽说这些王侯盗墓都是以敛财为目的，可是具体情况又有不同，具体可分为三类：只是因爱钱而赤裸裸地敛财，为了筹集军饷，为了营造园林、陵墓。

只是因对钱财的欲望没有止境而盗墓的王侯，不是很多。因为王侯处于社会的最高统治地位，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这种目的而盗墓的王侯，只能说是个人性格所致。他们无休止地盗墓，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对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王石勒、石虎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他们两个自幼生活贫苦，石勒还曾多次被人转卖给汉人当奴隶，石虎也在社会的底层没少受委屈。这些苦难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必然会给他们的一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他们视财如命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这样，这两个人后来虽然登上了国君的位置，却还对金钱有着狂热的需求与欲望。这种狂热的欲望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们，从而使他们为敛财走向了极端。

在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筹集军饷而盗挖陵墓的情况时有发

生。因为社会动荡，所以才会有无数的割据势力相互混战。这些混战中的王侯盗挖陵墓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以图在诸侯争霸中取得胜利。在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天下，登上帝位，这是每个胸怀大志的诸侯的梦想。然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称王称霸，必然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军阀混战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可能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哪有心思去训练、去打仗呢！没有充足的战斗力，必然会在诸侯混战中失败。因此，这些想统一天下的王侯们无不为筹集军饷而大费脑筋。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代表。曹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自己统一天下的政治野心前加了“匡扶汉室”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更给他的盗墓行为提供了义正辞严的理由。这使他丝毫不会为自己的盗墓行为感到羞耻。

还有一种为了钱财的盗墓方式似乎有些隐蔽，就是以修建园林、陵墓为名来盗取陵墓中的较为珍贵的建筑材料。古人，尤其是王侯将相等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之事。因此，他们的陵墓多用十分珍贵的建筑材料来营建。一旦后世的王侯们建造陵墓、园林时缺少珍贵的建筑材料，就必然会想到那些建造精美的古代陵墓。这种情况远的有孙权，近的有乾隆皇帝。孙权大破长沙之后，派人挖毁吴芮的墓，用陵墓中的棺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乾隆则为了得到明长陵、永陵中的珍贵的金丝楠木来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以修缮为名，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盗墓。这种以获取建筑材料为目的的盗墓虽然初看上去不是为了钱财，但究其本质与钱财是脱不了干系的。

对盗墓有着病态的嗜好的王侯以广川王刘去为代表。刘去自幼生活优越，不知怎么竟有这样一种残忍的嗜好，这与他饱读诗书的教育背景很不相称。他把盗墓当做一项游戏来玩，把盗墓的过程当做一种享受。他在盗墓中力求刺激、惊险，困难越大越能引发他的兴趣。可以说刘去是真正以盗墓为生活的人，在盗墓中体验着快乐，后人无人能及。

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而盗墓的王侯代表非南北朝时期陈国的始兴王陈叔陵莫属。他的这种变态的心理需求可能与他自幼残暴的性格有关，他以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为乐。看惯了活人的痛苦，便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去寻找更大的刺激，而盗墓正是能满足他这种心理需求的“良药”。每当看到盗墓得到的珍宝和从墓葬中取出的遗骨，他心里就会升起无限的满足感。

从王侯盗墓是为了达到多重目的来说，有的是泄私愤与敛财相结合，有的是敛财与特殊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

项羽盗秦始皇陵就是在多种原因下发生的。从泄私愤上来说，项羽的祖父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因此，项羽对秦始皇是极为痛恨的。再有项羽是楚国人，秦灭楚，统一天下，他对秦始皇也是有着国仇的。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值项羽与刘邦楚汉争霸。项羽的百万大军必然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而此时，项羽刚刚入关不久，立足时间尚短。况且由于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此盗掘秦始皇陵可以给项羽带来三重收益，了家仇、报国仇、筹军饷。

虽然王侯盗墓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造成的后果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使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盗墓者自身大多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项羽虽然因盗墓获得了充足的军饷，可是却因为丧失民心最终败给了刘邦，最后自刎；刘去因为盗墓等行为而被流放，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无人收尸；陈叔陵因叛逆而被处死，也是暴尸荒野，无人收尸；乾隆虽然用盗得的金丝楠木建造了奢华的裕陵，但是最终还是被民国的盗墓者孙殿英所盗，最后竟然落到尸骨异处的下场。

明火执仗为官盗

与王侯的出现一样，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便产生了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个上层社会阶层——官吏阶层。

在我国，从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此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官吏制度越来越完善。统治者把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又增加了许多爵位，用于封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吏。这些官吏上至太师、宰相，下至县令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同时这些权力是极有伸缩性的。倘若当朝的是个有德的帝王，那么他手下的好官可能就会多一些。这些好官不仅能帮帝王统治国家，还能帮帝王治理国家。倘若当朝是个无德的昏庸帝王，那么朝野中就会奸党林立，恶官纵横。那些恶官不但不能帮助帝王稳固江山，还是江山社稷的蛀虫，是一个王朝毁灭的因素。在我国几千年的官宦史上，出现了比干、包拯、寇准、房玄龄、魏征等许多好官。同时，也出现了赵高、杨国忠、蔡京、高俅等一系列坏官。

但是，有一种事情是好官坏官都可能做过的，这就是盗墓。当然好官与坏官盗墓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官吏盗墓中，盗墓目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复仇；第二类是为财；第三类则是为了取悦当权者，

谋取前途；第四类是为了猎奇；第五类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当然这几种目的很多都是相互交错的。

官盗，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或者官员组织进行的盗墓活动。这种盗墓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必担心违反法律而惶惶不可终日。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掘坟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伍子胥

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仗地大干。

在三国时，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和主管盗墓的专职人员。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是曹操，他在军中设立了发丘中郎

将和摸金校尉，专门负责寻找陵墓、执行盗掘，堪称古今最专业的官方盗墓代表。曹操之所以做这种缺德事，是因为当时军队粮饷匮乏，为了补充自养，不得已而为之。（关于曹操盗墓，在后面的章节里会有所表述，此处不作赘述。）

其实，某些官吏盗墓得到了某种制度的默许。比如，著名的陈奉盗墓事件，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默许。虽然历代对于盗墓有着各种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基本上还是官吏制定的，再加上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刑不上大夫，所以那些禁止盗墓的基本法律对官员缺乏约束力。

从制度根源上讲，古代对官员没有很好的监管。对于官吏盗墓，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官吏盗墓也必须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闹出事情来，不过度违背孝道、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历史上也有官吏因为盗墓被皇帝查处。

从官吏盗墓是为复仇来说，典型的代表是伍子胥。这种复仇与王侯的复仇有一定的区别。王侯的复仇目的有家仇、国仇，而官吏盗墓就不存在国仇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族而找那些死去的仇人的麻烦。伍子胥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哥哥报仇，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三百。他甚至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带领着吴国的军队几乎灭了楚国。伍子胥在政治上的作为堪称是一个好官，好官盗墓大多数是为了雪耻复仇。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敛财来说，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而且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官吏几乎全都是坏官。官吏们虽然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又都有朝廷的俸禄养着，但是若与王侯比起来，经济实力就相差得太远了。这些官吏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便要四处搜罗来财之路。贪污受贿是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不过风险也比较大，而且只有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吏才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如果对统治下的百姓太过苛刻，就有造成民变的危险。与这些生财之道相比，盗墓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盗墓不仅不用担心被皇上查抄，也不用担心有乱民造反，只要盗墓进行得隐秘些，是不会被外界所察觉的。考虑到这些，许多贪财的官员就自然而然地把生财之路放在了盗墓上。比如明朝陈奉盗明显陵，就完全是为了获取明显陵中的宝物。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自己的前途来说，最为典型的代表非宋徽宗时期的李朝孺莫属。作为陕西的转运使，专门负责钱粮等物资的筹备、运输，他可以说是不缺钱花的。然而，为了做更大的官，把前途继续向前扩展，他想到了取悦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方法。宋徽宗有收集古董的喜好，因此，李朝孺认为要想升官，可以从这方

面下手，把皇帝哄高兴了，官位不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吗？而盗墓是取得古董，尤其是那些较为珍贵的古董的“最好”方法。鉴于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李朝孺是不敢把那些普通的古董送上去的。比干墓的传闻给了他希望，那件充满传奇色彩的铜盘墓志铭就成了李朝孺取悦宋徽宗的最好的古董。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肯放弃了，盗墓也就成为必然。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猎奇来说，以东晋刺史温放之盗王士燮（xiè）墓为代表。温放之为当时的朝廷立下了不少军功，可以说是个好官。可是，他却偏偏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甚至对在民间传说中被传得极为阴森恐怖的王士燮墓也充满了好奇心。他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为了看看陵墓中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鬼神，掘开了王士燮墓，打开了棺椁。盗墓之后，温放之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然而，他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在盗墓归途中堕马而死。

从盗墓是为了满足盗墓者变态的心理需求来说，南朝太守王玄象盗墓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王玄象与刘去一样，都对盗墓有着强烈的喜爱，并把这种无耻的行为当做一种嗜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的盗墓业绩十分显赫，达到了在他的地盘内找不到一具完整的棺椁的地步。他自小生活在官宦之家，不缺钱，不是为了敛财而盗墓。他与所盗陵墓的墓主也没有什么仇恨，盗墓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的盗墓行为是在一种变态心理下进行的变态活动。

除此之外，元朝杨琏真迦的盗墓比较特殊。他的盗墓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取悦当权者以及变态的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怪胎。杨琏真迦盗墓确实搜刮了墓葬中的所有陪葬品，为敛财而盗名副其实；杨琏真迦的盗墓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因为在当时，创立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元朝统治者为了报复汉人的轻视态度，就采取了更为残忍的统治手段。在取悦当权者上，杨琏真迦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不满，就极力做一些迎合统治者心理的事情。这从元世祖忽必烈对杨琏真迦盗南宋六陵的默许态度可以看出。

官吏盗墓的性质是比较好区分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官盗事件，只有一小部分兼有官盗和民盗的共同特点，像明朝陈奉盗墓就既是官盗事件，又是民盗事件。说它是官盗事件，是因为陈奉是打着朝廷的名义，带着军队去盗墓的。说它是民盗事件，是因为盗墓所得的财宝大部分都被陈奉私吞。

官吏的盗墓手段往往极不高明，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因为他们并不是专职盗墓的盗墓贼，所以不具备一定的盗墓经验和特定的盗墓技术。盗墓工具也极为简陋，以铁锹、斧子、刀剑为主。这些致使他们所盗的陵墓遭到的常常是毁灭性的破坏。有的官吏盗墓时还十分残忍，像伍子胥鞭尸三百，像杨琏真迦把南宋皇帝的遗骨与牛马粪混在一起，并造塔镇压。

纵观我国官吏盗墓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发生的——社会秩序混乱，朝廷统治黑暗，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民变时有发生。伍子胥盗墓是吴国占领楚国之后；温放之盗墓则是出于长久不安的东晋时期；王玄象盗墓发生在诸多小国相互混战的南北朝时期；李朝孺盗墓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犯的时候；杨琏真迦盗墓发生在元军灭南宋的时候；陈奉盗墓发生在社会统治极为黑暗的明神宗时期。可以说，处于太平盛世，社会稳定，统治者贤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官吏盗墓事件的。因为那些稳定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都十分严厉，制度也比较健全，官吏就不好钻空子。那些混乱的朝代，统治者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盗墓官吏呢？况且，有的官吏盗墓就是在皇帝的默许与支持下进行的，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宋徽宗对古董的嗜好，才引发了李朝孺盗墓。正是因为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杨琏真迦才敢在南宋六陵中作乱。正是因为有了明神宗的默许，陈奉才有胆量盗掘明神宗曾祖的显陵。

聚蚁成堆即民盗

与官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民盗。民盗，指的是个人或团伙的盗墓行为，多数是出于对随葬品利益的追求。他们盗取随葬品后找机会出售来谋求暴利。与官盗最大的区别在于官盗不受法律的制约，而民盗却是违法行为，法律的制裁如影随形伴随着民盗们。

民盗没有官盗那样嚣张的势力，不敢明目张胆地行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传说民间盗墓者分为摸金、搬山、卸岭、发丘四个门派，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之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摸金派。

摸金的雏形始于战国时期，摸金一门能够根据风水和山川河流的走向找到墓穴的具体地点。他们进入墓穴之前要带上口罩，干活时要求动作麻利轻柔，从死者的头一直摸至脚底，不能对尸骸造成任何损

害，对技术环节是很注重的。曹操设立摸金校尉一职，专门掘丘，所以摸金门弟子又被称为摸金校尉。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卸岭三门都少有弟子出现，因此往往被认为门派传承就此断绝，只剩下摸金一门。

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傅传授才算弟子，他们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同门。不过在摸金门传承中，只有获得正统摸金符的人，才能被称为摸金校尉。号称掘丘一行的民间正统，与发丘天官的手段差不多，最善于以风水星象计算出古墓宝藏的方位。行事讲究留有后路，做事不做绝。

摸金校尉不喜欢与人合作，若独干有困难时，对方必须是很信任的人，只组成五人以下的小团体。积极吸纳现代社会的工具与武器，并能将它们与风水术法结合起来使用，但对传统行规最为重视，极少有人违反。不是很擅长武功秘法体术。

摸金校尉与发丘将军互相看不顺眼，摸金认为发丘与官府合作，挖掘古墓时坏人尸骸、损人风水，对行内传统规矩多有违背；而发丘以为摸金因循守旧，空有精悍手艺只为衣食谋，不能将行业发扬光大。

摸金校尉们最擅长的是找墓，他们往往将搜集来的各种资料，结合对当地风水的观察，总是能以很快的速度找到陵墓的具体地点。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动手之时，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地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

进墓前需戴口罩，入内千万别把口罩取下来。第一里面的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墓里，不吉利；第三，不能对着古尸呼气，怕诈尸。

一般都是三人一组。一个挖土的，因为坑外不能堆土，所以还有一个专门去散土，另有一个在远处放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搬山道人一派。

“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掘丘，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他们大都扮成道士活动，正由于他们这种装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神秘感。有的人以为他们发掘古冢的“搬山分甲术”，是一种类似茅山道术的法术。

搬山一派，最早在秦汉时就有雏形，但是兴盛于清朝中期，搬山

一派擅长破解墓葬中的暗器和机关。他们常常利用外力损坏墓葬外围，进入墓穴盗宝。风水上只是粗通门道，但与其他三派相差较远。搬山道人行事多独来独往，从不与他人合作。传统“武功”比摸金强一些。

搬山一派的前身与茅山略有渊源，但因为理念原因，也是互相排斥。由于创派时间比较晚的缘故，继承风水法术不多，对传统行规彻底无视，被其他门派所排斥，就极少表露真实身份，以道士的身份周游国内各地，没有太强烈的善恶与民族观念。

搬山道人掘丘，只为求财，虽通机关，但一贯以破坏为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人身安全及销赃渠道计，亦有自然形成而流传下来的种种套路。

卸岭一派属于“两栖动物”，游走于绿林豪强和盗墓贼之间，人数众多，实力强大。有墓的时候挖坟掘墓，找不着墓的时候，首领便传下甲牌，啸聚山林劫取财物，向来人多势众，只要能找到地方，纵有巨冢也敢发掘。卸岭门据说创始人得仙人传授，有令人力大之法，所以卸岭门门人，多是力大无穷、通晓武功之人，被称为力士。传说当年威震九州的吕布也曾是卸岭门传人，为董卓筹备军饷，曾挖掘过多位汉皇墓葬。

此派于北宋期间经过逐步交流融合，吸收了摸金与崂山派两派特色，形成了具体的流派，对风水术法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擅长于破坏法阵，熟悉各类风水地形的弱点。

元朝时期，因敌视元朝政权，被大肆迫害，于是展开全面报复，以破坏成吉思汗陵的风水，败坏元朝江山为己任。最终破坏了成吉思汗的几处附陵，恢复汉人江山，也因此和蒙人结下世仇。蒙古占据天下时，曾发出金鹰令，召集一个集合了天下刺客的秘密组织追杀卸岭门门人。据说直到今日，这一刺客集团的后人依然遵循祖训，追杀卸岭门门人。也正因为如此，卸岭力士最为隐秘自己身份，非本门之人虽父子妻女也不会告知自己的身份。卸岭门门人后来淡出中原，曾经多活动于苗疆外蒙西北一带，近代在中亚北非欧洲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踪迹。

卸岭力士多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华夏一族的传承很是重视，虽然活动范围不在中原，但传人只在汉人内寻找，对可能危害到汉人中原政权的国家，无所不用其极。精擅传统武功，行迹类于侠客。

卸岭这一派主要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程度，都忌烟酒、辛辣之物。用铁钎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用鼻子闻铁钎从地下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时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

木头、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

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其效果就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

卸岭派长期被蒙人追杀，门人多朝不保夕。为图自保，千百年来前辈的规矩多有变动，并演变出种种新的行规，比如从不对汉人甚至华人的陵墓出手等等。

发丘将军到了后汉才有，又名发丘天官或者发丘灵官。其实发丘天官和摸金校尉的手段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枚铜印，印上刻有“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八个字，在掘丘者手中是件不可替代的神物，号称一印在手、鬼神皆避。此印原型据说毁于明代永乐年间，不复存于世。

发丘一派与摸金一派的手法接近，技术上稍微逊色，但他们注重团队合作，经常以古董商人或当铺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瞄准大型的墓葬甚至皇家陵墓下手，是四派中唯一不忌讳与官方合作的一家。清代因为外族迫害，流亡海外，多活动于东南亚及美洲一带，诸多大型古代陵墓发掘队中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发丘将军行动的同时邀集多人，做好详细计划，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措施。然后按部就班，依次进行。因此在掘丘过程中危险性最低。而麻烦多来自事后分赃保密等程序，因此有所针对地产生了一系列规矩。

除了以上四大派别外，还有两派不知名的，即崂山道士派与茅山派。

崂山道士一派擅长于驱鬼捉妖、诅咒解咒、传统中医、地脉风水、内家功夫等。其中地脉风水与传统功夫两法分流到山贼组织，形成了卸岭力士一派。曾经辉煌一时的绿林军中多有崂山门下。传说唐末义军领袖黄巢就学过崂山之术，并曾经在陕西挖过多处唐墓以充军饷。而崂山派内部这些本领却逐渐失去传承。

崂山道士多以驱妖捉鬼、周游行医为生，也有人为富豪官宦服务，对付其敌人。崂山弟子素以不分正邪、行事胆大妄为著称，号称只尊天命、不理人情。弟子中颇多和四大门派合作盗掘古墓牟利之人。四大门派中回避僵尸的法器药物，也多为崂山弟子所创，与茅山为宿仇。

茅山派属于道教教派，为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所创，因在茅山筑馆修道，尊三茅真君为祖师，故名。一说汉茅盈及其弟固、衷，得

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此派主修上清等经书，奉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太微天帝君、后圣金阙帝君、太上老君等为最高神，主张思神、通经、修功德，兼修辟谷、导引和斋醮。该派代表人物除陶弘景外，隋唐时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高道辈出，隐若道教正宗。北宋时与龙虎山、阁皂山同为道教三大符箓派，号称三山符箓。元代以后归并于正一道。

茅山派擅长寻穴找墓、风水祭祀、迎亲典礼、机关阵法、相面测字、看八字、算吉凶，甚至逆天改命等。其中机关阵法，与搬山分甲术意外流失，形成了掘丘一行中的搬山道人一派。

茅山派人多以道士身份巡游四方，以参赞红白喜事、看风水找坟地、看相算命等行当为生。茅山派认为天命虽不可违却可变，所以最擅长利用墓穴改变他人命运。也因此和掘丘者水火不容，中土墓穴中的守墓机关，号称有半数为茅山弟子所创。

茅山、崂山两派为宿仇，结仇原因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追溯。实际上，后人多是因为谋生过程中产生冲突。崂山道人惯于破坏墓葬取利，茅山弟子则要费尽心思研究如何不让人掘丘破运，一来二往两派中人死在对方手下不计其数。

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对付规模小的墓葬自然是连夜赶工取走珍宝，在天明之前消遁无形，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对付规模较大的墓葬，必须采取持久战，这时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在墓葬周边开荒种田，播种玉米、高粱等高秸秆农作物。等它们长高后，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将墓葬挖掘一空（安全，就是得等庄稼长高，需要耐心）。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就可以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旁修建假坟，施工时暗中挖掘地道，进入墓葬。

不管用什么方式伪装，最后都得挖个盗洞进去。盗墓者确定墓葬的大致位置后，一般直接在地面垂直挖洞进入墓室，留下的盗洞大多是圆形的。但有些大墓比较深，直接开挖通道很容易塌方，搞不好就会把盗墓者压死或关在墓里面，于是出现了事先在墓穴的上方挖个大小仅容一人操作的方形洞口的做法，这样可以避免塌方。随着盗墓技术的成熟，出现了迂回挖洞的方法，盗洞也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并在四面装木板，利用木板的支撑作用，基本可以避免塌方，得手后或火烧木板或将木板抽出，防止留下痕迹。

由此看来，盗墓这行当并非人人可做，它需要有一定的天文地理

知识、风水堪舆本领，以及专业的盗墓技能。对常人来说，除了会刨土，其余的环节着实勉为其难。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至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无论官盗还是民盗，究其本质都是盗窃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非法获取了他人财物，打扰了死者的长眠安息，也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他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军阀盗墓最凶残

军阀盗墓是有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就是在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时候。这一方面是由于混乱的社会无法对盗墓行为加以遏止，另一方面军阀混战导致军饷缺乏是他们盗墓的直接原因。

就像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开篇那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多次长时间的分裂时期。这些时期有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时期、民国时期。

在这些时期，我国出现了不同于王侯与官吏但却手握重兵的特殊阶层——军阀阶层。这一阶层内的人物，长期征战沙场，大多没受过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凶狠残暴，脾气古怪，杀人成性。这些军阀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多年的兼并战，统一了全国。但是，军阀的连年混战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军阀，这类人在历史上声名狼藉，但是历朝历代却源源不断地盛产军阀。由于大多数军阀属于武人，他们不会像文人那么斯文和犹豫不决，果断在他们那里就成了凶狠残暴，所以从现有的历史记录来看，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是极端疯狂的，对文明社会的种种戒规视为草芥，更不用说那些死人的墓地了。他们往往迷信鬼神，更不怕死鬼，

他们也不关心穷鬼，他们喜欢的是富鬼。

国家长时间的分裂不仅使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各个分裂的军阀势力之间常年混战，给社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许多田地都因战乱而荒芜，许多百姓都因战乱而送命，许多平民都因战乱而无家可归。不仅如此，由于长时间的战乱，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出现了许多盗墓的军阀。

这些分封割据的军阀都占有自己的一块领地，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人敢制约他们的行为。于是，这些军阀就在管辖区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为了他们特殊的目的，有的军阀不惜背负千古骂名，做上了盗墓贼。

军阀盗墓的目的相对于王侯来说，要简单得多。他们盗墓的目的第一类是为筹集军饷，第二类是为了敛财，第三类是为了特殊的心理需求。在军阀盗墓的过程中，有时是筹集军饷与敛财交织的，有时是敛财与满足特殊的心理需求兼收的。

从盗墓是为了扩充军饷来说，这似乎是很多军阀都做过的事情。一个军阀势力要想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保持强者的地位，就必然需要强大的军队。要想培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就需要充足的粮草、丰富的后备资源、先进的武器装备，这里的每一项，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相对来说，军阀大多数不是什么皇宫贵胄出身，自身并不具备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使是那些出身名门的军阀，也不可能有足够支付一支强大的军队常年开销的实力。于是，战争形式的需要就与现实的状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被每个军阀都视为头等大事的矛盾呢？一遇到战乱，原本食不果腹的平民百姓就有许多会饿死，哪里能拿出钱财来交军阀的赋税呢？况且战乱必然给社会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有时大规模的战争竟然能造成千里田地被毁的现象。从那些富裕的人家抢劫，也只能使用一段时间。那些富裕的大户必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被抢走，他们在发现了军阀的抢劫苗头之后，就会把金银财宝藏匿起来。因此，对于那些欠缺军饷的军阀来说，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死人身上下手了。盗墓既不用担心那些死者会反抗，也不用担心财宝会被藏起来，只要挖开陵墓，金银财宝就会源源不断。为了适应大量钱财的需要，军阀们所盗陵墓大都是那些埋葬着丰富而稀有的陪葬品的皇陵。当然，倘若实在找不到皇陵，那些小陵墓他们也不放过。

为扩充军饷而盗墓的代表是东汉末年的董卓和民国时期的孙殿英。当然，他们盗墓也是有着敛财的目的的，但是主要因素还是筹集军饷。董卓作为一个从西北起家的军阀，虽然官至太师，挟天子以令

诸侯，但是在经济实力上并不是十分强大。东汉末年的皇室本来就已经很困顿了，哪还有什么油水可刮。虽然董卓把持朝政后，掠夺了不少汉天子的财宝，但是与他那庞大的军事支出来比，可以说那些掠夺来的财宝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凑巧的是，全国的十八路诸侯又同时讨伐他，就更使董卓的财政负担捉襟见肘了。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了。

到了近代，官盗更加横行，在中华民国早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大案。1928年7月的一天夜里，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命令工兵团长颛孙子瑜带一连人直奔慈禧的定东陵。同时，又命令师长柴云升手下的韩某奔胜水峪乾隆皇帝的裕陵，经过七个夜晚的罪恶活动，将两座陵墓内的金玉珍宝洗劫一空。他们的盗墓活动，无论是盗墓工具还是盗墓技术上，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人类战争史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作为大军阀的官方盗墓，充分享用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当发现墓道口用大石封堵时，早就不像他们前辈摸金校尉那样依靠火烧、斧劈来一点一点开路了，只需几包炸药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搞定。

天下之大，有着盗墓嗜好的人不止刘去一个，温韬也是一个以盗墓为乐趣的人。温韬趁着唐末的混乱局面摇身一变成了手握重兵的大军阀。除了敛财，他有时似乎只是为了过过盗墓的瘾而盗墓。这从他专门为自己的盗墓成果而编写书册就可以看出。

从以盗墓敛财来说，南宋末年金国所立的傀儡大齐皇帝刘豫是一个典型代表。刘豫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可是并没有皇帝应有的特权与待遇。刘豫对钱财的疯狂喜爱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他只是出身于一个平常百姓的家庭，依靠些小聪明当上了皇帝。其实，他并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宝物。于是，他便把目光盯上了陪葬品丰厚的北宋皇陵，大肆盗掘。

军阀盗墓的性质无一例外，都属于官盗，都是以大量的军队为后盾来进行的。军阀盗墓的手段比同时代的其他盗墓者都先进。因为这些军阀都手握重兵，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民国时期的各个军阀盗墓为例，他们在盗墓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便采用火药、抽水机等现代工具技术与手段。

军阀盗墓的过程是极为残忍的，他们为了尽快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盗墓，有的甚至不惜炸毁陵墓。在盗得陵墓内的财宝后，又会对陵墓内的尸体大加毁坏。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遗骨就被大卸八块，随意扔在了地上。

上述官盗行为，都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来进行的。盗墓者手

握重兵，掌握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刀把子决定一切的时代，可以横行无忌。官方盗墓行为是没有权力制约的，所带来的后果给人类的文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历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

乱世土匪无顾忌

土匪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从社会地位上还是从道德水平上大都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提到土匪，人们大多会想到面目狰狞、杀人如麻、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等形象。在我国古代社会，对土匪是非常歧视的。有的人宁愿乞讨要饭也不愿意当土匪。因为一旦与土匪沾上关系，不仅自己会遭到世人唾骂，就连后代也不会被社会尊重。尽管有一些土匪良心发现，做过一些好事情，但是他们的地位仍旧没法改变。土匪既不同于官府，也不同于百姓。与官府相比，他们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军事力量的保证。因此他们往往在官府的打压之下，苟且偷生。与百姓相比，土匪的力量又显得十分强大。他们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及军事力量，还有着一定的钱财做后盾，尽管那些钱财绝大多数都是抢来的。因此，他们往往充当着一个欺压百姓的角色。我国民间百姓对付那些淘气、调皮的孩子，往往吓唬他们说土匪来了，小孩听了马上就会安静下来。可见土匪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对他们就连世事不懂的小孩都惧怕至极。

这些土匪要想获得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以便购买钱粮、武器，就要广开财路。我国历史上土匪敛财的方法很多，包括拦路抢劫过往行人、偷盗，甚至举全寨之兵洗劫村庄与城市。这些都是他们较为普通的敛财方法，不仅收益小而且风险大。因此，有的土匪开始转向了其他的敛财方式，土匪盗墓便应运而生了。

纵观土匪盗墓，无论是在盗墓目的还是在盗墓背景、盗墓手段、盗墓规模、破坏程度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从盗墓目的上来说，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单纯地为了敛财，一个是为了扩充军事力量而敛财。这两者一般都是有交叉的。

单纯地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土匪大多是那些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有了较为雄厚的实力，身边所处的竞争较小，官府的威胁也不大的土匪队伍。已经发展成了一定的气候，因此，土匪队伍不再需要扩充人数，没有安全隐患也就不再需要购买武器。他们盗墓或是由于土匪头领的个人喜好，或是由于生活上缺钱花而盗墓。土匪们一般都出身于

贫苦家庭，几乎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一旦当上了土匪甚至是土匪头目，手中就有了一定的权力。有权力就会滋生腐败。因此，土匪发迹之后大都会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要维持这样的生活可不容易。因为土匪头子不光要考虑自己，手底下的兄弟若是过得太不好了也自然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大量的资金需要就使他们想到了盗墓。

单纯地为了扩充军队而盗墓的土匪大多是那些发展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武器装备落后，经常在众土匪队伍中混战，有着强大的生存压力，有时还会遇到官府追剿的土匪队伍。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武装自己，同时在武装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盗墓，可以说是这类土匪队伍的首选发财之路。

上述两种情况比较单一，这样的土匪队伍也很少。一般情况下，土匪队伍盗墓既是为了满足土匪头目个人的私欲，又是为了扩充军事力量。比如万娘坟被盗、光绪皇帝崇陵被盗以及清东陵又被王绍义盗掘等。他们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方面是为了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从盗墓背景上来说，土匪盗墓一般都发生在社会动荡不安、主流政府势力微弱，大小军阀连年混战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与土匪的生存条件有关的。一个社会之所以有土匪的生存空间，就是因为主流政府无法有效地对统治地区进行管辖。像我国那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代，土匪是很难存活的。这是因为，土匪的来源会受到限制。如果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又有谁会乐意去当风险极大的土匪呢。即便有那些不安分的人或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当上土匪，也很难长时间地生存发展下去。因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及英明的决策者，这些决策者一定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土内出现反叛力量的，何况强盛的王朝就必然会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他们便会对土匪进行大力镇压。因此，像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唐玄宗中前期以及后来的康乾盛世都基本上没有土匪作乱的情况发生，也就很少有土匪盗墓的情况发生。相反，那些主流政府实力微弱的时期，则是土匪大加横行的时候。这是因为势力微弱的王朝一般都是有昏庸无能的统治者领导的，也就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百姓出现民不聊生、生活无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落草为寇去当土匪。而昏庸的统治者或者不知道自己天下里土匪横行的情况，即便知道了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或者是“闲心”去镇压，所以只能看着土匪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因此也就引发了许多土匪盗墓的事情。这种情况很多，像宋朝，本身受到辽、金的长期侵扰而自顾不暇，又哪里能顾及剿匪呢？再如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势力

逐渐衰弱或消亡，又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根本就没有时间与精力剿匪。到了民国时期，大小军阀连年混战，基本上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即便有军队与驻军监管盗墓事宜，也大都是个摆设，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第三，从盗墓手段上来说，土匪盗墓手段都是极为低下的。他们并不是专职的盗墓者，只是来取钱的盗贼。他们一般都没有盗墓经验，盗墓工具也仅限制在铁锹、斧头等上面，盗墓技术更是匮乏。

第四，从盗墓的规模上来看，一般都是100人左右的盗墓队伍。这与土匪队伍的规模有关。因为土匪并没有正规军的地位，所以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这就注定了土匪队伍不会很大、很强。他们盗墓也不像一些财大气粗的军阀那样，可以明目张胆地盗掘。为了躲开各方面的冲击，他们常在深夜里偷偷行动。

第五，从被盗陵墓的破坏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因为土匪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一般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他们性格粗暴，就必然会对所盗陵墓大加破坏。他们使用的都是铁锹、斧子等破坏性极大的工具，因此所盗过的陵墓大部分都会出现开棺剖尸的情况。

第四章　盗墓派别之分
——北派南派，难分高低

分派别南北相当

中国古代盗墓贼从地区上分，有南北两派，以长江为界。北派中又分出洛阳（河南）帮、关中（陕西）帮等很多派别，每帮各有“活动范围”，外帮很难进来。一般情况下，各帮互不侵扰各做各的。

北派以“巧力”见长，如盗洞打在何处（棺前或棺尾）、掘成何形（方洞或圆洞）都有讲究，十分诡异。方口形的盗洞就是北派所创，因在陕西关中地区的黄土地上多见，圈内俗称“关中式盗洞”。北派盗墓贼在工具的使用上特别讲究，如洛阳铲就是北派盗墓贼发明的，他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盗墓，也可以施展他们盗墓的绝技。

南派则以“巧技”见长，手段超强，通过自己或是祖传的经验，结合所掌握的堪舆理论来探穴盗宝，他们对中国古代的风水知识有独到研究。北派发明洛阳铲。南派则善于使用“望”、“闻”、“问”、“切”四法，此法便是南派中的“长沙帮”盗墓贼所总结的，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当然也是绝技。

南北方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差异，造成了北方和南方墓葬的不同。千百年来，南北方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传承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北方的中原地区以黄土为主，土质较黏，因此墓葬形制除土坑墓之外，还有洞穴一样的土洞墓。南方地区由于土地沙质，土质比较松散，难以挖凿洞穴，所以墓葬多为土坑墓。

先秦时期，礼制逐渐形成，等级规范化的同时，南北方墓葬文化特征的差异日渐明显。两周时期，北方除周王朝统辖区域外，主要诸侯国有三晋、秦国等，南方的诸侯国主要有楚国、吴国和越国。三晋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秦墓的最大特点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竖穴，再

在竖穴底部横向挖墓洞放置木棺。总的说来，北方的墓葬多是土坑、土洞墓，墓圹（kuàng）的周围常常会开凿小的墓室放置随葬品，这是因为北方黄土质地黏稠，容易凝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此外，北方大型墓葬内经常有大量的砾石存放在木椁和墓圹之间，这是一种对墓葬的保护措施。南方地区的楚国墓葬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的墓葬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楚国的文化因素。楚墓最大的特点是木椁分好几个椁室，如君主墓葬的椁室为9个，大夫墓葬的椁室为7个，这些椁室根据位置的不同，存放不同的随葬品。南方地区墓葬也有相对应的保护措施。由于南方地区水系发达，土壤中水分较多，木椁和墓主人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大型墓葬中一般都会放置木炭，墓圹壁上也会涂抹一层青泥，其目的无外乎防腐。

两汉时期，南北方墓葬仍持续着前代的差异，北方地区出现多墓室的墓葬，墓室之多有时可达10多个；南方地区则继续流行多个椁室的土坑墓，马王堆汉墓便是多椁室土坑墓的典型代表。

进入南北朝，直至隋唐时代，墓葬形制变化的速度逐渐减慢。北方墓葬以土坑墓或土洞墓为主，形制多样，但总的来说都是长方形墓室前有一条墓道；南方墓葬则多为砖室墓。北方土墓、南方砖室墓的格局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传承千年的。

宋代之后，南方继续流行砖室墓，北方则由于长期为少数民族统治，在墓葬形制方面显现了文化借鉴与交流，如契丹族、女真族的圆形砖室墓，蒙古族的秘葬等。南北方墓葬文化的差异致使南北方盗墓者盗墓方法各有不同，经年累月，经验和技术不断成熟、固定、传承，最终形成南北方两大盗墓派别——“南派”与“北派”。

北派粗放器精良

北派盗墓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盗墓者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北方地区土质较黏，所以墓葬多为土墓，只有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为砖室墓或凿山为陵。针对北方土墓的特点，一种方便而又能快速、准确定位墓葬具体位置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洛阳铲。

洛阳铲是洛阳地区盗墓者惯用的一种寻找墓葬的工具。洛阳铲的端部用金属锻铸而成，截面呈月牙形状。使用时利用惯性将洛阳铲插入土中，再向上提起，铲头就能带出土来，根据洛阳铲带出的土，有

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判断此处是否有墓葬。一般说来，有墓葬的地方，洛阳铲带出的土为五花土，没有墓葬之处的土为生土。盗墓者提着洛阳铲在选定的墓区中四处勘探，最终确定墓地的精准位置。由于洛阳铲携带方便、用法简单，又能准确探测出墓葬所在，因此在中原、北方地区十分流行。可以说，洛阳铲是北派盗墓的象征。

利斧也是北派盗墓常用的工具之一，作开凿墓葬时用。尤其是对于汉代有黄肠题凑的大墓，利斧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除此之外，考古者在发掘墓葬时，经常能在先前被盗过的墓葬中发现凿、耜（sì）、镐、锹、镰刀等，这些都是北派盗墓者偷坟掘墓得心应手的工具。北方墓葬的盗洞一般开在墓顶正中，盗墓洞直径大概在0.4米至0.7米，因此锋利的工具对于北派盗墓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寻找墓葬还是发掘墓葬，北派盗墓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只是单纯依靠工具锋锐，所以我们将北派盗墓称为“粗放型”。

与北派盗墓者相比，南派盗墓者的绝活是寻找墓葬。在寻找古墓的过程中，南派盗墓者用各种技术与先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可谓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型”。

南派集约技为先

南派以今天的长沙地区为中心。由于南方地形复杂，墓葬埋藏的地理环境多样化，致使墓葬所处环境各有不同，寻找起来相对困难，而南方墓葬多以坚硬的青砖作为建造材料，也使得北派中的洛阳铲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南派盗墓者的重点和难点便在于如何寻找深藏地下的砖室古墓。有人形象地用中医诊疗的步骤形容南派盗墓技术过程，即望、闻、问、切。

望就是看风水。墓葬选址都是依风水而定，一般所谓的风水宝地、荫庇子孙之所，如依山面水之处，必然也是墓葬聚集之地，而且根据风水，还可以判断墓地的大小。除了风水，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对于南派盗墓者来说，也可传达出重要信息。老一点的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查看地势，看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按照士夫子的解释，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会有大墓存在且墓的规格高，陪葬宝物既多且精，许多是国之重器。以风水之术预测地面有无标志墓址，几乎百发百中。

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若发之，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半信半疑，"蔡夫子"可能是想在众小子面前故意露一手，于是打赌："若发之，无古墓和珍宝，我自己愿输一千银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我将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几百件。后来这批宝物被蔡民卖给美国一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后蔡氏在长沙子弹库盗掘出著名的战国缯书，同样被美国传教士弄到了国外。

闻，为闻气味，依气味的不同来分辨墓葬的有无。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在踩点时，若发现墓葬所在位置，便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大体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这听起来似乎玄之又玄的方法，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历代墓葬的填土、墓葬填充物不同，因此墓葬可以散发不同的味道，如秦汉时期墓葬中常常灌注水银、随葬朱砂防腐，而唐宋之后墓葬外侧习惯涂抹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许一般人难以察觉，可那些世代以盗墓为生的盗墓者却能敏锐地辨别出这些气味，从而进一步精确定位墓葬所在地。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这些人一般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和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历史、传说、地名、古迹等无一不透露着遗迹的信息，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即使在今天的考古调查发掘之中，古地名、古传说仍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的村庄以"窑"命名，那么就要注意方圆百里是否有过烧窑遗址的存留。而地名中有"王坟"二字的，其地多半有大型墓葬）。因多年练就的功夫，加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的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长沙的士夫子的盗墓方法，主要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其位置与年代，随后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挖竖井式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盗洞笔直向下，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来踏足，双手将洞内装土的畚箕举上来。再向下挖时，就采用搭人梯的方式。当接近棺椁部位时，就由有经验的"师傅"亲自探索，如果棺椁保存尚完

好，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如果棺椁已经腐坏，“师傅”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就是很小的印章也能找到。

切，为根据土层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和大小，一般的做法是用工具在地表打几个洞，通过洞来判断墓葬具体方向、大小，然后顺着洞在墓中棺材里摸死者身上的物品。用手摸出土物品，以判断物品的价值大小。

第一是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找到病源，也就是古椁室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棺头椁尾，盗取葬品。位于长沙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墓曾先后五次被盗，陪葬的顶戴花翎等珍物被盗得片甲无存。据考古人员清理发现，几次被盗几乎每次都是从墓顶直接打洞进入墓室的。

第二是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古人死后，据说在尸体的各窍放入玉器等物填塞，可避免腐烂。于是，许多贪得无厌的盗墓者便连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1994年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出的楚国贵夫人尸体，之所以遭到劈棺抛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敲开、牙齿被敲碎之祸，主要是盗墓者想从这些地方找到藏匿的珍宝所致。

第三是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凡行内高手所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价值几何。这个妙法主要是靠经验取得，若无常年与出土文物打交道的经验，再伟大的天才也望之不及。业内高手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胜算很高。

听，是盗墓中的综合功能，由听而观察世界万千事物的异同，从中对心中所期望的目标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派盗墓者们多是依靠技术寻找墓葬所在位置，这些技术往往都有科学依据，并非无稽之谈。

环境的差异、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促使南北方文化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而千百年来屡禁不止的盗墓行为也在这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走向分化。无论北派还是南派，都因地制宜地将盗墓技术推向各自的高峰，同时也为文明传承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厄运。

第五章　盗墓者动机揭秘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盗取财物为首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盗墓者们也不例外，也许自社会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产生的那天开始，盗墓者便如影随形地跟踪着古墓。正是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他们无视法律的严厉制裁、传统道德的无情唾弃，走上了盗掘古墓之路。

盗掘古墓获利之大简直超乎人们想象，个人的盗掘行为固然能令人一夜暴富，军事集团发掘古墓所敛财物甚至可以支撑一个政权的开支、维持一场战争。

仿佛是为了支持“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说法，盗墓者们也未因墓葬规模小，所藏随葬品不多便轻易放弃。在盗墓疯狂盛行的年代，大墓被盗一空，小型平民墓葬也难逃一劫，即使只有随身衣物，也被盗墓者席卷而去。东汉王充《论衡》中提到“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说明挖平民墓葬盗取衣物的事情在当时司空见惯。东汉末年，军阀李堪进入长安，军士缺少衣衫，李堪便纵兵发掘平民坟墓，将死人身上未腐烂的衣服剥下。

看来古人所说的“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们摒弃了一切道义与恐惧，铤而走险，唯利是图。

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缘故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曾经流传甚广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

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这些盗墓者，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者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魏晋间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曾经“着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王公贵族和凡夫俗子们都会毫不吝惜地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营建自己身后的极乐世界。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更是变本加厉，浪费奢华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前221年秦始皇称帝起，到1911年宣统帝退位止，在这2132年的时间内，前后共出现了二百多位皇帝。每一位身后都留下一座不折不扣的“国家宝藏”。这些宝藏，有的能够千年不腐，有的已随时间而逝，有的惨遭盗掘，还有的仅仅存在于传说中……自诩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死后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了地下陵墓。这是一座险些把整个大秦帝国在地下翻版一样的陵墓，如果不是陈胜、吴广起义，它还会永无止息地修建下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挖至泉水之下，然后用铜汁浇铸加固。墓宫中修建了宫殿楼阁和百官排列的位次，放满了奇珍异宝。为了防范盗窃，墓室内设有一触即发的暗箭。墓室顶部饰有宝石明珠，象征着天体星辰；下面是百川、五

岳和九州的地理形势，用机械灌输了水银，象征江河大海川流不息，上面浮着金制的野鸡；墓室内点燃着用鲸鱼油制成的“长明灯”。陵墓周围还布置了巨型兵马俑阵。陵墓的设计，处处体现了这位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样也不甘示弱，在他即位后不久（前139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寝，一直持续了53年，在他死后工程才完工。汉武帝动用了国家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从茂陵修建之初，年年都有金银财宝藏入地宫，直至汉武帝刘彻死后入葬，地宫已被装得满满当当。茂陵的地宫到底有多大呢？史书记载“地宫占地一顷”，按照现在的尺寸来计算，地宫占地约5334平方米，这是一个怎样的地下宫殿啊！我们单看茂陵的陪葬品，就能知晓那时候的厚葬之风有多么严重。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地宫内充盈了大量的稀世珍宝，例如，康居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古代社会厚葬的盛行，使社会财富渐渐向帝王贵族的墓葬集中。到了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依然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老佛爷”之欢心。那个把两代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那拉氏，不仅让凤高高地飞翔于龙之上，还把她的陵墓修建成清东陵中最精美、最豪奢的一座地宫。

太监李莲英曾经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李莲英和其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大约有一尺厚。仅慈禧身穿的那件绣珠服褂就价值265万两白银，凤冠上那颗大珍珠价值10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朝库存白银还不足7000万两。这个疯狂的西太后，恨不得把大清国全部的家当都带入地下。

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每个王朝的末年都是最混乱的时期，群雄争霸，盗匪横行，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个时候正是盗墓者掘坟挖墓的大好时机，历代王朝的陵墓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掘的。秦始皇陵埋藏丰富的宝物，必然会引起各种人物的觊觎。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说，项羽率众攻人咸阳之后，派30万人运了一个月都没有把秦始皇陵里面的东西全部运走。随后，关东盗贼又将铜棺窃去。后来，一个牧羊娃手持火把进入墓穴寻找遗失的羔羊，不慎引起火灾，大火持续烧了90天，将陵墓变成了一片焦土。

《晋书》曾记载了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

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nǎng）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做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盗墓只为取墓材

发掘他人坟墓，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将他人坟墓的材料拿来作为自己修建坟墓或其他建筑的材料。墓葬的材质多为土坑墓、砖石墓、石室墓等，许多墓葬上还有祠庙等建筑，一般用木材建成，于是发墓取材也就成为盗墓的一个重要原因。

《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做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只朱雀尾巴和一条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笞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做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

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1公亩（合100平方米），高约3米，墓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古人对墓葬建设的投入是很大的，有些建筑用材，不仅设计精美，而且持久耐用，为他人所垂涎眼热。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发掘墓葬取墓材，用来修建自己的墓穴，或者作为其他建筑用材的主意。

为了借用他人的墓材而盗墓，在古代屡见不鲜。

宋朝时，挖掘墓材，已经成了比较普遍的盗墓行为。致使一些人在修建墓葬时为了避免被盗贼挖掘，不再使用砖头和木材。北宋的吴春卿死后下葬，向下深挖两丈五尺，然后再按照棺材的大小挖坑，将棺材放进小坑，上面铺上东西掩盖，将两丈五尺深的大坑用土填充夯实，不用砖头。吴春卿埋葬先人，也是采用了这种办法，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将砖头挖走他用。

明朝正德四年，大太监石岩修建墓穴，但是没有可供使用的大砖有人向石岩建议说：“附近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古墓，里面有许多大砖，可以拿来使用。”于是石岩派人将那座古墓拆除，将里面的大砖全部挖了出来，用来垒砌自己的墓室。根据古墓的碑碣，被挖掘的古墓，是北宋名相王安石的墓葬。

历史上最有名、手段最为高超的墓材盗用事件，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贪图明十三陵中的金丝楠木，置九五之尊的颜面于不顾，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发墓掘坟占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

例。六朝时的达官显贵死后多葬于金陵梅岭。南朝时的陈国有个叫做陈叔陵的人，他母亲去世前希望死后能安葬在梅岭。但梅岭作为六朝时的风水宝地，好一点的地方早已有坟墓。陈叔陵便掘开东晋著名宰相谢安的墓，将其灵柩取出，用原来的墓圹，把自己的母亲安葬进去。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铩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他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没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做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政治惩罚显威严

开棺戮尸不仅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对被戮尸者的亲人也有很大的伤害。开棺戮尸常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运用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之间。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䶥（zhā）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泄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十六国时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皝（huàng）于咸康八年（342年）攻打高句丽。前燕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高句丽屡败于前燕。是役，前燕出兵4万，大将慕容翰与高句丽王钊大战，结果前燕大胜，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高句丽王钊单骑出逃。慕容皝没能俘虏高句丽王钊，为了彻底挫败敌方锐气，他发掘了前代高句丽王钊的坟墓，将其枯骨带回燕国。高句丽无奈，只得向前燕称臣纳贡，才在第一年换回了尸体。此举极大地打击了高句丽，从此高句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与前燕国抗衡。

开棺戮尸不仅可以打击军事上的敌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打击政治对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为皇帝的时候，是在朝廷铲除韦氏，平定外戚之乱之后。为了彻底肃清朝堂上的外戚势力，并以此为鉴杜绝今后外戚的发展，唐睿宗对有罪的外戚进行了夷墓、斩棺、戮尸等严厉的惩罚。武三思是武则天时代之后继续干权乱政的武氏家族成员，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当时的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父子。据《旧唐书》记载：“及睿宗李旦继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

墓，开棺暴尸，夷平坟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攸暨虽然一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乱被赐死，其时已死的武枚暨也受到牵连，被平毁坟墓。唐中宗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当属皇后韦氏一族，韦氏被诛杀后，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堂兄韦询的坟墓夷平。唐睿宗通过这些看似残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惩罚了唐中宗时期专权乱政的外戚，并彻底杜绝了之前唐代数十年外戚乱政的现象。

在这方面，清朝雍正年间，吕留良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

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掘坟毁墓虽然有失道义，但却能在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帝王权臣都会将这种方法作为政治手腕加以运用。

挖祖坟破坏风水

中国古代出现的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数不胜数，而盗墓之所以被世人视为断子绝孙的行为，也是因为祖宗的地气被泄露，所以才恨得咬牙切齿。

古人在墓葬的选址上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相信墓葬选在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可以庇荫后代，给后人带来福祉。同样，如果对头有了一个好风水的墓地，尤其是对于帝王来说，就极有可能会使山河变色，

被人取而代之。因此，破坏对手墓地的风水宝地，以求自安，也是一种盗墓的动机。

从战国到明清，曾经涌现出众多研究地理风水、气脉的堪舆高手，这些著名的地理师门集天文、地理、自然于一身，不仅堪龙踏脉，还精于通过考察自然来预知未来。史书记载，三国时的管骆堪舆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日，他随军西行，路过母亲的坟墓时不由得大惊失色地说："林木虽茂，但不能长久。玄武无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齐备，法当灭族。"时不过两年果然应验了他的话。

古代堪舆理论认为：凡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存空间的优劣，无不是"气"的作用。如果谁家的墓茔葬在了风水宝地，就选中了生气之地。得生气的地穴才是活穴，不仅能荫及子孙，还可以保江山社稷不倒。这也是古人，甚至今人都会花大工夫大把钱请堪舆师寻找风水宝地的主要原因。民间传说，朱元璋这个穷和尚之所以能够开创大明王朝，成为了九五之尊，就是因为他的祖坟葬对了地方，恰巧那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

先人们曾经把"气"分九种，其中最为尊贵的是帝王气。帝王气内赤外黄，或赤云如龙，气游于天，此种云雾森然如华盖，有时呈现出五色，多数出现在早晨或黄昏。如果某地出现帝王之气，将有真命天子出现，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在身边网罗了一批风水界的精英，随时准备进行厌气破势。

大家不要以为干挖坟盗墓的缺德事都是民贼的专利，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史上来看，大规模的破坏墓地风水多属于"官方行为"，许多皇帝都干过挖别人祖坟的事。

《南齐书》第十八卷《祥瑞志》记载：武进县彭山是萧道成家的祖坟，那一带岗峦起伏，绵延数百里，上空时常有五色云气出现，郁郁冲天，并且有神龙出没。萧道成是刘宋朝廷的权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明帝刘或对他早有猜忌。消息传到了京城，刘或十分忌惮，害怕萧家的运势昌盛，影响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派出风水先生高灵文前去堪典。高灵文和萧道成关系密切，当然不会说老朋友的坏话。他在萧家的祖坟转了一圈，回来对宋明帝说："万岁不必将此等小事放在心上，那不过是王侯将相的运势罢了。"接着又跑到萧道成家里说："老哥，准备坐龙廷吧！你家的祖坟是块风水宝地，贵不可言，有君王之相！"宋明帝听了高灵文大师的话依旧放心不下，暗自派人到墓葬四周以打猎为名，将墓葬挖开，并且在墓室四周钉了几个四五尺长的大铁钉，企图破坏萧家祖坟的风水。可是最终也没有逃脱

被萧道成取而代之的命运！

无独有偶，唐肃宗也干过这样的事，与宋明帝不同的是，他派出去的风水先生挖坟大功告成。

大唐王朝到了肃宗李亨这一代，先是虎父犬子，接着就是兔子生耗子，当真是一窝不如一窝了。那时候注定是多事之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将大唐江山搅得昏天暗地，半路又杀出来个回鹘族的骨力裴罗。此人骁勇善战，先平西域，再破突厥，然后独霸大漠和草原，对中原这块肥肉也是垂涎三尺。唐肃宗李亨光收拾国内的烂摊子就够手忙脚乱的了，哪里还有心思来应付来自外部的威胁。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骨力裴罗做老婆。其实这也符合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男人不行就换女人，打不过别人就和亲，通过做姻亲的关系来换和平。把女儿嫁出去之前，肃宗派了一批人到回鹘去考察，摸一摸骨力裴罗的老底。考察团里有位奇人异士，在行进的途中，不停地东张西望，遇见一个小山包就爬上去，用土圭测日影，用罗盘定方向，还在纸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原来他是位风水先生，担负着寻找回鹘龙脉的重任。

什么是“龙脉”呢？自从秦始皇被称作“祖龙”、汉高祖称自己是“龙种”之后，龙就成了君主象征、比附的对象。于是，龙脉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喻义，即指那些出过帝王或有可能出帝王，或是能够安葬帝王、护佑王室后裔的山水之脉。历代帝王都花大力气为自己“寻龙探穴”，为自己也为后代选择“万年吉地”。如果挖断龙脉就会泄了王气，所以唐肃宗李亨才想到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风水先生完成了勘探任务之后，立刻快马加鞭回到长安，神秘兮兮地向唐肃宗汇报说：“皇帝陛下，经过小臣精心勘测，终于发现了回鹘的龙脉所在。就在大漠之南，一座名叫福山的小山丘，他们先祖的坟茔全部都埋葬在那里。只要挖坟掘墓并毁了这座小山丘，回鹘的王气就散了，骨力裴罗很快就会呜呼哀哉。”唐肃宗听后大喜，立刻吩咐风水先生带领大批奸细赶往福山，把它搬回来。这批人来到福山后，将山上的坟墓挖掘一空，接着用火烧，用醋灌，将小山丘分解成一个个小块，装车运了回来。不久，骨力裴罗果然死了，回鹘走向低潮，边患威胁自然解除了。

挖几座坟丘就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有如此功效，自然会深受皇帝们的欢迎，因此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成了挖坟盗墓的模范。如果谁家的坟地冒了天子气，皇帝佬儿必定会除之而后快。为了避祸远身，晋代的名臣羊祜（hù）就曾经自掘父亲的坟墓，破坏其风水，表示自己没有政治企图。

羊祜出身名门，可谓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人文武全才，兵书战策无不精通。这么优秀的条件会让所有的人眼红，出身好、长得好、学习好、口才好，拥有了做一个成功男人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注定将来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一天，有位老风水先生给羊祜家看风水，只见他详细地看了看墓地周围的地势和水流分布情况，不住地点头称许。观看完毕，老人家手捻须髯，一脸严肃地对羊祜说："你们羊家的祖坟上有龙脉，将来会出帝王！不过要小心，如果风水被破坏了，你们羊家可是要绝后的！"

风水先生可能是想多说些吉利话，多讨些赏钱，但这样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说羊家要出宰相，要出大将军，要出皇后，都没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但是要说出皇帝，那就等于谋反，等于要把现在的皇帝赶下台，这样的话传了出去，羊家不但要绝后，很可能还要被诛灭九族。

羊祜闻听此言，脸都给吓白了，事已至此，就算羊家真的要绝后也不管了。羊祜二话不说，当即吩咐家里的仆役拿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将父亲的坟墓凿开，三下两下就把龙脉给挖断了。算命先生一看赏钱泡汤了，还是不死心，又在墓地里端详了一阵，然后对羊祜说："就算你把龙脉给挖了，将来还是会出一个断臂的三公。"

三公在晋朝时是位居极品的高级官位，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相当于皇帝的心腹重臣。做官做到最后，封你为太傅或者是太保、太宰，那就说明你的官运到头了，不能再升了，再往上就是皇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位极人臣。

经过这么一折腾，羊祜躲过了掉脑袋的风险。不久，他骑马摔了下来，折断了胳膊。到了后来，正如风水先生所说，羊祜生前没有留下子嗣，由于功勋卓著，死后被朝廷封为太傅。

僵尸药用极另类

古代人盗掘墓葬有许多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原因，有的甚至用干尸入药。由于埋藏条件的特殊，有些墓中的尸体会形成干尸。而相传，干尸入药可以治疗骨折等疾病，这种入药的干尸被称做"闷香"。这种特殊的药材引来了很多盗墓者。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祐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想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壁上的文字为：“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他见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以留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做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掘墓葬的动机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于人们或贪婪、或憎恶、或愚昧的心理，才导致了“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现象。

打旱骨桩以祈雨

至于发墓祈雨，则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活动。据文献记载，明清时，山东、河南一带曾盛行过这样一种奇异的风俗，每逢大旱之年，乡民们就将刚刚下葬的尸体挖出来，加以残害侮辱。当地的老百姓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大旱天气，是由于这个尸体变成了旱魃（bá）而造成的。暴打、肢解和焚烧这样的死尸，能够祈天求雨，缓解旱情。这种利用墓中尸体祈雨的巫术叫做“打旱骨桩”。可见，这种以祈天求雨为目的的盗墓方式，充满了神秘色彩。

所谓的旱魃，是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怪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州一县赤地千里、滴水无存。《神异经》中描述旱魃时说：“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民间则认为旱魃是死去一百天之内的尸体所变。变为旱魃的死人尸体不会腐烂，坟上不长草，坟头渗水，旱魃鬼会在夜间往家里挑水。只有烧了旱魃，天才会下雨。

过去，如果遇到久旱不雨，谁家的新坟坟头有湿润泥土，就说这座坟里出了旱魃。据说旱魃能喝尽天下的水，并且以活鸡为食。所以，出现旱魃的新坟不仅坟头湿润，而且在墓地周围还能发现许多鸡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打旱魃：先掘开坟墓的封土，露出棺材后立即用一张大鱼网扣住，以免旱魃逃跑。蒙好网，将棺材钻一圆孔，把装好药和沙子的土枪伸进去，“轰”的一声，将棺材轰得四分五裂。人们一拥而上，用钩、锨、钁头等铁器将尸体拖出刨碎，拖着这些零碎四处奔走。把旱魃尸体的碎块拖到哪儿，哪儿就会下雨。

捉旱魃时，人们的嘴里还要唱念着以下的词谣：“烧死你旱魃！烧死你旱魃！我田地的禾苗要成长，我山上的树木要成行！我要五谷丰登仓廪满！我要六畜兴旺无虫蝗！我要云要雨要风调雨顺！我要吃要喝要清水满缸！我村子里的子孙祈雨求龙王，我献上猪、牛、羊……”

这种“打旱骨桩”的风俗，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袁枚在《子不语》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为了求雨而盗墓的完整故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京师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灾，一时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有一个叫张贵的驿卒，骑着快马给某都统传递公文。这天来到良乡地界，张贵只顾奔行赶路，竟错过了投宿，不知不觉来到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正在行走间，忽然刮起了一阵黑风，吹灭了张贵手中的火把。紧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张贵只得下马，来到路边的邮亭寻了一个所在，准备在此过夜。这时候，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美丽女子提着灯笼翩翩而至，少女生得花容月貌，柔媚入骨，张贵一见，顿觉身体酥了半边。陌生女子轻启丹唇，邀请张贵到她的家里一叙。张贵牵着马跟在女子的身后，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处府第。女子奉上清茶，将张贵的马栓到柱子上，表示愿意和张贵同床共眠。张贵喜出望外，和女子缠绵了一夜。

鸡叫时分，女子披衣起身要走，张贵怎么也挽留不住。送走了女子，张贵感觉身体疲倦，又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觉得寒露清凉，感觉有杂草刺口鼻。醒来一看，天光大亮，自己却在荒郊野外的坟头之间躺着，不由得大惊失色。张贵站起身来，急忙上马行路，这时已

经错过了投递文书的时间。当张贵一脸狼狈来到衙门时，都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吩咐手下的人将张贵重责四十大板，张贵无法，只得将实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都统听后半信半疑，派人到那座坟墓去查看，并走访了附近的人家，得知那里埋葬着一个姓张的女子。这个女子在出嫁之前曾和人通奸，事情败露后羞愧得上吊自尽，变成女鬼之后经常引诱过往路人。有人说道："这是旱魃。形状像猴子，披头散发，用一只脚行走的，叫做兽魃；自缢身亡的僵尸，出来迷惑人的，叫做鬼魃。将旱魃擒住，用火烧死，可以消除旱情，引发降雨。"在征得上司的同意后，人们将棺材开启，果然看到了一个女僵尸，浑身生长着白色的绒毛。于是众人将它焚烧，第二天果然降下了大雨。

在许多民族的求雨习俗中都遗留着与此类似的原始巫术形式。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在《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中写道："有时，求雨巫术是用死尸来进行的。比如，在新喀里多尼亚，求雨者把自己全身涂黑，挖出一具尸体，把它的骨头带到一个洞穴里，再按人体形状连接起来，然后把骨架悬挂在一些芋叶上，用水浇洒骨架，让水流到叶子上。""俄罗斯有些地区的农民一旦陷入旱灾的痛苦之中，便常去挖出喝酒醉死的人的尸体，把它沉入最近的沼泽或湖水之中。"甚至也有类似"残其肢体"的行为，"1868年，因长期干旱，出现了欠收预兆，塔拉申斯克乡的一个村子的居民挖出一具死尸，一些人一面鞭打那具尸体或尸体残剩部分，一面在它的头部附近高喊：'给我们雨水！'"中国求雨民俗中的"打旱骨桩"，很可能与弗雷泽所记述的做法在原始动机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

"打旱骨桩"残害墓主的尸体，伤害墓主家人的感情，这明显有违人伦、有伤风化。这种风俗之"恶"还不止于此，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人竟然利用"打旱骨桩"之名，行报私仇之实。他们打着攘除旱灾的旗号，煽动迷信愚昧的群众，将冤家对头的坟茔刨开，毁尸泄愤。明朝弘治四年（1491年），河南、山东等地官员对此进行了大力整治，并且对带头的人进行了处罚，其他参与者全部流放到偏远地区，这股歪风邪气才算消减下来。尽管如此，"打旱骨桩"祈天求雨，在民间还是屡禁不绝，时常会死灰复燃。

"打旱骨桩"可以致雨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能够沿袭如此久远，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民俗，或许这种民俗隐含着某种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神秘文化信息。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民俗是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神奇能力的。

病态盗墓成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南史·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书·始兴王叔陵传》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昼伏夜游，恒习奸诡，抄掠居民，历发丘墓”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鞭尸挫骨以泄愤

墓葬是人们死后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丧葬，对一个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掘其坟墓；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也莫过于鞭尸挫骨。因此，在古代，掘仇人坟墓，对其尸体进行侮辱，是一种极端而又常见的复仇泄愤手段。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生性残暴，汉献帝初平元年（196年），董卓进入长安，自封丞相，大权独揽，对以往故人睚眦必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曾与董卓有仇，此时何苗已经被人杀死，董卓仍没放过他。史书记载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消边”，以泄当年之仇怨。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燕与赵国临近，常年征战不休。一次，前燕国主慕容儁（jùn）梦到赵国国主石季龙咬啮他的尸骨，一怒之下便下令将早已死去的石季龙坟墓挖开，将之鞭尸并弃尸于漳水。

挖墓只为认血亲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盗墓动机。渗血认亲，和古代的“滴血认亲”属于同一种原理，是古人进行“亲子鉴定”的一种手段。《洗冤集录》中记载的“滴骨认亲法”，就是对渗血认亲的最好说明：“某甲是父或母，有骸骨在，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何以验之？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是亲生，则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俗云‘滴骨亲’，盖谓此也。”

“亲子鉴定”古已有之，南北朝时期，梁豫章王萧综就曾经掘开自己老子的坟墓，来认祖归宗。

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本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宠妃。梁武帝萧衍称帝后，将吴淑媛纳入后宫，此时吴淑媛已经怀上了萧宝卷的孩子，她将此事隐瞒了下来。七个月后，吴淑媛生下了萧综，当时大家都认为萧综是萧宝卷的儿子。萧综长大后被封为豫章王，很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他曾到齐的宗庙和齐明帝陵私服考察，可是依旧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世。他听说有一种“渗血认亲”的方法，就是将生者的血液滴入到死者的骨头上，如果渗下去，就是一家人，具有血缘关系。

于是，萧综就私自盗挖了萧宝卷的墓穴，取出萧宝卷的尸骨，进行渗血认亲。果然由此证实自己是萧宝卷的儿子。

后来发生的事情，则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萧综为了验证渗血认亲的准确性，竟然将自己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次子杀死埋葬，接着让手下人连夜将儿子的尸骨挖掘出来，和自己进行“渗血认亲”的试验，最终的结果是“皆有验”。当萧综得知自己不是萧衍的亲生儿子之后，便常怀异志，不久就投靠了北魏，改名萧缋，并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综在北魏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和骠骑大将军，31岁时生病死去，死后北魏按照王侯的礼节将萧综下葬。538年，萧衍令人将萧综的墓葬盗挖，取走尸骨。萧衍到此时还蒙在鼓里，坚信萧综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将萧综的尸骨归葬在家族的陵园里面。

第六章　盗墓工具曝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盗墓工具面面观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的方位。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且任重道远！

紧跟时代日益精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人，时间是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采用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河南洛阳城历史文化悠久，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基于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历史上的厚葬之风。历史上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至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在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他便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作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20世纪80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

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序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20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如果是一把好的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白蜡杆并且接上特制的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之后，铲头里面会带出一筒土壤。

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洛阳铲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文化遗存进行普查探测。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盗墓奇兵洛阳铲

盗墓的第一步自然是如何找到墓葬。古代大型墓葬上方一般都有封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岁月的侵蚀，封土渐渐被削平，而封土上的树木更是不复当初。大墓尚且如此，寻常小墓更加难寻踪影。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探测墓葬位置、距地表深度的简单方便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盗墓奇兵洛阳铲。

洛阳铲又称探铲，长约30厘米，直径约6厘米，形状为半筒状，截面呈月牙形，头端打磨尖锐，尾端有一个梁，用来插一个长约2米的木杆，而木杆的另一端装置一个铁环，铁环的用处是用来系绳子，加深洛阳铲的探测深度。使用时，一人双脚分立，提着木杆用力将洛阳铲垂直插入土中，提上来的时候，半筒状的铲头上便携带了土，将土倒出后，再将洛阳铲顺着先前的洞再次插入，如此反复，提上来的土便是打探这一点的垂直土样。盗墓者就是通过对土样的观察确定墓葬的。

没有墓葬地方的土叫做生土，一般为黄色，土色纯正，没有杂色，土质相对细腻。有墓葬地方的土颜色一般比较混杂，如黄色中夹杂红色、黑色等，这种土叫做五花土。因为修建墓葬时，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墓圹，下葬之后便将先前挖的土回填到墓中。不同深度的土颜色、质地各有不同，挖墓过程中便混杂了不同层次的土，因此五花土颜色、质地都不如生土纯正。五花土特殊的成因和特点，使其成为判

断墓葬的依据，有经验的盗墓者只要探到五花土，就能确定探测地一定有古墓。另外，一些大型古墓下葬后填土时，会将土夯实，以使墓葬更加牢固，因此夯土的质地都很坚硬。用洛阳铲打探碰到夯土，如果不是古代建筑遗址，便一定是墓葬。

洛阳铲打探简单、准确，常常一铲下去，便会打到随葬品甚至是人骨，不仅盗墓者对它十分垂青，就连专业考古工作者也将洛阳铲视为不可或缺的探测工具。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洛阳铲不仅能探测出墓葬所在，还能确定其他类型遗迹，如建筑址、聚落址等，并通过密集打探，大致确定遗迹的分布范围和深度。秦始皇陵园范围就是利用洛阳铲探测出来的。由于洛阳铲木杆拴绳后可以延长，在秦始皇陵园勘探中，有的地方遗迹埋藏较深，洛阳铲打探深度整整有20余米。

铁斧蜡烛老鼠衣

如果说洛阳铲在盗墓者手中属于训练有素的“侦察兵”的话，那么铁斧和铁锹则是克敌攻坚的“重型武器”。当洛阳铲探定好墓葬的具体位置之后，就需要挖盗洞，进入墓室，掠取宝藏。这时候，铁斧和铁锹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人结伙或者数人结帮的盗墓团队，他们用铁锹挖出一个可供一人进出上下的盗洞，派人手提灯笼进入墓室。对付木质葬具，最好的东西就是斧子。汉人所推崇的黄肠题凑是由柏木心堆垒而成，十分坚固。但是在大斧的重击之下，依然会变得不堪一击。即使有墓墙阻隔，铁斧所到之处，照样也会畅通无阻。

制做的铁斧和铁锹，是由经验丰富的铁匠用精钢反复锻炼打造的。其重量轻，软硬适度，既不会因为质地太硬而易断，也不会因为质量太次而影响挖掘效果。铁锹和铁斧的柄，用粗细长短适宜的坚硬木棍做成。粗细以容易手握为度，长短以容易轮转砍劈为宜。

除此之外，铁镐和精钢打造的铁凿子，也是古代盗墓者挖盗洞进墓室所不可缺少的“重型装备”。铁镐和铁凿子用来开启棺木与凿启墓墙砖，当盗墓者进入墓室后，如果棺椁封闭良好，就会用斧子劈、镐头刨、凿子凿的方法开启棺木，盗掠陪葬品。

当盗墓者进入地下数米甚至十几米的墓室，除非有火眼金睛，否则不得不借助亮光。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像皇陵贵族的墓葬那样豪华

宽敞，金银财宝一目了然。有好多墓葬，由于日久天长，棺木腐烂变坏，一些陪葬品是很难搜寻的。有经验的盗墓者，会拿着竹签在碎土中仔细搜寻。如果没有极好的眼神和明亮光线的配合，很容易将这些宝物错过。

在古代的盗墓者当中，最常用的照明工具是火把和蜡烛。古代的火把一般用松树木棍加上松油或者动物油脂做成，燃烧时间长且亮度高；蜡烛则是较粗的那种，燃烧时间长，容易放置。现代盗墓者大多用手电和打火机，手电是特制的巡防强光手电筒。在深邃悠长的盗洞和墓道中，手电的一束强光，会有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打火机则可用做不时之需，在一些狭小的空间，手电派不上用场，打火机就可一展身手。

照明工具是盗墓者的必备之物，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群体属于“地下工作者”，像老鼠一样在夜间行动，在搜罗宝物时更需要借助于灯光。照明工具不仅仅可以方便作业，还有一项重要的“保命”功能——如果发生“鬼吹灯”的现象，盗墓者必须立刻逃出墓穴，否则将缺氧致死。

盗墓是非法的行为，不能在墓地周围久待，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目标，所以盗墓需要行动利落，简单明了，那么身穿老鼠衣就是最佳选择。

老鼠衣是一种连体套装，是由粗布、麻布或者帆布缝制而成，紧身合体，不会勾连扯拽，不怕剐蹭，也不会将沙子尘土弄到身体里面去。穿上老鼠衣的盗墓贼动作敏捷，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夜行老鼠，手脚并用，探洞、挖坑、进墓、起宝、走人，工作效率极高。连体衣上布满了许多小口袋，里面携带着多种多样随手可用的工具，就像电工的工具夹一样。老鼠衣全身连体，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可爱娃娃的造型。不过，这可不是在搞笑娱乐，而是窃墓大盗的生财之宝。

穿老鼠衣的同时，还要戴上手套，这也是盗墓者必备的常用工具之一。除非盗墓者有少林寺金刚指和二指禅的功夫，否则就要保护好他自己那双生财的手。如果不想让十指皮开肉绽、指甲脱落，带上防护手套，铲挖手抠，才能无所不用其能，无所不用其巧。戴好手套，手拿铁锹、铁斧、铁铲，风车似的劳作刨挖。要赶时间，天亮了就得撤了。贼不走空，怎么着也不能白忙活。

妇孺皆知分土剑

分土剑是民间传说中的盗墓工具，在中国古代甚至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分土剑的起源来自于一个中原地区的民间传说。

在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很大的王公陵墓，里面埋葬着无数的奇珍异宝。死者入殓时，他的家人为了使尸体不腐烂，在他的口中放入了一颗夜明珠。这颗夜明珠可不一般，有鸡蛋那样大，通体呈碧绿色，晶莹剔透。夜明珠在放入死者口中之前有人曾在晚上见过，发出的光就是在百步外也能看见。墓主人为了在死后得到安宁，并能够保住大量的陪葬品不被盗墓贼盗掘，就在修建陵墓时设置了许多道机关、布满了暗器。若是有盗墓贼闯入，必定会被暗器和机关所伤，甚至陪葬。而且，这座陵墓的封土十分巨大，没有大量人手来挖掘是不会打开陵墓的。

因为有了这些防盗措施，墓主人下葬数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受到盗墓贼的侵扰。然而，这座戒备森严的大墓却被一个南方人轻而易举地盗掘了。这个人制胜的法宝就是他身后背的那把分土剑。这个人来到这里后，先是住在了陵墓旁边的一个村庄里。白天，村民们见他悠闲地散着步，没有任何异常，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奇特的本事。

但是这个盗墓贼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地溜出了住处。他身上穿着一身奇特的夜行衣，攀援腾跳十分灵活。他不走大路，直接从村民们的房顶、墙头而过，不一会儿就出了村，来到了大墓旁。他一个箭步就窜上了高高的封土顶上，接着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到了地上，似乎在听着什么声音。就这样，他在封土的顶上仔细地探听了一阵，然后轻松地站了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小心地向四周望了望，看见没有人发觉，就从身后抽出分土剑，对着选好的墓道方向，用力地刺了下去。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随着剑的插入，剑身两侧的封土迅速地裂开，不一会儿，居然形成了一个洞口。那个人顺着洞口向下走去，随着剑的前进，地下的墓土也都被分裂开来。就这样，没过多久，他就顺利地进入墓穴的内部。

他用剑护住自己的面部，在墓室里进行了详细的探察。奇怪的是，那些传说中的机关、暗器一个也没有发作。之后，他按着道家的九宫八卦阵中的“生死休开”的路径顺利地来到了棺材前面。他毫不犹豫地用分土剑去撬棺材。那体积巨大、密封极严的棺材盖被他轻轻一拨，就露出了一道足可以探进一个人的缝隙。他从死者的口中挖出那颗传说中的夜明珠，用一块红布包好，紧紧地束在腰里，又按着九宫八卦阵中的“生”路退了出来。到了洞口，就顺着来时的路回去了，并迅速逃离了村庄。

第二天，村民们见这个南方人一直没从家里出来，都很奇怪，到

他屋里查看，哪里还有踪影？人们都对这个人的诡异行为很吃惊，这时，有人报告说陵墓封土上出现了一个洞。村民们纷纷跑到陵墓上面去查看，只见墓顶上果真有一个能供一个人出入的洞，里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大家都不相信那个人能在一夜之间挖下这个大洞，就把他的神秘行为与他身后背着的那把分土剑联系了起来。这个南方人用分土剑盗夜明珠的事就这样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神。到后来一旦出现陵墓一夜之间被盗的情况，就风传是分土剑的原因。

其实，并没有一个人见过分土剑，这种盗墓工具的真实性也就不可考证了。后来有人认为这种传说极不可信，不过是技艺高超的盗墓贼为了迷惑众人所编造的谎言罢了。

此外，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还有螺旋铲，也是盗墓贼专用的盗墓工具。螺旋铲是用来打洞挖土的，铲头由三片锋利的铧犁叶片组成，与我们现在使用的电风扇的结构很相似。螺旋铲的后部还装有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很像现代的割草机。这种工具十分方便，不仅可以挖土，还可以把土排出去，提高了盗墓效率。在遇到墓室砖墙时，还可以利用它的旋转来打通墓砖。

像分土剑、螺旋铲这样的民间传说还有很多，但是这些传说中的盗墓贼使用的专业工具大都不具科学性，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

招摇炸墓最得力

炸药是最得力的盗墓利器，却又最不常用。没有相当的势力和抵制外界干扰的绝对勇气，谁也不敢用撼天动地的炸药来“招摇炸墓”。可是，用炸药来对付古墓却是最有效的办法。用洛阳铲打出碗口大小的深洞，放入雷管和炸药，引爆后瞬间就会出现一个可供一人进出的洞。一次爆炸，相当于盗墓者几个小时的艰苦劳作。所以，炸药是盗墓者最为推崇同时也是压箱底的利器之一，再坚固的坟墓在炸药面前也会不堪一击。

1946年1月21日，位于南京附近的梅花山突然戒严，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禁绝来往。国民党部队51师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士兵趁着夜色，将150公斤TNT烈性炸药运上山顶。这些炸药，就是用来炸毁汪精卫的坟墓的。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是墓穴顶部却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相当坚固。可是再硬也硬不过炸药。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

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

毁墓的命令是1月中旬下达的，南京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义正辞严地说："汪精卫的坟墓葬在梅花山，和国父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果不将其迁走，有碍各方面的视听。"随后，何应钦将建议上报给当时尚在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揭开棺木，只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尸身着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汪精卫的马褂口袋内有一张长约3寸的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字。这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从日本接运汪尸时所写的。随即汪的棺椁被拖出坟墓，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抛开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恩怨，从民族大义上说，用炸药来炸开这个汉奸的坟墓也称得上是大快人心。

盗墓工具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烈性炸药上，暴利的吸引，使得现代盗墓者的工具更加先进，盗窃技术更加具有科技含量，更加智能化，对于墓葬的损坏也更为严重、快捷。

第七章　盗墓者的技法
——手眼通天，鬼蜮伎俩

盗墓手段屡创新

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民间盗墓活动非常隐秘，自古以来这个行业就存在，而随着收藏风气的兴起，其活跃程度也随之起伏。近几年，盗墓活动又随着古董热的升温而变得益发猖獗。

与国家有组织的保护性挖掘相比，盗墓者是极其聪明的。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工作很细致，甚至用刷子干活。方式上几乎全都是“大揭顶”（地宫庞大的明清墓除外）。而盗墓者则不然。历朝历代对盗墓行为都在法律上给予严惩，现代更是如此，所以其“时间”观念和“隐蔽性”就很强。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中使用最多的刷子、木铲对盗墓者来说是没用的。

对于盗墓贼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墓的地点和想好盗的方式。

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

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庄稼的长势一般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

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

比较确实可信的是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陵墓的地点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盗掘。对于盗墓者来说，这并不是难事。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

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对付规模小的墓葬自然是连夜赶工取走珍宝，在天明之前消遁无形，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对付规模较大的墓葬，必须采取持久战，这时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在墓葬周边开荒种田，播种玉米、高粱等高秸秆农作物。等它们长高后，利用青纱帐做掩护，将墓葬挖掘一空（安全，只是得等庄稼长高，需要耐心）。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趁机洗劫墓内财物。三是在古墓旁修建假坟，施工时暗中挖掘地道，进入墓葬内盗取财物。

不管用什么方式伪装，最后都得挖个盗洞进去。盗墓者确定墓葬的大致位置后，一般直接在地面垂直挖洞进入墓室，留下的盗洞大多是圆形的。但有些大墓比较深，直接开挖通道很容易塌方，搞不好就会把盗墓者压死或关在墓里面，于是出现了事先在墓穴的上方挖个大小仅容一人操作的方形洞口的做法，这样可以避免塌方。随着盗墓技术的成熟，出现了迂回挖洞的方法，盗洞也由圆形变成了方形，并在四面装木板，利用木板的支撑作用，基本可以避免塌方，得手后或火烧木板或将木板抽出，防止留下痕迹。

然而，“最先进”的盗墓手法还是洛阳铲加定向爆破。盗墓贼先用洛阳铲确定墓葬位置，然后使用定向爆破技术，很容易就能将墓葬盗空。

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就是被这种方法盗劫一空的。盗墓贼居然花了4个月的时间，打了一条2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了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然后，这个盗墓分子采用定向挤压式爆破的方式，一下子就打开一个40米深的大洞，能够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

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被称为“关中式盗墓”，即先在地面挖一个方形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操作，同样是垂直下挖。解放前，盗墓贼确定墓葬后，一般会选择在偏远的角落迂回挖洞，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他们吃住在洞里，工期可达半年之久，而一旦成功，整个墓室就会被一扫而空。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脚”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他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形坑，近代为圆形

坑，这就是所谓的“古方近圆”。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盗墓技术渐成熟

随着历史的演进，盗墓技术也在盗墓者们的盗墓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盗墓工具不断进化、更新。盗墓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盗墓队伍的形成更使盗墓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盗墓活动的发端以及早期，并没有形成什么专业的盗墓人。那时对陵墓的盗掘多是偶然现象，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专业的盗墓技术。后来，随着厚葬制的风行，盗墓活动渐渐发展壮大，就开始产生了一些专业的技术。

民间盗墓者是这些专业技术的发明者，因为他们跟官盗比起来，没有什么优势，只能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获得成功。而那些以大量军队作为后盾的官盗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就能把陵墓打开，取走所需的东西。官府和老百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约束力，因此也就不用避讳时间等问题。民间盗墓者则不同，他们处于社会的被统治地位，没有什么权利，受到皇帝、官府等上层社会以及有关盗墓法律的制约，因此就要尽可能地缩小目标、减少工期，这就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做后盾。再有，民间盗墓的人数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一般都是在几人到十几人之间，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盗墓时更要讲究使用一定的先进技术。

民间盗墓组织有几种组织形式，都是十分讲究的。

第一，“碰伙”，就是在长期的盗墓活动中，根据盗墓活动的大小、费时等具体情况，几个职业盗墓者自发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团伙。对团伙内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详细的分工并订立严格的规矩。在团伙成员的齐心协力下盗墓，然后分赃。一个盗墓活动完成后，团伙也就相应地解散了，不具有稳定性。

第二，“组伙”，就是在一两个经验丰富的专业盗墓贼的带领下，找一些零散的盗墓贼或者是体格强壮的人组成盗墓团伙。其中的专业盗墓贼就是团伙的首领，负责寻找古墓，统领大家。挖得财宝后，销赃完毕由首领按照每个人功劳的大小分赃。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赃款都被首领吞占，其他人得到的只是相当于工钱的小部分钱财。

第三，“拉伙”，就是由一些豪强、财主等有一定势力的人物出资，拉拢一些专业的盗墓者作为技术指导，雇用一些体力劳动者组成规模较大的盗墓团伙，盗得财宝，分取赃款。出资人所得收益最多，专业盗墓者次之，体力劳动者所分得的赃款则比较少。

此外，有一些专门针对帝王将相等大型陵墓而临时组成的专业盗墓的大型团伙，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种盗墓团伙叫“建大伙”；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盗墓团伙，他们以经验丰富的专业盗墓者为首领，手下人长期在这个团伙内干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团伙内部人员甚至有师徒关系，这种盗墓团伙叫“硬伙”。

随着专业的盗墓队伍的形成与发展，盗墓贼在寻找、探测陵墓的技术上积累了许多经验。

我国的陵墓有许多在地面上就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如墓碑、封树、地面建筑等。这些地面标志成为盗墓贼寻找古墓的坐标。但是，随着盗墓活动的猖獗，这样留存有大量地面标志的古墓越来越少。后来很多帝王将相为了防盗，有的已经不再设置地面标志，甚至在下葬时还设置了许多疑冢。如曹操出殡时就由72支队伍从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奔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不封不树，这就使他的陵墓成了历史的谜团。还有一些古墓因为年代久远，遭受到自然、战争等破坏，不再遗存地面建筑。对于这样的陵墓，盗墓者要想找到它们就很需要一些专业的经验与技术了。

盗墓贼要从各种史料、地方文献等书籍，或者是民间传说甚至是歌谣中搜集一些线索，待有了目标后再去实地查看。

闻土辨味识古墓

中国古代的盗墓人群中，长沙盗墓者当首屈一指。“土夫子”们在长期与土壤打交道的过程中，活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中“闻”的手段，进行盗墓，用鼻子来吃饭。

“土夫子”本来是对长沙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因为在当时湖南长沙城里，以烧煤炭为主，而煤炭里面又要放上黄泥巴，以此来增加耐烧延时的效果，故而对黄泥巴的需求极大，于是就诞生了以拖着板车以卖黄泥巴为生的一种职业——“土夫子”，多以男性壮劳力为主，取土地点也多在城边缘附近。

“土夫子”出身贫贱，没有文化，但也行行出状元。黄泥中的上品——“糯米泥”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因此，很多“土夫子”就去墓葬所在地挖取黄泥土。最初偶然挖到了一些唐宋墓葬中的随葬品，卖给古董商，换几升米，赚几个小钱，但偶尔有一些古器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土夫子”们见有利可图，于是就以盗掘古墓为职业。慢慢地也开始不再卖黄泥巴，干脆也以盗墓为生。

“土夫子”们多年挖黄泥巴生涯，渐成土层专家，哪个地方有没有墓，他们稍作分析即可得出结论。“土夫子”识别古墓是根据古墓封土（堆筑坟堆的土）和墓葬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的，也就是“一看二挖”。

古代营建墓穴时，对封土特别看重。上面曾说过，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糯米汁搅和石灰。鉴于所用土的性质的不同，不仅其颜色很好分辨，其散发出来的土壤气息也很容易识别出来。加上秦汉时期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在墓葬中大量使用，也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实际上，葬过尸骨的地方本身就会有不同的气味，尸骨、棺木腐烂后，泥土也会被污染，那股味道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辨别出来。

商承祚先生《长沙发掘小记》记载：“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据考察，有的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长沙的“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各有自己的盗掘范围，他们与古董商之间，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土夫子”在长沙凭借自己的“本领”发了一些小财，但同时也造成了文物的损坏和流失。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被美国人柯克斯骗走，至今仍流落在美国（现藏美国亚洲美术馆）。

1942年9月，在老长沙城东郊一个叫子弹库的地方，一伙“土夫子”盗掘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楚墓。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二次补救性发掘，发掘是根据当年“土夫子”的描述进行的。事后的考古报告称，这座战国墓是一椁双棺墓，规模并不大，墓穴由青灰色膏泥密封。

墓主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盗后遗物有鼎、敦、壶等陶器，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玉壁和帛书、帛画。由于陪葬品不见青铜器，显示墓主当时地位不高。但所陪帛书和帛画却相当珍贵。帛画藏于椁盖板与其下的隔板夹层，当年的“土夫子”没有发现，被官方二次考古获得。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这些“土夫子”精湛的技术，当时的文管会就聘请了当中个别优秀者当了发掘工人。他们的“土”办法，对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被称之为“土专家”。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尤其是在长沙汉墓的科学发掘中，他们指路引线，免去了诸多不便，因为这些汉墓是十墓九空，许多就是他们干的，这一回算是将功补过。据说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其千年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土夫子”们出主意用五块木版斜插进去，将棺侧起，谨慎将女尸取出，因此得以保存。

堪舆风水成依据

古人认为，葬在风水宝地上的墓冢会出现一种“气”，有祥云出现的大多是帝王的陵墓，上面的气称之为“王气”。《异苑》有一则“戴熙”的故事。戴熙的祖坟就葬到了风水宝地，“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这里的“王气”就是这个意思。它为盗墓时的“望”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细细地“望”会有所发现。

因为不同时期的人对葬地有不同的追求和喜好，所以，从中国古代的丧葬规律来看，也可找出“望”的窍门。墓穴后方枕着玄武靠山，是古人眼中的最佳风水宝地。如秦代人多选择高岭之地为墓穴，西汉时的开国功臣之一淮阴人韩信，当年葬母时即是这样。据《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当年“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这里的“高燥地”就是比较高的岭地，即非低洼积水之处。汉代人则喜欢把坟墓建在向阳的山南坡，“秦埋岭汉埋坡”即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则多平地起坟，砌出精美的砖质墓室；唐人则把陵墓设在半山腰，甚至凿空整座山，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是凿空了九嵕山而成。

墓穴的选择讲究宽敞，有“地气”。皇家的陵址要求更苛刻，还要讲祖山、朝山、案山，得有“左辅”、“右弼”之势，非“龙穴”不能葬。除宋朝的陵墓选在背阴处之外，一般会选择朝阴的。

北宋皇陵多位于山地的西北方，背阴。据宋仁宗赵祯时王洙等人奉敕编纂的《地理新书》所讲，国音赵姓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也可居之”。

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从古人崇信的“风水”现象中和各朝人的偏好上，很容易找到古墓所在。看来，中国古代的堪舆理论，即所谓风水术，在盗墓者眼里成了“盗墓理论指导”。

占卜问卦亦可为

与堪舆风水术一样，“占卜术”也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方术之一。

“占”意为观察，“卜”是以火灼龟壳，认为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可以预测吉凶福祸。它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与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占卜所需的物质材料分两类，一类是显示卜兆及刻辞用的载体，即龟甲、兽骨等；另一类是整治甲骨及刻辞用的工具，有锯、凿、钻、刻刀等。占卜流行于全世界各个时代的文化中，而且方法多种多样。早期的占卜和宗教密切相关，其发展受到宇宙观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常见的占卜方式有询问性占卜（如中国民间的求签）、鸡卜、鸟卜、鸟占、水占、星占、纸牌占卜等。

盗墓有不少时候得碰运气，于是盗墓者想到了占卜问卦。袁枚《子不语》中的“掘冢奇报”故事的主角朱某，就是靠占卜盗墓而发家致富的：“杭州朱某，以发冢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锄四出。嫌所掘老多枯骨，少金银，乃设乩盘，预卜其藏。”

实际上，“占卜”与“风水”过去一直是相提并论的。古代风水先生在选择墓穴时叫“卜择”。《葬经》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又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语。这种把占卜与风水结合起的“点穴”手段，为历朝皇家使用。《隋书》中便有这样的文字——“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

《葬经》的作者郭璞本人就是一位既擅风水，又懂占卜堪舆的高人。

《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母亲去世后，将其“卜葬地于暨阳”，这个地方紧靠水边，不过百步之遥。当时人看了都说离水太近了。郭璞回答：“当即为陆矣。”果然不久以后，此地被河水带来的泥沙淤积成沙滩，郭母墓的方圆十来里都变成了桑田。

郭璞曾经给南北朝时宋会稽太守张裕的祖上看过坟。《南史·张裕传》记载，郭璞当时看了两处，一处是“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还有一处是“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张裕的祖上选择了后者。张裕因祖坟风水好，当上了大官。从郭璞选择风水宝地的记录可知，占卜被用来盗墓，在古人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听风听雨知墓穴

前面说过，有盗墓者把中医诊疗手段，灵活运用，转化成为盗墓绝技。这种绝技里面有很多主观因素，与“占卜盗墓”的听天由命截然不同，盗墓者凭借的是直觉，或者说经验。

盗墓史上凭借超人直觉和丰富从业经验盗墓而屡获成功的大有人在。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总能找到隐藏神秘的墓穴。

清人徐珂在其汇编清代各种掌故、笔记、传闻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焦四的广州盗墓贼神乎其神的判断墓地的技巧。焦四盗墓的方式，可作为“听”的精彩操练，其技术之精、诡计之神奇，令人拍案叫绝。

每个盗墓团伙内总有一名“掌眼”的，掌眼起到现在工程项目中总工程师的作用，焦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掌眼。

他掌眼的本事了得，“观风”、“望气”、“听声”、“看土”样样在行。焦四不仅有一双“入地眼”，还有一双“听风耳”。通过“三听一看”，焦四就能知道地下是否有墓，墓中是否有金银玉石这些随葬宝物，多还是少。

焦四聚集了数十个同伙，四处盗掘古墓。他们盗墓之所以百发百中，是因为焦四有一手绝活，他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等方式判断墓葬所在。一天，焦四和其他盗墓贼到郊外寻找墓葬。当时是正午，天空却电闪雷鸣。焦四赶紧让手下人分散开来，到不同的方位观察雷雨闪电，并记住特征，回来向他汇报。焦四则站在高处观望。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打雷的时

候，他觉得脚下有浮动，而且地下还有回声。焦四兴奋地说：“那里就有古墓。”盗墓贼们随着那人赶过去挖掘，果然下边有一座大墓。

第八章　严刑峻法下的危险游戏
——历代对盗墓者的惩处

盗防正邪不两立

盗墓贼的可耻行径，一直被人们深恶痛绝，不管是我国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无法对其谅解。所以，除了古代的帝王等实权者盗墓不会受到惩罚外，一般的盗墓案件都会被官府侦破，并对盗墓贼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现代更是如此，公安干警对发生的盗墓案件都会竭尽全力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逮捕盗墓贼并努力追回被盗文物。虽然我们对盗墓贼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盗墓贼的盗墓手段大多都十分高明，不仅有专业的盗墓工具，而且还有先进的盗墓技术以及丰富的盗墓经验，多在夜深人静时凭借建筑、茂密的植物等作为掩护。并且，盗墓贼人数一般都比较少，采用流窜作案的方式，不容易留下什么踪迹。这些都使盗墓贼逃之夭夭后不会留下什么明显的线索，也就给盗墓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许多困难。

官府在与盗墓贼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也渐渐地掌握了一些破案方法，总结出了一些规律，这就使许多盗墓大案得以破获。特别是现代的公安人员，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加快了破案的进程。

在我国古代，因为条件的限制，官吏对盗墓案件的侦破方法比较简单，相对来说，成功率也比较低。除了那些皇家陵墓盗窃案能够被官府主动关注外，一般是通过民众举报或者是墓主人告状的方式受理案件。

古代盗墓案件的侦破案例有很多，我们先来看《宋史》中记载的一个案例。有个叫刘敬的御史台在知永县督导军队。这期间，不断有人向他举报一个名叫范伟的浪荡子弟的盗墓事件。原本，这个浪荡子弟的家族内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可是他却冒认武功县已故的县令范祚为祖父。为了向世人证实这个谎言的真实性，范伟竟然偷偷地掘开范祚的陵墓，把自己祖母的尸体葬了进去。因为有了这个已故的

县令做靠山，范伟便在此地为非作歹起来，不仅逃避了50年的赋税徭役，甚至还多次盗掘陵墓。官府将他抓获后，本欲把他判处监禁或者是流放，但都因为他是官宦子弟而没有真正定罪。刘敬接到报案后，立即就逮捕了范伟。为了调查他到底是不是范祚的后代，刘敬先后向几百人取证调查。但是，案子刚审到一半，刘敬就奉旨回京了。虽然有几百人的证词，但范伟咬紧牙关不承认，其他官员无奈只得又一次让他逃脱了惩罚。刘敬虽然回京了，但关于范伟盗墓的案子，他却丝毫没有忘记。得知范伟没有受到惩罚的消息后，他便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宋仁宗。宋仁宗十分震怒，下旨押解范伟到京交给御史台查办。经过这样一番追究和折腾，案情终于大白，范伟被判处了极刑。

从这件古代盗墓案的破案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盗墓案的审理受到的阻碍比较大。首先，办案的前提是，在朝廷上要有为官清廉、正义刚直的官员。但是，我国古代的管理制度自身存在的弱点比较多，很多官员都不务正业、昏庸无能，甚至还存在官盗勾结的现象。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官府的破案手段与盗墓贼的盗墓手段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官员们看不上盗墓贼的行径，更不屑于了解盗墓这些歪门邪道的知识，因此，在破案过程中也就抓不住案情的要点。

古代对盗墓案件的侦破，往往是从盗墓贼不小心留下来的东西上追查下去。但是，那时的技术落后，指纹鉴定、基因测试等技术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太多可供使用的破案工具，对于那些没有明显线索的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我国古代对陵墓的保护十分重视，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古墓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可是盗墓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古代的各项侦破技术都比较落后，不利于古墓的保护，即使那些被抓住的盗墓贼会受到死刑之类的严厉惩罚，却依然无法阻挡盗墓大军的脚步。进入近现代以来，大量的先进技术也被公安人员应用到盗墓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如从盗墓现场遗留物就可以知道关于盗墓贼的许多信息。只要遗留物上有文字标记，就可以查出它是从哪里生产的，并可以大致确定盗墓贼的活动范围。此外，还可以通过指纹鉴定、基因测试等技术检测出盗墓贼的各种具体信息，并以此缩小怀疑目标。

在公安人员通过盗墓贼遗留在现场的麻袋等作案工具来确定盗墓贼的活动区域的案件中，“郭家岗1号墓”被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公安人员经过多方走访，查到了盗墓贼使用的雷管、炸药等作案工具的来源，进一步减小了查案范围。此外，成立技术领先、机动灵活的专案组，利用电脑网络等先进工具都是十分必要的。

位于古城西安东南部的西汉传奇皇帝汉宣帝刘询的杜陵，规模十分宏大，是现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西汉皇陵之一。在杜陵的周围还有皇后、将相等大大小小的陪葬墓100多处。这座历经沧桑的帝王陵墓之下，埋藏着无数珍贵的西汉文物。

然而，这座皇家古墓虽然躲过了历史的烽烟，躲过了几千年来诸多的盗墓贼，却在当今被盗墓贼盯上了。2006年8月6日深夜，西安警方接到群众的举报，说在杜陵的陵墓上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盗洞——盗墓贼已经向杜陵下手了。

接到报警后，西安警方立即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们先到杜陵勘察现场，发现了举报群众所说的那个盗洞。只见这个盗洞洞口直径约为1米，向下望去深不见底，洞口处还有盗墓贼遗留下来的绳子。办案刑警发现洞口周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磨损痕迹，挖出来的土质还很新鲜，根据这些情况及以往的办案经验，他们初步断定这是一个盗墓贼刚刚打好的盗洞，还没来得及盗取陵墓里面的陪葬品。

因为长期与盗墓贼过招，所以办案的刑警对摸索盗墓贼的盗墓情况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盗墓贼在打通盗洞后，尽管墓穴里面有众多珍贵的陪葬品，也不会盲目地立即下去盗掘，因为地下陵墓经过长时间的封闭，很有可能在墓穴内沉积一些有毒气体，这些气体对于盗墓贼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因此，他们宁愿担着盗洞被外界发现的危险，使盗墓前功尽弃，也不会轻易地深入地下盗宝。这些盗墓贼往往会守护在盗洞的附近，待觉得墓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才伺机作案。

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刑警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时离开杜陵的盗洞，在较远的地方进行外围埋伏，等待盗墓贼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盗墓者进入墓室前的那一刹那，一举将他们擒获。

因为杜陵在市外，交通及其他方面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外围设伏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刑警们基本上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能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埋伏而不暴露目标。

随着侦察员再一次传来的消息，埋伏在周围的各路刑警飞一般地冲了出去，把正在往盗洞里面进的盗墓贼抓了个正着。盗墓贼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已经被戴上了手铐。这次共抓获盗墓贼5名，捣毁了一场预谋中的盗墓计划，千年古墓内的珍贵文物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无论何时，对盗墓案件的侦破都是正与邪的较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给破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干警们可以通过电话、手机、互联网等多方面搜集线索并保证行动的协调。同时，现代化的通

讯工具也给盗墓贼提供了方便。盗墓贼一般都会选择那些较为偏僻、交通不便的陵墓作为盗墓对象；而警方的人力有限，不可能对每一处陵墓都派专人保护，这就给了盗墓分子以可乘之机。

盗墓者永不赦免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古人十分重视丧葬，很多统治者也将重要的丧葬作为政治手段。商末时，周武王伐殷，占领朝歌后“封比干之墓，表商荣之闾”。比干和商荣是商朝老臣，在商人中有很高威望，周武王此举意在拉近周人和商人的关系。十六国时期，石勒与东晋名将祖逖（tì）开战，石勒忌惮祖逖，意图讨好他，便修缮了位于范阳的祖逖母亲的坟墓。对此，祖逖也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双方一度休战。

与此相反，古代有一种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刨祖坟，开棺戮尸，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和惩罚。

因为如此重视墓葬和丧仪，为了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了严刑峻法，惩罚偷坟掘墓的盗墓贼，以求杀一儆百，彻底根除盗墓，从而维系安宁。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记载，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对盗墓严令禁止，有违反者都要处以重罪。

汉高祖进入秦都咸阳后约法三章，成为一时佳话。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武帝后独尊儒术，无论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还是提倡宽仁的儒家思想，都弘扬宽和，反对严刑峻法，这奠定了汉代刑狱制度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却非常严重。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到。《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

中国人形容一项罪行严重，不可原谅，常会用的一个词就是“十恶不赦”。中国古代大凡皇帝登基、册封皇后、立太子、寿诞、冲喜等皇室大事，都会大赦天下，减免囚犯的刑罚，但对于犯有“十恶”重罪的人却不予减免。虽然盗墓不在十恶之内，但大赦天下时，盗墓贼

往往不在获赦范围内。

汉元帝时期，汉高祖刘邦妃傅夫人墓被盗掘，时值大赦天下，但是汉元帝以盗墓大逆不道为由，不同意赦免这个盗墓贼。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仍规定“发墓者诛”，即盗墓者死罪。即使不是作奸犯科，只要发掘坟墓，在汉代便是大罪。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向廷尉请罪，罚做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到宽赦。

挖五脏烹而祭之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成熟的时期，唐律成为后世法典的典范和蓝本。唐朝的法律，对于盗墓者的惩罚，理性而又详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也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将盗墓行为分为三种处罚方法：开挖墓葬的，判处劳役流刑；打开棺椁者，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徒刑三年。对于损害陵墓的草木行为，也有相应处罚，击打一百刑杖和判处两年徒刑。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盗掘王陵的后果，确实很严重。唐人戴孚在《广异记》记录了一则，盗掘唐玄宗李隆基宠妃华妃墓而遭严惩的事情——“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

五位主犯被处以酷刑，心、肝、肺都被挖了出来，放在热油锅里炸后祭祀华妃。这种处罚盗墓者的手段，大概为古今仅闻，闻之丧胆。

在唐代，盗挖坟墓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在封建社会，封建帝王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以及大婚等重大喜事的时候，为表现自己的仁爱，以施恩为名，对全天下的囚犯或是被流放边疆或是被贬官员进行减刑，昭其回乡，官复原职或升迁的种种优惠政策。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减免赋税等政策。但是，如果身犯盗墓之

罪，即便在大赦天下的时候，其罪责也不可赦免。可见当时掘墓之罪的严重性。唐朝后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颁发大赦天下的诏书，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应甄别其罪行的轻重，酌情尽快免罪释放，不再囚禁。而挖坟掘墓等几项罪名，则不予大赦。两年后，唐懿宗再次大赦天下，对挖坟盗墓者仍旧不予赦免。又过了两年，唐懿宗迎接佛骨进京，再次大赦天下，“除十恶性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和痛恨的。

少数民族用重罪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族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对盗墓者进行惩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盗墓空前繁盛的时期，盗墓者横行，墓葬无不被发掘，始作俑者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行下效，全国上下掀起盗墓之风。即便是在这种统治者带头盗墓的时代，国家法令法规仍然明文规定盗墓是违法行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魏书·高宗本纪》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到阴山，看到山上那些因被盗而荒废的墓葬后，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自从文成帝下过这道诏令，将盗墓者斩首成为北魏法令的明文规定。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是鲜卑人。鲜卑族系东胡族，生于马背，驰骋草原，信奉萨满教，因此鲜卑族对墓葬和丧葬礼仪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汉族。统治者下令严惩盗墓者，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

汉化的表现之一。北魏文明太后是汉化的首倡者，而她的丈夫文成帝却先她一步在惩治盗墓者一事上率先汉族化。

如果说北魏拓跋氏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反盗墓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后来的金太宗、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们无疑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反盗墓事业长足的发展。

金太宗二年（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揭发盗墓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惩治“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盗墓者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盗墓者取的是自己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也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

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份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概率比平贫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盗错墓赔尽家财

历朝历代对盗墓者的法律制裁，都是相当严厉的。更趋于合理完备的，是明清两朝律例。据《明会典刑律条》："凡谋反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凡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条准此）。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合计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只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从上面的规定看，对谋毁山陵（盗墓）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共谋者要被一块一块割肉，即"凌迟"处死，父兄、妻女甚至连堂兄弟都要遭殃而一块跟着死，最宽容的也要"流三千里"，罚去荒凉的边疆服苦役，永不得回原籍。

明万历年间，曾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民间盗墓事件。

为了迎合皇上贪财的心理，腾骧左卫百户仇世亨向明神宗朱翊钧上了一份奏疏，信口胡言道："湖广二十五府所属州县，各项赋税的存留羡余及遗漏税银、赃罚赎例银、入官空兵饷银、绝户产银、河草场佃价银、鱼税银等，何止亿万余两，宜委官追查。"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据兴国州士民漆某报告，当地人徐某等"挖黄金万两，内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杨氏诰命金牌一面，对方二尺，厚两寸，金童一对，乌金炉瓶烛壶，尚有左右金银窖未开"云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纯粹是小小百户为邀功的信口胡诌。全国一年缴入太仓的税银不过三四百万两银子，太仓历年积存的银两都未达到"亿万余两"的数目，区区湖

广一省何以会有存留税银亿万余两的神话？至于挖出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宝，更是街谈巷议的子虚乌有之事。而财迷心窍的神宗却信以为真，十分兴奋、十分认真地下了一道谕旨，要陈奉带管此事。他说："这奏内，湖广通省各府州县积贮各项存留羡余等银，约有亿万余两；及兴国州民人徐乃明掘古坟，黄金鉅万，掩饰事情。且今帑藏匮乏，何不解进济用！着督理矿税内官陈奉，不妨原务带管，督率原奏官仇世亨、原任守备戴烨、士民漆有光，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并经管有司官员查明，一半留与本省兵饷赈济之用，其一半及金银等件，一并解进应用。"

事后证明，这是一起盗墓"冤案"，是因为当地奸人漆有光向官府告密，导致徐某盗墓事发。而徐某所盗的墓也不是李林甫夫人的墓，而是元朝吕文德夫人的坟墓。

吕文德也是元朝有名的人物，南宋将领，淮西安丰（今安徽寿县）人，樵夫出身，赵葵招致其麾下。本是南宋荆湖制置使。但这人很贪，蒙古人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襄樊之战中，忽必烈看到汉人贪财的致命弱点，悄悄遣人以玉带贿赂吕文德，结果吕文德让元军在襄樊城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如此贪官，夫人的陪葬品自然是不会少了。但是这笔横财徐某大概命不该有，此事惊动朝廷，命得一保，却赔尽家财。

陈奉受此事件启发，为了完成朱翊钧给他下达的"敛财"指示，在湖北兴国一带公开盗墓，甚至以开矿为名，打起了皇陵——朱翊钧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显陵的主意，引发了明朝最为严重的盗墓之风，导致一时民间反盗墓抗议情绪激烈。

大清律例定绞刑

明亡清兴，龙椅易人。清朝，对盗墓行为的惩罚更为详细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人进入关内后，比汉人更明白其中的道理。清军刚入关时并无系统的法律，临时使用的就是朱元璋定的明律。后来才根据清朝的情况，"参以国制，集议允当"，定了《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对于盗墓行为的规定更加细致，规定了36种情形的罪责，条例计22条之多。

清律在《刑律》"贼盗"中，辟有"发冢"专节。对民间盗墓行为，依其性质的严重程度和盗掘对象的亲疏，列出了七种类型。其中第一

条称，“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冢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与明律并无两样。可见，历朝历代的官府对盗墓行为持一贯的反对态度。

除了对盗墓行为本身进行惩罚外，清律对“辱尸”行为的制裁，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若残毁他人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谓死尸在家或在野未殡葬将尸焚烧残毁之类，若已殡葬者自依发冢开棺椁见尸律从重论）；若毁弃缌麻以上尊长死尸者，斩；弃而不失及髡发若伤者，各减一等。”对亲属间的行为也有规定，“毁弃子孙死尸者，杖八十；其子孙毁弃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毁弃家长死尸者，斩。”

盗墓严惩有例外

古代对盗墓者也不尽都是严惩，有的也会被宽大处理，而且会得民众的理解，这就是盗掘贪官、奸臣、恶人等“坏人”的坟墓。

周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文人，著有《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和《琐事剩录》等。专记明初以来金陵掌故，上涉国朝典故、名人佳话，下及街谈巷议、民风琐闻。南京为六朝古都，周边陵冢多多，盗墓也层出不穷，周晖的笔下自然少不了的。

《续金陵琐事》（上卷）记载，明宪宗朱见深当皇帝时，江宁人盗掘秦桧墓事发，被抓住后，却没有被严惩，被从轻处罚：“秦桧墓在江宁镇，岁久榛芜。成化乙巳秋八月，为盗所发，获货贝以巨万计。盗被执，而司法者末减其罪，恶桧也。有蔡西圃名昂，历事大理，亲阅囚牍，为作诗以快之。”

据现代考古发掘，秦桧及其家属墓都在今南京城南的江宁镇一带，秦墓在历史上曾被多次盗发。2004年南京曾发现一座宋朝大墓，当时媒体报道是秦桧墓。因没有从墓中找出墓志，参与考古的南京博物馆考古队一时也无法认定，最后公开的说法是“疑似秦桧墓”。据未经公开证实的消息，后来专家就墓中出土后运南京博物馆的物品推断，此墓就是秦桧墓，当时发现的那具女人尸骨，应该是秦桧妻妾中的一位。

第二篇　盗墓风潮大历史

在中国的盗墓史上，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盗墓风潮：盗墓风潮第一波——先秦两汉的盗墓，可以看做是盗墓的发端；盗墓风潮的第二波，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此时的盗墓之风可谓达到高潮；第三波为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此一时期的盗墓主要以官吏、军阀盗墓为主；宋元时期的盗墓风潮是第四波；第五波盗墓风潮为明清时期的盗墓，这一时期较为惨烈；第六波，是清朝结束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国时期的盗墓活动，因为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所以盗墓者对墓葬的破坏也比较严重。除了这六个盗墓风潮之外，建国后，盗墓活动又有死灰复燃、重新升温的迹象，一些重大的盗墓事件让人震惊，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下面，我们将进入历史的长河，为你讲述其中的盗墓场景。

第九章　先秦两汉的盗墓史事
——盗墓风潮第一波

先秦被盗名墓记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个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刘去盗掘。（关于刘去盗晋灵公墓，本章第三节将会作详细的描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

齐桓公（？—前643），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姜姓，名小白。齐僖（xī）公的孙子、齐襄公的次弟，其母为卫国人。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齐襄公和齐君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桓公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桓公晚年昏庸，信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齐桓公一人孤卧床榻，不见一个人来问候，连口水也喝不上，不久就死了。前643年，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之前，齐桓公又想起管仲的遗言，不由得悔恨万分，他大声痛呼：“嗟兹乎！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音落气绝。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

易牙得知桓公的死讯，立刻与竖刁、开方等人拥兵入宫发动政变，“因内宠以杀群臣”，强行拥立公子姜无诡为国君。

最后还是在上卿高虎、国懿仲两位老臣的出面安排下，桓公的遗体才得以殡殓。这时，桓公已死去67天，尸体腐烂，尸虫乱爬，臭气熏天。百官见此惨景，无不悲伤痛哭。

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历史是无情的。春秋首霸、一代英主齐桓公不听劝谏，竟落得人亡败国、蛆虫满尸的悲惨下场，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然而，他的教训也像一面镜子，给人以借鉴，使人以启迪。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mǐn）帝建兴年间，被曹嶷（yí）盗掘，据说里面的“缯（zèng）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阖闾（？—前496），又作阖庐，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公子光”。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

前49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趁越国丧乱之际兴兵伐越，刚刚继位的越王勾践起兵抵抗，阖闾受伤而死，归葬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据《史记》等书记载，当时征调十万军民施工，并使用大象运输，穿土凿池，积壤为丘；灵柩外套铜椁三重，池中灌注水银，以金凫（fú）玉雁随葬，并将阖闾生前喜爱的“扁诸”、“鱼肠”等三千柄宝剑一同秘藏于幽宫深处。据说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丘”。宋代苏州州学教授朱长文则认为，虎丘因形似蹲虎而得名，并说：“然观其岩壑之势，出于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阖闾因之以葬

也。”清乾隆帝弘历也表示赞同：“本来岩壑擅天成，虎踞偏称金气精。”

虎丘，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角的虎丘山风景名胜区，距市中心5公里，已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时吴王阖闾在此修城建都。而后秦始皇曾登丘览胜；西楚霸王项羽又在此率八千子弟起兵反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凿山引水，并修七里堤，使虎丘景致更为秀美。宋代诗人苏轼曾经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诚为憾事。”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诸”、“鱼肠”等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liàn）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相传，吴国灭亡后的数百年间，越王勾践、秦始皇、东吴孙权，曾先后来此探宝求剑，结果都一无所获，徒劳而返。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被盗的春秋战国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是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子，名嗣，死后谥“襄”，故称魏襄王。前318年至前296年在位。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便在魏襄王元年，但最后并未获胜，“不克而返”。

魏襄王冢被刘去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mén）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西楚霸王盗秦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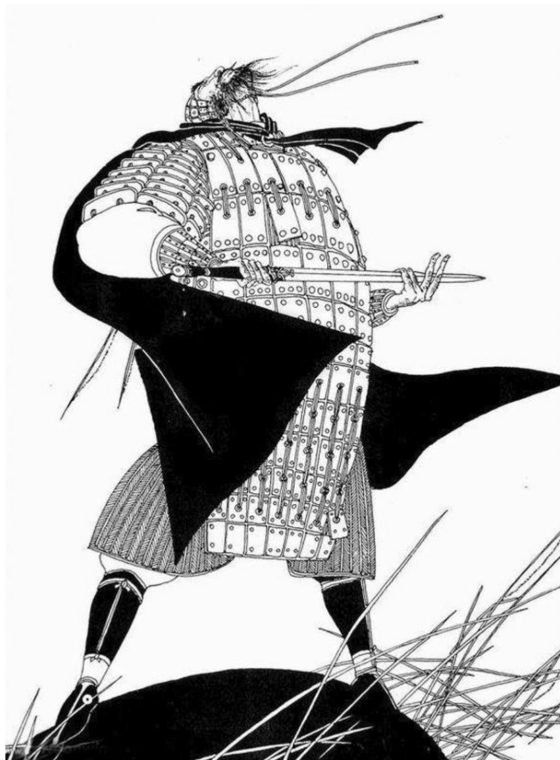
与伍子胥相比，项羽盗墓显得理由更充分更正义一些。

伍子胥是为了报“家仇”而盗掘陵墓，是私心。三百年后，项羽掘开秦始皇嬴政的陵墓，出于“国恨”，天下民众所愿。秦始皇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陵是什么陵？中国帝王陵中的“第一陵”。敢对这样的帝王和其陵墓下手，最先只有项羽！

前221年，秦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战争形式，一一剪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最高统治者嬴政的权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他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于是定“皇帝”尊号，称“始皇帝”，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更新政治文化观念，维护皇帝专权制度的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

除了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而外，宫苑的规划，也力求适应天人一致的文化原则。“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

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进一步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营造工程，“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当时宫室之繁多，据说“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除了广建宫室而外，又开始修筑陵墓，“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帝陵的营造，也是宣示威权的形式之一。



项羽

秦陵是中国陵墓史上最为著名的，无论是规模气势，还是传说中的地宫，都令后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秦陵坐落于距古城西安36公里的陕西临潼县城东。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其工程之浩大，创历代君王厚葬之最。其布局结构和建筑风格，在集夏、商、周之大成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展。而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园，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秦陵尚未发掘，其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历代史学家都对其有不少的描绘，使我们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在这些记述中，时间最早、最具真实性的当属《史记》。据《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得知，秦皇陵地宫设施与地面宫殿一样，墓内地底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了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人鱼”炼油，制成蜡烛，用做陵中的“长明灯”。在墓室的地面和顶部，雕凿成天地山河，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以珍珠宝石镶嵌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为防备盗掘，在墓道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若有人接近，触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地宫中的大量水银易于挥发，产生剧烈的毒雾，令盗墓者闻之胆寒。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下令，皇宫内凡未生育的宫女嫔妃，悉数殉葬。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参与墓内修造之工匠，全部被封杀于墓道之中。高大的坟丘上种植草木，像山一样雄伟壮观。

秦陵建成后的第三年，项羽率军入潼关，将陵墓上豪华的地面建筑付之一炬，只剩下了巨大的封土堆。这个封土堆坐南向北，呈覆斗状，基部南北长350米，东西长345米。建成时的高度约折合现在的115米。经过长时间的风雨侵蚀，水土流失，现高87米。

对于项羽掘秦陵，班固编著的《汉书》称，“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球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紧闭之祸，岂不哀哉。”

项羽，名籍，其祖父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大将项燕。战国时期，各国混战，秦国为了统一天下派王翦为将攻打楚国，楚国派项燕迎敌，项燕兵败被王翦所杀。项羽因家仇发誓要“取秦而代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秦始皇死后，各地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秦起义。项羽在秦末的

反秦斗争中发挥了杰出的指挥才能，再加上他的名贵出身，很快就得到了各路起义军的支持，成为了西楚霸王。前207年，项羽在巨鹿大败秦军，严重地动摇了秦的统治。

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在位三年，被权臣赵高逼死，赵高又拥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这时的秦朝已经在各路起义军的攻打下摇摇欲坠了。前206年，另一位杰出的起义军首领刘邦先项羽一步入关，秦王子婴向其投降，曾经显赫一时、强大无比的秦王朝灭亡了。

入关后的项羽拥有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他本人因为指挥有方，战功显赫受到天下人的尊敬。那时军事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刘邦。刘邦起身布衣，仅担任过一个很小的官职。然而，秦王却被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所收服，项羽心中很是不服气，更何况他还背负着沉重的家仇。于是，他便把怒火都发在了秦皇室成员以及秦始皇所建宫室上。项羽进入关中之后，先杀了秦王子婴和秦王室贵族，然后将咸阳城内所有财富掳掠一空，又放火烧城。咸阳城和阿房宫在大火下烧了三个月，最终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然而，项羽内心的仇恨并没有在杀戮与破坏中得到安慰和满足。他的内心仍然被一股无名的怒火煎熬着。

于是，在杀尽秦始皇的后代，烧光秦始皇的宫室之后，项羽把目标又转向了另一个更为宏伟的建筑——秦始皇陵。《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有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列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项就是项羽火烧秦宫室、盗秦始皇陵。《水经注》中也记载项羽入关后，以30万人挖开了秦始皇陵，挖出的宝物运了30天都没运完。在刘向写给汉成帝的一篇谏书中也记载有项羽烧秦宫、挖秦陵的事。从这些史书中看出，项羽盗秦始皇陵墓是确有其事的。

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历史上也有不少记载：

《史记》中借刘邦之口，骂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写道：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三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棺椁。

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这样描绘：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造冢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

五嶽九州岛县地理之势，宫观百室，奇器珍宝，充满其中……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另外，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项羽掘秦始皇墓的传奇故事：

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乱箭如雨发，当场射死许多士兵。随后从墓中又飞出无数怪鸟，啄伤不少士兵。惊魂未定的士兵四散逃去，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咬伤无数。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报告项羽。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后，项羽定睛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但这时又是一阵乱箭射击，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灭秦后，派10万兵士挖掘秦始皇墓。士兵在陵墓南面和西北寻挖墓穴道，挖了半月有余，踪迹全无。项羽听说后，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开挖，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出了两条沟，这两条沟后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项羽没有找到秦始皇的棺椁，因此，他开棺戮尸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他本身也并不太在意是否能够找到秦始皇的尸体报仇，那众多的稀世珍宝早已使他转移了目标。既然财宝已经找到，还管什么其他的事情呢？但是，项羽并不想让秦始皇在地宫里安息，也为了不让后人知道他的盗墓行为，就在挖掘完宝物之后放了一把火，试图把陵墓整个烧掉。幸而，项羽所发现的秦始皇陵墓只是实际陵墓的一小部分，陵墓本身各个墓室之间又有很好的防火设施。因此，秦始皇陵墓地宫才能保存至今，并没有因项羽的火烧而遭到毁灭性破坏。

项羽盗取的大量宝物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反倒给他的声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刘邦要比项羽明智得多。刘邦入关后听说秦始皇陵墓极为奢华也曾动过盗墓的念头。但是，他身边的谋士劝他，如果那样做会失去民心，得不到天下。因此，他不但没有盗墓，还命令部队对当地人民要秋毫无犯，从而赢得了民心。后来项羽失败后，刘邦列举项羽的罪状中就有盗秦始皇陵墓一条。由此可见，项羽盗墓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小失大。

项羽对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是秦始皇陵所遭遇的最早的劫难。但是

秦陵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宁，西楚霸王的这次行为成了秦陵劫难的导火索。从那以后的几千年里，秦始皇陵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项羽盗秦始皇陵的阴影还没有消散，秦始皇陵就又迎来了一批接一批的盗墓者。西汉王莽、赤眉军都曾经对秦陵进行过大规模的盗宝。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人把目光盯紧了秦始皇陵墓，挖空心思地盗取其中的宝物。

1974年，随着陵园兵马俑的发现，为了探明秦陵全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现已探明，秦陵墓地面积为22万平方米，陵园总面积21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埃及金字塔，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人的墓葬都无法相比的。

陵园地面曾有内外双重城垣，为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城垣有门，内外城之间有角楼、寝殿、便殿、寺园吏舍等大量建筑遗址。外城周长6000多米。在陵墓以西墓道一配房中，已发掘出两组铜车马。陵区所在地宫部位，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言“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说法。在建筑遗址中发现大量文物，其中有直径61厘米的大瓦当，为中国瓦当之最。

陵区仅发现的陪葬坑就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5万多件，最大的陪葬坑1万多平方米，最小的仅1平方米。除已发掘和待发掘的兵马俑1、2、3号坑外，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马厩坑和跽（jì）坐俑坑98座，珍禽异兽坑31座，筑墓民工墓103座，被处死的宫廷近臣陪葬墓18座，刑徒服役的石料加工场1处，窑址多处，以及防洪堤和鱼池遗址。

封土层下的地宫，据考古实测，面积近25万平方米，比盖在它上面的封土层面积大6万平方米。地宫上方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四周有一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的宫墙，其顶部距现地表2.7～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宫墙四周有门，东西北三边有斜坡门道。

地宫在宫墙范围内，又分为外宫和内宫，从内宫再到墓室，如同三个倒置的梯形，一层深过一层，第三个层面约2万平方米，即秦皇棺椁之所在，而产生强烈汞异常反应的，也正是在这一中心部位，面积达1.2万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些。秦陵地宫是一座立体结构的楼阁，推测深度最少在50米以上，其墓葬规格远远超过我国已发掘过的任何一座陵墓。

虽然不断地有人盗掘秦陵，但他们所做的这些盗墓行动只触及了秦陵地宫以上的部分，地宫从未被打开过。因此，几千年过去了，我们才能看到现在保存较好的秦始皇陵。

超级变态广川王

盗墓有的是泄愤，有的是贪财，但中国历史上有一盗墓者却很变态，首先是为了好玩，是一种游戏心理，他就是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亦有史书称刘去疾）。刘去是把盗墓当成一种游戏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逆转乾坤的能力，却因为辉煌的盗墓成就而遗臭万年。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统治，沿用了商周时代的分封制来加强政府对地方势力的管辖。他在其称帝初年就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到各地诸侯国为王，想依靠刘氏宗族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

然而，汉高祖分封诸侯王的初衷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效果，甚至给他的后代子孙的统治埋下了十分严重的隐患，后来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诸侯王作为地方势力的最高统治者，自治其国。到后来诸侯国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大大地独立，甚至可以不听从中央政府的统治。这众多的诸侯王国中，就有广川王家族。

第一代广川王叫刘越，是景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前155年，刘越受封为广川王，建都信都（今河北冀县），开创了汉宗室中的广川王族。然而，广川王族日益腐朽堕落，在汉朝皇室中慢慢成为最差的一支，为后人所不齿。

刘越，是个极为平庸、碌碌无为的人，在位12年就去世了，死后被谥为“广川惠王”。刘越有7个儿子，长子刘齐继承王位，就是广川缪王，在位44年。刘齐是个极为荒淫无耻的人，生前曾与姐妹乱伦，又犯大不敬罪，终究恶有恶报，还未及受到朝廷严惩就病死了。刘齐所做之事实在是太过无耻，民怨极大，死后也难逃惩罚，被汉武帝革去王爵，广川王族也被废除。

没过多久，汉武帝顾及宗族之情，不忍绝了刘越的祭祀香火，又封刘齐的儿子刘去为第三代广川王，恢复广川王族。没想到，广川王这一支实在是扶不起来，一代不如一代，简直给皇族丢尽了脸。刘去比他的父亲刘齐更加荒淫无道。刘去精通儒家经典，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本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儒雅之士，可偏偏为人残暴成性，按照现在的话说，他的潜意识里具有反社会、反人类的分裂人格，属于神经系统功能方面出现了障碍的人。同时他还有一个变态的嗜好，就是

喜欢盗挖墓葬，甚至盗墓成瘾。

刘去年轻时就不务正业，整日和一些流氓混混在一起玩鹰遛狗、游玩打猎、寻找古墓。《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刘去年少时就是一个实足的“流氓”，生性暴虐。其祖父刘越多次劝他少做坏事，可他始终不学好，最后连家也不回了，时常在外过夜鬼混。十四五岁时，家里让他跟老师学习《易经》，因为老师多次劝谏惹他不高兴，竟然暗暗派手下人去刺杀老师父子。在吃饭的酒席上也没有正行，喜欢让女戏子赤裸全身坐在他大腿上，以此取乐。这还不算，其对待身边女人比盗墓更令人发指。

刘去身边的姬妾众多，他制裁身边认为对自己不忠女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史书上记载的有：一是“生割灌铅”，“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二是“肢解烹煮”，“置大镬（huò）（形如大盆，用以煮食物的铁器）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三用棍捣戳下体，“椓杙（zhuóyì）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四令女人脱光衣服，将烧红的烙铁烘灼赤身裸体的女人。另外还有针刺，“不服，以铁针针之，强服”。而在施暴的同时，还逼着身边的其他姬妾在旁边“观摩”，“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可以说，刘去是个无恶不作之徒，先后被他如此这般杀害的如花美女有16名。

如此恶王，做出盗墓的勾当并不令人意外。

天高皇帝远，刘去在自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对盗墓不以为耻，反以为乐。他甚至根据自己的盗墓经验亲自写了一本《方士集书》，里面恬不知耻地介绍了一些关于盗墓的经历和方法。刘去在整个盗墓过程中都担任着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如何寻找古墓是他的强项，位置确定下来后，则由手下人动手。这个心灵扭曲的王子只在乎盗墓的过程，至于结果如何他并不太在意。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封国里面凡是有点规模和名气的古墓大部分都被他盗过了。

刘去盗墓所盗得的第一座墓，是他垂涎已久的晋灵公墓。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割据，群雄争霸，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经历多年战火之后，在华北一带就分布有燕、齐、晋、魏、赵等诸国，这些诸侯国的王公将相死后都建有较为豪华的墓地。这些古墓埋藏了很多的奇珍异宝，成了几千年来盗墓贼觊觎的对象。晋灵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一位国君。

晋灵公本是晋文公的孙子，从小就做了皇帝，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半点苦。灵公长大之后荒淫无度，性情残暴。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大量搜刮百姓钱财来美化自己的宫墙。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以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为乐。有一次因为厨师没把熊掌炖

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抬出宫去。

灵公下面有个宠臣，名叫屠岸贾，是个十足的小人。

一年，灵公让屠岸贾在王城之内替他建了一所花园。园内遍植各种奇花异草，常年不败，其中以桃花最多，故号称桃园。灵公特别喜欢打鸟，常在园子内用弹弓打鸟作乐。

桃园内有个高台，站在台上可以看见整个王城的市井百态，灵公常常站在上面看热闹。有次，灵公让人在高台上演戏，引得无数百姓在墙外观看。灵公突然鬼点子一转，就对屠岸贾说："平日里经常打鸟，不知道弹弓打人是个什么景象。"于是两人便在台上向人群中狂射。弄得百姓苦不堪言，个个都恨晋灵公。也许是恶有恶报，这位无道国君死后遇到了比他更加残暴的广川王刘去。

晋灵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生前荒淫无道，死后又把搜刮到的大量财宝为自己陪葬。他的墓冢呈馒头状，由五花土堆积而成。刘去对坟茔里面的奇珍异宝早已垂涎三尺，他率领自己的盗墓部队来到晋灵公的墓前，由于陵墓没有任何防盗措施，这些盗墓贼没费多少力气就挖到了陵墓的墓门。墓室门打开后，刘去急忙走上前去观看。只见墓室中央停放着晋灵公的棺椁，由于日久天长，棺椁已经朽烂不成样子了，四个角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默默守护着亡灵。40多个男女石人，捧着灯烛站立在棺椁的周围。棺椁打开之后，晋灵公的尸体历经四五百年居然保存完好，皮肤还有弹性。根据以往的经验，刘去认为尸体内部一定放置了防腐的宝物。他急忙吩咐众人撬开晋灵公的九窍，果然发现了许多金玉珍宝。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刘去看上了这个玉蟾蜍，好拿回去当储水磨墨用的水盂使。

刘去刚一入行就收获颇丰，但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紧接着又把目标锁定在规模宏大的魏襄王陵墓上了。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40人，用手触摸，光滑如新。墓穴内部也是用石料做成的，中间放置石床、石屏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也为了显示气派，魏襄王墓上面用铁水灌注。想要掘开如此坚固的古墓，着实需要费一番工夫，但有着盗墓嗜好的刘去却更乐于挑战难度。他带领盗墓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成功地打开了墓室的石门。正当刘去兴奋不已的时候，墓室里面突然冒出了一股股又苦又辣的黄色浓雾，士兵们都以为触怒了墓室内的灵魂，要遭报应，一个个面面相觑，反应快的拔腿就跑，反应慢的呆立着，不知所措。他凭借着丰富的墓葬知识，认为这只不过是为

了防止盗墓而设置的机关，用来吓唬人而已。

刘去要把游戏玩得更精彩，越困难就越能激发他的斗志。他派兵把守在墓穴周围，令人开始进入墓室不准离去。七天以后，黄雾终于散净了，刘去带领众手下用大锤敲开石门上的大锁，仗着胆子一拥而入，首先映在眼帘中的是魏襄王高大的棺材。棺材乌黑发亮，它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刀枪不入，光可照人，即使这样也难不倒刘去这位盗墓界的奇才，他吩咐手下用锯子将其锯开，将棺材里的宝物收敛一空，魏襄王的尸骨也被抛出棺外。刘去继续在墓室周围搜索，他转了几圈忽然发现墓室旁边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石门，上面有暗锁。对于他来说，这个游戏就更加好玩了。想方设法进去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灰尘堆得老厚的大石床。床左右有20个妇人石像侍立。铜帐钩一只掉在地上，似是因为帐已腐去。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被刘去盗掘的有名古墓还有好多，如魏王之子且渠墓、周幽王墓、栾书墓等一大批古墓。但盗墓多了，刘去也害怕。《太平广记》记载，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里面的人竟然栩栩如生。刘去赶忙让手下人住手，退出，重新封好。他把盗墓行为看成是一场游戏。倘若游戏玩得好，自然是满心高兴。倘若游戏玩得不好，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盗掘陵墓，以忘掉心中的不快。广川王封国内的墓冢几乎无一幸免。

墓室盗多了，遇到的奇怪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变态的游戏终于有一天玩到了尽头。

刘去带着他的盗墓部队去盗且渠的墓时，打开墓葬后，发现墓里没有棺材，石床下全都是天然云母石，床上有一男一女，大概二十来岁，裸身躺卧，两人皮肤的颜色像活着一样。周围的士兵们都非常恐惧，不敢触动他们。刘去见到这样的场景也害怕了，慌忙退了出去。

刘去在盗掘周幽王墓时遇到了“活见鬼”的事情。周幽王的墓穴高大雄伟，刘去掘墓时发现上面一层是厚厚的白垩土，挖了3米多深以后，现出1尺厚的云母。清除后显现出一百余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没有腐烂，保存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

传说广川王刘去在栾书墓里，因为触犯了墓穴里的灵魂而遭到了惩罚。当他带人打开墓穴时，一只白色的狐狸从里面跑了出来，刘去命令士兵们用箭射中了狐狸的左腿，狐狸带伤而逃。晚上，刘去就梦见一个鬓发眉毛皆白的老者，恶狠狠地对他说，“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说完用手杖打了刘去的左脚一下。刘去被吓醒后，发现自己的左脚果然肿了起来，过了几天就生了毒疮。无论怎样

医治，这块毒疮都不见好转，就像被施了诅咒一样。后来，他的丑恶罪行被揭露，朝野哗然，大臣们纷纷要求处死他。但汉宣帝不忍心对皇族成员用极刑，只是下诏革去了刘去的王位，贬为庶民，流放上庸（今湖北竹山）。刘去在流放途中自杀身亡。

刘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逆转乾坤的能力，有的只是累累恶行与那一件件盗墓的罪责而被后世唾骂。

汉武大帝墓多舛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为突出的。所以被盗掘的次数和规模也远远多于其他皇陵，仅历史记载的被盗事件即有五次。汉武帝在位54年，茂陵就修建了53年，他下葬茂陵时，封土上的树木已经合抱。由于茂陵营筑时间长，所以陵中陪葬物多得放不进去，引来盗贼的频频光顾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汉武帝安葬之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84年的一天，都城长安附近的扶风市有人兜售一个玉箱和一个玉杖。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碰巧让经过这里的一位曾经侍奉过汉武帝的侍从看到，一眼就看出这是汉武帝生前最喜欢的物件，是康居国国王的进贡物品，于是就马上报告官府。官府认为这件事情重大，将兜售之人抓起来拷问。这个人只说他是用30匹青布和9万枚铜钱从别人那儿买来的，至于兜售之人是谁、从哪里来根本也不清楚。这起案件只得就此作罢，由此看来武帝墓最早被盗有据可查的是这一年。

谜团由此而来。既然汉武帝聚敛了几十年的财宝放入墓中，那么几个蟊贼是无论如何也拿不走这些东西的，如果这样，那么茂陵中的珍宝应该还有很多，但事实上茂陵中的珍宝所剩无几了。因此有人会问：后来茂陵又遭受了怎样的厄运呢？汉武帝这位大权独揽的皇帝在自己死后是否过得舒坦呢？迄今为止，我们还能从茂陵中得到什么宝贝呢？茂陵还能给我们留下哪些惊喜呢？

历史给茂陵制造了无数的悬案。公元前64年，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诞的事情。山西有个采药人，名叫李友。此人常于山中采集药物。一次，他来到上党的抱犊山采药。当他爬到半山时，已是筋疲力尽。此时，他看见了一个山洞，便走了进去想休息一下。坐于山洞口的平坦岩石上，李友俯视抱犊山，只见满目青翠，山中的小溪淙淙流淌，不

觉心旷神怡，疲劳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休息片刻，李友起身欲走。就在起身的同时，他不自觉地看了山洞一眼。这一看，看出了问题，他发现黑暗的山洞里有个东西闪着金光。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向洞里走去。走了大约200米，他看到了那个闪光的东西，原来是个金箱。他试着抱了抱，箱子很沉。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将箱子搬到了洞口。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金箱，发现里面盛满了书籍。书籍码放整齐，计有杂书40余卷，包括《老子》2卷、《太素中脂经》6卷、《天柱经》9卷、《六龙步元文》7卷、《马皇受真术》4卷。经过进一步核对，让主要官员大吃一惊，原来这是汉武帝的随葬书籍。他们赶紧上报给当时的皇帝。但由于皇帝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只对守陵的官员作了一些简单的处罚就草草了事，所以这件事情的真假就成为了悬案。这是关于茂陵的第一起悬案。

不久，又有一位地方官从一个农民的手中缴获几个玉碟，经过查验，发现是茂陵内的东西，地方官急忙禀报上去。谁曾想，检查组还没有到，这个藏有玉碟的农民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至于他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玉碟，也无人能知了！这是第二起悬案。

最后一起悬案更加离奇。江苏某县县志记载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位商人出门采购货物，忽然遇到大雨，他急急忙忙跑到一个土地庙中避雨。没有想到雷电交加中土地庙上空出现一个似龙非龙的动物，当这个商人想要看个究竟的时候，这个动物突然吐出一颗宝珠来。商人捡起一看，上面刻着“御用”两个字，他哪敢留下，很快就交给官府并将此事原委说了。谁曾想到，怪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不久这个商人不见了，又过了几个月，放在官府府库中的这颗宝珠也不见了，朝廷严厉追查也毫无消息。又过了三年，人们却发现商人口含宝珠死在离茂陵不远的一口井内，也不知道死多久了。后来西汉皇室成员确认这颗宝珠是汉武帝的随葬品，并将它送回祭祀汉武帝的祠堂内。据说后来每天晚上都有打雷的声音隐隐从祠堂里面传出来，以至于守卫祠堂的士兵晚上都不敢靠近祠堂，再后来这颗宝珠就不知下落了。这个悬案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但就没有人能说出它的真相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是杜撰的，不过这却给茂陵笼罩了些许神秘的气氛。

这些悬案不能确切地说出茂陵是否被盗过，也就更加吸引后来者去探究茂陵珍藏宝藏的秘密。那么都有哪些人真正进入过茂陵呢？这些进入茂陵的人都从那里带走了什么呢？让我们再次打开历史文献，就不难找到这样的记载：西汉末年，琅野人樊崇率百余人入泰山，揭竿起义。公元22年，新朝皇帝王莽派大军10万人打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起义军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史称“赤眉军”。结

果大败王莽军。公元25年，赤眉军30营（1营为1万人）攻入长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掳掠，在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赤眉军又来到咸阳塬上，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西京长安二百年的文物，几乎被破坏殆尽。而汉武帝的茂陵，当然也在劫难逃。

据史书记载，赤眉军掘开茂陵后，成千上万的士卒搬取陵中宝物。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附近的帝后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令人发指的是，个别人竟然干起了奸尸的可耻勾当。据《后汉书·刘宣子传》记载：赤眉起义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兵西征，“逢大雪，坑谷皆满，上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公元26年，赤眉军再一次“光顾”了茂陵。当时，他们正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打败，走上了穷途末路，兵退咸阳。许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军心更为不稳，樊崇为此一筹莫展。此时，起义军的军师，名叫徐宣，他给樊崇出主意说：“眼下我们东有刘秀攻打，西有隗（wěi）嚣追击，两面受敌，想退是不可能了。只有设法再次打进长安，方有一线生机。只是现在雪下得这么大，军心不稳，我看主要是士兵闲来生事。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士兵们有了财物，士气自然高昂，攻进长安就有希望了。”樊崇一听，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士兵再次去盗茂陵。

徐宣此次出主意去盗茂陵，除了想要提高士气外，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得到茂陵中的道术秘册。原来徐宣能掐会算，曾当过县衙的狱吏，在《易经》上造诣很高。他知道汉武帝生前信神敬仙，收集了不少方士的道术，所以猜想其墓中必有秘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徐宣的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猜测：士兵们找遍了茂陵的所有角落，甚至捣毁了著名的茂陵陪葬墓——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也不见道术秘册。

盗两汉墓奇事多

中国的墓葬发展到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从秦始皇开始，最高统治者的坟墓有了特殊的规制，开创了中国历代皇帝的陵寝制度。为了显示与老百姓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帝王的墓筑得又高又大，就像座小山。《水经注》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

陵，故通曰山陵矣。”由于帝王身份是等级最高的特权人物，所以生前有能力凌驾于万民之上，死后也有财力将坟墓修筑得巨大无比，这样才可以显示出军权的至尊无上。毛泽东在诗词中所提及的“秦皇汉武”，不仅在活着时是当时的杰出帝王，就是在他们死后，其墓葬也无不显示出他们在人世间的奢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的厚葬之风走向了一个高潮。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盗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厚葬，厚葬必然引起盗墓。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辑录如下：

《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公元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愍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所以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在徐州龟山汉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上用不规则的小篆写着：第百上石，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椁，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也心者悲之。

这座墓乃西汉时的楚襄王刘注与其妻的“同茔异穴”墓。碑文主要是告诫后世，他虽为一代楚王，但墓中既无华贵的服饰，又无陪葬的宝物，当你看到碑文时，你心中一定会感到悲伤。

尽管如此，后来的发掘证明，其墓仍被盗掘两次。更令人感到可笑的是，这两次盗掘，在墓中依然出土了玉器、陶器、车马器、陶俑、五铢钱、麟趾金、龟纽银印、铜矛、朱雀肖形印等大批文物。而那碑文，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使用数量众多的塞石封堵墓道，塞石重的可达7.8吨，但仍未能阻止盗墓贼的进入。经现代考古发掘可知，盗墓贼或将塞石击断，或将其拖出，最后成功地进入了墓室，将随葬品洗劫一空。考古人员清理时，发现后甬道一块塞石已被盗墓者拖运到前室，塞石的前端有盗墓者为便于拖拽而凿出的牛鼻扣。据推测，盗墓贼借助凿出的牛鼻扣，拴上绳索，用一头或数头牛向外拉动，一一将石板拖出室外，然后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打开棺椁，盗取宝物。在塞石的缝隙中，清理人员发现了玉衣片，这证明墓主曾穿戴金缕或丝缕玉衣，盗墓贼连同玉衣和陪葬器物一并劫走了。

五花八门的离奇的事，史书记载中却屡见不鲜。传说，盗墓贼打开刘表的坟墓以后，香气扑鼻，打开棺椁，更是香溢心田，令人心旷神怡，以至陵墓附近几里地都能闻到香气。那么，刘表之墓何以如此飘香数里呢？

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姿貌温伟，少时知名于世，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刘表死后80余年，也就是晋太康年间，他的墓遭到了盗贼光顾。当盗墓贼打开棺椁的时候，不仅感到香气扑鼻，而且还看到了神奇的一幕：刘表和他的妻子栩栩如生，皮肤和活人差不多。据说面带微笑，好像对盗墓贼说：你们现在才来呀，我们夫妻俩等你们久矣！对于此事，郦道元的《水经·沔水注》曾有记载：“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日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那么，为什么坟墓里会有香气呢？原来，其子刘琮“持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北宋李昉主编的《太平御览》也说：“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梼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

大概这大量的珍香有去异味的作用，使细菌虫霉没了生存环境，再加上香药料也有保养皮肤的作用，所以起到了防腐功效，以至盗墓贼仿佛是见到了活人。此外，由于香料充满了棺椁墓室，以至十里之外都能闻到香味，久久不散，也许刘表希望自己死后不但能流芳青史，而且还能留香人间吧！

虽然说史料记载的各种近似传奇的古代未腐尸体，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而无法详考，但现代考古发掘中确也时有类似的实例发现。

第十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盗墓高潮——盗墓风潮第二波

民间盗墓已成风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有两处说到“掘冢”，司马迁在论述中这样写道：“故壮士……斩将搴（qiān）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见，司马迁也认为，盗墓的大部分动机都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从而说明了当时民间盗墓情形的严重。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见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生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至南冈。夜梦（鲁）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王）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

这两则故事略有不同，一个是说王伯阳的妻子占用了东吴统帅鲁肃的墓穴，一个是说王伯阳自己占用了鲁肃的墓穴。但王家的活人都因此遭到了鲁肃的报复。在第一则故事中，王伯阳被鲁肃的鬼魂击打了数百下，结果发疽溃烂而死；在第二则故事中，王伯阳的儿子梦见鲁肃之魂恶狠狠地说要杀了他的父亲。又梦见他的父亲之魂说在阴间被鲁肃闹得不得安生。醒来后就看见他父亲的灵座褥上有鲜血。

同样出于《太平广记》：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

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闾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闾丘为杨佺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

这里是说晋安帝隆安年间，闾丘南阳要把他的妻子葬在“文将军”的墓旁。晚上他的随从都梦见这个文将军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闾丘南阳没有在意，还是把妻子葬在那里。下葬的时候，只要音乐一响，就能听到鼓号和铠甲的声音。送棺入墓室的时候，又有三个人死在了墓门旁。不久，闾丘南阳被杨佺期灭了九族，人们都说这都是那个“文将军”作祟的结果。

为寻解药得咒语

三国时期的盗墓史事，虽然民间盗墓成风，但盗墓的主要力量是官盗。说起官盗，就不得不提起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官至太师、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合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自小性格残忍而且谋略极多，还有一身超强的武艺。董卓天性好斗，力气很大，尤其是臂力过人，会骑马，喜欢腰挂双弓，能够左右驰射。当时岷县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年轻时就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交往。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帅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的趋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

帅来家做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武，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因董卓的义气而感动，都一直死心塌地跟随他。

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yuàn）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强大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

不久，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朝廷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朝廷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

后来，董卓被朝廷所用，虽然在战斗中屡战屡败，但是却由于自己的钻营而得到连续的升迁，手中握有重兵。他凭借手中兵权，在汉灵帝死后乘机攻入都城洛阳，并操纵了朝廷。他为了把持朝政，长期专权，便废了少帝，改立献帝为皇帝。朝廷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他不

断给自己加官进爵，官位直至相国。

董卓为人极为残暴，他在洛阳时，纵兵大肆诛杀劫掠。京城人人自危，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天下各路诸侯都对董卓的专权极为不满，便商议讨伐董卓。汉献帝元年，袁绍带领全国各路诸侯兴兵讨伐他。董卓并没有因此而着急，因为他手里还攥着一张王牌，即汉献帝。他挟献帝以令诸侯，各路诸侯为了皇帝的安危不敢轻举妄动。董卓还强迫汉献帝下诏自洛阳迁都长安。次年，董卓自称太师，专权到了极点。

董卓所做坏事远不止这些，盗墓也是他诸多罪名中的一项。他入西关前，由于天下混乱，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就曾派手下将领盗取过很多东汉帝王的陵墓。但是，由于那时他的势力尚小，不敢明目张胆地盗墓，怕引起天下人的非议。在他入关后，独揽朝廷大权，满朝文武以至献帝都要唯董卓马首是瞻，他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再加上天下各路诸侯都来讨伐他，就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保障自己的地位。为了筹集充足的军饷，董卓便肆无忌惮地盗起年代更加久远、陪葬品更为丰富珍贵的西汉皇陵来。董卓盗墓的执行者就是他手下第一大将、他的义子吕布。

在董卓所盗的诸多陵墓中，规模最大、珍宝最多的就属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了。

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至于吕布盗掘诸陵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其盗掘茂陵却留下了一个故事。

据说，吕布盗茂陵时，董卓曾交付其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要其留心寻找茂陵墓中的秘方妙药。原来，董卓有个孙女，名叫董白。此女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乖巧，甚得董卓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岁时董卓就封她为渭阳君，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仪式举行时，董卓特命兵士搭起了宽6米多、高2米的高坛，董白坐着显贵的轩金华青盖车，由大批官员簇拥，登坛受封，好不隆重。但可惜的是，这董白是个哑巴。为此，董卓十分忧虑，曾广延天下名医为之医治，均未见效。后来，董卓听手下大臣说，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吕布。

吕布带领大批士兵进入茂陵，在搬运大批宝物的同时，细心地找起了灵丹妙药。但是，搜遍了整个陵墓，连汉武帝的棺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灵丹妙药还是未能找到。吕布没有完成董卓交付的特殊使命，心中既着急又懊丧。正在这时，只见一个士兵手拿一卷绢纸，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小跑过来。吕布听到后心中不由得一阵

狂喜，他不等士兵报告，一把从其手中抢过了绢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用端端正正的隶书写着十二个大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吕布乃一介武夫，好不容易认识了这几个字，已属不易，哪里还会理解其中的深意，他认为这也许正是董卓要找的。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宣布班师回朝。回来后，将绢纸交于董卓。董卓端详了一阵，也不知其意，于是转而问大臣。然而众大臣面面相觑，无一应答。董卓大怒，厉声喝问：“连这十二个字的意思都不能理解，我养你们这帮大臣何用！”厉声之下，众大臣无不战栗。董卓更为生气，走下殿来，双目圆睁，逼视站在最前面的大臣。该大臣一看大事不妙，扑通一声跪下：“大王，臣非不知，实不敢说。”董卓说：“你说，我不怪你，赶忙说。”大臣颤声道：“这句话是诅咒您的。”“如何见得？”董卓仍是不解。大臣道：“您看，这千里草，合起来是一个‘董’字，十日卜合起来，是一个‘卓’字，这句话是诅咒您不得好活啊。”董卓听完，气得都快晕过去了，他伸手将那一卷绢纸拿来，欲将其撕个粉碎，但是，这绢纸非常结实，怎么撕也撕不碎。盛怒之下，他将其掷于地，踩于脚下，并大声斥责吕布：“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饭桶！滚下殿去……”

后来，余怒未息的董卓又派人将汉武帝的尸体扔在墓外曝晒。朝中大臣对此无不黯然，于是公推蔡邕前去劝解。董卓这才消了怒气，派人将尸体放回，并草草处之。

后来，董卓不禁为自己盗取汉武帝茂陵的荒唐举动后悔起来。他本来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见到那张诅咒他的纸后就更加后悔了。他怕盗墓行为坏了地脉风水，坏了他的霸业，影响到以后他做皇帝，就又派人将一部分不太重要的陪葬品放回了茂陵中，还把茂陵也重修一下，以求得上天的宽恕。

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竟完全应验了那张神秘的纸上面写的内容，没过多久董卓就死在了王允的连环计下，杀他的人正是吕布。

从董卓发迹直到被吕布刺死，这期间董卓所盗陵墓无以计数。在他专权期间，修建了大批的宫殿庙宇以同众妃子们享乐。这修建宫殿庙宇的很多钱财都是从陵墓中得来的。茂陵后来被修复还算是众多陵墓中最为幸运的一个，其他的陵墓大都被他彻底损毁，就连皇帝的尸体也被他随便丢弃。

专业盗墓曹孟德

继董卓之后，这个时期最著名、最专业的盗墓者出现了，他就是曹操。曹操以将盗墓专业化、产业化而闻名，他首开先河，在军队中设置专门的军官负责盗墓，还形象地给他们取了名字——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曹操经常亲临盗墓现场，指挥盗掘。曹操手下的专业盗墓者发掘的最大墓葬是洛阳芒砀（dàng）山中的西汉梁孝王刘武墓和其妻李王后墓，获利无数。据说仅此一次盗墓，便解决了曹操手下十几万军队三年的开支，盗墓利润之丰，超乎常人想象。曹操堪称是中国盗墓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者。

曹操（155—220），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曹操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担任官职，封为费亭侯。据说父亲曹嵩出身不明，《三国志·武帝纪》中说他是“莫能审其本末”，而在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间接引用三国吴人所著《曹瞒传》中称曹嵩本姓夏侯，但此说可信度很不高。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字子将，以知人著称，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此据《后汉书·许劭传》。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作“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曹操在民间传说里，一直是个典型的奸雄形象。但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应该是其盗墓行为。史载，曹操在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便想到陪葬甚丰的汉帝王陵和富家大墓，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曹操盗得的最著名墓冢是芒砀山王墓，这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

刘武（？—前144），汉文帝嫡二子，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同母弟，母窦太后。公元前178年被受封代王，前176年改封淮阳王。前168年，梁宣王刘揖薨（hōng），无嗣，刘武继嗣梁王。前161年就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七国之乱期间，曾率兵抵御吴王刘濞

（bì），保卫了国都长安，功劳极大，后仗窦太后疼宠和梁国地大兵强欲继景帝之帝位，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谥号孝王，葬于永城芒砀山。自受封至去世，共为王35年，其中为梁王24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为其五子封国。梁孝王是文帝的二儿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景帝，两人同为窦太后的儿子。

梁孝王一开始为代王，后来淮阳王，最后才为梁王。

窦太后比较喜欢梁孝王，所以一直希望景帝千秋万岁之后能传位于梁王。

景帝确实犯傻，居然在一次酒会上从容地说“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记住，司马迁用了“从容”二字，显然不是喝醉了。皇上乃金口玉言，说话当然算数，所以梁孝王窃喜，没想到被窦婴驳回去了。从小就听说过周成王桐叶封疆的故事，皇上岂是口误。奈何当时举目天下，唯有梁孝王才是自己的亲兄弟，不靠他靠谁呢？

所以后来平定七国之乱后，因为梁王最亲，战功确实也很卓著，所以后来分的财物和大城市最多。

当景帝废了栗皇后之后，窦太后又动起了这个心思，没想到袁盎这个时候推荐刘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梁孝王一下子气坏了，派刺客把袁盎给杀了，可是事情没做干净，被景帝查出来了，吓得他连忙负荆请罪。景帝又一次原谅了他，还是因为窦太后说了一句。

以梁孝王的财力和军力夺取天下并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当时七国之乱时，景帝特别防着他，硬是没让周亚夫发一兵一卒。平定之后更是声名显赫，有功高盖主的嫌疑，所以屡次被景帝暗算。

刘武抵御七国之乱有功，一度有夺景帝帝位的念头。后来不知道采用谁的破主意，开始主持大兴土木，宫台楼榭绵延三十里，天子旌旗，出门以天子仪仗……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景帝不担心他称帝的野心。没想到刘武后来打猎打到一头牛，牛脚长在背上，结果，他六月发热病，不久就死了。

想梁孝王也是虚怀若谷，门下不知多少人才，像我们熟知的司马相如、枚乘、邹阳，都有响当当的名号。

刘武的陵墓形状之巍峨、陪葬之丰厚，令人叹为观止。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汉梁孝王墓群进行保护性发掘，在这个三国时代就被盗过的墓群中，仍发掘出了金缕玉衣、大型玉璧等珍贵文物2万余件，许多文物价值连城。可以想象，这个巨大的宝藏，对当时缺衣少食的曹操军队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大行

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胸怀天下的曹孟德，只要军队能吃上饭、打胜仗，哪里还在乎背上骂名。

曹操的兵卒应该是第一批走进汉梁孝王陵墓的盗墓者。汉梁孝王墓群的每一座墓的墓道都被用大量上千公斤重的塞石封死，所以，普通的盗墓贼就算找到墓室的准确方位，也很难进入。而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曹操来讲，要想盗墓，可谓小菜一碟。陈琳在檄文中具体描绘了曹操亲自指挥将士盗掘梁孝王陵墓的情景。文中说：“（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水经注疏》中说：“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

曹操的士兵进入墓室后看到了什么、拿走了什么，我们无法考证。但据史料记载，曹操用从墓葬里盗得的宝物，养了手下的军队三年！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盗墓都是一种宽容的罪过。项羽盗掘秦陵让刘邦找到了诽谤的理由，曹操则让袁绍抓着了小辫子，成为挨伐的一大罪状。

1991年4月，河南商丘的村民在永城芒砀山崩山采石，炮声过后，尘烟散尽，一片金黄呈现在人们面前。已经有了经验的村民，很自然地想到了古墓。他们不敢怠慢，立马报告了文物部门。

在现场发现的一枚“梁后园”铜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考古人员由此初步判断：此墓应是梁孝王王后李氏之墓。

李王后墓同梁孝王一样，也是“斩山为廊，穿石为藏”的大型岩洞墓，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该墓是一个由两条墓道、三条甬道、前庭、前室、后室、隧道、排水系统和34个侧室等部分构成的庞大地下建筑群。李王后墓东西全长210.5米，最宽处72.6米，墓内最高处4.4米，总面积1600多平方米，总容积6500余立方米。因为墓内容积巨大，李王后墓曾被称为“天下石室第一陵”。

这个墓从东到西贯穿了整整一座山，所以当地老百姓用“从山东到山西”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李王后墓的巨大。

其实李后的墓有如此规模也并不令人奇怪，要知道从前144年梁孝王去世，到前132年李王后去世，李王后墓至少建造了21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修建李王后墓所动用的人力之多，花费的财力之大，足可以想象。

李王后墓有东西两个墓道。东墓道位于山峰的东坡，是在岩石上露天开凿的，总长37.7米。东墓道的西端连接前庭，前庭北壁有两个

侧室。侧室门口发现刻有“东车”、“西车”字样。东墓道西端有门和甬道相连。甬道南北两侧各凿有两个侧室，是放置陪葬品的地方。

李王后墓的前室西部有一斜坡甬道与回廊和后室即主室相连通。后室是李王后墓的主体建筑部分，周围有回廊环绕。后室西半部凿有一长方形凹槽，后室北壁凿有棺床室、侧室和过道。过道西壁有两个小侧室，南侧室为浴室，北侧室为厕所。厕所内有便池及扶手等，当为我国坐便器的最原始形态。在南回廊的东段南侧有一仿楼阁式侧室，被称为储冰室，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冰箱”。

据史书记载，汉代丧俗，夫妻“同茔不同穴”。为了在死后能够继续相亲相爱，梁孝王嘱咐后人在他与李王后的墓穴之间挖一条黄泉道。这条黄泉道到现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一条从李王后墓中的南回廊中部往南开凿的隧道，可惜这条黄泉道只修了50多米，远远不到200米（李王后的陵穴距梁孝王的主墓穴约有200米）。这对恩爱夫妻因此含恨九泉，千古难以相见。

一代奸雄求薄葬

可能是看到了厚葬的弊端和被人盗掘的险境，曹操生前积极提倡薄葬、秘葬。鲁迅先生在其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里说到曹操：“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古代指女歌舞艺人）怎样处置等问题。”

曹操这样的大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共同点就是：有一天都会死去。所以曹操对后事也有所安排，他死前写了《遗令》：

>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
>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着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
>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着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在这篇《遗令》中，曹操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做了简略的结论，认为自己依法治军是一贯的，至于发小脾气，犯大过失，则不值得仿效。从这一点来看，曹操还是实事求是的。

此外，令文对自己的婢妾和歌伎也做了安排，要求将她们安置于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要向着灵帐歌舞，还要常登铜雀台，遥望自己的墓田。对于余下的熏香，可分于诸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之人如无事，可学着编织有饰物的鞋子卖。自己一生做官得到的绶带都放于柜中，遗留的衣服等放于另一柜中，放不下的可由曹丕等兄弟们分掉。

曹操《遗令》中的细琐安排，特别是对妻妾的安排，遭到历代文人的非议。如杜牧《杜秋娘传》云："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写道："纵酒苍悟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祝翁》中也评论道："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这些纠缠于细枝末节小事的诗歌，其用意大抵是一种讥讽。

公元207年5月，已逾"知天命"之年的曹操，在征战乌桓的归途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表明，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一方面统一大业路途尚远，另一方面老境渐至、岁月如梭，所以，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就成为曹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暮年将至、壮志未酬的苦闷也随之而生。

对于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曹操是十分向往的，这从其诗《气出唱》中可得到明证。这是其中的一首：

>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cān）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在这首诗里，曹操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历经泰山、蓬莱，得到了不死之药，又同各路仙人饮酒同乐，共度良辰的美好梦境。其成神仙、齐天地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对此，曹操的认识是清醒的，也

是痛苦的。这从其61岁时所作的《秋胡行》（其二）中可得到体现：

>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遥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
>
>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
>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
>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
>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在这里，曹操虽然试图“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人道居之短”，连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都不能得道成仙，何况自己？所以，他只能面对现实。但是曹操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人生的短促，他并没有采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悲观放纵态度，而是表达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与“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不懈精神。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中国的气功有几千年的历史，可气功这个词的出现时间并不是很早，它首先见于晋朝许逊著的《灵剑子》一书。据考察认为此书不是许逊亲自所著，因为书中有很多气功术语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用的，所以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宋朝。但它的思想可能是许逊这个门派师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在《灵剑子》一书中，气功这个词不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来使用的。过去练功叫修行，就是修道，也叫行气，可以解释为练周天，也可叫呼吸吐纳，也可称运气、行气，就是把气的功能加强起来，一方面修德、好事，一方面练，使身体发生变化，到一定程度修成了，就叫“道气功成”。

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

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著。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晋朝以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兴盛起来了。宗教利用了气功，把气功神秘化了。本来气功是练气修德，很具体很实际的，可是宗教化以后，就追求修炼成神、成仙、成佛了。这么一来，气功的科学本质没有了。但如果翻开中国气功史，可看到就在晋、隋、唐这一时期，有很多古人用气来命名的著作，如《气诀》、《气经》等，书中写的都是练气、用气的内容。《气经》中讲了几十种练气、用气的方法，连发放外气的方法都有，叫“布气”。以后的宗教淹没了气功，气功的名词就没了。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他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之所以主张薄葬，其原因有二：

一是曹操主张节俭，反对浮华。《三国志》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

二是为了防止盗墓。因为曹操盗过许多王侯的陵墓，看到了盗墓过程中的惨烈，对于墓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他自己说要薄葬，意思就是你们盗墓，也盗不到什么。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的暴行。檄文指出，曹操品德最为不耻，挖人陵墓。难怪有人说：“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可能曹操

自己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自己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他才一再要求薄葬。

集团盗墓最疯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乱世，魏即是说曹魏，晋就是两晋。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馑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过着这种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活，面对满目疮痍、黯然无光的环境，许多人铤而走险，加入盗墓者的行列。当盗墓成为另一种风行的行为时，人们便不以为耻，窃贼竟也能公然走上庙堂。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其妻文德郭皇后也说过“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可见当时盗墓活动何等之猖獗。

作为盗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魏晋时期盗墓最大的特点是盗墓者中多有王侯将相。魏晋是一个军阀并起、豪强割据的时代，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军阀间战火不断，军队数量庞大，所需军费也骤然提高。而由于战乱、饥荒、瘟疫，人们不能安心劳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阀财政收入匮乏，割据一方的豪强们纷纷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于是，盗墓这一古老的不需成本而速见成效的敛财之法，被各路军阀竞相采用。

就这样，魏晋时期出现了许多王公贵族盗墓集团。这些人对王侯的陵墓进行了疯狂的盗掘，甚至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国君刘曜，本是汉王刘渊的同族，后来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力日渐强大。319年，他迁都长安。他虽然也起用了一些有学识的人做官，也在长安开办学校，造经学之士以教之，但他始终没有一套成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措施。刘曜初入关中时对部下的规谏还听得进去，如他命起陵霄台，在霸陵西南建寿陵时，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进谏，刘曜听了大喜说：“二侍中恳恳有古人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遂罢其工程。但平定巴氏叛乱不久，就开始对大臣们的进谏听不进去了。陈安之乱未平，刘曜就为其父母建永垣陵、显平

陵，功费至亿，游子远进言停建，但他不听。后来大兴土木，发600万民工为其父及其妻修建陵墓，《魏书》、《晋书》记载其“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其结果是“气塞大地，暴骸原野，器声盈衢”。由于其大量挖掘古坟，并将尸骸遗弃荒野，从而造成了太原一带瘟疫流行，老百姓死者无数。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

东晋太宁二年（325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尹平战败被斩，石生掠前赴5000人而还。太宁三年（326年），刘曜联合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进攻石生。刘曜派中山王刘岳将兵15000人，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州、司州之兵会攻石生，前赵联军迅速攻克石梁（今河南洛阳东）、孟津（今河南孟津）。石虎率步骑五万自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与刘岳战于洛西，大败后赵军队。六月石虎收复石梁，擒刘岳及其将领80余人，氐羌3000余人，皆送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坑其士卒10000余人，不久又攻陷并州。刘曜败归长安，郭默南奔建康，李矩部下率众2000人投降后赵。自此，司、豫、徐、兖等州皆为后赵所有。

咸和三年（328年）石虎率兵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西上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刘曜自将精锐驰救蒲阪，两军战于高侯（今山西闻喜境内）。石虎大败，陈尸200余里，南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自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乘胜进军石生于金墉（今河南洛阳以东），决千金堨（在今河南洛阳以北）以灌城，洛阳为之震动。同年十一月石勒发兵三路进攻刘曜，十二月石勒后赵诸军集结于成皋，不见刘曜设防，军队迅速开至洛河。刘曜忙陈兵十万于洛西，石勒遂命石虎引兵自洛阳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命石堪率兵自城西而北，由刘曜前锋，石勒自出洛阳阊阖门，夹击刘曜，前赵军队大溃。刘曜在退兵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为石堪生俘。

石勒大获全胜，斩首五万余级。石勒让刘曜写信令其子刘熙投降。刘曜给刘熙的信中却令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遂杀刘曜。

石勒杀死刘曜后不久，便得病而死。他的侄子石虎乘机杀死了石勒的儿子，自己做了皇帝。这个石虎性同野兽，十分残暴，他即位后，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人民的脂膏也被其搜刮得干干净净，老百姓被饿死的就达十之六七。除此之外，他又是一个盗墓狂，《晋书·石季龙载记》中说其“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这一点也不夸张。

此外，十六国时的后秦君主姚苌、后燕君主慕容垂等，都是盗墓能手，每到一处，即“毁发丘墓”，掠取宝物。经过这些人的大肆盗掘，前代陵墓大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更令人发指的还有一个人——始兴王陈叔陵。

陈叔陵（？—581），字子嵩，陈宣帝陈顼次子，母彭贵人，生于江陵，封为始兴王。曾随父往西魏做人质，天嘉三年（562年）与兄陈叔宝一同还陈朝。

《南史·陈宗室诸王传》记载：“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翫（wán）弄，藏之府库。”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叔陵为了安葬其母，竟然派人“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真是荒唐透顶！

此人表面上看来，文质彬彬，入朝时在车马中总是执卷读书，还高声朗诵，一副书生模样，但背地里却十分残暴荒淫。他不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而且好色成性，“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又私下里将其随从的妻子、女儿招来，与之奸合。不仅如此，这个淫荡之徒还有个嗜好，专好在坟墓中游荡，并将死者的尸骨当做收藏品来欣赏把玩。

每逢他在野外游山玩水的时候，若遇到一些较为豪华的墓碑或是名人的墓碑，都会下马驻足细细地品读一番，然后就下令让手下人挖开坟墓，把墓中的所有东西一一翻遍，拿走所喜欢的东西。陈叔陵常常在将陵墓内的珍宝洗劫一空之后，便洋洋得意地回府了，有时甚至把所盗陵墓中的尸骨也带回府悬挂起来作为战利品。

陈叔陵所挖掘的众多古墓葬中，有很多都是名人的墓葬，就连东晋太傅谢安的陵墓也没能逃出他的毒手。

在那个丧乱年代，关于盗墓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纵兵盗掠”、“发掘陵墓”等也成为当时史书上最常见的字眼，这是乱世的悲哀。

好奇盗墓堕马亡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说过，盗墓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敛财而盗墓，有的人是为了复仇而盗墓，也有的人是为了好奇而盗墓。但是，因为好奇而盗墓的人还真不多见。东晋刺史温放之

就是这类罕见的奇人中的一位。这位好奇心极强的人，最终把命也搭了进去。

温放之是东晋太原人，官至黄门侍郎。东晋最有名的功臣温峤是他的父亲。温峤因军功被封为晋大将军、始安郡公。在东晋初年，温峤与王导、庾亮、阮放、桓彝并称为“中兴名士”，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稳定晋室纲纪，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中，功绩卓著，彪炳史册。温峤死后，温放之继承了爵位。与温峤一样，温放之也为东晋的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晋穆帝升平三年，现处于越南地区的林邑国发生叛乱。

晋穆帝派去的众多将士都未能平定叛乱。于是，派温放之成为最后的底牌，晋穆帝让他去征讨。温放之凭借着杰出的指挥才能，很快就平定了那里的叛乱。温峤虽然官居高位，但他为官清廉，因此家境比较贫寒。温放之曾因家贫而请求外放到地方去做官，以便多挣些钱缓解家境。晋穆帝十分器重他，便派他做交州刺史。

温放之不但能领兵打仗，还有着很好的艺术才华，尤其对书画方面十分在行。唐窦臮（jì）《述书赋》卷上论曰：“放之率尔，草健笔力。岂忘保持，足见准则。犹片锦呈巧，细流不极。”宋朝人陈思所著《书小史》也称温放之“善草书”。按说，这样一个在艺术和政绩上都有着突出成就的人，应该性格开朗、豁达。但事实并非如此，温放之性格极为孤傲，十分偏执，好奇心极强，还不听人劝。

一天，温放之在家中闲坐看书。因为没有什么公事，很是清闲。可清闲久了，他又开始觉着无聊起来。书没看几页，他就看不下去了。于是，温放之站起身，决定去花园走走，散散心。

温放之的花园被修整得十分漂亮，得益于他是一个极为讲究生活的人。花园里无论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此时，正值春天，花园里自然是繁华似锦，花团锦簇。看着这些美丽的花，温放之的心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他顺着游廊继续往前走，准备去湖边看看湖边春色。刚拐过假山，就看见几个家丁聚在一起在大柳树下边休息边议论着什么。

一般情况下，温放之对这种议论是不大感兴趣的。因为他自命为文人雅士，对这些下人的议论根本就不屑一顾。但那天却是不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竟非常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于是，他悄悄地走近了这几个家丁。一个家丁正在聚精会神地说着什么，其他人也在专心地听着，根本没注意到温放之的到来。

原来，他们说的是关于一个叫王士燮的人的陵墓的事。据这个家丁说，这王士燮的陵墓经常发生一些灵异的事情。陵墓四周常年都被

一股神秘而浓重的雾气包围着，有人还经常见有一个人的影子在那里出入。

温放之听了这个消息也感到十分惊奇。但他天生是个不信鬼神的人，听了这件事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

王士燮是汉朝末年人，关于他的墓葬有着很多诡异的传说。从汉朝到东晋经历了几百年，历经战火，有很多人都曾经想对王士燮的墓下手，企图盗取里面的陪葬品。但是这些盗墓者都因一些诡异的事情而没有成功。到东晋温放之时，王士燮的墓仍旧完好地保存着。

传说有一伙盗墓贼不信邪，趁着月黑风高，拿着斧子、铲子等工具偷偷地来到了王士燮的墓前。他们曾听说过很多关于这座墓的传闻，虽然这不是第一次盗墓，可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初见这墓，他们便放下心来。因为这座墓葬与其他的墓葬相比，根本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一般的墓葬豪华些罢了。见是如此，这几个人就准备挖墓了。

可是，他们才挖了几下，就发生了让人感到十分可怕的事情。忽然，在他们背后传来一个十分低沉恐怖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难道不怕死吗？”随着这个声音的传出，一股阴冷的风不知从哪里刮了出来。

这几个盗墓贼向树上看了看，树上的树叶一丝也没动，但是他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这股阴风正从他们的脸上吹过。这股阴风好像有什么魔力，吹得他们骨子里都充满了寒气。这几个盗墓贼都被吓呆了，哪里还敢回头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就这样僵持了许久，盗墓贼中的头目稍微胆大些，轻轻地回头瞥了一眼。这一瞥，差点把他吓死过去。他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原来，在他回头时，看见一个面色纸白双脚离地的人站在自己后面。那股阴风竟然是从“他”的身上发出来的。

“你……你……你是人是鬼？”那个头目结结巴巴地问道。

“哼哼，你说呢？你们是来盗我的墓的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那群盗墓贼慌忙跪倒地上哀求。

“我不想为难你们，念你们是初犯，就暂且饶恕你们一次，若下次再敢来，定让你们命丧黄泉。”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这群盗墓贼除了这句话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你们走吧。”随着这句话的说出，刚才的那个魂灵就消失了，那股阴风也停了下来。

可这帮盗墓贼早已被吓得脚软腿麻，哪里还走得起来，只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温放之不知从哪里也听来了这个传说。越是这样，他对王士燮的墓就越感兴趣。他迫不及待地想带着士兵往王士燮的墓地奔去。温放之久经沙场，征战南北，对死亡早已经不再恐惧。手底下的那些士兵也都跟他一起征战多年，个个都对死亡毫无恐惧。自从温放之从林邑征战回来之后，军队已经好久没有再打过仗了。军士们闲得心都发痒了。他们听说要去干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万里无云，虽说才只是仲春的时节，可已经显现出了夏天的样子。浩浩荡荡的队伍斗志昂扬地向王士燮的墓赶去。老百姓听说他们要去掘王士燮的陵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都纷纷簇拥着跟了过去。这些老百姓虽然心里很害怕，可毕竟人多势众，好奇心战胜了对鬼怪的恐惧。

到了王士燮的墓前，温放之下马围着墓仔细地查看了一番。他看到，这个墓葬虽然历经几百年的战火烽烟，但还保存得十分完好。墓碑不仅没有出现一点毁损的痕迹，就连上面的字都还十分鲜明。

温放之急于想知道这座坟墓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马上下令士兵挖坟墓。

一声令下，士兵们就蜂拥着开挖王士燮的陵墓。士兵们刚把墓碑刨出来，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霎时间就布满了乌云。这些阴云很低，仿佛要压到人们的头上一样。紧接着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拍打着士兵们的脸，无法挖墓，温放之只好命令士兵先停下来去避雨。第一次挖墓就这样失败了，温放之沮丧地往回走。不过令他惊奇的是，这回城的一路上都没有雨，这雨似乎只是下在王士燮的陵墓附近。城里仍旧艳阳高照，与他们出城时一样。

对此，温放之并不死心，他反而对这个王士燮的陵墓更加好奇了。好奇心折磨着他，使他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天刚刚亮，温放之就又带着队伍出发了。这天与头一天一样，照样是个大晴天。到了王士燮的陵墓后，温放之和众兵士都吃了一惊。昨天明明被挖下来的墓碑竟然又“长”了上去，挖下的泥土也被“填”了回去。兵士们都小声议论着。温放之偏不信邪，他认为这一定是昨天围观的百姓趁他们回去之后偷偷做的，并命令士兵继续发掘陵墓。

兵士们只得继续挖了起来，这次再挖到墓碑时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过多久，士兵们顺利地挖到了陵墓里面的棺椁。

温放之身边的一个小随从为了争宠赶紧跑上前去，抡起斧头就要砍。这时，灵异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晴朗的天空不知怎地突然响起一个惊天动地的炸雷。这个炸雷带着一束火球轰隆隆地向士兵们冲来，士兵们急忙四散躲避。炸雷响过之后，兵士们又都聚拢在陵墓的周围。只见刚才试图打开棺椁的那个小随从已经口吐白沫，气绝身亡了。士兵们都被这景象吓坏了，再也不敢靠近那棺椁一步。

温放之看到那个被雷劈死的随从，心也咯噔地沉了一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温放之十分偏执，不听别人劝，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弄清楚。他拔出腰里的宝剑就向棺椁砍去。士兵们怕再出什么意外，赶紧将他抱住拉了回来。

“大人，我们还是快回去吧，看来这陵墓确实有鬼啊！”一个军士劝道。

“我堂堂一个大将军，这辈子还真没见过鬼长什么样！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倒要开开眼界，看那鬼能把我怎么样？”温放之仍是固执地说道。

众军士见他不听，也只好任他行事。温放之再一次来到棺椁前，对着砍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棺椁就被他砍开了。他往里面望去，除了一具保存完好的骨架之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哈哈哈，看来鬼也惧怕我，逃走了，我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温放之十分得意，放声大笑道。

原来，传说中神奇的陵墓也不过如此，温放之对它失去了兴趣，就带着他的士兵趾高气扬地回城去了。一路上，他都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中。队伍向前走着走着，忽然，一阵狂风大作。温放之胯下的坐骑不知是受了惊吓还是其他原因，突然发疯般地向前面冲去。温放之虽然带兵征战沙场多年，可是他正在兴头上想着别的事情，根本没对这匹一向十分温顺的马加以提防。

“啊！”随着一声惨叫，狂风骤然间停了下来。士兵们慌忙寻找被那匹惊马驮走的温放之。他们发现，那匹马停在一处乱石堆中，而马上的温放之不知踪影。他们迅速跑上前去，眼前的情景让他们觉得毛骨悚然：只见温放之摔在乱石堆中，头部正撞在一块大岩石上。这块大岩石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倒在上面的温放之已经气绝身亡。他的双眼还惊恐地睁着，仿佛看见了什么十分恐怖的事情。

士兵们见状，都认为是温放之因强行盗墓惹恼了陵墓中的灵魂，

而遭到了惩罚。他们不敢怠慢，慌忙抬着温放之的尸体逃回城去了。

温放之盗墓是我国盗墓史上的一个奇闻。他的盗墓目的令很多人难以理解，只是因为好奇而盗墓的确是一种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温放之把这种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发挥到了极致，对大多数人都非常敬畏的陵墓也不放过。他最终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

太守盗墓命归西

南北朝时期，由于各个小国之间常年混战，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许多官员们不仅不能恪尽职守，有的还做起了很多知法犯法的事情，甚至他们自身竟参与到盗墓活动中来。

南朝时宋国的下邳太守王玄象也干起了这种勾当。

王玄象是王玄谟的叔兄弟。王玄谟（388—468），南朝宋将领，字彦德，太原祁人。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屯兵徐州（下邳）期间，王玄谟20岁。刘裕率师北伐，在青州见到他，与之谈论天下大事，受到刘裕的赏识，被辟为从事史，开始了其官宦生涯。刘宋政权建立后，先后任南蛮参军、辅国司马等，迁南豫州刺史，卒年八十一，谥曰庄公。

王玄谟是跟刘裕一起扛过枪打过仗的，而且还帮助刘裕的孙子刘骏出生入死抢过皇帝椅子的，结果当然也就很美好了，加官进爵从来没有少他的份。有这样一个大哥罩着，王玄象跟在屁股后面混个一官半职也就很正常了，孔夫子倍赞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嘛。王玄谟荐举自己的叔兄弟起码可以称得上半个“祁黄羊”。傻瓜都知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人家王玄谟不顺手提拔自己的弟弟当官，难道会没头没脑地欣赏哪个素不相识人的才能，提拔个三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如果提拔了，他王玄谟就是缺心眼子，是胳膊肘往外拐。所以王玄谟不管自己叔兄弟是什么材料，什么东西，先给个一官半职再说。事实上，王玄象不仅当了官，而且官当得还不小，是下邳太守。虽说王玄象从小也是锦衣玉食不缺吃穿，可是不知怎地却形成了一种十分怪异、孤僻的性格。这个人十分胆大，不惧鬼神，又十分贪财。他还有一个为人所不齿的嗜好，就是盗墓。

他管辖的下邳地界，被他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最后竟然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坟墓，成为古来今往最彻底的盗墓贼。可见他对挖坟掘墓是多么的痴迷，他的盗墓生意是多么的红火、猖獗。以至于《南史·王玄

谟传》中就有记载：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王玄象利用自己手中太守的职权去盗墓，凡是他的管辖范围内的陵墓，只要能被发现的就没有一个不被他盗取的。王玄象的手下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不仅没有对上司的这个怪异的嗜好加以任何劝阻，有的还为了得到他的信任，故意搜罗一些关于陵墓的一些奇闻轶事向他报告。

关于王玄象盗墓，还有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一天，王玄象正在自家的花园内闲逛，他感觉十分无聊，不知道做些什么好。由于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陵墓进行了近乎地毯式的扫荡，已经很难再找到没有被发掘的古墓了。王玄象因此已经很久没有盗过墓了。这使他感觉生活特别没意思。他整天无精打采的，就连吃饭也打不起精神。王玄象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只盼望着他的手下能尽快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

王玄象的手下见主人没了墓盗十分颓废，竟瘦了一大圈，便想，若此时能帮主人解决忧虑，肯定会得到青睐的，便更加热心地寻找起陵墓的踪迹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叫王二的手下经过了几个月的走访，还真的发现了一个陵墓的踪迹，而且，这个陵墓还很有可能埋藏着很多宝物。虽然王二的消息也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什么确切的依据，但是他立功心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他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兴奋地向王玄象报告去了。

王玄象听王二报告说：一个坟头上早晨出现一个女子，近看就没了。于是他便让人发掘。挖着挖着，突然从家丁们的铁锹、锄头底下传来了金属撞击的声音。家丁们一下子沸腾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挖到陪葬品了。从声音可以判断出，这些陪葬品一定是金银等贵金属做成的。家丁们有了这陪葬品的刺激，更加疯狂地挖了起来。没过多久，他们果真挖出了许多金蚕铜人。这些金蚕铜人制作得十分精致华美，一看就是富豪人家的东西。金蚕铜人一个个被挖了出来，最后家丁们一数，竟然有上百个之多。

挖完了金蚕铜人，陵墓内的棺椁就露了出来。这个棺椁保存得十分完好，就连棺椁上面的花纹还都十分鲜明，丝毫没有因为常年的腐蚀而掉色。王玄象见到做工这样精美的棺椁十分高兴。因为仅从这具棺椁，就可以看出这个陵墓的主人身份一定特殊。而且这样精美的棺椁内陪葬品也一定十分丰厚。

王玄象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赶忙命令家丁把棺椁打开。众家丁又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七手八脚地向棺椁寻宝。他们有的用斧头砍，有的用撬棍撬，有的干脆用木棍砸。经过了一番折腾，棺椁的盖子终于松动了。王玄象见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就让家丁们全部都退下，他

要亲自把这具棺椁打开。

“嘎吱”一声，王玄象就用手中的宝剑一下把这具棺椁撬开了。他探头向棺内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棺椁内完好地躺着一个年约二十的女子。这个女子长得十分美丽，身上穿着华贵的衣服，佩带着名贵的首饰，面容栩栩如生，就像刚刚睡着一样。她虽然经过了多年的腐蚀，可是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她。她的皮肤仍旧是那样细腻光滑，头发仍旧是那样滋润柔软，就连眼睛上的睫毛都还丝丝分明。王玄象彻底地被棺内的女子震惊了，他不由得伸出手去，想触摸一下那个女子是否是真实的。谁知，他的手刚伸到那女子的面前，更为惊奇的事发生了——这个女子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这个女子躺在那里说：“请不要碰我。我是东海王家的女儿，原本是不应该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可是，世事难料，我也不再祈求什么。只求你能行行好，不要伤害我，给我保存一个全尸吧。这棺椁内的陪葬品你们可以全部拿去。如果你偏要对我加以伤害，我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那棺椁内的女子仍旧闭着眼睛，只是嘴巴一张一合地说道。说完这些话，那女尸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这幕场景把王玄象和他的所有家丁都吓坏了。刚才还人声鼎沸的盗墓现场霎时间安静了下来，好像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音。就这样过了好一会，王玄象和众家丁才从惊吓之中缓过神来。他们再次朝棺内望了一眼，见这具女尸并没有从棺材里走出来，稍稍放下心来。他们这才想起刚才女尸说的关于那些陪葬品的话。王玄象也看到了棺椁内那众多精美的陪葬品，有巨大的珍珠、珍贵的玛瑙，金银首饰更是数不胜数。他被这些精美的陪葬品深深地吸引了。这种吸引力竟战胜了他对女尸的恐惧感，使他不由自主地向棺椁内的财宝伸出手去。他开始只是试探着拿一些，见那具女尸没有什么反应，就放开了胆子，把棺椁内的金银财宝都取了出来。

众家丁见老爷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死尸的报复，也就胆大起来，纷纷向棺椁走近。他们见王玄象已经把棺椁内的财宝取得差不多了，就把手伸向了女尸的身体。他们把女尸身上的金银首饰都扒了下来。有个家丁见女尸手臂上戴着一个精美的玉镯子，便想把它拿下来。可是，他费了半天劲，还是无法取下。他见人多手杂，就拔出刀一把砍下了女尸的手臂抢走玉镯。那女尸本还有一丝气息的，经家丁们的这一番折腾，便彻底死去了。王玄象在一旁看着家丁们的疯狂抢劫并没有加以阻止。他认为，这不关他的事，他只是按照女尸的话把棺椁内的财宝取出而没有伤害女尸本身。至于家丁们砍断女尸手臂的行为，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他的盗墓行为就像那女尸说的一样，很快

就得到了报应。

王玄象盗完墓就带着人回去了。他兴师动众的盗墓活动当然吸引了远近的百姓前来观看。于是，在盗墓过程中遇到女尸复活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这次盗墓活动的细节很快就传到了他的堂哥王玄谟的耳朵里。王玄谟与他的这个堂弟十分不同。王玄谟自小就很有大志，长大后在军队中很快就得到了升迁，先后做过益州刺史、豫州刺史等职，后来又被封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谟听到自己的堂弟竟做出这样为人所痛恨的偷坟掘墓的勾当，十分生气。

王玄谟知道后马上就决定大义灭亲，把这个不争气的堂弟的罪恶行为上报。朝廷知道了这件事后，满朝震怒，王玄象因此而被罢官。至此，王玄象的盗墓生涯也画上了句号，不久就暴病而亡。在他担任下邳太守期间，领地内的所有大型陵墓都被他发掘殆尽，竟然贪婪得连一些小陵墓都不放过。

死尸活着，尸体说话，当然都是荒诞无稽的传言，可能是憎恨王玄象的人为了扩大事态、便于传播故意编造的耸人听闻，达到引起朝廷和社会重视的目的。但是东海王家女墓被盗应该是真的，也是王玄象倒霉的时候来了。王玄象挖得下邳遍地没有完整的棺木王玄谟不管，偏偏这个就管了？问题正应在这个东海王家女身上。原来，王玄谟派人对这个奇异的陵墓做了一番周密的调查。东海王氏乃是西晋皇室的亲属，其代表人物是魏末中领军、兰陵侯王肃。王肃之女嫁给司马昭为妻，是晋武帝的生母。由此看来，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富户。而且东海王氏与琅琊王氏一脉所出，琅琊王氏可是东晋开国“王马共天下”的主角。虽然当时刘宋政权东海王氏势力已经衰微，刘裕亦曾打击琅琊王氏的势力，但是作为百余年的名门望族，政治力量还是很大的。王玄谟岂敢得罪，只好立即与王玄象切割，因此王玄谟这么做是很有政治头脑的政客表现。

第十一章　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盗墓风潮第三波

开国皇帝要薄葬

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第一个提出薄葬的君王，他为中国历代君王的薄葬树立了一个旗帜。在他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要求薄葬的人，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就是其中之一。

杨坚，弘农郡华阴（今属陕西）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589年，隋文帝遣兵挥戈南下，灭亡了割据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圣朝典牛马。隋文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部落，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他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文帝在位期间，隋朝开皇年间疆域辽阔，是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的巅峰时期。

杨坚在开国之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使国家人丁兴旺，国库殷实，促成了“开皇之治”的局面，是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隋文帝杨坚娶独孤氏，生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接着是杨俊、杨秀和杨谅。581年，杨坚代周称皇帝建立隋朝后，立杨勇为太子，封杨广为晋王。

杨勇自幼好学，性情温厚，擅长辞赋，颇得杨坚的喜爱。按着“立嫡立长”的原则，杨坚称帝后立杨勇为太子。杨勇被立为太子之后，军国政事及死刑以下的刑罚，都让他参加裁决。凡政事有不妥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和纠正办法，文帝多赞同，常常采纳他的意见。但是杨勇性格厚道、坦直、为人耿直倔犟，不会处事，喜欢排场。文帝杨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尚节俭，反对奢华，对杨勇的这种作风很不满意。他教训太子杨勇说：“统治天下，未见有奢华而能长久的。你身为太子，首先应该崇尚节俭。”有一次，百官来朝，杨勇设乐受贺，文帝很反感。从此，文帝杨坚对杨勇的恩宠逐渐衰薄。

加上独孤皇后不喜欢长子杨勇，而偏爱次子杨广。太子杨勇的妃子元氏是独孤皇后选定的。元家也是北朝的大世族，跟杨家门当户对，因而结亲。元氏为人忠厚老实，但容貌平平，而且体弱多病，又不生育，因此得不到太子杨勇的欢心。杨勇以自己没有儿子为借口，多选侧室，多内宠，尤爱姬妾云氏，被杨勇封为昭训。而元妃因患心脏病，突然病故。独孤皇后疑元氏之死乃被太子杨勇和云昭训所害。元妃死后，杨勇请求立云昭训为正妃，独孤皇后就是不同意。皇后想另为太子选妃，杨勇说什么也不娶别的女人，就这样，母子二人僵持起来。皇后更加不喜欢杨勇了，甚至挑拨文帝与杨勇的感情。

就在太子杨勇在父皇母后面前越来越失宠的时候，晋王杨广却善于矫情饰行。他与其兄杨勇正好相反，杨广生得仪表堂堂，聪敏好学。待人接物格外谦虚。他知道母亲奇妒，因此，晋王府上上下下便做出一番待人谦恭、生活简朴的样子。有一次，隋文帝杨坚“突袭”杨广的府宅察看，眼前的一切让他叹一声舒心的长气：杨广的几个书房休息室，乐器的丝弦大多都断了，尘灰粘得满满的，似已多时不用而彻底弃置了。这一下，他便误以为皇儿不喜好歌舞伎乐，定能成大器。他甚至再次想起了那次皇儿随他狩猎遇雨，士兵湿衣而皇儿也不愿穿左右递上的桐油雨衣，那一幕使作为皇上的他足足感动了许久。这日的巡视，再次坚定了他对皇儿杨广的信心。

这样，杨广不仅赢得了父母的欢心，而且也颇得群臣的赞扬，声誉越来越高。同时，杨广还暗中指使党羽杨素等在父皇母后面前盛赞杨广的功德，并且多说太子杨勇的过错。就这样，隋文帝杨坚终于产生了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的念头。但废立是大事，文帝暗中派人观察太子的行为。有一次，文帝派杨素去探太子，杨素到东宫，特意久停门外，让太子久等，以激怒之。果然太子非常不满。杨素回来对隋文帝说，杨勇怨恨杨坚，恐怕要发动叛乱，又说杨勇准备在杨坚离开长安去仁寿宫时，在京城发动兵变，诛杀大臣，还捏造了许多罪名。杨坚听了这些谗言，对太子杨勇更加猜疑。这时杨广的心腹太史令袁充认为时机成熟，便假借天象对文帝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文帝信以为真。600年，隋文帝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隋文帝

杨广利用文帝对太子成才心切与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情，挑拨离间，极尽阴险毒辣的手段，终于打倒了杨勇，使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太子。

仁寿四年（604年）正月，隋文帝离开京师，前往仁寿宫休养，把朝政托付给太子杨广。年老体弱的杨坚到仁寿宫不久就病倒了，而且病势日益沉重。为了防备万一，他命内臣前往京城宣召太子。

太子杨广在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以及护卫随从的陪同下，星夜赶到仁寿宫，当天夜里就去拜见隋文帝。由于隋文帝在熟睡，杨广等人向左右宫人询问了病情，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便各自安歇了。第二天一早，杨广等人再次入见隋文帝。隋文帝躺在床上微睁双眼，有气无力地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便吩咐退下。

杨广到了大殿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到隋文帝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而自己也将登上皇帝宝座，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提笔给杨素写了一封信，询问隋文帝死了以后，应当怎么办。杨素看完信后，马上回了一封，详细谈了隋文帝死后所应采取的各项措施。

没想到的是，杨素给杨广的这封信被宫人错送给隋文帝了。文帝看后大怒，痛骂杨广是不肖子孙。

这时，名为服侍父亲杨坚，实为等待他死期的杨广，在花园里碰到了一位绝色女子——隋文帝晚年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陈氏是陈后主的妹妹，生得国色天香，羞花闭月。杨广见了不由得欲火焚身，兽性大发，企图逼奸她。隋文帝听说后暴怒，真正看清了杨广的真面目，他强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口中不停地骂："像这样的畜生，怎么能够托付国家大事！"并且速召柳述、元岩入宫，要他们立即起草诏书，废掉杨广，立杨勇为太子。杨素听说后急忙找到杨广，将诏谕内容告诉了他，杨广心急如焚。杨素看到这种情形，便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讲了出来。杨广听后大喜，立即下令照办。

随即，杨广矫诏调东宫兵入卫禁中，将柳述、元岩逮捕，并以东宫卫士全部替换了隋文帝的卫士。这些卫士在大将军宇文述、郭衍指挥下，封锁了仁寿宫的全部通道。杨广又下令说，不经他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出入仁寿宫。一切布置好后，杨广派左庶子张衡直入隋文帝的寝宫。张衡让隋文帝身旁的人全部离开，由他负责照管。宣华夫人陈氏及许多宫女都被赶到了别的房间内。过了一会儿，张衡从文帝寝宫内出来，大声嚷道："皇上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报告？"众人听了，都吓得浑身哆嗦，不敢吱声。其实，隋文帝是被张衡杀死的。据说，张衡走进隋文帝寝宫，将众人赶走后，就将隋文帝从床上拉起，用刀直刺他的身体，喷出的鲜血将屏风都染红了，宫外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文帝的惨叫声。

不久，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隋炀帝。短短十几年时间，他即断送了隋文帝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大隋帝国。

一代励精图治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间。他的灵柩，实现了最后的归葬。杨坚的陵寝为泰陵。泰陵位于咸阳城西75公里处的杨凌区五泉乡双庙坡村。陵冢前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隋文帝泰陵"碑。

泰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冢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总面积49.29万平方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

泰陵一如秦汉封土为陵（坟）的建制，然而，也许是隋文帝遗有前嘱，这座开国君王的陵墓，远远不如秦汉皇陵的规模。而据西汉墓葬制度规定，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每年从全国税收中抽取三分之一营造皇帝陵墓，即寿陵。帝王陵园占地七顷，陵穴占地一顷，陵高十二丈，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有四个墓道，都能通过六匹马驾的车子。四门埋设暗剑、伏弩机关以防盗墓。死者身穿金缕玉衣、口含玉蝉……

那么，隋文帝的陵墓中是否也如汉时墓葬制度规定的，皇帝陵墓必有大批金银珠宝、稀奇古玩呢？现代部分专家学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泰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典籍没有记载有关泰陵随葬的例证，而当地百姓皆传说泰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尤其民国时军阀樊老二、张白英等盗掘法门寺地宫珍宝未成，转而来到泰陵掘洞以盗，在终无所得之后，只好悻悻离去。

杨坚的薄葬遗嘱，给了多少盗掘辈以失望和徒劳的嗟叹。

而当岁月的年轮刻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隋文帝杨坚力倡薄葬的伟大开创。这便是位于陕西关中的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开启。

1998年10月17日中午，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法王塔地宫开启全过程，使好奇自负的现代人对隋朝的帝王陵寝、寺塔庙宇的建构供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舍利塔，为隋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建造的。时文帝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法王塔正是其中之一。

陕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开启，撩开了寻觅已久的面纱，幽闭千余年的石函、石碑伴随着诸多神秘面世。

仙游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的周至县，法王塔地宫的发现实为偶然。当时在法王塔拆迁中清理塔基，并未发现有地宫，但继续往下清理才发现迹象。循迹下挖，终于发现塔基下1.65米处的地宫门洞。

地宫顶部周围露出排列神秘的五块卵石，1米多宽、2米多高、1.5米长的通道上原来堵满的卵石已被搬出，卵石中夹杂着古代的残石构件和地下宫殿石门的残件。

地宫内出土了高0.7米、宽0.4米的宫门两旁的线刻人物画像，线条流畅，雕刻精美传神。地下宫殿往里，宫中放有石函一具，约60厘米见方，高40厘米，外部雕有精美花纹，盖上放着一只造型优美的陶熏炉。石函左侧放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厚约10厘米的青石碑，碑两面刻有铭文，一面是隋《舍利塔下铭》约100多字，另一面为唐《仙

游寺舍利塔下铭》约200多字。据文物专家介绍，按记载分析，法王塔和法王塔地宫大约是在仁寿元年（601年）建造的。

隋文帝给后人留下了葬奉简朴的榜样，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可以奠定考古地位的机会！

正如佛语有云：一切的因便有自身的果。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隋文帝杨坚知晓。因为他信佛而下令全国31州建塔供奉舍利是真，也因为他提倡俭葬习俗是真，才有今日的没有让千万人看到大批珍宝自塔下滚滚而来的壮观场面。其实，敬佛崇佛、奉佛事佛的高境界是捧一颗真心就是了，捧金捧银地大肆铺张，不是正处于广积国财、励精图治阶段的隋文帝杨坚的作为。

暴虐帝陵被盗掘

生性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在草草地“薄葬”了自己的父皇——隋文帝杨坚之后，登上大隋天子的宝座，登基还没有几日，便着手进行迁都洛阳的浩繁工程。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是以残暴而著称的。但从大量史料来看，隋炀帝也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他亲自指挥作战完成祖国统一。

在隋统一的过程中，他率军灭陈，对中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秋毫无犯”，对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走向了和平、强盛。

其次，他下令修建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的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连接了中国南北两个文明，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融为一体，满足了将已成为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连接起来

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直到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逐渐淡化其国家经济大动脉的作用。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与其相比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终因劳民伤财导致灭国。

再次，他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

他抗击突厥和吐谷浑，重通丝绸之路，维护了辽阔的疆域。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608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纳入其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出发，浩浩荡荡地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寻求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3000多米，终年温度在0℃以下。于是，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在路上吃尽苦头而狼狈不堪。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确定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最后，他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

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刚毅正直的人才。创建的科举制度，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人才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发展影响深远。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它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礼部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此外，他还兴办学校，广搜史籍，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无疑是进步的。应当说，隋炀帝对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但是，隋炀帝确实又是一位暴君。

隋炀帝杨广天生花柳性格，唯抱“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莫蹉跎”的思想，他虽然在有生之年掌握着万民的生杀大权，但他并没有想过自己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要为自己修筑一处豪华皇陵阴宅以供升天之后享用的动机。隋朝的史书上，毫无一星半点儿记录。也许，聪明的他已参透人生“生死来去无牵挂”的道理了。尽管自隋伊始，也就是从他父亲杨坚开始，就恢复了秦汉的封土为坟的陵寝制度，而他隋炀帝所做的恰恰是对这一制度的反叛。隋炀帝即位之后，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忙着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圈地修陵，而是执著地实施自己认为对的政策。

618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

宇文化及和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棱，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的绝美女人。所以说，这样的玉镯就像是权力的象征，成为这些女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因为有此种说法，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有学者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棱，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时，降唐而被封为江都总管的陈棱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棱所得。这样，隋炀帝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年之谜：价值连城的玉镯到底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了，抑或是被盗墓贼所起获了呢？

太宗薄葬骗世人

白驹过隙，时间跨入令世人景仰的煌煌大唐。

李世民被时局大势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国泰民安，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就在这时，朝野之间传出了李世民强娶三国时魏国之主曹丕皇后之宫女的故事，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被收入仿《山海经》而作的《神异录》中，其中的“邺中妇人”篇讲述隋末起义军将领窦建德盗墓偶遇美女的奇事。

当年窦建德起事时，在没有巨额金钱资助、粮食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义军的日常开销，只好仿效曹操盗墓掘宝。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窦德建竟然盗到了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的宫女墓。开棺后发现，里面有一个20来岁的女子，貌若天仙，十分漂亮，就像活着一样躺在棺材内。窦建德一看这个女子穿着的衣物和陪葬品，知道不是当时人。过了一会儿，美女开始喘气，并慢慢睁开了眼睛，望者大骇。想不到葬于三四百年前的宫女，竟然神奇地复活了。窦建德觉得此事甚奇，便将这位女子带回军中调养了一番。经询问，女子自称是曹丕皇后的宫女，于是窦建德便收她做了房妾。更怪的是，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后，竟然要霸占此女，要她做后宫妃子。此女说，是窦建德救了她，才让她有了今天，这再生之恩不能忘记。据说，在遭到拒绝后，李世民还觉得很伤心。

《三国志》记载，曹丕的皇后姓甄，为当时上蔡令甄逸的女儿。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曹丕称王。六月南征时将甄氏留在了邺地。黄初二年（221年），因为失宠于曹丕，甄氏颇有怨言，嫉妒其他嫔妃，这惹得曹丕十分生气，派人将她赐死，葬于邺。依此复活宫女所说，“随甄皇后在邺”，与史实并无二致。

对于李世民霸占此复生宫女做妃子一事，也可以从史书上找到蛛丝马迹。《新唐书》记载，窦建德就是被时为秦王的李世民所剿杀。当时李世民派秦叔宝出阵，将窦建德引了出来，结果窦建德一惊一犹豫，被打成重伤，遭生擒，后被斩于长安。窦死后，其家眷都被李世民籍没了，很可能此宫女就是这个时候被李世民看上的，但是否正是从墓里弄出来的那个宫女就难以说得清了。或许是当时人有对其发动玄武门政变心怀怨恨，而故意编造的桃色新闻吧。

不管朝野如何议论，编造的故事如何传奇骇人，随着李世民以自己的德才学识和用人的纳谏任贤，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很快形成，国力日显强大。而连年征战厮杀、鞍马驰奔创立万世基业的高祖李渊，则成了伤心的过渡人。世民这几年励精图治的成绩，李渊似乎并未看到。

李渊内心深处的伤痛，缠住了性格抑郁的清瘦躯体。大业初建，儿子们沥血夺嫡，互相残杀，一夜之间，失去了曾与之东拼西杀的“上阵父子兵”大儿建成、三儿元吉，他悲痛欲绝，难以自拔。还有自己尚未过足皇帝瘾便被逼“禅让”皇位给二儿李世民的阴影，一直难以消弭……

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唐高祖李渊乘鹤西去，举京陷入悲痛之中。一时间，围绕着为这位太上皇建造陵墓，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

的争论。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巡察。

李世民缘何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于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做声。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认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唯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

虞世南说厚葬是"亲之累"，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有这样充分的理由，所以对自己的尊亲厚葬，是不可采用的。

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理，有醒世作用。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

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作出决断。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房玄龄、右光禄大夫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无疑，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也说明了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

此时，唐陵还没有完整的陵墓制度。

一年以后，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根据皇后遗言"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命匠人在九嵕山建筑昭陵，从而最终确定下唐代的陵寝建制——两种情形：一是继承和发展魏晋、南朝因山为陵的制度，即在风水佳好的雄巍山峰中部开凿墓室建造大气非凡的山陵；二是承袭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长孙皇后的安葬，没想到成了李唐王朝反盗墓与后来盗墓风潮不断"对话"的焦点。

长孙皇后（601—636），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女人。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其"仁孝俭素，好读书"。出生于长安，是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皇族后裔，名臣高士廉之妹。大业九年（时年13岁）嫁与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对李世民的政绩有很大的贡献。她一方面做李世民的好妻子，另一方面非常好学，曾利用闲暇专门收集历代著名女性的业绩，编写《女则》三十卷。她崇尚节俭，一次有人对她说太子宫中器物太少，显不出皇家富贵气象，请皇后开恩给增拨一些，她不但不同意，而且亲自前去教导太子：“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耶！”最终使太子打消了添置金银器皿的念头。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她是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恩爱有加。她也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在她不幸患病，弥留之际遗言：“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在她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诏告天下——“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亲命匠人筑造昭陵。他当着百官的面，对负责昭陵营建的侍臣说，昭陵的规模“足容一棺矣，务从俭约”，并在筑陵完工后令史官记载：“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

从字面看，造昭陵并没有铺张，昭陵的规模并不大。然而，李世民在此只不过是说给后人听的，确切地说是与盗墓贼绕弯子、捉迷藏。他在按自己的意愿施放烟幕弹。

为了使天下人对他主张薄葬深信不疑，葬完长孙皇后的第二年，即637年春，他又向天下发布诏书：生是天地的大德大恩，寿是或长或短的一个期限。生有七尺的身躯，寿以百岁为限度，包藏灵性、禀受天地之气的人类，无不一样。生与寿都得之于自然，是不能够分外企求的。所以《礼记》说：君主即位就制作棺木。庄周说：躯体使我劳累，死亡使我休息。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通大事理的贤人的深识？……天下得到安定，这是朕平素的志向，现在已经实现。但朕仍怕死后的日子，子子孙孙习惯于流行的风俗，仍然遵循通常的礼仪，加四层的棺材，砍伐百年的巨木，骚扰百姓，增高增大陵园。现在，朕预先写下这一诏令，丧事务必遵从俭省的原则，陵园在九嵕山，地宫不过足以容纳棺木而已。岁月积累，逐渐齐备。葬具有木马泥车、瓦制的鼓、芦苇截成的笛，这样做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从今以后，功臣近亲和德行、事业有助于当世的人，如果逝世，应当赐给坟地一处及所用的棺木，使埋葬的时候，丧事完满。有关主管部门照此筹措准备，就合朕的心意了。

这些看似凿凿的言辞，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当盗墓者钻进九嵕山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自己的地宫中的时候，后世人便知道了李世民当初不敢公开的秘密，以及他撒播的、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纯属弥天大

谎。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安葬之地。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0多公里的九嵕山上，东北距离贞陵19公里。九嵕山孤耸回绝，气势雄伟，树木葱茏，风景绮丽，是渭北山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山。昭陵因山而置，封域120里，总面积达30万亩，是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陵园始建于636年，是由著名建筑学家阎立德设计的。当年昭陵有富丽堂皇的地面建筑和地下宫殿，高大的朱雀门、雄伟的献殿和庄严的祭坛，构成地面建筑的主体。

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由于玄宫前面山势陡峭，来往不便，就顺山旁架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5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3000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2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

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罴（pí）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

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的风雨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呈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呈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

在主峰地宫山的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

坏，今存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

20世纪初，陵区陵园的地面建筑大都已经塌毁，正南面山下朱雀门的门阙和献殿，以及山北的玄武门、祭祀坛等墙基还能辨识，依稀可见昭陵的宏大气势。

温韬盗遍十八陵

唐代被誉为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唐一代独领风骚。

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渊开国的大唐王朝，至今大唐遗风尚存。在全球好多国家和地方，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中国的古式服装在外国人眼里是“唐装”，至今仍穿在国人的身上，并作为“国服”而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

与唐代的繁荣鼎盛相对应，唐代崇尚厚葬，唐代大墓无不装饰精美，奇珍异宝藏满其中，尤其是唐代帝陵，陵园恢弘，雄伟瑰丽，气势磅礴。这些帝陵皆设计巧妙，巨石林立。

唐代自建国以来，历21朝，凡290年，其中女皇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夫妻合葬，所以唐代共有帝陵20座。除了唐末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的昭宗李晔（yè）葬在河南渑池的和陵，哀帝李柷（zhù）葬在山东菏泽的温陵外，其他十八座唐陵均坐落在关中地区。这些陵墓分布于渭河以北的礼泉、乾县、径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东西绵延100余里，以长安为中心，呈弧形展开，与巍峨的秦岭遥遥相望。由于这十八座陵墓均位于关中地区，所以后人将这些唐陵称作“关中十八陵”。关中十八陵各据一山，因山起陵，或封土为陵，或凿山为陵，有的山势险要、曲折蜿蜒，有的峰回路转、难觅行踪，动辄百里之广，无不固若金汤。但其中17座都被盗掘了，而第一祸首就是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温韬。温韬也算是历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一个人，许多珍贵的文物都让他给毁了，实乃危害最大的盗墓者，真是罪该万死。

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致；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殆尽，成为千古大盗。

温韬，五代后梁人，祖籍华原（今陕西耀州），出生在大唐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日。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也许是为了附会温韬后来盗墓成狂的恶行，后世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温韬出生之时，有匪星陨落在嵯（cuó）峨山。嵯峨，东与九嵕山向望，而九嵕山就是唐太宗昭陵的所在之处，其南渭水之滨，其北黄土高原掩映在巍巍苍山之间。迷信者遂传将给唐皇陵带来一场灾难的人物出世了。果不其然，这个荒诞不经的预言在温韬担任长安行政长官时应验了。

温韬年纪不到10岁，便成了家乡有名的小蟊贼，加入土匪团伙的人当中，数他最小。起初，百姓看到这么个小娃娃耍枪弄棒，行为刁钻，传以为笑，但当他挥刀杀人不眨眼时，人们方才如梦惊醒。生逢唐末战乱，10多岁的时候，温韬就上嵯峨山拉人马，发展土匪队伍。俗语云：兔子不吃窝边草。温韬正好相反，他凭着吃窝边草起家，祸害家乡一带，使他率先在自己的家乡华原成了名。

尽管如此，此时的他，也只仅限于小打小闹，尚没有攻城略地的实力。狡猾、奸诈的温韬，一方面经营他的嵯峨山根据地，一方面坐山而看天下大势，伺机出山霸天下。

有消息不断地从最近的地方传来，唐皇室彻底土崩瓦解，“西府王”李茂贞日益强大起来。李茂贞身居凤翔节度使之职，不断扩充实力，随时觊觎天下。此时的李茂贞成了他走上仕途的领路人，温韬立即以“贼帅”的身份攀附李茂贞。正在另立中央的李茂贞，看到温韬的贼众，心想正是用人之际，热情接纳了来投奔的温韬。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小算盘，都是想利用对方的实力，来壮大自己的队伍，两个各怀鬼胎的人一拍即合，走到了一起。为了使自己无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李茂贞意欲认温韬为干儿子，温韬自然乐意拜李茂贞为干爹，并主动改自己的姓，要李茂贞为自己重取个名字，李茂贞赐他名字为彦韬，委任他为华原镇将。

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温韬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这样的人根本就靠不住。在战乱频发的年代，温韬极易倒戈。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十月，于军阀战乱中脱颖而出的朱温大军锐不可挡，攻克长安。旌旗西来，直捣凤翔。凤翔李茂贞拼死抵抗，但难以遏制住朱温军队的攻势，情势到了最后关头，李彦韬（温韬）见李茂贞大势已去，遂倒戈投敌，降附朱温。李茂贞落荒而逃，到朔方重整旗鼓去了。

但是，对温韬不利的是，没多久朱温东归，他成了没爹没娘的儿，无依无靠。为了不被其他军阀吃掉，温韬重又回到了他当初打家

劫舍的据点——嵯峨山。在这里，他再次施展两手，一手坐观天下，静待其变；另一手则加紧聚敛财物，疯狂地掠劫长安附近的各县，重又当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李茂贞又回到了他的凤翔，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他见温韬已被人丢弃，遂不计较昨日背叛自己的旧嫌，派人下书，又与温韬修复了父子关系。

天祐三年（906年），李茂贞命名华原县为耀州，命名美原县（今富平东北美原镇）为鼎州，设置义胜军节度使管理这两个州，李彦韬领命，又坐上了节度使的交椅。

随着流浪逃遁的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哀帝李柷覆亡，大唐宣告结束，埋葬李唐王朝的朱温，以马上挥舞的剑戟，开辟了新的朝代——后梁。从此，战乱不堪的五代开始了。

在此期间，温韬曾担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在担任耀州节度使的7年时间内，温韬挖掘了关中十八陵中除了乾陵之外的17座皇陵，敛取陵中无数金银珠宝。《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郡，唐帝诸陵发之殆遍。”嵯峨山临近唐太宗昭陵，而雍州即是关中地区。《资治通鉴》又记载：“（后周太祖）屡诫晋王曰：‘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唯多藏金玉故也。’”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温韬盗墓之瘊，也说明温韬盗墓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赤裸裸的抢劫财物。乾陵保住不被盗掘之身，要感谢奇异的天象。宋人程大昌《考古编》中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就是说，在盗掘乾陵时，出现了极为反常的天象，狂风骤雨，电闪雷鸣，怕遭报应的温韬被吓跑了。

温韬给中国帝王陵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许多珍贵的文物被其给毁了。所以史学界、考古界都认定，温韬是中国盗墓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盗墓者，有千古之罪。

最为愚蠢的黄巢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唐朝，逐步从封建社会统治的顶峰，转入衰败。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让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各地叛乱不断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由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过人胆

识，最终取代王仙芝而成为这场大起义的总领袖。由他领导的这场大起义摧毁了腐朽的李唐王朝，打破了唐末军阀割据混战的黑暗社会的僵死局面。为社会由分裂向统一过渡准备了条件，从而推动了历史继续向前发展。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进士不第。适逢关东大旱，官吏还要催缴租税、差役，百姓走投无路，便聚集黄巢周围，与唐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与子侄黄揆（kuí）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

黄巢军最初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转攻山东、河南等地，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县）、郏（jiá）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进逼汝州（今河南临汝）。

876年，攻克汝州，杀唐将董汉勋，俘汝州刺史王镣，直指东都洛阳。王镣是宰相王铎堂弟，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wò），表示愿意接受“招安”。是年年底裴偓诱降王仙芝，愿授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黄巢坚决反对，大骂仙芝：“始吾与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汝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何所归乎？”随后以杖击伤仙芝头部，头破血流，其众喧哗不已。招安不成，裴偓逃奔鄂州。不久两军分裂，3000余人从仙芝，仙芝乃大掠蕲州，黄巢引兵2000人北上。乾符四年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破沂州。

王仙芝一度攻破鄂州，王、黄又再度合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不久又分兵，仙芝转攻郢州。唐朝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再次诱降，仙芝遣尚君长、楚彦威等人洽降，中途为唐招讨使宋威所劫持，宋威贪功，妄报战胜，尚君长等人移送长安被杀，仙芝大怒，降敌之事再次未遂。朝廷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镇压“无功”，解除其兵权，擢升曾元裕为招讨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

乾符五年初，王仙芝军攻破荆南（今湖北江陵）罗城，由于沙陀兵援军到达，焚掠江陵而去。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在黄梅（今属湖北）兵败被曾元裕部斩杀，余部奔亳州（今属安徽）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转战黄淮流域，又进军长江下游一带。

黄巢的起义军纪律严明，还提出了颇顺人心的“均平”口号。黄巢对外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甚得民心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880年占领东都洛阳，次年拿下京城长安，并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齐”。但三年后，即884

年，黄巢兵败自杀。20多年后唐亦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黄巢军队前期“整众而行，不剽财货”，那他号称40万大军的粮饷从哪里来？盗墓掘宝应该是收敛财路之一。

黄巢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狂人，因为其盗掘的对象都是重量级的。一是效法项羽，掘秦始皇陵；二是学赤眉军、董卓，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三是掘武则天与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对于黄巢盗掘的文字散见关于诸陵被盗掘的各种记载中。

关于乾陵被侵犯的历史文字中记录，黄巢掘陵时动用40万起义军在梁山西侧挖山不止。据说差不多挖了半座梁山，但最后仅挖出了一条深40米的“黄巢沟”，此至今仍有迹可寻。由于农民军中文化人少，加上乾陵的结构实在太坚固，兵士弄不清乾陵的内部结构，结果挖错了方向，乾陵躲过了劫难，否则保存不到今天。看来，盗墓也是要有“学问”的，蛮干不行。

手下有那么多人，随便挖挖也能弄出不少宝物啊，真是蠢死了。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分析，在三座帝王陵寝中，黄巢不会一座未得手，最有可能掘开的是茂陵。茂陵之前已多次遭盗，地宫入口容易发现。现在分析，黄巢带领起义军盗掘帝王陵，乱挖一通，并不仅仅是盗宝，也有泄恨的意思，是对封建皇权的一种政治挑战。

为寻秘籍挖董冢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正是盗墓贼的黄金时代。由于很久以来就风传董仲舒的母亲坟墓里陪葬了神奇的秘籍，所以这时就有盗墓贼把目光盯在了董母的坟冢上。

董仲舒（前179—前104），尊称董子，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为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作出过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董仲舒，广川（治所在今河北景县西南）人也。”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十分刻苦。他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不过名声却因其弟子在仕途的发展而越来越大，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在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之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十年；前125年（元朔四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以后辞职回家著书。但是，朝廷每有大议，汉武帝便派遣使者及廷尉登门问之。

前104年，一代大儒董仲舒与世长辞，被葬于长安西郊（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做“下马陵”。下马陵又称虾蟆陵。

关于下马陵的由来，还有个故事。相传，董仲舒死后，一日，汉武帝经过这里时，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就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便称这里为下马陵。但是，由于陕西话中“下马”二字与“虾蟆”同音，所以几经流传，便被称做虾蟆陵。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虾蟆陵由此而闻名遐迩。明代开始，西安城里从文庙到关中书院，再到虾蟆陵，一直是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处。抗战时期，虾蟆陵还曾是西安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下马陵并没有被人盗过。由此看来，盗墓贼也是很精明的，因为一个大儒大概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可能只有一些在盗墓贼看来毫无用处的书简罢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对董仲舒的尊重而没有动他的墓。然而，历史上却有董仲舒母亲之墓地被盗发的记载。

民间早有传说，认为董仲舒的双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仙配》中所说的董永和七仙女，后来因为父母升天成仙，董仲舒无法奉养以尽孝道，遂修衣冠冢，春秋礼拜。关于此事，唐末五代杜光庭在《录异记》中就有记载：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

有人想，既然董母是仙女，那么坟墓中一定会藏着什么神仙用的东西，说不定有什么长生不老的法宝。而且董仲舒本人十分好仙，对神学有着深刻的研究，懂得许多阴阳秘诀，还经常制作一些神符灵药。莫不是他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把这些神仙的东西藏在董母墓里。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打上了董母墓的主意。

据历史学家考证，董仲舒家乡为广川，离平舆有千里之遥。传说中的董永或有其人，但不会是董仲舒之父，可能是古代文人为给董永找一位最为有名的董姓后裔，查来查去便找到了董仲舒身上。然而，

这一文人的发挥，在董仲舒死去千年之后居然还有人深信不疑，从而引发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盗墓案，这大概是谁也不曾预料到的。

根据上面的记载判断，董母墓被盗的原因实际上是董仲舒的神学学说。他的神学思想深入人心，百姓自然就会把他神化，才导致了董母墓被盗的悲剧。

第十二章　宋元时期的盗墓活动——盗墓风潮第四波

盗墓风愈演愈烈

《庄子》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

宋代以来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辅车相依，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活动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的样子了。

其实，当时民间盗墓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宋元时期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原因仍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珪发慕容详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也有很多。动机五花八门，想来宋代盗墓情形亦如此。

北宋皇陵惨兮兮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将驸马张永德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之外别无他路。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大宋朝定都开封，赵匡胤的子孙们开始了他们167年的奢侈生活。前后有九个皇帝临朝，除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囚死于漠北以外，其他七个皇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共七帝八陵都选址于远离都城开封的河南巩县。这似乎一时间难以被人理解，但人们从赵匡胤的所作所为便可窥出一点究竟。

原本，洛阳是赵匡胤首选的国都之所在。他至死对开封的地理位置都存在疑虑。开封地处平原，无山川之险，加上黄河常致水患，而洛阳乃历代王朝之都，山水绝佳，进可攻，退可守，颇具山河之胜。这样的都城让他感到，开封实在不是最佳的选择。

刚坐皇位的第三年，赵匡胤便将自己父亲的棺椁迁葬巩县。朝廷主管天文历法的星相学家卜出了永安陵的具体位置，赵匡胤颇感满

意。

但迁都的事，却因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被耽搁下来。在此之时，开封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大大发展，短时间内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尤其皇宫富丽，建筑速度、规模都大得惊人。赵匡胤渐渐地打消了迁都洛阳的计划。而宋陵的陵址却永远地选在了距洛阳不远的巩县。赵匡胤意在使自己的后代们死后都伴于他父亲的周围。

尽管宋陵依规模而论，与秦、汉、唐诸陵有一定的差距，但其随陵设施、布局等，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规律。七帝八陵，分布在相距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帝陵周围陪葬着21位皇后陵，140多座皇族子孙墓，还有功勋卓著的将领和文臣的7座墓，以及各帝宗室200多座，形成了一个大而密集并各成体系的陵区。

继这座规模庞大的陵寝建筑之后，南宋、明、清等朝代，都继承了这一陵区集中设置的制度和传统。

靠阴谋诡计起家的赵匡胤怕皇权有朝一日同样被臣属以阴谋篡夺，便玩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阴谋。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年），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年），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赵匡胤的这一计，使皇权集中起来归自己独享。这一着狠棋，无疑是赵匡胤的胜利，但也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其中之一是给深宫内的后妃们提供了参与朝政的便利。

当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恒死后，他的刘皇后就垂帘听政，任命宰相丁谓和宦官雷允恭督建真宗陵寝。墓穴好不容易选定后，主管天象的官员判司天监邢中和去看了一番，回来后声称再往山坡上挪百步，则有一万年不遇的人间罕见的“佳穴”，是真正的“风水宝地”。话传到了宦官雷允恭耳朵，雷允恭马上献媚，奏禀刘皇后和宰相丁谓。

刘皇后和丁谓信以为真，准许按邢中和的说法办理。数万名工匠被征来改挖墓穴。然而，地刚刚挖下去没有几尺深，一股清泉喷涌而出，瞬间大水汇成水池，墓穴遂告泡汤。

在古代风水学上讲，陵墓的地宫向外窜水是不吉利之事，此事很快传到刘皇后的耳朵里。她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雷允恭和邢中和抓来问罪。雷、邢二人被扣上了包藏祸心、擅自移动皇堂贻误工期的罪名，惨遭斩首。而权倾一时的宰相丁谓也因这场选陵风波被贬崖州，过上了流亡生活，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而陵区内每座皇陵都有一个完整的陵园，陵园分为上宫和下宫。远离京都下葬，送葬耗费颇大。赵匡胤下葬时仅护驾的就有3500多人，宋太宗赵光义下葬时的护驾人员增至9400多人，而到了宋仁宗赵祯时，护驾人员多达4.6万多人，其耗费之大历史罕见。

靖康之耻后，宋陵大规模被盗。1125～1127年，北方草原民族一个叫金的国家，发动军队大举南侵，兵戈所指，攻无不克，昏庸透顶的徽、钦二帝被金兵劫掠北去，宋八陵首次遭到大规模破坏。大金官兵大肆盗掘八陵。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抗金英雄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朱仙镇，这位举国敬慕的英雄，专门派人前往察看北宋皇陵，并加以整修，表现了一位爱国忠君的将领的良苦心境。

北宋灭亡之后，巩县八陵都遭到了破坏。金灭亡后，元朝控制了北宋陵区，一切地面建筑除石雕外都被“尽犁为墟”。“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永昌皇陵不永昌

宋代陵制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转折点，宋代开始集中皇陵成陵区，布局受风水影响，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永昌陵现在位于巩义开发区至西村镇的公路旁。这个地方已看不出来皇家气度，陵丘都低矮，神道很短小；也看不出风水宝地，前后都是坡地，位于低洼地带（这个地方现在的名字就叫“陵洼”）。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约600米。永昌陵上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

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巩义这个地方，按古人的说法是个山高水来阴宅吉地。它位于嵩山北，是为阴；位于黄河以南，亦为阴，符合了“山之北，水之南”的风水要求。正所谓“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看来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包括永昌陵在内的八座宋陵都是南高北低，居于最崇高地位的陵台却处在各自陵区的最低处，到这里瞻仰宋陵，丝毫没有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皇帝几乎躺在了人们的脚下，这和历代皇帝的埋葬方法完全不同。

那么，宋陵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选择呢？其实如此选择还是和风水有关。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体制，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永昌陵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

上宫建筑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皇帝陵台、皇后陵墓。永昌陵不是帝、后同穴合葬陵。宋太祖结发妻贺氏死于958年，年30岁。当时，宋皇朝尚未建立，后来葬在永安陵兆城内。贺氏死后，赵匡胤又娶王氏为继，王皇后死于963年，年22岁，也葬在永安陵内；又立17岁的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死后葬于永昌陵北边。贺、王、宋三位皇后的坟冢早已泯没，无可指寻。

陵园正中为皇帝的陵台，象征着帝王“丰业”和尊严，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养植柏林

的“柏子户”。而今，宋陵的柏树已不复见。陵台经近千年的风雨剥蚀，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姿。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两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之意。石虎、石羊各两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两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望柱南为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他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南门有站立的石狮，被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而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虽然这些威风凛凛的石像围护在皇陵左右，但它们真能看护好太祖的陵寝吗？

据《宋史》记载，灵台之下二十几米深处建有“皇堂”，即地宫，是皇帝棺木藏放的地方。随葬的物品有玉圭、佩剑、冕、翠衣及种种明器，皇帝生前所有的日常用具，金枪、板刀、弓箭、金银器皿都埋在地下了，在地宫的甬道和耳室里，还摆满了皇帝喜爱的各种宝物。

但这些宝物却因为陵寝的损毁而不知散落在何处了。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初六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金兵不仅对京城开封大肆劫掠，而且对北宋皇陵也开始了疯狂抢劫。因下宫的大殿及禅院里有许多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这里成为金兵最先下手的地方。

包括永昌陵在内的宋陵都建在平原的黄土地上，墓道建制规模相同，所以比较容易盗挖。金兵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缒绳而下。陵区内顿时烟火弥漫，一片混乱。据记载，北宋的皇帝陵包括皇后陵都遭到了很严重的盗掘，哲宗皇帝的尸骨还被盗墓者抛到了陵外。

宋高宗赵构闻讯后，命令河南镇抚使翟兴和抗金英雄岳飞北上，赶走金兵，又修复了皇陵。这样，巩义就成了宋金拉锯战的战场。宋军撤退后，金兵的报复更加强烈，不仅掘墓更凶，而且还烧房扒屋，砍树伐木。于是，松柏茂密的陵地很快变得千疮百孔了。

南宋灭亡，蒙古人控制北宋陵区后，他们怕宋代的遗民怀念先朝的皇帝，就把北宋皇陵上的建筑全部烧毁，这也是北宋陵区只有孤零零石雕的原因。所幸的是，宋陵区域被划为官地，不准百姓打柴放牧，不准种植庄稼，一直荒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建筑遗址，特别是石雕像。

今天，站在永昌陵上四面望去，近处是块块肥沃的良田，远处是点点含翠的青山。1000多年前的陈迹，已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得几乎净尽，然而“唐宗、宋祖”作为历史人物，却常使我们浮想联翩。

盗墓只为皇帝过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一个朝代。

在这一时期，宋朝的统治频繁地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而宋朝的统治者大都不思进取、昏庸无能，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一再忍让、妥协，最终导致了大宋王朝的覆灭。在这一时期的皇帝虽然大都没能

做出什么较大的政绩来，但是却也出了一些在其他方面较为突出的君王。宋徽宗就是这样一位政绩平平却极具文学才华的皇帝。

宋徽宗赵佶（1082—1135），神宗十一子，哲宗弟。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赵佶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在位26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

赵佶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建立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他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奢侈的宫殿。为了把这些宫殿建造得更为奢华，他派人专门到全国各地搜刮奇花异石，不论路途长短一律用船运至开封。这些石头就是在我们大家熟知的《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所运送的花石纲。为了追求奢华，他竟将父亲留下的有人估计当时占世界上70%的财产都花光了。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

宋徽宗在位期间，爆发了方腊、宋江等领导的民变。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传位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道士郭京身上，妄以“六甲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御笔崇宁通宝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粟（sù）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北宋灭亡，二帝被俘北上。后被押往北边囚禁。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五年后，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病死于五国城。照当地习俗火葬。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宋徽宗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正是他的这种才华导致了许多陵墓被盗。宋徽宗十分喜欢收藏古物，尤其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时称“古董皇帝”。他执政时期，为了放置古物，还专门在宣和殿的后面建造了保和殿，左右两侧分别设立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趋迎”。为了迎合宋徽宗收藏古董的爱好，朝廷内的官员们到处去寻找古董来取悦皇帝。于是，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寻求古物之风十分强劲。为了找到更为珍奇的稀世珍宝，有些官员竟然盗起了古代规模较大的陵墓。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提点茶马程唐为了能够升官发财，也参与到了盗墓的大军之中。他们盗的墓可非同一般，是商朝著名大臣比干的陵墓。

比干，子姓，为殷商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比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比干是殷帝丁的次子，帝乙的弟弟，帝辛（即纣王）的叔父，官少师（丞相）。他受其兄帝乙的嘱托，忠心辅佐侄儿——幼主纣王。

比干眼看着强大的国家就这样慢慢衰败下去，十分着急，便对商纣王的种种残暴昏庸行为加以劝阻。他想，君王有过失，作为大臣不加以劝阻就是不忠的人，怕得罪君王而死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君王有了过错，如果加以劝阻，君王不采纳反而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是最忠实的表现。于是，他便到商纣王经常享乐的摘星楼去冒死进谏，但是他的进谏惹恼了商纣王。纣王竟然命令比干自己剖出心脏来看看是不是传说中忠臣具有的七窍之心。

比干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真的举起刀把自己的心脏挖了出来。他捧着自己的心脏来到商纣王面前，就倒了下去。商纣王被比干的举动吓坏了，他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比干的心，果真见到他的心脏有七窍。一代忠臣比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63岁。

比干被害后，纣王还要将其满门抄斩，比干的夫人陈氏当时身怀六甲，被同情比干的士兵偷偷地放了出来，在附近一处山林里生下了比干的遗腹子。纣王的追兵赶到后，查问孩子的姓氏，陈氏急中生智，指林为姓，躲过了这次劫难，林氏由此起脉。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为比干封墓，正式赐比干的儿子为林姓，赐名为坚，封河清公，食采于博陵（今河北安平一带）。所以林坚就是林姓的始祖，比干成了林姓的太始祖。

传说中的比干墓有一件稀世珍宝也算得上是天下第一。这就是周武王派人专门为比干墓铸造的“铜盘墓志铭”，据说这面墓志铭十分奇特。那铜盘正面是十六个字——“前岗后道，左林右泉，万世之宁，此焉是宝”。铜盘背面是一面镜子。传说每年中秋月圆，用鸡皮把镜面打磨光滑，对着月光看，就能看到比干的头像，比干在镜子里还能与外面的人说话。也正是因为这面墓志铭，比干墓才被李朝孺盗劫的。

陕西转运使这个官职虽不是什么大官，却油水极多。因为其主管陕西境内米粮、钱币、物资的运输，这些都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东西。李朝孺不是什么好官，又十分善于钻营，自然在这个官职上也赚得金银无数。因他所管理的人多为往来奔运的基层小吏，所以他对乡野市井之事、街巷绯闻之谈十分了解。

这天，他正在一个码头上监管发往河南粮食的转运事宜，船上几个船夫的谈话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

“要说咱们河南出的最大的名人，就要推商朝的比干了。他可真是位大忠臣啊！”

“是啊，虽说咱们那里出的名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可惜比干死得太惨，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不过，他死后也得到了应有的待遇。他的陵墓甚至比许多帝王的陵墓都建得豪华，还是周武王亲自派人建造的呢！”

“是啊，听说那周武王所铸造的墓志铭可非同一般，能在月圆之夜看到比干在里面说话。”

“真的？还有这样稀奇的事！那真是件无价之宝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名船夫的谈话，竟然给比干的陵墓带来了灾难。李朝孺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窃喜。他想，当今皇帝最喜欢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了，倘若能把这件比干的墓志铭弄到手，那以后升官发财就不用愁了。如何得到这个墓志铭，不用说，只能盗掘比干的陵墓。

李朝孺盗宝心切，马上就带领着手下的士兵即刻前往比干陵墓。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李朝孺的盗宝队伍到达了河南的比干陵墓前。虽然他心里很急，但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盗掘比干的陵墓，因为他怕招来当地百姓前来围观，还可能会有许多人出来阻止他的盗墓行为。于是，李朝孺便选择了晚上下手。

时辰一到，李朝孺就迫不及待地命令手下士兵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就着月光向陵墓挖了下去。不一会儿，墓葬就被挖开了，露出了里面的棺椁。此时，李朝孺早已忘却了对死人的恐惧，赶紧命令士兵将棺椁打开。士兵们七手八脚就把比干的棺椁撬开了。之后，他们马上对棺椁内的陪葬品搜检起来。经过长时间的仔细寻找，还真没有辜负李朝孺的“煞费苦心”，一位士兵找到了那块传说中的墓志铭。

李朝孺接过墓志铭一看，十分惊喜。这块埋藏了2000年的墓志铭，只是镜面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李朝孺想起了那个铜镜内可以见到比干影像的说法，赶忙拿出随身带来的鸡皮，用劲儿把镜面擦得干干净净。

李朝孺拨开众人，找到一处月光较好的地方，把镜面慢慢地向月光对着看。他果真见到一个须发皆白、胸前鲜血淋淋的影子。

“大胆！什么人竟敢盗掘我的陵墓。”只听一声断喝从镜子里传了出来。

李朝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瘫倒在了地上，那面镜子也从他手中滑落下来。

众士兵也听到有很大的声音从李朝孺那里传了出来，只是没有听清楚是什么声音。他们见到李朝孺突然瘫倒在地上，赶忙奔上前去将他搀扶起来。李朝孺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缓过神来。为了不引起恐慌，他并没有告诉士兵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命令士兵把那铜盘镜面朝下收在了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盒子里。他为了避邪，还用一块大红布把那个盒子包了起来。做完这一切，李朝孺又让士兵收拾了一下陵墓中的其他陪葬品，就带着队伍悄悄地趁着夜色回去了。

李朝孺因为在陵墓旁被铜镜内的比干影像吓坏了，所以再也没敢独自一人打开过那个盒子，只是派了许多士兵严加看管，直到他回京时把它献给宋徽宗。很快，比干墓被盗的消息传了出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盗墓罪行，李朝孺竟然又想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栽赃。

李朝孺从街上抓来了一个泼皮无赖，后者因赌博而荡尽家产，正在街市上卖最后一件祖传宝物。李朝孺预先派人把那个盒子藏在了泼皮的家里，诬陷他的家传宝物不是正当所得，而是盗墓所得。于是，李朝孺派兵对那泼皮的家里进行搜查，把那装宝物的盒子搜了出来。

李朝孺便诬陷是那泼皮盗掘了比干墓，偷去了里面的宝物，而那比干墓中的墓志铭就是他盗墓的证据。那泼皮起先不肯承认，但是经不住李朝孺的一番严刑拷打，只得承认比干墓确实是被他所盗。就这样，李朝儒名正言顺地把铜盘墓志铭收缴了上来，并献给了宋徽宗。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朝儒的盗墓行为并没有因为他的掩盖而被历史忘掉。他的盗墓罪行终究还是被载入了史册。

现存的比干墓庙位于卫辉市区北7.5公里处，占地约20亩，有古柏数百棵，树形奇特，蔚为壮观。陵园内有三道门楼及拜殿、大殿、厢房等，规模十分宏伟壮观。陵墓内还保存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64座。其中著名的有魏孝文帝悼比干文刻石，陈宣帝祭比干文，唐太宗赠殷太师比干诏、祭文碑及乾隆御碑等。

比干墓以“四个天下第一”著称于世。

天下第一仁：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死谏君的忠臣。

天下第一庙：殷太师比干庙。建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因墓立庙。主体建筑有照壁、山门、二门、木枋、碑廊、拜殿、大殿、石坊、墓碑亭等，鳞次栉比，各具特色。四周朱墙环围，古柏交

柯，碑碣林立。在比干庙正南方有比干石雕像、神道、牌坊，环境幽深。它是比干后裔林姓儿女祭谒的圣地。

天下第一墓：因为它是第一座史有记载的坟丘式墓葬。沿比干庙中心甬道穿过三门可见比干墓，为周武王所封国神，距今已3000余年的历史。相传比干死后，天降大风，飞沙走石，卷土将比干尸骨埋于此处，故称其墓穴为天葬墓。又说天葬墓四周生出许多没心菜和空心柏树——比干宁愿剖心为国家为人民，万物精灵为比干献心感动；牧野地区人民为了怀念爱国英雄，并用比干心起名“心乡”（即新乡）。

天下第一碑：比干庙里有个石碑，是孔子用剑刻的碑，上书“殷比干莫”几个字。因为这是孔子留在世上的唯一真迹，被称为“天下第一碑”。前497年，孔子55岁，这年春天他从鲁国来到了卫国。但孔子在卫得不到卫灵公重用，他就带着徒弟到匡城蒲乡（今河南长垣）。经过牧野，忽然车子坏了，他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答曰：卫地。孔子非常激动，说这是仁人之墓，恭敬举行了祭奠，挥剑刻下四字“殷比干莫”。“莫”与“墓”在古代是通假的。这其中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据说，孔子是借地为土，故意把墓写成莫字。后来，有个好为人师的县令看到这块墓碑，讥笑孔子写了错别字，就拔剑刻上一“土”，刚刻好，乌云滚滚，雷声大作，“轰隆”一声，将补上的“土”又劈掉了。

可以说，宋徽宗时期猖獗的盗墓现象与宋徽宗本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喜欢收藏古董，下面的官员也不会挖空心思来盗墓。宋徽宗大观年间，宋朝皇室收藏的古物仅有500余件，然而到了宋徽宗政和时就增为6000余件，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宫廷内的古董竟然超过了10000件。这个宋朝皇室古物激增的数字，也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盗墓活动的猖獗。

刘豫盗墓不仗义

与岳飞相比，投降金国，被金兵扶持，当了“伪皇帝”（即“大齐”皇帝）的刘豫，则成了北宋皇陵的千古罪人。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家中世代为农，他却从小读书，最终通过科考踏上仕途之路。但刘豫为人品行极差，年轻时就偷窃过同学的衣物用品，做官不久即遭弹劾，若不是当时的皇帝不想宣扬这件丑事，刘豫早就被罢官了。经历了这件事情，刘豫并没有反躬自省，感谢皇恩浩荡。他原为北宋河北提刑，金兵南侵时，这

家伙十分惧怕，弃官逃往真州。在真州，得到张悫的推荐，被宋高宗赵构任命为济南知府。金兵攻城略地，大军兵临济南城下时，刘豫诱杀鼎力抗金的爱国骁将关胜，授城投敌。

高宗赵构举国南徙，迁都临安，史称南宋。为了有效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金人在北方设立傀儡政权，以“宋人治宋”的方式对北方实行管理。而这个被选中成为傀儡皇帝的人就是刘豫。在刘豫投降的当年，金国册封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后迁都汴京（开封）。

刘豫迁都汴京后，进行了极不光彩的搜刮财宝活动。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攫取珍宝的贪欲，假以淘沙之名，大肆毁掘开封、洛阳一带的陵墓，致使这两地的“冢墓发掘殆尽”，历代帝陵惨遭盗掘。

有一天，刘豫从手下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便爱不释手并顿起贼心。当得知这只水晶宝碗出自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时，他便命令心腹恶棍刘从善前去掘陵取宝。为了掩人耳目，刘豫特封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名正言顺地发兵赴巩县对宋陵施暴。刘从善率兵掘开哲宗永泰陵后，将陵内所随葬的珍宝洗劫一空。这还不算，刘从善还让士兵打开哲宗的棺椁，将哲宗的尸骨暴弃于陵外荒野。史书上记载，“刘豫僭立，见兵士卖陵中玉碗，即置陶沙官，再发河南山陵及发民间无主坟墓。”除了启用他臣，为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刘豫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淘沙官”。

刘豫降顺变节，本已不仁。合伙盗掘宋陵，则更不义。

绍兴十八年（1148年），南宋太常少卿方庭顼出使金国，路过北宋皇陵，见哲宗遗骸暴露于野，当即脱下自己的衣裳，为这位故国君王殓葬。他用自己的衣裳包住哲宗的尸骸，双手挖土，磨得鲜血淋漓，挖得一坑，将哲宗重新掩埋。后来，他回到南宋朝廷，将路上的遭遇奏报给高宗赵构。赵构大哭出声，满朝君臣悲痛，有人羞于前皇被辱竟拔剑自刎。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听说前朝帝陵遭此浩劫，一腔男儿的血气凝于笔端，愤然写下悲怆已极的诗作，试图唤起南宋人民保家卫国的情感。诗《闻虏乱有感》中写道：

近闻索虏自相残，秋风抚剑泪汍澜。
雒阳八陵那忍说，玉座尘昏松柏寒。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赵匡胤生前认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都未能幸免。据记载，刘豫与粘罕盗墓很有一套，小墓采用

目前考古界常用的“大揭顶”，完全把墓刨出来。大墓则从陵台一侧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缒绳而下。期间，现场场面热闹，陵区内到处都是盗墓的士兵。宋哲宗赵煦的尸骨被挖出后，乱抛在地，曝晒日下。当时被弃尸骨漫山遍野，风水宝地成了乱坟荒冢。

北宋是个崇尚薄葬的朝代，也许是唐代刚刚灭亡，其关中十八陵便险些被盗殆尽的惨痛教训刺激了北宋诸帝，他们纷纷提倡薄葬。加之北宋是中国丧葬文化形式转变的时期，从北宋开始，人们逐渐把丧葬的重点转移到“丧”上，而“葬”的方面多少有所精简，因此北宋帝陵远不及唐代帝陵气势恢弘。

但所谓薄葬，也只是相对汉代、唐代而言，作为皇帝陵寝，其气势规模，不问可知。北宋帝陵的修建也是穷一国之力，汇总天下能工巧匠的智慧，精心设计建造而成。所谓“事死如事生”，巩义八陵的气派丝毫不逊色于皇宫殿宇。据史料记载，修建宋仁宗的永昭陵时调集全国工匠、民夫不可胜数，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共用石材27600块，动用工匠4600人。

宋陵无论从规模还是气势方面都远不及唐陵，但殿宇楼阁鳞次栉比，石刻雕塑栩栩如生，陵区内树木长青，郁郁葱葱。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耗资巨大、建造精美的大型皇家陵园，却在短短八年间被盗一空，焚烧殆尽。更可悲的是，它们不是亡于敌国之手，也并非毁于后世盗贼，而是被这个朝代曾经的臣子刘豫盗掘，取尽珍宝，甚至将皇帝尸骨暴尸于野。

刘豫僭越皇位期间，帮助金人镇压北方的抗金斗争，岳飞、韩世忠的抗金都曾遭到刘豫的阻挠。刘豫为世人所不齿，就连扶植他的金人也瞧不起他。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只是为了利用他，一旦刘豫不能完成金人交给他的使命，金人就会无情地抛弃他。

随着刘豫日益强大，金人开始猜忌并计划铲除他。在刘豫僭位的第8年，金人废掉了这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刘豫郁郁终老，结局悲惨。

刘豫与粘罕盗掘北宋帝王陵，里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史学界认为，金政权有意借摧毁皇陵之际，刺激南宋政权神经，从而达到摧垮汉人精神的意图。而刘豫在其中当了一个很可耻的角色，为后人鄙视！

盗墓毁容朱漆脸

刘豫盗掘北宋巩义八陵的行径极大地刺激了北方盗墓者的贪欲，而五代以来兴起的金石收藏之风也为盗墓者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于是，四方盗贼如同蚁聚，一时之间盗墓成风。刘豫的毁灭性盗掘，使那些生活在陵区的僧尼、柏子户等无存身之处，只好流落他乡。从此，北宋皇陵再无专人管理，民盗相继兴起，最猖獗的一个盗墓贼叫朱漆脸，他所盗之墓就是永昌陵。

朱漆脸并不是盗永昌陵的始作俑者，永昌陵的首任盗墓者是刘豫。刘豫盗宋陵时，重点是宋仁宗的永昭陵，永昌陵虽然也遭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但是宋世祖赵匡胤的棺椁并未被打开。永昌陵也就成为北宋巩义八陵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永昌陵在躲过刘豫后，却没有逃出民间盗墓者的手心。

宋末元初时期，可谓是盗墓者的天赐良机。那时，宋朝朝廷岌岌可危，金朝的势力已经被元朝覆盖，而当时最为强大的元朝正在到处征战，以取得全国的统治权。这时的皇陵可以说是姑姑不疼、姥姥不爱，谁也不管。朱漆脸正是找准了这个时机下的手。

朱漆脸在盗墓者中也算资历深厚，他见洛阳附近大大小小的古墓已经被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那些不是规模太小不值得盗就是有官兵看守无法下手。他琢磨再三，决定去盗永昌陵。他经过一番详细勘察后，制订了盗掘永昌陵的计划，带领手下人顺利地打开地宫、进入墓室。永昌陵虽然遭遇过刘豫的洗劫，但刘豫并未打开赵匡胤的棺椁，因此，当朱漆脸见到石床上安然如初的棺椁时，心中一阵狂喜。

朱漆脸指挥手下打开棺椁，无数价值不菲的随葬品映入盗墓者的眼帘。当盗墓者们收敛尽覆盖在赵匡胤身上的随葬品后，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皇帝的尸体暴露在人们面前。虽然经过几百年，可由于防腐措施得当，赵匡胤的尸体并未腐烂，宛若未死一样腰间系着一条晶莹剔透的玉带，经验丰富的朱漆脸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便要得到这条玉带。然而由于尸体僵硬，宋太祖的身量比较大，很胖，棺内空间又比较狭小，朱漆脸和手下用尽各种方法也没能挪动赵匡胤的身体取走玉带。

最后还是朱漆脸想到一个办法，他用一个带子套上太祖的脖子，另一端系在自己腰间，他跨骑在尸体上，试图用腰部的力量将尸体拉起来。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朱漆脸一发力，赵匡撤的尸体便被拉了起来。就在赵匡胤“坐”起来的一瞬间，尸体的嘴巴突然张开，一股黑色私液喷射出来，不偏不倚正喷在朱漆脸的脸上。朱漆脸惊得失魂落

魄，以为是防盗的毒液，可是过了很久，他也没有中毒症状，便渐渐放下心来。但是这黑色的黏液粘在脸上后却无论如何也清洗不掉，于是“朱漆脸”的名字便流传开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渐渐忘了他原来的名字。

这是史书中有关尸毒传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古人为了防腐，经常在临死前服下剧毒的药物，这样有助于尸体的保存。这种剧毒药物在人体内会腐蚀掉整个内脏，将其化成液状存留在体内。当有盗墓者搬动尸体时，尸身受到挤压，液体就会从嘴里喷射而出，会灼伤盗墓者的皮肤。这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朱漆脸”的原因。

西域恶僧盗皇陵

南宋是北宋亡国之君所建的偏安王朝。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至1279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bǐng）跳海灭亡，共历152年。在浙江绍兴五云门外仅留下了六座皇陵。最后三位皇帝仅历6年，个个都惨死殁身。六位葬于浙江绍兴宝山，分别是宋高宗赵构的永思陵、宋孝宗赵昚的永阜陵、宋光宗赵敦的永崇陵、宋宁宗赵扩的永茂陵、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宋度宗赵禥的永绍陵。末三帝葬在哪里？要么失考，要么在异地。南宋六陵只是作为一个“攒宫”来使用的，即为攒集梓宫，暂葬地。南宋的前六位皇帝生前不思收复中原，却梦想着死后归葬祖陵。所以，在绍兴营造了临时性的陵墓。而且，这个临时性的陵墓群中，每陵都将上下宫串连在同一轴线上，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明、清的帝陵轨制，成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南宋的其他诸位皇帝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收复失地，把自己葬在祖坟也就是北宋的巩义八陵中。但是，这个愿望直到南宋亡国也没有实现。

北宋皇陵被盗掘，南宋皇陵也未能幸免。

南宋皇陵是在元初遭盗掘的，这也是中国帝王陵寝被盗掘事件最悲惨的一次。因为南宋皇陵为“攒宫”，初葬时考虑以后“收复河山”，迁回河南巩义祖陵区内，所以棺椁葬得比较浅，盗掘起来比巩义宋陵更方便。

历史上，僧人盗墓并不鲜见。但是，却有一个僧人将盗墓的恶行发挥到了极致，他就是藏僧杨琏真迦，又作杨琏真伽、杨琏真加。

杨琏真迦，唐兀（党项）人，僧侣。至元十四年（1277年），任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后改江淮释教都总统），掌江南佛教事务。次年，在宰相桑哥支持下，盗掘钱塘、绍兴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绍兴人唐珏等以假骨易诸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识。后杨琏真迦复取假骨，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曰“镇本”。元世祖的时候，江南释教总摄西僧杨琏真迦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遍掘诸陵，这是江南六陵遭到最大的一次洗劫。

史载杨琏真迦善于盗墓，他伙同演福寺和尚允泽等人勾结宰相桑哥，对南宋六陵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盗掘，一共掘杭州和绍兴帝陵、大臣墓101座，搜刮陵墓中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

杨琏真迦首先从南宋孝宗第二个儿子魏惠宪王赵恺的墓开刀。赵恺的墓在绍兴天衣寺后面，杨琏真迦与天衣寺奸僧福闻密谋，公然开掘墓穴。

自八思巴被元世祖尊为国师后，元朝对西藏高僧的封号越来越高。

元朝皇帝颁布给国师“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玉印”，印文为八思巴文，青玉质地，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之后，杨琏真迦一发不可收拾，又操起屠刀一样的盗墓器具，气势汹汹地奔南宋六陵而来。

《辍耕录》和《癸辛杂识》记载了当时盗掘经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九月，杨琏真迦和允泽率部众蜂拥来到陵地，陵使罗铣竭力相争，不让开陵，允泽拔刀相逼，罗铣无奈大哭而去。这伙歹徒有恃无恐，先盗掘宁宗、理宗、杨后等陵。

南宋六陵附近的泰宁寺恶僧宗恺、宗允等无视宋陵禁规，恣意砍伐陵区的树木，被南宋守陵人阻止。宗恺等释迦的不肖子孙竟然向官府告状，反而诬陷守陵人侵占寺院地产，要求官府保护。早已急红了眼的杨琏真迦见时机成熟，就以调解纠纷为名，带领大队人马封锁陵区。杨琏真迦和僧允泽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守陵官罗铣（xǐ）据理力争，无奈此时朝代已经星移斗换，大宋的天下已不在。演福寺主持奸僧允泽等人将罗铣毒打一顿，并用刀子架在罗铣的脖子上，陵使罗铣无奈大哭而去。其余的守陵人员见大势已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批横行霸道的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盗掘皇陵。

杨琏真迦一伙进入墓室，掠取大量的奇珍异宝，这还不算，他们又劈开棺椁，攫取了棺内垫葬的金银珠玉。

其中，理宗永穆陵被盗的现场更为惨不忍睹。

理宗在位40年，是南宋皇帝中统治时间很长的一位。盗贼们打开理宗的棺盖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身下铺着好几层锦褥，褥子下垫着精细的丝罩，一名恶徒拖出尸体，拿起丝罩掷地有声，一看，原来是用金丝编成的。盗僧们撬开理宗的牙齿，取出了理宗含在口里的夜明珠，又把理宗尸体倒悬挂在一棵大树上，将肚子里的水银全部倒了出来。杨琏真迦残忍地用刀子割下了理宗的头颅，剔下头盖骨制成夜尿壶自己使用。直至明太祖朱元璋攻入元宫后颁下诏书，才使得理宗赵昀的头骨最终能归葬永穆陵。

1285年十一月，杨琏真迦又盗掘了徽宗陵、高宗赵构的永思陵、孝宗赵昚的永阜陵、光宗赵惇的永崇陵和昭慈皇后、显仁皇后、显肃皇后等一批帝后及大臣的陵墓。这次对南宋陵地的大洗劫共计101处（包括后妃大臣墓），掠去随葬的金银珠宝有：徽宗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的“真珠戏马鞍”，光宗陵的“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的“伏虎枕”、“穿云琴”、“金猎睛”，度宗陵的“玉色藤丝盘”、“鱼景琼扇柄”。另有黄金1700两、白银6800两、纱116260锭。

作恶多端的杨琏真迦深恐南宋理宗等阴魂不散，过了七天，他突有所悟，派人把曝尸于荒野的诸帝后的骨殖收集起来，集中深埋于杭州凤凰山东麓南宋故宫遗址内，“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以显示镇服南宋。可杨琏真迦哪里知道，六陵帝后遗骸并没有被他无端埋压于塔下，在此之前，义士唐珏、林景熙等人邀集附近村民，冒险潜入陵区，用牲畜骨头将帝后的遗骸偷换出来，用木匣敛之，覆盖上黄色的丝绢，上面署上帝号、陵名，秘葬于天章寺前，树冬青以为标志。

直到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发诏书，宋六陵才得到厚葬。后人为褒奖林景熙与唐珏的义举，在皇陵边建造“双义祠”，文征明在所作的《双义祠记》里称唐珏、林景熙为“千古之大义士”。有人以冬青花为题，创作剧本流传后世。而杨琏真迦则遭到千古唾骂。

南宋六陵被疯狂盗掘后，过了六年，身为大元朝丞相的桑哥，排斥异己，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东窗事发，被朝廷处以死刑。杨琏真迦也被朝廷问罪抄家，共查得巨额赃物计黄金1700两，白银6800两，纱11.6万多锭，田地2.3万亩，珠玉珍宝不计其数。

恶僧允泽在盗墓时，感染上了墓中有毒细菌，也该恶有恶报，其“双股溃烂，十指堕落”，没多久，便可耻地被疾病缠磨惨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奸僧福闻为富不仁，霸占他人财产，被愤怒的农民围住杀死。

恶僧宗恺、宗允与杨琏真迦因分赃不均而起内讧，被杨琏真迦活活用棍打死。

一群恶僧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的盗墓惨事——盗墓风潮第五波

陈奉盗墓最大胆

大家熟知的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其实，还有一处皇陵也是十分有名的，这处皇陵虽然没有埋葬皇帝，但是它的地位却不可小觑。这处皇陵就是坐落在今天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明显陵的主人是朱祐杬（yuán），他生前虽然没有坐上皇帝的位子，死后却享受到了皇帝的待遇。

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的异母弟、明武宗朱厚照的叔父。成化二十三年封为兴王，弘治七年就藩湖广安陆州（今钟祥）。正德十四年薨逝，享年44岁。明武宗朱厚照赐谥为“献”，在松林山选定吉地，按亲王规制营建陵园安葬。

从朱祐杬的生平来看，他是没有做过一天皇帝的，那他又是怎样当上恭睿献皇帝的呢？由于明武宗没有儿子，在他死后根据太祖朱元璋“兄终弟及”的遗训，皇位就落在了与明武宗血缘关系最近的朱厚熜头上，就是明世宗。

明世宗继位后，不顾朝臣的反对，追尊生父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后来献皇帝神主又被供入太庙。朱祐杬被追尊为皇帝后，他的陵寝安置规制也由原来的亲王级别提升到皇帝级别，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在嘉靖四十五年正式完工，前后历时47年，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明显陵是我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座帝王陵寝。

明显陵的被盗与明神宗有着极大的关系。

明神宗是一个贪图享乐的皇帝，不仅在世时大兴土木，修建了许

多宫殿庙宇，还念念不忘死后的安乐。他在位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墓，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明神宗的享乐是要以大量的钱财作为后盾的。但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极为缓慢。为了达到享乐的目的，他就搜刮钱财，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利是图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以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便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明神宗的昏聩无能以及敛财暴行，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安。据说，老百姓即使是养一只鸡，也要向皇帝缴纳一定的税金。

陈奉就是明神宗派出的到各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宦官之一。

陈奉，湖北钟祥人，生卒年不详，出身市井无赖，品质恶劣。陈奉本来是个御马监奉御，因为人通达，善于阿谀奉承，很快就升任了要职并得到明神宗的信赖。他是明神宗时期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与高淮、陈增等并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被委派为税使赴湖广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并管理钱厂鼓铸之事。陈奉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任务，非常得意，为所欲为。每到一个地方，即招募地痞无赖，收受他们的贿金，然后编为员役，让他们分别管理奏记、谋议、出入等事。到荆州后，他大开告密之门，地虎韩丙等几十人天天告密、到处搜刮，沙市百姓骚动。开始，陈奉还有点畏惧，略有收敛，但一个月后圣旨到，令逮捕为首的百姓，并牵连何、熊两孝廉，于是陈奉气焰转盛，以至城关内外人心惶恐，连大气也不敢喘。

陈奉在各个郡邑布列税官，很小的市镇也派去税官五到七人。这些税官把当地富户的名单开列给陈奉，然后以种种借口向富户要挟勒索，如说富户的墓地、房宅、田产下有金矿，要掘地开采；说富户挖到了古文物匿不报官；说富户非法藏有违禁御用物，等等，均无中生有、胡乱编造。有的税官甚至公然抄没自己仇家的家财，献给陈奉。这些富户无处申诉，只得倾家行贿陈奉求免。小贩或农民进城镇卖鸡、肉、蔬菜，亦遭到税官的抢掠。税官到百姓开的酒食店吃东西，店家连钱都不敢收他们的，以致通都大邑呈现一片荒凉沉寂景象，商贾困于苛重的杂税，不敢照常营业；农夫则为无法完纳的欠税所苦，处处民不聊生。

陈奉每次出巡，都鞭挞地方官吏，抢劫过往商旅，引起了商民普遍的愤恨。他们乘陈奉从武昌到荆州时，聚集数千人在路上向他示威，争着用瓦石掷他，陈奉狼狈逃脱。

陈奉到了荆州后，凭借自己对当地的详细了解，很快就使自己的敛财工作步入了正轨。陈奉及其手下十分残暴，不仅对当地居民横征暴敛，还随意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甚至把孕妇的肚子用刀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简直是无恶不作。就这样，他积聚了很多钱财。

即使这样，贪婪的他还不满足，依旧想一些新的办法意图最大限度地诈取钱财，他甚至向本朝皇陵下了黑手。说起来，他的这个盗墓主意还来源于另一起盗墓事件。

一天，陈奉正在府中苦思冥想一些新的敛财之术，一份密报打开了他的思路。

“大人，这里有一份密报。”陈奉府中的下人禀报道。

“什么事情？要是不急，就先放在这里吧。”陈奉正在想着敛财的事，不想分出心思来。

“好像是关于一起盗墓事件的，好像还与许多金银有关。”那下人含混地说道。也只是从报信人的嘴里听了只言片语。

陈奉一听说金银的事情，立刻两眼放光来了精神，接过密报看完之后，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意。

原来，陈奉为了更好地对所控地区进行监视，便收买了很多人充当他的眼线。有什么关于钱财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份密报是荆州的一个眼线送来的。密报里说有乡民徐鼒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夫人杨氏的陵墓，这些盗墓贼从杨氏的陵墓里挖出了大量珠宝玉器等陪葬品，还有黄金万余两。

李林甫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他想到李林甫原配夫人的陵墓想必也一定豪华。陈奉见钱眼开，一声令下，就派兵把徐鼒等人盗得的财宝都抢了过来，据为己有。没想到，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爱财如命的明神宗知道了。明神宗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盗墓，就也对这起盗墓成果窃喜了很久，命令陈奉把所得宝物悉数交公。这样做，美了明神宗，愁了陈奉：自己费尽心思得到的财宝竟然一点也没捞上，陈奉怎能甘心？

陈奉从这起盗墓事件中又看出了一个绝妙的财路——盗墓。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当时，在他权利范围内的坟墓无论大小，不论有名无名，几乎都被他派人盗掘了。从这些墓葬中，陈奉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陈奉盗墓的受益者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是明神宗了。陈奉并没有忘记本分，把盗得的财宝分了一半给皇帝。他的盗墓行为使满朝为之哗然，并激起了许多忠臣的反对。巡按御史王立贤就曾上奏，请

明神宗下旨制止陈奉的盗掘行为。然而，自身因盗墓而受益的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大学士沈一贯也都曾上奏揭露陈奉的罪行，明神宗全都置若罔闻。明神宗的举动大大助长了陈奉的恶念野心，也使陈奉进一步摸清了皇帝的意思，最终导致了陈奉盗掘显陵事件的发生。

有了皇帝做靠山，陈奉更加有恃无恐，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物，陈奉想尽办法、费尽心机。一天，陈奉从爪牙处得知显陵就在枣阳矿山旁边，其中宝物一定多得惊人。可是，那毕竟是皇帝老子的老祖宗，明目张胆地掘墓，无异于自找死路。于是，陈奉就用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去获取其中的财物。怎么做呢？就是开采离其不远的枣阳矿山。

陈奉开枣阳矿时，知县王之翰因该地接近显陵，坚决反对。陈奉便弹劾王之翰和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以及曾试图救助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的一些官员，缇骑到武昌逮捕了这些人，并追逮冯应京。冯应京任职期间对百姓比较关心，百姓见到冯应京被逮捕，相随痛哭，送他上路。陈奉却派人在大街上到处张贴通告，罗列冯应京的罪状。士民更为愤怒，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再次暴动，相聚围陈奉公署，誓杀陈奉。陈奉从后门逃跑，藏到楚王府中，暴乱的百姓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16人捆缚起来，扔进长江；以巡抚支可大保护陈奉为由，烧了他的辕门。陈奉却又秘密派遣自己的走狗参随三百人带上兵丁，追逐射杀群众。冯应京在槛车中劝说，百姓才散去。万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仅召回了事。皇帝做到这份儿上，真是昏到家了。

武昌再次民变的情况传到京师后，有两个多月朝廷不敢派人去武昌调查。吏部尚书李戴与众官员共同上疏，指出镇抚司所监禁的生员和官犯，一半是因陈奉诬奏而被逮入狱的，请求释放他们。首辅沈一贯及给事中姚文蔚等亦请求撤陈奉回京师，但他们的奏疏都被扣压不报。这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正督理湖口船税，也上疏揭发陈奉在水路阻截商船，在陆路拦截贩运商人，敲诈勒索，以所得的三分之一放进自己腰包，要求神宗调走陈奉，以平息商民的怨骂。神宗这才在四月下旨：“其湖广店租及开矿、铸钱、钱粮等项，着守备内官杜茂兼管，陈奉着该抚按差官伴送回京处分。”

陈奉在湖广两年，搜刮了大量金银财宝。湖广巡抚支可大恐怕百姓拦截，派兵护送他出境。陈奉回到京师后，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揭发他的罪行，被降杂职，支可大被革职。冯应京在万历三十二年才被释放，而王之翰终于死在狱中。

百姓闹事的事件平息下去之后，陈奉才偷偷地从楚王府中溜了出

来。之后，他马上调集了大量军队，作为他盗墓的保障。百姓们在军队的震慑之下，只得任由陈奉胡作非为。

就这样，陈奉率领着大批军队再次以采矿为名进驻明显陵。这次明显陵没能逃过劫难，不仅大量的地面建筑被毁，陵墓地宫内也惨遭劫掠。陵墓内所有的陪葬品连同朱佑杬棺椁内的金银珠宝都被陈奉搜刮一空。

面对着皇家陵墓中如此众多的稀世珍宝，陈奉竟然打起了算计明神宗的主意。他虽然贪污受贿，公然劫掠了许多财宝，可是那些财宝与明显陵中的宝物相比，就相差太远了。他利令智昏，竟偷偷地把明显陵中大部分的财宝都据为己有，只把那些不是十分珍贵的陪葬品呈给了明神宗。

据说，陈奉回京述职时，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运载财宝的舟船首尾相连，长达数里。为确保万无一失，陈奉还特意为护送财宝而增派了大量士兵护卫。

明神宗虽然在政治上十分昏聩，可是在敛财上却很有经济头脑。他看着陈奉送上来的明显陵中的珍宝，马上就看出了陈奉的把戏。明神宗十分生气，再加上不时有大臣弹劾陈奉对湖广百姓的残暴统治以及他的盗墓罪行，明神宗决定好好惩治一下这个不忠的奴才。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与陈奉的种种恶性区分开来，平息朝廷以及天下百姓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杀鸡给猴看，借此，警告他的那些敛财官宦。

于是，陈奉一回到京城，明神宗就把他囚禁了起来，并对他施以酷刑杀死。罪大恶极的陈奉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对陈奉盗自己祖宗陵墓的行为予以默许的明神宗，也没能在死后安然地长眠于地下。连自己的祖坟都敢挖的皇帝实在是太昏聩了！

乾隆帝偷梁换柱

盗墓与一朝之君联系到一块，或许不少人都可能觉得意外，这怎么可能呢？但为了一己之利、出于坏人风水的考虑，皇帝也未能免俗，做起偷盗勾当，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并不缺少。著名的乾隆皇帝，便干过这种事情。

乾隆，名弘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雍正死后继承皇位，改元乾隆，为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继位时，清王朝已经过康熙、雍正两

代70多年的治理，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稳定，百姓安康。乾隆励精图治，促进了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绝唱出现了，此即“康乾盛世”。乾隆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为中国帝王中实际在位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是一位文治武功卓绝的帝王，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推向最后的顶峰。乾隆一生自负，认为自己功勋卓著，无人能及，晚年自号“十全老人”。

这位十全老人凡事追求十全十美，修建陵墓也不例外。他的陵寝——裕陵规模宏大，气势雄浑，设计精巧，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在陵墓材料的选择方面，乾隆也要求做到最好。当时清朝正处于巅峰时期，国力强盛，国库充盈，乾隆不惜巨资，遍寻天下优质木材作为自己陵墓地面建筑的材料。这些木材来自全国各地，不远万里送到北京。然而，乾隆最中意的却是明十三陵中的建筑用材。

在中国盗墓史上，乾隆该算是权力最大、最尊贵的一位盗墓者了，其盗墓动机亦堪称一奇，据说仅是为了盗取陵中的楠木大柱——偷梁换柱。

最初，乾隆皇帝将目光投向了明成祖朱棣的长陵。长陵祾恩殿的大柱用材是金丝楠木。金丝楠木是木材中的精品，可谓大器晚成，质地坚硬，木材表面光泽，不必髹（xiū）漆，气味芳香怡人，蚊虫不近，历朝历代都以其为建材中的极品。明长陵祾恩殿是中国最大的金丝楠木殿堂，这使得一心渴求精美材料的乾隆大为动心。刘墉、纪晓岚等人知道乾隆看上了明成祖朱棣长陵祾恩殿上的金丝楠木大柱后，遂竭力劝阻，方得保住了长陵。但乾隆仍不死心，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

在一些大臣的谋划下，乾隆皇帝最终还是找到了借口，那就是修缮明十三陵。

负责这项工程的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金简和户部侍郎曹文埴。明十三陵的修建工程浩大，建筑结构合理，尤其是永陵，虽然经历了数百年风雨，仍然风采如旧，只有局部需要修补。然而，修葺工程负责人却深谙乾隆的意图，以金丝楠木采伐殆尽为由，上表奏请长陵、永陵的地面建筑部分“拆大改小”，即将永陵的部分宫门、享殿拆除，缩小规模。这样一来，不仅使永陵焕然一新，还能剩余很多木料，而这剩下的木料自然被乾隆据为己有。据《大明会典》记载，永陵祾恩殿原为7间，左右配殿各9间，祾恩门面阔5间。乾隆五十年，拆后重建的祾恩殿变为面阔5间，少了2间，祾恩门也减为面阔3间。定陵祾恩殿面阔及间量也缩小了，柱网分布也与旧制不同。

民间广为流传“乾隆盗木”的故事，就是这次修陵过程中发生的。

就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了出去。皇帝盗陵的事件实属骇人听闻，最后，乾隆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竟然又导演了一出将自己发配江南的闹剧，不仅给臣子们一个交代，也为市井之间增添了不少谈资。

皇帝都是窃国“大盗”，清朝皇帝确实也喜欢“做贼”。自顺治皇帝始，多有拆毁明朝建筑建陵修殿的记录，据说都是因为看上了明朝建筑所用的优质材料。但敢“盗陵”的，只有乾隆。乾隆的裕陵后来也遭到盗掘，受尽凌辱，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

第十四章　民国近代的盗墓破坏
——盗墓风潮第六波

六骏被盗现裂痕

如果把昭陵比做一顶美轮美奂的皇冠，那么昭陵六骏浮雕就是这顶皇冠上面最耀眼的一颗宝石。这些浮雕原来置放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与历代一些帝陵陈陈相因的一般性的石人石马布局不同，这是为了纪念唐太宗开国的功勋所立的。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大唐帝业时所乘过的六匹骏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在削平群雄而纵横驰骋的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性命。它们的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特勒骠”、“青骓（zhuī）”和“什伐赤”。相传六骏诸形出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由技艺高超的名匠依照图形一一刻在青石屏上，每件石屏刻一匹马。石屏高约2.5米，宽3米，左上角或右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不过，如今字迹已无从辨认了。

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出于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诏令画家阎立本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后由工艺家刻在石屏上，置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唐太宗还为每一匹战马赐名作诗，记述它们的战功和风采。

昭陵六骏采用高浮雕表现手法雕刻而成，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人马侧面像凿入巨石达15厘米之深。因年代久远，平坦背景上是否还有图案已无法辨认了。石雕四周由凸起高边围护。护边表面和石雕侧面上的祥云花枝纹仍依稀可辨。昭陵六骏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中华文物的稀世珍宝，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前无古人”。

从文献中得知，排列在东侧第一位的为“特勒骠”，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特勒骠”是一匹毛色黄里泛白的战马。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史载：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白蹄乌”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为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据《全唐文》（卷十）收录的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马“白蹄乌”是武德元年（618年）九月至冬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其势不可挡的造型再现了当年浅水原大战之时，该马势若凌云、所向披靡的无畏气概。“飒露紫”是石刻六骏中唯一一匹兼刻人物图像的战马，艺术家们紧紧抓住该马胸部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其拔箭时欲拔不忍的瞬间动作，真实地表现出一种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青骓”和“什伐赤”都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势力在虎牢关大战时的坐骑，二马各中五箭，一役俱损。“拳毛騧”是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tà）时的战马，该马身中九箭而亡，充分显示了李世民连年征战、浴血疆场的艰辛。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jí），氛埃廓清。”把它比做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照“中国古代以右为上，左为下”的传统礼仪依次排列，昭陵祭坛西侧（即右侧）为上，首位便是丘行恭为之拔箭的“飒露紫”，“拳毛騧”位居第二，然后是“白蹄乌”；祭坛东侧（即左侧）依次是“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

大概由于六骏的战斗经历，再加上石雕艺术的魅力，这组浮雕在民间的传说中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据说安史之乱时，唐军和安禄山手下将领崔干佑在潼关展开大战。战斗中，叛军的一队白旗军冲杀悍勇，攻势凌厉，唐军一时难以招架，眼看要败下阵来。突然黄旗招展，不知从何处杀出一队人马冲向白旗军。两个回合的恶战下来，黄旗军杀得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因寡不敌众，被白旗军团团围在核心，难以突围。就在这危急之时，忽然阴云四起，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转眼间黄旗军踪影全无，惊得叛军呆若木鸡，仓皇倒退了几十里。后来，昭陵的守陵官员奏报朝廷说，潼关大战那天，昭陵前的六骏个个汗湿欲滴。人们纷纷传说：那队勇猛神奇的黄旗军就是由昭

陵六骏和墓前的石人石马组成的。

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最为出彩，诞生的背景和故事最为奇特，千年以来演变成广为流传的神话，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珍贵的稀世国宝。

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拔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特别命人将丘行恭的英雄形象雕刻在昭陵上。

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拔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是一匹毛做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

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后来也被李世民击溃败走。

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騧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时至今日，我们却只能看见经过修整和复制以后的六骏了。原来，1912～1914年，北京的一个古董商勾结陕西军阀，把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打下辗转卖到美国（现均陈列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余四骏被复原，被盗之两骏也被复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昭陵六骏了。就这样，从1914年5月至今90多年来，“两骏”一直流失在海外，国宝六骏天各一方。与留在西安的“四骏”相比，“两骏”身上似乎有更多岁月和时代的痕迹——现在留在这两块巨石浮雕上的纵横裂痕是当年为搬运方便，凿碎石雕而留下来的。战马和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细致到马

儿腿毛清晰可见的惊人工艺，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13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而石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裂痕和无法弥补的残缺，则又向人们昭示100年前盗窃与掠夺的罪恶。

古董商又勾通美国商人将另外四骏（即“特勒骠”、“青骓”、“白蹄乌”、“什伐赤”）打成块企图装箱盗卖运往国外，后被爱国民众发现追回。在2002年8月至12月的昭陵北司马门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清理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六骏中“青骓”的后腿关节浮雕残块和“特勒骠”中的蹄腕浮雕残块，使这两件稀世珍宝的部分残缺得以弥补。同时还确定了六骏坐落的原始位置并发现了六骏的坐落底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昭陵六骏的“四骏”被移交给西安碑林博物馆永久收藏。历经磨难，“四骏”在辗转盗运中马蹄断裂，造成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重新嵌合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骏”，在向人们展示中国的高超雕刻艺术的同时，也带着斑斑的历史伤痕，向世人诉说着它们遭受的磨难和至今仍分离的痛苦。

而历史上的昭陵也是屡遭侵扰，地宫之中的其他绝世宝物是不是也像昭陵六骏一样，已经惨遭厄运？这座费尽心思、倾一国之力建成的帝王之陵，还留有多少当年的印记，供后人去瞻仰和追思呢？或许这一切只有待正式发掘昭陵的那一天，方能揭晓答案了。

土匪夜盗万娘坟

一个人，无论他生前的地位如何显赫，如何睿智英明，如何张扬跋扈，都无法预知他的身后事。百年之后，也许他的美名能够流芳百世，也许他的恶名传世千年。而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只要是葬于墓穴之内，就有可能招来盗墓贼的关注，古代帝王之家的陵墓更是特别受盗墓贼们的青睐。本节所说的，是位于北京昌平城区西北7公里处明宪宗的爱妃万贵妃的陵墓。

万贵妃名叫万贞儿，是明朝著名的妃嫔，4岁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孙太后（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祖母）的宫女。成人之后，被皇太子朱见深看中，二人暗中往来，有了男女私情。万贞儿对朱见深的服侍很是贴心，让朱见深儿时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随着朱见深年龄的增长，他竟对这个贴心的宫女产生了感情。于是，在朱见深即位之前，万贞儿就已经成为了太子妃。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娇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

朱见深的宠爱。万氏恃专宠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就连堂堂皇后也惧其三分。万氏一生喜欢玩鹰，喜欢鹰啄活物的血腥味，为讨其欢喜，皇帝下诏向全国各地摊派征鹰任务，一时万氏的深宫中处处鹰迹。由于万氏侍奉有方，皇帝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而借机将她废掉，立万氏为皇后。后因群臣竭力劝谏未遂。

万氏从35岁为妃到59岁去世，宠冠六宫无人能及。她比皇帝大整整17岁，却在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的后宫之中受宠一生，可谓离奇。万贵妃能够得到明宪宗一生的宠幸，也应该知足了。她虽然由于群臣的反对没有当上皇后，但她的权力绝对比皇后要大，也要比皇后幸福得多。但她偏偏还不知足，竟然凭着皇上对她的宠爱公然向皇后挑衅。一次，明宪宗的正宫吴皇后跟万贵妃发生了口角。万贵妃在明宪宗面前对吴皇后大肆诽谤。明宪宗对万贵妃的宠爱使他完全相信万贵妃的话，竟不对事情加以调查就把吴皇后打入了冷宫。吴皇后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此以后，皇宫内再也没有人敢惹万贵妃了，就连后来的王皇后为了保住后位，都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巴结万贵妃。

明宪宗为什么会纳一个年龄可以做自己长辈的女子为妃呢？万贵妃中年妇人之貌，他为何专宠这个万贞儿呢？这还要从明宪宗坎坷的少年时代说起。

明宪宗朱见深是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两岁被立为太子，可这时的太子非但没有半分储君的尊荣，反而惶惶不可终日，形同囚犯，因为他的父亲明英宗已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俘虏，他的叔叔景泰皇帝登上皇位。很快，景泰皇帝废朱见深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贵为皇子，朱见深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周围人也都对他冷淡、排斥，只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这个明日黄花的废太子，这个人就是自朱见深为太子时就照顾他的宫女万氏，那一年，朱见深两岁，万氏19岁。万氏对年幼的朱见深不离不弃，同甘共苦、风雨相携走过8年艰难岁月。1457年，明英宗从景泰皇帝手中重新夺回皇位，朱见深的人生才峰回路转地再次被立为太子。

1465年，18岁的朱见深登基为皇帝，并立即封35岁徐娘半老的万氏为妃。不久，万氏生下一个儿子，谁知未及满月就夭折了。此后，万氏再没能生育。一心想成为皇后的万氏丧心病狂，她因此不愿看到后宫中的女子生孩子，便想尽一切办法霸占明宪宗，竟然对怀上龙嗣的其他妃嫔痛下毒手。后宫之中凡是怀孕的妃嫔都莫名流产。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宪宗也听取了大臣的意见，但是仍不见有子嗣出生。除了明宪宗之外，所有人都知道是万贵妃所

为，但奈何万氏不但宠冠六宫，而且威行朝野，无人敢向明宪宗告发。

一次，明宪宗在宫里游玩，见宫女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了。宠冠后宫的万氏听闻这个消息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然而，并非人人都是万氏般的冷血之人。宫女见纪氏生性柔弱，心生恻隐，便谎报说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纪氏就是这样在万贵妃的阴影下，在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曾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就这样朱祐樘一直被偷偷地养到6岁。

一天，张敏为明宪宗梳头时，明宪宗叹息说：“朕老了，竟尚无子嗣！”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有子。”明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明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导致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给儿子起名祐樘。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有直接关系。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官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即使这样，万氏仍不死心。有一次，万氏请太子去吃饭，周太后叮嘱道：“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因此太子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当宫人捧上汤羹时，年幼的太子说：“我怀疑此中有毒。”万氏听了这句话后十分气恼。嚷道：“这孩子才几岁就如此，他日必加害于我！”此后，她一改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妃嫔们怀孕也能顺利出生，皇子渐渐多起来。万贵妃想以此要挟皇帝另立储君，废掉皇太子。宪宗对万贵妃一向言听计从，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但是朝中众臣极力反对。而此时泰山一带突然出现地震，占卜者指地震的原因是上天警示如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动乱，宪宗心中恐惧，于是下令不准再议废太子之事。

万贵妃虽然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却偏偏十分幸运，死在了明宪宗的前面。成化二十三年，已经58岁的万贵妃一次因小事怒打宫女，哪知因身体肥胖，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明宪宗真是一位痴情的男子，在位23年，始终如一地专宠万贵

妃。万贵妃死后，明宪宗十分伤心，哭得涕泪皆流。他不仅违反祖制为万贵妃辍朝七日，还打破明朝的丧葬制度，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执意把万贵妃葬在了皇帝的陵园内。除殉葬者之外，万贵妃是第一个进入十三陵陵区的妃子。他还为爱妃修建了一座十分奢华的陵墓，并陪葬了无数的稀世珍宝，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万娘坟”。

万贵妃死后，明宪宗由于思念万贵妃，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也在这一年去世了，年仅41岁。

万娘坟坐西北朝东南，整体布局为前方后圆。方形院落面宽197.8米，进深138.5米。园内都有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享殿。享殿和园墙飞檐翘瓦、雕壁琉璃，煞是富丽堂皇。封土呈覆斗状，直径14米。园寝呈人头状靶形。前寝呈方形，后部两边内收呈半圆形，与东西二井略异。外墙、门楼保存基本完好。门三重，正门一道，上建有门楼，通高5.35米，宽3.23米，进深2.1米。两侧距正门6.15米处各设一掖门，门宽2.77米。前寝南北长138.5米，东西宽106.7米，园墙以大城砖砌成，顶部平砌四层出檐，檐外挂黄琉璃瓦滴水，墙高4米，厚1米。园墙围绕享殿及两庑建有内墙，长71.2米，宽47.58米，墙高2.35米，厚0.75米。前后设门。重门宽16米，进深3.6米（重门可能为三道）。享殿柱础石保存完好，两庞基石不存，已垦为农田。第三重门通园寝后半部，门一道，宽2.88米。园寝后部形如二井，宽89米，通长90.8米。距门6.35米处立照壁一座，宽5.1米，厚0.5米，高2.1米。下以绿琉璃砖砌作束腰形座，上部为琉璃砖砌出屋檐，中间以三层方砖嵌心。其后立无字碑一通，高2.2米，宽0.93米，厚0.27米，碑额雕出云凤纹。碑座束腰形，前后两面各雕二凤，中间为一断字云，束腰部分亦雕二凤，两侧各一云凤纹。其后置石供案，长2.23米，宽1.05米，大部分已陷入地内，五供已失。再后为坟堆，残高2.5米，直径约14米。后部园墙高3.5米，厚1米，下部两侧以大城砖垒砌，中间夹石块灰泥，高1米至1.35米，上部用山石垒砌，顶部平砌三层砖出檐，脊中间立一横砖，两边填碎砖抹灰泥作成屋脊形。坟园内外墙墙皮均抹1厘米厚的灰泥，再刷以红粉。

明代设官军守卫，有官员管理。清代改为坟户看守后，看坟人及家眷即住在园寝的第一进院落内，经世代繁衍，形成村落。后因院内狭小，清末民初就将民居扩建到园寝院外，形成现在的村落格局。

然而，无论万贵妃生前有多么受宠，身份地位又是如何的荣耀，可是她一定没有想到死后会落得被人挖坟暴尸的下场。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

生。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报应。

斗鸡台古墓遭掘

罪恶的盗墓活动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盗墓活动跨越了几千年，延续到了近代。

清朝末年，政局动荡，世道非常混乱。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全国太平下来，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集团反而以靠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相互倾轧，战乱频仍，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当时，就连活人的安全都在时时受着饥饿、寒冷、瘟疫、战争的危害而不能自保，谁还能顾及到那些在陵墓中的死人的安危。这些各自称霸一方的军阀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国民政府无力支付这些军队的军饷，自然也无法约束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任何一个军阀要想扩大实力、称雄一方，就只能靠自己。筹集军饷更成为军阀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大小军阀为了筹集军饷，扩充实力，并使自己发财致富可谓费尽了脑筋，真是挖空心思，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其敛财之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所想的这些办法中，最为省心、省时、省力的一个就是盗墓了。毕竟打死人的主意要比直接从活人身上搜刮容易得多。况且，当时社会经济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从活人身上确实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这一时期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斗鸡台盗宝案。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党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党玉琨。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因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见过不少文物，并经过一些古董商的点拨，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尤其善于识别铜器。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留下的。

后来，党玉琨发现军阀们都有着强大的权力和经济实力，便决定从戎。最初，他投靠的是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党玉琨从一个小兵做起，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很快升任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

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此时党玉琨在凤翔的统治并不稳固，被他所打败的那些军队经常向他反扑，他还面临着更大的军阀将他兼并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了扩张势力和巩固地位，党玉琨开始疯狂敛财。但是无论他想尽何种办法，所得的财物都十分有限，令他伤透了脑筋。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当然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搜罗文物，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经营人脉、换取资金购买枪械，为他独霸一方捞取资本。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biàn）、自己的同乡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志贤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大洋都是平常事。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来了。为探明虚实，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村进行勘察。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一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后开始，盗宝指挥部就设在杨万胜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及柴官长、张福、白寿才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

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挖出来的土把偌大的一条深沟也填平了。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zhì）。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百姓，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当年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唯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zhào）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yǒu）（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盖和提梁）。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孽，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万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宋哲元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党玉琨盗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敛财。因他个人对文物的特殊癖好——只要铜器而不要其他文物，因此，民工在劳动中一旦挖到铜器就留下，而当遇到陶器、石器时，不是随手打碎就是顺手扔掉。这些挖宝人无偿地替党玉琨挖宝，还经常遭受监工的严厉打骂，常常心怀不满，因而在挖宝时不但不小心，有时反而还故意破坏，以此泄愤，导致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无端遭受严重破坏。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

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gōng）（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还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欷歔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琨（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

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500多件文物中，有饪（rèn）食器70余件，计有鼎、簋、瓦、豆；酒器39件，计有觥、彝、罍、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计有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其他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垂帘女皇惨遭劫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让人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民国时期，打起盗墓主意的军阀不止党玉琨一人，另一个军阀孙殿英与其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殿英在我国历史上本不值得一提，但是自从他盗了清东陵之后，他的“地位”就飞速上升，成为了臭名昭著、人人痛恨的民族败类。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生于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使之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出了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胆量，开始贩毒。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遂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他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地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

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土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作为张宗昌的羽翼，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

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

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面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虽然位至将军，但大字不识一个；战功没有，赌技却超群。盗墓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此后被讥为“盗墓将军”。

原来，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自清朝灭亡后，这些陵墓就再也没有正规军队看管了，曾多次发生过盗墓事件。1921年，直隶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买陵树为名，派兵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土著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8年6月，土匪出身的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清东陵宝藏垂涎，趁清东陵附近没有守兵便大肆洗劫一番，然后逃之夭夭。

孙殿英派师长谭温江去清东陵做了一番详细的探察，决定先从慈禧太后的陵墓定东陵开始盗掘。就这样，一起震撼中外的东陵盗宝案就这样悄悄地准备着。在军事上表现平平的孙殿英，一夜之间震惊了整个世界。

但是盗墓过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开赴东陵的是孙殿英的心腹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虽然，士兵们挥舞着铁锹、斧子等工具埋头苦干，挥汗如雨，可是都只能挖到陵墓的皮毛。他们挖了几米深后，就再也挖不下去了，因为里面全都是坚硬的大石头。无奈之下，谭温江只得命令士兵们不停地变换挖掘地点。这也无济于事，整整挖了两天两夜，定东陵都快被挖成马蜂窝了，还是找不到陵墓的入口。孙殿英十分着急，就派人把当地的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

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可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烫。老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孙殿英的折磨，就说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叫苏必脱林的曾参加过修筑陵墓，兴许他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个苏必脱林又是怎么逃离虎口，独自生存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

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当时苏必脱林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苏必脱林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孙殿英从老旗人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便迫不及待地去找苏必脱林。深更半夜，苏必脱林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地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苏必脱林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苏必脱林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苏必脱林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苏必脱林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到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但是老奸巨猾的孙殿英立刻就想出了一个对付苏必脱林的办法，只见他大手一挥，说：“你不说，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去，把他儿子给我抓来，今天我就当着他的面扒了他宝贝儿子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苏必脱林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

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霎时一股股阴霉气“嗖嗖”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于是孙殿英下令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逃跑就打死谁。

不久，官兵们见陵墓已经打开，蜂拥着闯了进去。

这些士兵已经半年没有发过军饷了，见到陵墓里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就抢了起来。他们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这些并没有让他们满足，因为他们知道，更多更好的宝贝还没到手呢，这些宝贝就在慈禧的棺椁里。利益的诱惑驱散了他们对死尸的恐惧心理，他们毫不犹豫地用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材打开。只见棺材里金碧辉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稀世珍宝。士兵们你争我抢，一会儿就把棺内的珍宝劫掠一空。

在他们疯狂的抢劫中，已经丝毫不顾及眼前的尸体就是那个曾经让全中国人都闻之色变的慈禧太后了。他们把慈禧尸骸扯出棺外，因争抢宝物太过激烈，慈禧的尸首被扯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他们抢完棺椁内的宝物后，又将棺椁移开，把棺椁底下金井中的财宝也洗劫一空。

清帝王陵——中国封建帝王陵的最后绝唱，这些文物宝库本可免遭劫难、完好保留给后代子孙的，竟然让一介武夫给毁了。从民国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孙殿英恶行传出后，举国震惊，社会各界强烈谴责，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为逃脱罪行，孙殿英“花钱消灾”，用盗得的珠宝上下打点——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慈禧口中的夜明珠以及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分别送给了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另一把宝剑送给了何应钦；阎锡山则得到了50万两黄金。孔祥熙、戴笠等关键人物也都分别得了孙殿英行贿的宝物。

由于政府的腐败，四处行贿的孙殿英最终逍遥法外，震惊一时的清东陵被盗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孙殿英是个十足的兵痞，毫无道德节气可言。抗日战争期间，他到处投机倒把，不但在驻军附近设立招待所招待日本人，最可耻的是1943年4月，孙殿英被日军包围后竟然不战而降，堂而皇之地当了汉奸，其部变身“和平救国军”，他任伪军副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先遣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但作恶多端的孙殿英未得好死，1947年解放战争中，孙殿英在河南汤阴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一年后病死于狱中，也许真是应了盗墓者不得好死的说法。

十全老人墓不保

就在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由于丁綍庭部在挖掘康熙帝的景陵时发现积水，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綍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几经周折，终于打开了地宫。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以及名帖字画、古书纸扇……均被抢的抢、扔的扔。尤其可叹的是，乾隆这位活了89岁的皇帝倾其一生搜集而来的一卷卷旷世罕见的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当做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乾隆是我国历史上被人广为称颂的皇帝之一。在他60年的统治中，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集大成的时期。君主专制的程度，无论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达到了顶点。

但是，在他统治的中期以后，奢侈之风开始蔓延开来。乾隆皇帝对自己前半生取得的成就十分骄傲和自豪。随着心态的变化，他开始好大喜功起来，虚荣心日增。他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乾隆的这种好大喜功及虚荣心不仅体现在他的众多诗作中、辉煌的陵园上，还体现在他的陵墓上。

乾隆建陵时正值国家鼎盛、国库丰盈之际，遂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其木材来自川、广、云、贵及东北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石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江苏专门烧造，瓦料由京西琉璃厂运送，土料也是于数十里外选择来的含沙量合适的“客土”。裕陵占地面积为46.2万平方米，工程进展数十年，耗银200多万两。

裕陵的规模稍逊于顺治皇帝的孝陵，但建筑的壮美、工艺的精湛在清代诸陵中可谓是首屈一指。裕陵建有神道、神功圣德碑亭、华表、神路桥、牌楼门、神道碑亭、神厨库、朝房、班房、下马碑。隆恩门内建有东配殿、西配殿、隆恩殿、焚帛炉、玉带桥。陵寝门内建有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宫。所有这些建筑都不同凡响，尤其是地宫与隆恩殿，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裕陵是清东陵里耗资最多、耗时最长的陵墓，光地宫内部雕刻梵文、咒语一项就花费了3万两白银。可以说极尽奢靡。乾隆的陵墓无

论是在建筑规模还是在建筑艺术上都有很多独到之处。

裕陵是在大清国实力最为强盛时营建的，其豪华程度非前后世之帝王可比。在那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在科学技术上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为繁荣、最为富裕的国家。因此，裕陵的修建和地宫中的陪葬也极尽奢华。

据现在考古所知，裕陵的地宫在已出土的清代皇陵中最为宏伟，它进深54公尺，面积337平方公尺，由三间长方形的券堂——明堂、穿堂、金堂串连成“主”字形。乾隆皇帝的棺椁便放置在最里侧的金堂，两旁还有附葬的二后、三妃灵柩。地宫内四壁与券顶皆雕满各种佛像、经文和装饰图案，雕刻刀法明快，线条细腻流畅，以明堂门洞两侧浮雕的四大天王像和券顶的五方佛像最具代表性。

孙殿英率领着他的部队对慈禧的定东陵大肆劫掠时，并没有忘了乾隆的裕陵。他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柴云升去盗掘裕陵。柴云升接到这个任务后，十分兴奋，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迅速向裕陵挺进了。

柴云升本人是行伍出身，肚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墨水，对乾隆陵墓的相关知识就更加缺乏了。他的部队一开进陵寝，便像一群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四处乱窜。他们的挖掘毫无章法可言，短短的一天时间，这位伟大皇帝的陵墓表面就已经面目全非了。柴云升在对清裕陵的盗掘中，遇到了孙殿英盗掘定东陵一样的问题，就是无论怎样也找不到陵墓地宫的入口。

柴云升令自己手下最得意的旅长韩大宝，率部挖掘陵墓宝顶的最前方，也就是明楼的后方，令三个团长分别率部挖掘宝顶的左、右和上端，企图以四面开花的方式打通地宫。与此同时，他还当场下令，“只要挖出地下的一块窑砖，赏一个袁大头（银元）”。所有的官兵听说挖出一块砖就能换来一块银元，于是个个争先，人人望赏，镐头铁锨又狂飞乱舞起来。

直到第二天接近中午，所有的官兵都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躺在地上再也举不起手中的镐头、铁锹了，但依然没有什么进展。旅长韩大保在绝望中蓦地想起，要到谭温江部和丁綍庭部察看一下这兄弟部队的进展情况。当他带着极为沮丧的心情来到慈禧陵寝前，找到谭温江，又在谭的亲自带领下，穿过设在陵寝内外的三道防线。进入陵寝内的地宫入口时，韩大保的心猛地一震，接着两眼放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地宫入口——这时，谭温江部不但找到了地宫入口，而且已用粗重的树干撞开了地宫中第一道石门，韩大保听了谭温江的介绍，恍然大悟，立即返回乾隆的陵寝，重新行动起来。

有了寻找慈禧陵的借鉴作用，柴云升指挥手下官兵马上朝着陵园内一座明楼前的琉璃影壁下挖掘起来。这一次果然没有让柴云升失望，兵士们垂直向下挖了四丈多深之后，果然发现了一面金刚墙壁。柴云升大喜过望，连忙命令士兵继续向下挖掘。士兵们见陵墓地宫终于有了痕迹，身上的力气也倍增。沿着这道金刚墙壁又挖了一丈多深，兵士们发现了一段汉白玉雕阳纹经咒的金刚墙。这段金刚墙与之前的墙壁有着明显的不同。沿着这段特殊的墙壁四周挖了一会儿，果然发现了一个二尺见方的洞，这就是乾隆裕陵地宫的入口。这时已是1928年7月9日的深夜。

柴云升这个人十分谨慎，他见地宫入口已经找到，就只留了一小部分人守在洞口，其他的士兵都在陵墓的周围进行警戒。深入地宫、开棺取宝则交由韩大保一人全权负责。

韩大保接到这个任务后简直是受宠若惊。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顾不得许多，只想尽快取得地宫中的宝物，便带着几名胆大的士兵深入地宫去考察。韩大保也十分狡猾，他虽然急于想知道陵墓里面的样子，可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让那几个士兵走在前面，自己则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以便遇到什么不测就及时撤离。韩大保让两名胆大的亲兵先进去察看一下情况。那两个士兵求财心切，也顾不得什么安全不安全了，举着火把就往前走去，刚走几步就迈入了一个向下的斜坡墓道。这两个士兵当然不知道最先接触的是一个斜坡甬道，这条甬道有四五丈长，同慈禧地宫一样，是专门为滑放墓中主人的棺椁而特设的。当棺椁送入地宫入口后，在斜坡甬道上铺放一根根滚木，棺椁压在滚木之上，并借助其下滚的力量，轻轻滑入地宫的第一道石门处，然后再慢慢移于后室。更令这两个“傻大胆”难以想象的是，此时的乾隆地宫已渗满了四五尺深的地下水。这些水由于久积不散，在和棺木、尸体混合后，形成了一种霉变后的毒菌散布于整个地宫之中，若过量吸入这种毒菌，便会置人于死地。

走着走着，只见前面的几点火光随着几声“扑通、扑通”的声音都相继灭了，接着传来了挣扎的声音。

“救命啊！救命啊！”

“我不会水，快来救命啊！”

韩大保不敢往前走，只听着里面呼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最后都沉寂了下来，墓穴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韩大保看着前面黑洞洞的墓道就像一张吃人的大嘴一样，他再也不敢前进了，慌张地跑了出来。

原来，那两名士兵加快速度向前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墓道的变

化。呈斜坡型的墓道延续了一段之后就断了，继而相接的是几级高大的台阶。两个士兵忽略了危险，相继踩空了台阶，都掉了下去。台阶底下是四五尺深充满腐臭之气的地下水。两个士兵都不通水性，因此只挣扎了几下就相继毙命了。

一个小时后，韩大保等人发现地宫内的亲兵仍无动静，便又悄悄凑上前来商量对策。韩大保决定仿照慈禧陵的办法，动用炸药炸崩地宫入口，以让其尽可能地扩大，这样上下活动的范围也就大了许多。

主意已定，韩大保立即让一个团长带领手下弟兄运来炸药，并在地宫入口处又下挖了一个3米深的大洞，将炸药埋了进去。由于颛孙子瑜的工兵团此时都集中在慈禧陵，且颛孙子瑜本人又在地宫中正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乾隆裕陵盗掘事宜，故韩大保干脆让步兵团的弟兄实施引爆。步兵毕竟不是工兵，在不熟悉爆炸技术的情况下，强行引爆，其结果导致炸药不是向下和向左右两边爆炸，而是在惊天动地的轰鸣中，地宫入口像民间燃放的“二踢脚”爆竹一样，强大的威力凝结成一道扇形的火柱，裹挟着碎石乱砾直冲天幕，崩飞的碎石在漆黑的夜幕中旋转着四处坠落。周围村庄百姓家中的门窗也被震得“哗哗”乱响，并有许多人被震醒后慌忙从被窝里钻出来，跑到院子中间眼望东陵惊恐万状，大骇不已——几个月后，当东陵盗案事发后，这一声爆炸，成为四方百姓向官府和新闻界提供的间接证据。

待硝烟散尽后，韩大保等陆续向地宫入口围来。尽管火药的威力无比强大，但收效却不明显，整个金刚墙只炸裂了几道缝隙，并未炸出预想中的几个窟窿。韩大保不敢再行炸崩，只好命手下弟兄动用镐锹，将金刚墙的砖一一撬下、搬开，直至出现了一个足以站着进入地宫的大口子后，才停止动作。

韩大保又选了两名士兵，命令他们进去察看动静。这两名士兵虽然胆怯，但也不敢违抗军命，只得壮着胆子接受命令。为了防身，他们俩不但装备了照明手电、手枪和手雷，还在每个人的腰里系上了一根长长的安全绳通到外面。几名健壮的士兵紧紧地握住安全绳，以便进去的人发生什么不测时，好随时把他们拉上来。一切准备就绪，两位士兵沿着斜坡甬道渐渐下滑，发现了地宫腥臭的黑水以及在黑水中飘浮着的两位“傻大胆”的尸体。两位兵士见状，大吃一惊，迅速转身，呼喊着向外退去。由于外面已拽紧了绳索，他们未费多大力气就连爬带跑地窜出了地宫。

两位士兵喘着粗气，将地宫中的情况向韩大保做了报告。韩大保听后嘴里边喊着倒霉，边向师长柴云升做了汇报。

这下可把柴云升急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陵墓打开，却又

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一脸愁云的他向部下询问解决的办法。

“师长不用发愁，听说现在洋人发明了一种新机器，能毫不费力地把水从里面抽上来，那样我们就可以安全地进去了。我听说天津就有卖的，离这里很近。师长可以马上派人把机器买回来。”

在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最后两人决定连夜派人赴天津购买消防用抽水机，同时将情况报告孙殿英。

天刚刚亮，抽水机就买回来了。柴云升马上命令士兵安装好抽水机对地宫进行抽水。在他们看来，这种先进的技术设备就是神奇。过了短短两个时辰，地宫内的水就已经快被抽干了。又过了一个时辰，地宫内的水就完全被抽了上来。

韩大保见地宫里已经没有了水，就马上派兵下去探查。下去的士兵很快就传来了好消息，里面已经一点水都没有了，还发现了墓道内的一道石门。

柴云升、韩大保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他们知道，在修建大行墓室时，一般都在棺椁的附近设几道石门作为最后屏障。墓道内有石门出现，就证明他们离乾隆的棺椁已经十分近了。他们马上派了大批士兵下去打开石门，他们自己也跟在后面压阵。

只见高大厚重的石门分成东西两扇紧紧关闭着。东扇石门之上雕刻着代表大智的文殊菩萨，菩萨的右手高举一柄宝剑，据说这柄宝剑能斩断人间的一切烦恼；菩萨左手承托佛家经卷，可使众生增长智慧。西扇雕刻着代表大力的大势至菩萨，右手持降魔杵能驱散邪恶，左手执法铃可传播法音。柴云升等人当然不懂得这些，他们开始以为石门上的雕刻是什么机关暗器，但经过反复察看后，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便放心地一挥手，喊道：“给我撞！”于是，兵士们运足了力气，抬着沉重的树干，踩着黑水烂泥，呼呼啦啦地向石门撞去。只反复三次，第一道石门的自来石被撞断，大门轰然洞开。门上那两位挥剑弄杵（chǔ）的佛法无边的菩萨，眼睁睁地看着这群疯狂的官兵冲了进去而毫无办法。

接着，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撞开了后面遇到的四道石门。士兵们以为宝藏就在眼前了，都异常兴奋，兴冲冲地来到第五道石门前。这道石门看上去似乎与前面四道没有什么不同，却让群情激奋的士兵消沉了下来。原来，无论士兵们使多么大的劲，甚至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石门仍是纹丝不动。

韩大保甚觉意外，挥手让满头大汗的士兵们停止行动，自己来到石门前详细察看起来。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道石门看上去跟前

三道没有什么两样，怎么就是撞击不开呢，莫不是乾隆皇帝的灵魂在冥冥之中作怪？或者是门上的这两位菩萨在起作用？韩大保在门前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要领。最后，他牙关一咬，对着石门愤愤地说道：“不管是鬼还是妖，只要落到我韩某人的手中，就休想作怪脱逃！哼，既然不能把它打开，就把它用炸药炸开，看看是石头厉害还是炸药厉害。”

炸药安放好后，所有的人又都退了出去。随着又一声来自地下的闷响，第五道门终于被打开了。硝烟散尽之后，柴云升、韩大保马上又进入了地宫，他们以为这次马上就能见到宝藏。韩大保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亲自点了从河南老家带出的20名“子弟兵”，携带各种工具进入地宫，准备搜寻财宝。可当他们来到石门跟前时，发现三具棺椁被压在了重达三吨的石门之下，根本无法劈砸。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由于地宫中积水太多，原本放在后室“宝床”上的棺椁，像船一样浮了起来。当外边动用抽水机抽水时，这些飘浮在水面上的“船”，便随着水的流动和吸力离开了“宝床”滑到石门背后，并将石门紧紧挤住。由此，韩大保手下的弟兄才无法用树干撞开石门。当石门被炸倒后，自然地将这三具挤上来的棺椁压住而让盗墓者一时无从下手了。

面对着被巨石覆盖的棺椁，柴云升再一次犯起了难。在这关键时刻，还是韩大保聪明。他对这几具棺椁详细查看了一番之后，便决定直接用斧头把棺椁的前面砍开。几十名士兵纷纷举起利刀快斧向棺椁劈将过来。这招很奏效，一顿“劈哩啪啦”后，三具棺椁都被打开了。士兵们蜂拥而上，一会儿就把棺椁内的财宝洗劫一空。棺椁内有一具女尸，虽然经过了几百年仍然完好无损，像活着一样。士兵们为了争抢她身上的陪葬品，已经顾不得什么忌讳不忌讳了，将她拖出后摘冠拔发，脱衣搜身。一顿疯狂的抢劫之后，这具一丝不挂的女尸就被只顾抢夺财宝的士兵扔进了污泥之中，几乎被踩成了肉酱。就连乾隆皇帝这位伟大君王的尸骨也没能逃脱噩运，被士兵们扯得四分五裂，扔得到处都是。

乾隆皇帝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费尽心机建造的奢华的陵墓竟会毁在这样一群无耻的盗墓贼手中。再牢固的石门，再多的石门，观音菩萨、四大天王在炸药面前也只能是束手无策。乾隆生前虽然富贵寿考，死后所遭浩劫，比慈禧太后更为惨烈。不仅财宝荡然无存，而且尸骨也受到玷污。根据善后实地查勘，骸骨狼藉墓道内外，晕珠残玉俯拾即是，有的尸骨散不成形，有几具金棺已劈成残片。这些生前常人看也不敢看一眼的帝王贵妃们，如果真的在天有灵，也只能哀叹自己太过于注重身后之事，子孙无用，才使自己身后遭此惨祸。

土匪光顾清东陵

就在孙殿英率部向顺义、怀柔一带大举撤退之时，躲在东陵外围的土匪、歹徒以及奉军、直鲁残军的散兵游勇，闻风而动，纷纷向东陵这个再一次成为真空的藏宝之地赶来。当他们发现各座陵寝均被凿挖得千疮百孔，而慈禧、乾隆二陵地宫已被盗掘时，遂趁着混乱再次将原本就堵塞不严的入口扒开，打着灯笼火把，提着口袋和各种防身武器冲进慈禧、乾隆两陵的地宫，再次进行了洗劫。兵匪、歹徒们的行动，渐被附近的土著所闻。于是，一帮又一帮的土著像刚刚从箱中放出的无王之蜂，成群结队地提着草筐、口袋向陵区涌来，并将地宫中散落下的珠宝玉器又详细地搜刮了一遍。乾隆地宫由于泥水混杂，散落的宝物已很难寻觅，土著们便携来耙钩，像在田野中搂草，又像在河沟中捕捞鱼虾一样，在泥水中四处打捞、搂钩，将珠宝玉器以及乾隆和后妃们破碎的尸骨一并装入带来的草筐、口袋，带出地宫。然后或挑或背或用车拉，将草筐、口袋弄到陵区之外的河中，用铁筛子反复涮洗，以淘选出金粒与珠宝。至于那些被裹挟而来的破碎的尸骨，自然是扔入河中随水而去。可谓一场真正的洗劫。许多兵匪、歹徒及土著由此也大发了一笔横财。

生前无限荣耀的“十全老人”、“太后老佛爷”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死后竟会遭到如此粗鲁、野蛮的待遇。不光自己的陵寝遭到盗掘，而且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得不到安宁。不光他们俩得不到安宁，许多兵匪、歹徒又将先前被盗劫过的同治帝的惠妃陵寝地宫掘开，再次砸棺抛尸，全面搜寻劫掠。同慈禧的遭遇相同的是，那位面色如生、全身完好的惠妃被扒光衣服，赤身裸体地抛在地宫的石板上，棺木被劈成碎片，横七竖八地被胡乱抛入地宫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随葬品被劫掠殆尽。东陵再度陷于大失控、大混乱、大劫掠之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尽管东陵一片混乱，劫掠财宝之人络绎不绝，但没有一人及时向官府和满清皇室报告这一消息。原来由清室派驻的那位名义上的东陵守护大臣毓彭，在此之前就开始监守自盗，大发不义之财。当他探知慈禧、乾隆两陵被兵匪盗掘后，怕承担责任，溜回北平家中，既不出头露面，也不派人向住在天津的溥仪禀告，而是私下里倒卖从东陵盗出的文物。倒是住在北平的一位原满清都统衡永（字亮生），在对东陵的被盗事件微有所闻后，为弄清事情真相，便给自己的亲戚、时任遵化县知事的蒋起隽写了一封私信，询问东陵情形。蒋起隽见信后，派人到东陵做了调查，并很快回信做了暂短的说明。信的原文如下：

东陵此次惨案幸在弟接印前数日，尤以乾隆、孝钦后陵为甚，尸骨狼

藉，惨不忍睹。同治惠妃尸体如生，实不可解，惠妃尚系弟之表姑也。可叹可哭！现在此案范围扩大，弟处正在查办，将来需由国民政府会议解决也。清室为一代君主，逊位不及二十年，如此结果，令人伤心。乾隆及孝钦前后男女两英主与中国盛衰关系最大，此次遭劫亦最甚。不遭于外人之手，不遭于革命人之手，而遭于无知识想发洋财一群军匪之手，想默默（疑为冥冥之误）中亦有定数耶？

从蒋起隽的复信看，除了庆幸此案与己无责外，似乎未表现出大的惊讶，或许在他看来东陵惨剧确系“定数”。

就在衡永接信不久，满清贝子溥忻又收到了东陵内务府旗人和钧的一件呈文。这件呈文较详尽地叙述了东陵被盗前后的经过，并实实在在地告了毓彭一状。其文是：

呈为报告东陵被盗情形以资究办事，窃查阴历五月间，奉军退却之际，陵寝保护无人，守护大臣毓彭串通内务府郎中博尔庄武、麟祥、翼长恩华等，并有著名土棍惠陵幼丁邵受言勾结木商朱子山、遵化商务副会长陈敬斋会同北平西珠市口铺陈市复兴永经理张裕振等，起意盗卖各陵金银器皿、软片、五供各物，定价五万余元，又愚惑利诱众旗丁为变卖发起人。复联络各地土匪为保障，于五月十四日竟将各陵物品由朱子山等在金银器皿库内取出，运至遵化县。近闻转运平津，设法售与外人，藉饱私欲。该商等业将款项拨付，阳则藉维持旗众生计为名，阴即奸盗朋分。此风一开，当地人民皆以为陵寝官物可自由取夺，绝无窒碍，群起拆毁殿庭，肆行偷卖。

仅五、六两月时间，所有楠木檩架均行拆毁一空，仅存殿盖。而昭西陵、孝陵、大红门、更衣殿、景妃陵、惠陵东西配殿、神厨库情形尤甚。时有孙魁元军队住在马伸桥，目睹此种情形，见利智昏，顿起祸心。派其师长韩大保，假借剿匪名义，于五月十八日率队分驻各陵。将裕陵、普陀峪定东陵，用炸药炸毁地宫，将梓宫挖开，尽将地藏贵重物品全数掘出，隐匿盗卖，事毕返防。现下各陵毁坏已极，裕陵、定东陵地宫先皇、先后御骸尚遮暴露，悲惨情形笔难罄述。而该守护大臣毓彭与本陵在职人员不但漠不关心，反而来京商卖各陵铜炉、鼎、鹿、鹤等古物，俾裕私囊。似此胆大妄为罪恶已极，理应从严依法惩办，用正典刑。特此泣陈，敬祈裁夺，饬将该盗犯等缉拿追办，以惩暴逆。钧所呈各项如有不符，情甘反坐。伏乞钧鉴。

和钧谨呈八月三日

从和钧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封信不但写得详细，字里行间还透出一股敢于负责的精神。“如有不符，情甘反坐”，这话足以说明，确实已经发生了毓彭监守自盗之事。东陵被盗的事实已被完全证实后，衡亮生当即往告清皇室宗亲载瀛等人。载瀛、载泽、溥与宝熙等连夜商讨应变之策，最后决定，一面到北平卫戍司令部报请对盗陵匪军严加惩办，一面致函清室遗臣陈宝琛请他代向住在天津的废帝溥仪禀告。

载瀛等人来到北平卫戍司令部，以极度悲痛的心情，向总参谋长朱绶光诉说了东陵被盗的惨案。朱绶光大为吃惊，急忙将情况向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做了汇报。阎锡山惊出一身冷汗，决定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各种应变之策。

会议最后决定：速电请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让其先派一个营的兵力火速赶赴东陵守卫，而后视情形再增派军队；暂对新闻界封锁消息，视情况变化再作透露；速派宪兵队封锁平津一切交通要道，对可疑过客详细盘查。同时通知全国各警察署局和各海关、检查站，让其严密注视可疑案犯和可疑财物，倘有端倪立即扣留，详细盘查。尤其是平津两地的珠宝市、各家金银铺以及钱庄、银行，要分布密探和便衣警察及大量宪兵秘密侦查，日夜守候，发现可疑之人，不需调查，先行逮捕……随着一道道命令的发出，各地军警纷纷行动起来。宪兵、密探、便衣警察像猎狗一样散布于各个角落，一道无形的巨网悄悄张开，只等待投网者的到来。

满清遗老陈宝琛于8月2日怀揣载瀛等人的书信，来到天津张园向溥仪报告。溥仪一听东陵被盗，立觉头顶响起一声炸雷，眼前一黑，身子在龙椅上摇晃了两下，便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知……等到臣僚们连摇带晃，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凉水，一阵手忙脚乱的折腾之后，总算将其唤醒并扶上椅子重新坐定。溥仪喊了声“大清祖宗……”，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过了好长时间，溥仪才从巨大的哀痛中略微醒悟过来。他缓缓站起身，目光呆滞、迷惑地望着面前的遗臣、奴仆和白发苍苍、声泪俱下的陈宝琛，颤抖着声音问：“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

“听说是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魁元部下所为。他们以剿匪为名，用炸药炸开了祖宗陵寝地宫，掠走了所有随葬珍品，乾隆爷及孝钦后尸骨狼藉，惨不忍睹……”陈宝琛尚未说完，只见溥仪抬手抓起身边桌上的一个玉石茶碗，“啪”的一声摔得粉碎。随之猛地站起身，两眼血红，牙关紧咬，声色俱厉地从嘴角挤出了几个字：“孙魁元，此仇不共戴天，我与你誓不两立！”说完，又不禁大放悲声，号啕起来……

过了好长时间，在遗臣、后妃、家人的劝说下，溥仪才止住悲声，开始考虑应付方案。除决定立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外，同时电召北平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等人即刻来津，商讨善后事宜。

8月4日中午，北平的满清遗老旧臣相继赶奔天津张园拜见了溥仪。溥仪满脸悲痛之色，带领遗老旧臣们来到临时设立的“奉先殿”，向乾隆和慈禧的灵位祭奠叩拜。然后，在张园的八角楼召开“御前会议”，钦定了三项应付措施：

第一，以逊位王室和全国遗老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的控诉，要求严惩窃陵魁首；

第二，通电全国遗老旧臣，募捐和征集修缮陵寝的费用，在修缮之前，先派耆（qí）寿民、宝瑞臣、陈诒（yí）重、徐榕生等遗老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委派镇国公载泽、固山贝子溥恭代祭告，并遣镇国将军溥侗（dònɡ）、辅国公恒煦随同行礼；

第三，在张园摆设香案祭席，拈香行礼，每日三次，直到陵寝重新修复为止。

圣祖景陵遭劫难

康熙这位伟大的帝王生前风光无限，为当时中国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康熙是我国古代史上功勋最高的皇帝之一，可能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他8岁登基，在位61年。康熙好学敏求，勤于政事。在军事上，曾智擒鳌拜，剿撤三藩，收复台湾。他还出兵击退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沙俄侵略军，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曾亲自出征平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在经济上，他兴修水利，治理黄河，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爱民如子。由于他的文治武功，中华帝国的多民族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发展。清朝正是从康熙起，正式迈入了繁荣的时代，是广为后人称颂的“康乾盛世”的开端。不仅如此，他本人还多才多艺，在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书法算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然而，盗墓者们在利益驱使的驱使下，丝毫没有顾及到康熙帝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而放过他的陵寝。清朝末年，康熙帝景陵所在的清东陵便时常受到盗贼侵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到处抢掠，清东陵这座安葬了五位帝王的皇家陵园自然吸引了他们贪婪的目光，成为他们抢劫的重点目标。负责守陵的大臣毓彭也趁机监守自盗，河北一带的古玩、珠宝市场上开始出现数量众多的东陵所藏珍宝。盗墓者们将东陵地面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劫一空，连陵中数以万计的苍松古柏也被砍伐殆尽。

直奉军阀大战时，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领部队占领了清东陵，并对之大肆抢夺，将地面祭祀建筑中的宝物车载而归。

1928年，在孙殿英的盗墓计划中，康熙帝的景陵原本也被列入盗掘名单，但因为景陵地宫积水很多，匪兵们无法进入而作罢。

虽然孙殿英没有得手，但景陵并未因此而躲过劫难。这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帝王陵寝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景陵北依昌瑞山，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下马碑、神厨库、牌楼门、神道碑亭、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陵园总面积达174057平方米。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以一条宽9.70米的神路贯穿成一个完整的序列，该神路南与孝陵神路衔接，北端直达宝城，弯环如龙，盘曲有情。

与康熙帝同葬景陵的有：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索尼孙女，废太子生母，康熙十三年因难产而死，年仅22岁）、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康熙十七年逝世）、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二十八年病逝，死前一天被立为皇后）、孝恭仁皇后乌雅氏（雍正帝生母，康熙时为德妃，后尊为皇太后，雍正元年逝世）、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皇十三子怡亲王胤祥生母，康熙时为敏妃，康熙三十八年去世，入葬景陵妃园寝，雍正元年追封为皇贵妃，迁葬景陵）。

景陵是清五朝在东陵界内营建的第二座皇帝陵，其建筑规模稍逊于孝陵，建筑规模总体上是以孝陵为蓝本，但局部又有所改创。如圣德神功碑亭内立双碑，石像生缩减为5对，改龙凤门为牌楼门等。景陵在葬制上也有重大变革，开创了先葬皇后，附葬皇贵妃的制度，另外还摒弃了尸体火化入葬的传统而改为土葬。景陵的建筑风格及丧葬形式大多为后世所效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朝皇陵中的圣德神功碑亭是由嗣皇帝兴建的，用以彰扬先皇一生的功业，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建于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1725～1727年）。按照雍正皇帝的意愿，亭内竖立了两块石碑，分别镌刻满文、汉字，记述康熙大帝61年的赫赫功德。碑文由雍正皇帝亲自撰写，长达4300多字。

景陵石像生的布置有别于清代所有帝陵，自五孔桥至牌楼门段的神路由于地形的影响而呈弯环的曲线，无法像其他陵寝那样对称布置，于是当时的建筑设计人员就根据神路走向顺地制宜随曲就弯地进行设置，一改其呆板的模式而呈现出灵活多变、步移景换的效果，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聪明和才智。

1674年，康熙帝的第一位皇后孝诚仁皇后薨逝，康熙帝陵寝营建工作启动。1676年，景陵正式破土动工，历时13年竣工。

景陵的规模虽然小于顺治帝的孝陵和乾隆帝的裕陵，但它无论在建造风格还是规制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实行土葬的皇帝，无论墓葬的形制还是地面的附属建筑，都模仿中原汉族皇帝的陵寝。他不仅巩固了满清政府，将中原的无限江山真正纳

入清朝统治，同时也将满汉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但是，盗墓者并不会因为某人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就对其陵墓放手。在盗墓者眼里，盗取财宝是第一位的。

1945年9月2日深夜。漆黑的夜幕下，乌云四合，繁星隐没。王绍义的队伍集结到了清东陵。

因为惠陵被盗后已经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王绍义盗景陵就更加谨慎小心了。王绍义算得上一只老狐狸，甚至比狐狸还要狡猾。他为了保证盗墓能够顺利进行，而不会遭到当地驻军的阻止，就想出了一个声东击西的办法来遮人耳目。王绍义经过精心的策划之后，把盗陵队伍分成两批。他派一批队伍在清东陵的西部炸石头采石。这个采石场可不简单，几乎比当时任何一个采石场的设备都要先进，动用了炸药。然而，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并不见有人采石。这些爆炸声只不过是为了把人们的目光吸引过来，从而掩盖与采石场相隔较远的盗掘行动。王绍义亲自带领着另一批人盗墓。为了保密，他还为盗墓设计了一些暗号，比如管盗陵叫“挖金”，调集民兵叫“集训”，晴天称“天高”，黑天称“明路”，动手叫“立拖”。就这样，在张尽忠等人的帮助下，王绍义利用当地老百姓的愚昧，使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加入了盗墓的行列。王绍义甚至还给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展开了战前动员。

“百姓们，这古代的皇帝都是大地主，都是欺压我们老百姓的。他们不仅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还想在死后永生永世地享受。为了达到他们这些无耻的目的，就在死后陪葬了无数的金银珠宝。那些金银珠宝都是他们从我们这些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今天我们就要把祖辈们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全都要回来。”他竟然编造了这样一套歪理邪说，迷惑百姓。

王绍义作战前动员的时候，他的手下早已在景陵的周围布置好了炸药，准备随时向景陵发起“进攻”。王绍义一声令下，景陵的宝顶就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四散飞溅了。他们的这种盗墓方法很简便，只需几次爆炸，就完全打开了地宫的入口。爆炸声响过之后，百姓们就拿着各式工具刨开了碎石，露出了深深的地宫入口。有了盗惠陵的经验，王绍义命令百姓们只准在外面等候，不准进去，他则带着自己的人进入了地宫。

点亮火把之后，王绍义看见地宫的宝床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六具棺椁，是康熙与其皇后和妃子们的。他料想那具体积最大、最为精致的棺椁一定是康熙的，就决定先把这具棺椁打开。一阵斧劈锯凿之后，康熙的棺椁就被打开了。有两人围住棺椁，探下身子，想看个究竟。

突然，“噗”的一声炸响，棺盖下蓦然间喷射出熊熊烈火。两人猝不及防，被硝烟烈火迎面烧了个正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刹那之间的惊悸与恐怖过后，王绍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冲上前去，朝“哇哇”乱叫的两人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后，又各赏两人一脚，然后命令继续开棺。

随着棺盖的开启，棺椁里喷射出一束令人炫目耀眼的光芒，整个地宫亮如白昼。

只见棺椁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物，有玛瑙、珊瑚、镶金宝石、翠玉戒指、赤金鼻烟壶、珠串玉雕帽花、太平车、如意、花枝、坠子、耳挖、翡翠、台灯、夜光杯……

这下可把王绍义乐坏了，他赶忙命令众人将财宝收了起来。然后，他又命令把其他五具棺椁都一一打开，又获得了许多珍宝。据史书记载，康熙的景陵内的珍宝有：天鹅绒鎏金朝冠1顶；金冠珠顶1座，上嵌大正珠顶、东珠各15粒；得勒苏草拆纟丕缨冠1顶，嵌镶银珠20颗；各种玉及镶钻石、宝石镏子35件；镀金点翠上带红宝石的连环4对；玉镂田瓜盅1个；百褶金龙1件；金累丝镶嵌色珠石九凤钿1顶；玉镶珠挑杆8枝；金珐琅盅碟2件；镀金银奠池5件；镀金银中碗7个；镀金银爵盏10个；龙形翡翠饰物1个；黄杨木镂雕八仙过海盆景1尊；九龙玉杯1只……它还不算那些陪葬的金银、玉器、古董、花瓶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九龙玉杯，这便是小说《三侠剑》中杨香武三盗的宝物，在这场劫难中也被盗墓者盗走，最终下落不明。

王绍义等人的盗墓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尽管他们在盗墓时采取了一些隐蔽的措施，但是那巨大的爆炸声根本无从掩盖。国民政府不仅抽调人员，四路设卡，安排部分特工守在珠宝店里，捉拿来北平销赃的盗陵犯，没收其全部珠宝，人员关押审讯，还派出专人缉拿主犯黄金仲，企图把盗陵的幕后指挥者这一罪名往共产党头上戴，导致了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蒋介石责问周恩来的闹剧。随着解放军的连连胜利，共产党领导的蓟遵兴联合县专案组也展开了对清东陵盗墓案的调查。盗墓贼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黄金仲于1946年被军统特务抓获，后来死于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新中国成立后，遵化县当地人民政府对盗掘景陵非法获取国家财物、破坏文物古迹的王绍义进行审判。王绍义在1951年被执行了枪决。见财起意的盗墓者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景陵也在屡遭浩劫后得到重新修缮，可是墓中那些珍贵的文物却就此散佚，再也难觅踪影。

黄金仲再盗东陵

在康熙帝景陵、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定东陵惨遭盗掘的时候，清东陵内其他陵墓也未能幸免，名垂青史的伟大帝王自身尚且难保，当然也不能庇护他们的子孙。1945年，咸丰和同治父子的陵墓便遭洗劫，而盗掘这两座陵墓的人正是曾经跟随王绍义盗掘清景陵的黄金仲。

定陵是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zhǔ）的陵寝，位于清东陵界内最西端的平安峪。它的神道在七孔桥南与孝陵神道相接，一直西行，直至西大河东岸北折，第一个建筑是一座五孔平桥，每侧栏板7块，然后是涵洞一座、五孔拱桥一座、望柱一对、石像生（狮、象、马、武将、文臣）共5对、冲天牌楼门、神道碑亭、西侧有神厨库院一座、北为三路三孔石桥，桥北东西相对朝房各一座，东西相对布瓦卷棚顶值班房各一座，正中为隆恩门，隆恩殿仅月台南东西三面有石栏杆，大殿本身取消了环绕的石栏杆，殿后为三座门，定陵裁撤了二柱门，其余与祖陵同。1966年，拆除了西朝房和西配殿。定陵始建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完工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前后计有7年半的时间。定陵修建之时，在规模和规制方面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由于咸丰帝突然崩逝，导致定陵的修建紧迫异常，而且咸丰一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重创，清政府割地赔款，早已不复康乾盛世时的鼎盛局面，皇室开支也相应减少，所以定陵“缩水”势在必行。与乾隆皇帝之前的陵墓相比，定陵规模有所缩小，修建材料中也有一部分是道光帝陵寝的废材。但作为皇帝陵寝，定陵仍旧规模宏伟，净耗白银313.4547万两之多。

1945年，康熙帝景陵被盗之后，盗匪黄金仲开始谋划盗掘定陵。黄金仲是解放区冀东分区敌工部部长，参加过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还立下过赫赫战功，不知为什么竟也参加到盗墓的队伍中来了。

虽然有了盗掘景陵的经验，可开启定陵的地宫还是耗费了盗墓贼们好几天的工夫。当盗墓者用尽全力打开地宫大门时，一股霉气喷涌而出。盗墓者们惊慌失措，有人大声叫喊：“有毒气！”人们纷纷退下。等到地宫内的霉气散尽，盗墓者又重新聚拢过来，而另一个更大的困难横亘在他们面前——定陵地宫中有地下水。随着盗墓者的深入，地宫中的地下积水也愈来愈深，渐渐地盗墓贼浮沉在地下水中，寸步难行。

在黄金仲的指挥下，匪兵们在隆恩殿香案顶上拿下大匾，再加上两扇紫檀门板，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做成了简易的木筏，他们乘坐木筏一路划进地宫的主墓室。地下积水“水淹”盗墓贼已经是千古未见的

奇事，更奇怪的是这些盗墓贼竟然乘“船”盗墓，这无疑给定陵被盗事件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盗墓贼历尽万难，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棺椁，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将之劈开，随葬的无数金银珠宝也被抢劫一空。

双山峪惠陵是与定陵同时被盗的。惠陵是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的陵寝。

清穆宗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为人任性，刚愎自用，是受制于慈禧太后、没有什么作为的傀儡皇帝。同治帝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其母就是慈禧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病危，召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代写朱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上述大臣赞襄政务。载淳生母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尊为皇太后。第二天咸丰帝去世，5岁的载淳即位。

由于慈禧太后贪恋权力，她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拖延同治帝亲政时间。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才为自己17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同治帝婚姻是个大问题。找谁做皇后，两宫皇太后意见不一：慈安太后提议以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慈禧太后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蔡氏为皇后。同治帝本人喜欢前者，便以阿鲁特氏为皇后，富蔡氏为慧妃。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亲政。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年仅19岁，其寿命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短的。同治帝的死因有不同说法：一说是梅毒。这是民间说法。同治帝喜欢皇后阿鲁特氏。而慈禧太后要同治帝多接近慧妃。同治帝不高兴，常独处乾清宫。苦闷的他，由王庆祺导淫，与载澄（dèng）（恭亲王奕□第一子）微行，在宫外寻花问柳，引起性病。慈禧太后误作天花来治，最后病死，这种说法证据不足。一说是天花。这是官方说法。根据相关史料，时人笔记记载，多数史学家认同同治帝死于天花。同治帝死后葬河北昌瑞山惠陵，庙号穆宗，谥“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

同治帝生前没有修建陵墓，其陵寝是在去世后才开始修建的。当时执政的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于1875年春（史载为光绪元年二月）最终将陵址选在位于景陵东南三公里处的双山峪这块万年吉地。二月确定陵名为惠陵。按照清东陵的昭穆制度，同治帝的陵寝应位于陵园西侧，乾隆帝裕陵的旁边。自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动工，至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竣工，历时三年零一个月，共耗银4359110.89两。承修大臣醇亲王奕譞、左都御史魁龄、户部侍郎荣禄、署理工部

侍郎翁同龢等。

惠陵建筑规制依照定陵，除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和二柱门外，又裁了石像生和接主神道的神路。建筑布局从南往北依次为：五孔拱桥一座、平桥两座、石望柱两根、牌楼门一座、东西下马牌各一座、神道碑亭一座、神厨库一座、井亭一座、三孔拱桥三路、平桥两座、东西朝房各一座、东西值班房各一座、隆恩门一座、东西老燎炉各一座、东西配殿各一座、隆恩殿一座、琉璃花门三座、台石五供一座、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各一座，宝顶下为地宫。陵寝外围环以砂山。除东西值班房为布瓦盖顶外，其他建筑屋顶均覆以黄琉璃瓦。该陵虽是清晚期营建的皇帝陵，但所用木料均为楠梃木，木质坚硬，俗有“铜梁铁柱”之称，因而大木构架至今保存完好。

清东陵是不幸的，在清王朝灭亡后的短短数十年几乎被盗一空，而清东陵中最不幸的陵园当属同治帝的惠陵。惠陵在1945年到1948年这短短的四年之间竟然被盗三次！

1945年，第一批盗墓者踏入惠陵的地宫，从此，惠陵成为盗墓贼们竞相光顾的地下银行。第一批进入惠陵的盗墓者同样遇到坚固的墓门，他们采用了与前辈们相同的方式——用炸药炸开墓门。他们劈开同治帝的棺椁，盗窃了棺椁中大量的珍贵随葬品。

一年之后，当地的盗墓贼再次进入这座墓门洞开的陵寝。这一次，盗墓贼们挖开了惠陵的金井，盗窃了其中的随葬品。

1948年，最后一批盗墓贼叩开了惠陵的墓门，这也是惠陵历次被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宫中的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同治帝和皇后阿鲁特氏的尸体横躺在棺椁的外面。可怜的同治帝只剩下一具枯骨，身上的随葬饰物被搜罗殆尽，而皇后阿鲁特氏更是惨遭辱尸。

不明兵匪盗崇陵

历代每一座皇陵建成之后，都会有守墓的人在陵墓附近安家，以期长年累月守护皇陵。因此，皇陵附近总有不少的村落。清西陵也不例外。1938年秋季，我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帝陵崇陵也未能摆脱盗墓者的魔爪，在建成刚刚25年后便被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县城里。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看守，整个西陵的戒护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崇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一说崇陵是被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盗，另一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被盗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然而此事说来更有另一段蹊跷。

在清西陵附近一个叫华北村的村子里，有个叫鄂士臣的汉子，此人胆大手黑，能发财的事什么都敢干。1938年11月初，鄂士臣找到老相识关友仁密谋，乱世之中，群雄四方，他也打算搞点家伙，拉支队伍闯荡闯荡，希望弄得好能捞个一官半职。

鄂士臣的话句句都像勾魂似的扯动着关友仁的心。他暗自寻思，如今易县地面是三不管，老蒋溜了，日本人顾不上，八路军还没有正式开到陵区来，正是拉队伍的好机会。常言道：有枪就是草头王。想到此，关友仁不等鄂士臣继续劝诱，开口把话头凿在点子上：“这家伙到哪里去弄呢？”

鄂士臣见关友仁如此干脆地同意搭伙，绽开了笑容，凑到近前，手指点点脚下“就朝地下的死人要！”一番话说得关友仁异常高兴，二

人当下便物色了几个同伙，决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第二天他俩又分头找来了几个盗墓的老手，有那保余、苏振生、李纪光等八人，决定盗墓。

这几人中李纪光具有多年盗墓经历，当众人聚在一起研究盗墓计划的时候，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建议盗妃陵。鄂士臣对此深表赞同，众人同声附和，决定先挖妃陵，但西陵内有三座妃陵，从哪个下手呢？

八个人最后将目标集中在园寝中的珍妃墓。理由是：崇妃园距村庄较远，不易被人发现，比较安全。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宠妃，生前虽不得意，死后入葬的规格却很高，随葬的珍宝肯定不少，进行盗墓容易发横财。

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是人们按她曾获封的称号来称呼她的。她是满洲镶红旗人，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光绪皇帝最为受宠的妃子，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初三，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珍妃和光绪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初五，慈禧太后选定其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之后，同时封珍妃与她的姐姐瑾妃为嫔，时瑾嫔15岁，珍嫔13岁。光绪二十年，两人同时晋封为妃。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珍妃进宫时，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有关珍妃之死，史学界大多赞同是慈禧指示亲信太监崔玉贵推其入井的，但是细节方面却不是很清楚，关于这一点，有三部书都曾经进行过比较详细描述。

一是来自金易的《宫女谈往录》，作者自称是崔玉贵的描述：

>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
>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
>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
>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
> 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
>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
>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
>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
>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
>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而一位旧宫监唐冠卿在故宫博物院周刊的《珍妃专号》里则说：

> 闻珍妃至，请安毕，并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现在还成话么？义和拳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音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儿

们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么？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桂（即崔玉贵），桂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儿下去，我才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怦然一响，想珍妃已堕井矣！

第三段资料出自《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一位太监的描述：

听说珍妃被害的事已经有很多人写过。我们过去同人中一位叫王祥的是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去的。以下是王祥在几年前对我讲的话：

王祥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他清楚地记得，庚子年七月二十，宫里乱七八糟的，西太后和光绪皇上都改变了装束，就要逃出宫了。就在这当儿，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到了宁寿宫，把珍妃从三所（囚禁珍妃的住所）里提了出来。珍妃在这里不知道已经受了多少折磨。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我们从门缝里看到她，战战兢兢，憔悴的样儿。

西太后究竟同她说了些什么，王祥没有听见。后来在场的太监们传说，西太后对她说，现在太后同皇上就要离京了，本来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让她赶快自尽。还听太监们传说，珍妃对西太后说，皇上应该留在北京，但是还没等珍妃说明道理，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抢白她说，“你死在眼前，还胡主张什么。”

这些传说是不是实情，王祥说不能判断。当时王祥从门缝里只看到珍妃跪在西太后面前，哀求留她一条活命，口里不断呼叫：“皇爸爸，皇爸爸，饶恕奴才吧！以后不再做错事了……”西太后气狠狠地呼喝：“你死去吧！”

在场的人，有的眼里流着泪，像木鸡似得呆站着。大概谁也不忍下手。光绪和瑾妃也眼泪汪汪的。

西太后怕时间耽搁久了，就接连着喊叫，快点动手。崔玉贵走上前去，把珍妃扯过去，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井里去。

珍妃临危前，王祥还听到她呼唤：“李安达，李安达！”安达是对太监的尊称。这是珍妃呼唤李莲英，求他救救她。

这三段资料虽然在细节方面大有不同，可在慈禧处死珍妃的理由上却十分一致，那就是以时局纷乱为借口将她推入井的，这应该是珍妃之死的一个真相。

1901年11月，清廷与八国联军媾和，慈禧等人从西安返回北京，慈禧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下旨要珍妃家人来打捞珍妃遗体。珍妃遗体在井内泡了一年半有余，井口又小，怎么也捞不上来。慈禧大怒，要对全家问罪。珍妃弟弟志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摆上香案，烧香叩头，求姐姐显灵开恩，救全家性命。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遗体打捞上来，已是惨不忍睹。志含泪将姐姐一条曲着的腿捋直，装殓入棺。慈禧命人把珍妃掩埋。对外宣称：珍妃为了免遭洋人污辱而投井自杀。并恢复珍妃名誉，从妃册封为贵妃，企图以“贞烈殉节”的名义掩世人耳口。

慈禧为何把珍妃害死又行追封之事。据说慈禧在出逃期间，屡做恶梦，梦见珍妃浑身水湿、遍体血迹、目眦欲裂地前来索命，使她备受惊吓，于是假惺惺地施以恩惠，抚慰珍妃亡灵莫来打扰。

珍妃死后，埋葬在西郊的什么地方，各种记述歧异。《清史稿》说“葬西直门外”；《逊清皇室轶事》说“葬于西直门外的恩济庄”；《珍妃其人》说“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的宫女墓地”；《崇陵传信录》则说“浅葬京西田村”。恩济庄在阜成门外海淀区八里庄之西，也可说是“西直门外”。珍妃到底埋葬在海淀区的恩济庄，还是田村？据查，恩济庄确有一座“老公坟”，即太监公墓，连大太监李莲英的坟也距此不远，但在老公坟南边并未发现宫女墓地。在恩济庄西三里的田村却有妃嫔停棺之地。据《诗书见闻录》记载：“乾隆三年，端慧太子薨，停棺于城西的田村。”又据《养光斋丛录》记载：清代雍正年间，“妃嫔病殁，金棺皆停吉祥所。五日后乃奉移田村。”由此观之，“珍妃浅葬田村”是符合事实的。

1914年，隆裕皇后去世，与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合葬于西陵金龙峪之崇陵；同时将珍妃从海淀区田村迁葬于崇妃园寝。就这样，珍妃永远被埋葬在永宁山下了。

第十五章　死灰复燃，重新升温——近年来的重大盗墓事件

群贼共盗唐恭陵

若论我国古代哪位太子的命运最为坎坷，那就要属唐朝的李弘了；若论我国古代哪位母亲对自己的儿子最狠毒，那就要属李弘的母亲武则天了。

李弘，是唐高宗第五子，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永徽三年（652年）秋冬之际，李弘出生了。第二年，李弘就随母亲入宫，被封为代王。永徽七年被封为太子的时候，李弘还是武则天最最疼爱的孩子。正是依仗着这第一个儿子，她才真正稳固了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原本压迫在她头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是因了李弘的诞生，而迅速失去了她们皇后和宠妃的位置。所以武则天不可能不从内心里宠爱自己的儿子，何况这又是个仁孝懂事的儿子。

《唐历》中记载："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有过……"高宗对其非常器重，并寄予很大希望。为其选聘著名大臣李绩、许敬宗、李敬玄、刘仁轨、许圉师等作为辅弼老师。李弘"深为帝及天后钟爱"，少小即让他参政，培养他的政治才能，使其在行政的实践中锻炼。如龙朔二年（662年）高宗"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次年十月一日，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武则天

仁孝、谦虚、谨慎的李弘，深得高宗喜爱，朝中的官员也对他有好感。他虽然体质羸弱、性格温和，但对于许多事情，却能有些大丈夫的作为，喜欢打抱不平。

历史上所记载的李弘一生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曾非常勇敢地私下探望过自己的两个被深锁牢狱的姐姐宣城公主和义阳公主，并为她们争得了权利，让她们走出了冷宫，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义阳、宣城两位公主是萧淑妃所生，而萧淑妃与武则天政见不一，和皇后一起在与武则天的权力角逐中落败，两位公主受到牵连，被幽禁在掖庭，也就是冷宫，年过三十还没有结婚，李弘奏请高宗，允许她们出嫁，高宗准奏。

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大唐，也只有他敢于冒着得罪母亲武则天的危险，要求高宗允许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出嫁。

但毫无疑问，这件事让李弘卷入宫廷内部斗争之中。从此之后，李弘开始了他的悲剧人生。

675年，春天的洛阳繁花似锦。唐高宗与武则天、太子李弘在合璧宫举行家宴。李治见儿子已经慢慢地磨炼成熟，最近又做了几件漂亮的事情，十分高兴，对他赞不绝口。武则天也很高兴，赐酒一杯给李弘以恭贺他的业绩。李弘谢了母后，将这杯酒一饮而尽。接着，悲剧发生了，李弘突然倒在地上，浑身痛苦地扭曲着，脸上也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就这样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再也没有声息了，此时年仅24岁。从此，唐高宗的皇宫中少了李弘这个人，他也是当时死的第一位皇室成员。

对于李弘的死，高宗万分悲痛，他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高宗这个老子亲自为儿子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关于李弘的死，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根据其他史料，在《本世纪·第三》中写道：“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皇杀皇太子。”该书《列传·第三》中写道：“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zhèn）薨，年二十四。”

根据《新唐书》所记，有专家也做了分析考证，认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武则天杀太子是有可能的，因为宫廷斗争的特点就是骨肉相残。这些事情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唐太宗李世民为皇帝之争，就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自己的手足兄弟。而在李弘之前，武则天与皇后争宠，曾掐死其亲生女儿。而在李弘死后，又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在巴州逼自己的亲生儿子、章怀太子李贤自死。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扫清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道路上的障碍，武则天就乘高宗游幸合璧宫之机，暗做手脚，蒙蔽高宗，将太子李弘杀死。但是，也有许多史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早在清代就有人对武则天害死儿子说提出了怀疑，清王昶（chǎng）《金石萃编》对《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条提出疑问：“天皇晚年倦勤，庶政多决于后，即是太子受禅，天后自度亦不难制其子，何致以请嫁二公主，激怒遽（jù）萌杀子之心？此事本有可疑者。”另一种说法是太子李弘前往合璧宫时，因为长期患肺痨，又是一路风尘，病情加重，一度昏迷不醒，后来有所好转，而就在这时，高宗皇帝表示要将皇位传于他，太子听了这话，深感不安，结果又导致病情恶化，“伏枕流欷”，终致“旧疾增甚”，最后于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在合璧宫绮云殿去世。

《旧唐书》载：“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其年，葬于缑氏县景山之恭陵……”

众所周知，唐代诸多皇帝的陵墓多在陕西，也就是关中，为何独独李弘这个唐高宗挚爱的儿子的陵寝设在偃师呢？其实，这与武则天

有着很大的关系。

武则天作为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是极其有魄力和胆识的一个人。太宗执政时，武则天作为才人跟随太宗十二载，耳闻目睹，对于治理朝政、发展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

后来，武则天通过自己的才识和手腕，成了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初，就曾谏言皇上十二事，其中一事就是“劝农桑，薄徭役”，致力于发展生产。接着，为了缓和关中的政治矛盾和生活匮乏等经济矛盾，以政治家的气魄，于657年劝高宗迁都洛阳。到675年李弘死时，东都发展已初具规模，社会经济也迅速增长。

李弘死后，按常理当归葬关中，“近侍昭陵”，但轻徭薄赋是武则天经世的一贯主张，为了不过多劳费民力，就和高宗商量在景山为太子选陵。这在《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文中有明显的反映，文云：“农垦在候，田务方殷，重归关辅，恐有劳废，遂割一己之慈（阙）便兆人之业（阙）以为言故，殓绝于珠玑，明器唯资瓦木，一从本志，无夺宿成。”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虽然武则天以自认为的节俭殓葬李弘，但这样大规模地营建恭陵，耗费钜亿，却导致了两次役夫逃亡事件。据《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营陵功费鉅亿，人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官司，或相率亡。”《新唐书·韦弘机传》：“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仲寂治陵，成而去堂厄，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怒，夜烧营去。”这两条史料是对“田务方殷”“恐有劳废”等的另一种说法，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话语。

有专家认为，恭陵建在景山，与地理位置、环境优美不无关系。“步彼景山，松柏丸丸。”景山处于伊洛河与万安山之间，古时遍山松柏，郁郁葱葱，实乃偃师南部的一道东西走向土岭，这里有古时通洛阳、连西安、入登封的大道。晋建安七子之一、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曾经于此流连，写下著名的《洛神赋》：“……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过轩辕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曹植背离伊阙，回东方的藩属之地，越过轩辕经过通谷，登上了景山。到此以后，已是红日西倾，人疲马乏，于是就在长着杜蘅的岸边停车，在长有芝草的田地里饲喂马匹，而后纵目四望，在阳林一带游玩。

在缑（gōu）氏当地民间，关于恭陵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武则天二次进宫辅政，传说全靠王子晋的帮助。武则天刚参政，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有位大臣曾难为武则天说：“一夜之间能叫后花园牡丹竞开才叫本事。”数九寒天，鲜花何以盛开？武则天发了

愁，整夜昏沉不能入寐，朦胧中做了一个梦，有个仙童驾鹤提壶来为后花园的牡丹浇水。临走时武则天问他叫什么，只听仙童说完“家住缑山，名晋也”，就不见了。天还不亮，忽有宫女向武则天禀报，后花园的牡丹开花了。武则天高兴地自语：“这真是天意啊！”从此这位未来的女皇开始理政。李弘死后，武则天把陵墓选在了南应升仙观，西临仙鹤观的景山上，一是为了陪伴她的大恩人王子晋，二是渴望李弘也能升仙。

恭陵建成后，洛州特地恢复缑氏县，以管“恭陵”，此时的仙鹤观经过皇帝下令重修，观内尼姑三千，整日香客如云，它和恭陵连在一起，形成较大的建筑群。相传，当时缑氏县衙就设置在恭陵，本来平静的景山，有了恭陵和仙鹤观，开始热闹繁华起来。

恭陵位于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的景山之巅。南依嵩山，北临洛河，东南群山环抱，西北岗峦叠起，山川如画，景色宜人。

据说李弘的陵址是武则天亲自选定的。一天，武则天带领众大臣前来看茔地，路途歇息时，在现在的偃师中宫底村下驾。随从的大臣问武则天：“太子的灵台封土堆多高？”武则天随口答道：“这里能看见为止。”身边大臣低声议论：“这还了得，此处是深沟，就是把陵墓建得再高也看不见。”有个大臣想了个使她金口玉言能够变为现实的办法，为此还专门请了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对武则天说：“皇后再向北走五里，遥望太子茔地最为吉利。”武则天遂又移驾到现在的安滩，即偃师安滩村。临回宫，大臣们又问武则天：“灵台封土多高？”武则天说：“不是说过了，这里能看见为止！”大臣们领到了新圣旨。用了三省民工，花了三年时间，费了亿万两黄金，恭陵建成现在的模样。巧的是，若是朗朗晴空，站在现在的安滩村北堤坡上，刚好能看到大冢的冢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年所修的唐恭陵规模是何等的宏大，气势是如何的雄伟。据说，当年唐恭陵的神道就有50多米宽，好像现代的马路一样。神道两侧立有两列石像生。最南端的望柱至北神门外坐狮，总长800余米。恭陵的灵台封土呈长形覆斗状，现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高23米。经探查，灵台封土四周经千年风雨侵蚀及人为垦殖，每边均被损掉10米左右，原封土的长、宽应分别为180米、160米左右，灵台高度按唐代天子礼“依汉长陵故事，汉长陵高九丈”，合27米，恭陵的灵台封土为高黏度红胶泥土质，且经过夯筑，坚硬密实，经过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其高度仅损失5米左右，基本保持了原貌。

恭陵俗称“太子冢”。陵园坐北朝南，平面正方形，建筑规划工

整，长宽均为440米，四周原有神墙围护。

根据文物钻探，墙基保存尚好，基槽宽1米，红褐色生土夯筑。神墙四角有角阙。地面以下有砖石墙基，地面以上今存夯土台基，高3～4米，长宽均10余米。陵园四角当年有角楼建筑。四面神墙中部各置神门，以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整个陵墓布局极为严整。陵侧有唐高宗亲自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一通，高6.1米，宽1.95米，厚约0.4米，文33行，每行82～89字。陵园东北角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是李弘太子妃的墓，俗称“娘娘坟”“娘娘冢”。李弘暴亡后，太子妃惊闻噩耗，伤心欲绝，也追随李弘而去，被封为哀皇后。底边长宽各40～50米，残高13米。陵墓周围有12个小土丘系当年的门阙和角楼。南神门宽30米，门阙外10米有立狮一对、石人三对，飞马、华表各一对，其余三神门外分别为一对坐狮。

唐恭陵不同于昭陵、乾陵等“依山为陵”的陵墓规则，而是在平地上用红褐色土夯筑灵台“号墓为陵”。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发现，唐恭陵神秘的面纱才被逐步揭开，据专家考证，夯筑灵台所用红胶泥土不是缑氏本地土质，而是来自东南方向50公里开外，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想想吧，即使按现在的规模，恭陵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高23米，皇后陵50米见方，外加4个角楼、8个阙台都需要土；除此之外，恭陵地宫中的行沙，从8里外的伊洛河，人挨人、人传人，传到恭陵，炒干后倒入，仅搬运工作该有多大？

实际上，作为布局规整的陵墓，恭陵也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好的一座，恭陵的大型石刻群组合开创了唐代帝陵石刻制度化的先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刻精美，形象生动，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中原唐代陵墓石雕之冠。体现了大唐帝国的雄峻风采，是河南仅存的一组盛唐时代皇家规格品质的陵墓雕刻，成为考察唐陵规制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宝贵资料。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当年盛极一时的大唐东都洛阳多少巍峨华丽、金碧辉煌的宫殿，随着岁月的推移都已灰飞烟灭，而恭陵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李弘的陵墓虽然几经盗墓贼的盗掘，但是都没有得手。民国时，一群盗墓贼结伙带着工具来到了恭陵试图盗墓，他们决定在封土的正中央开始挖掘，以为这样能最快地到达地宫。可是，洞刚刚挖了十几米深，洞口就忽然冒出了一股黄烟，紧接着洞就塌陷了，在里面挖掘的人全部被活埋，一个也没能逃出来。在洞口外接应的盗墓贼被吓坏了，以为是李弘被他们的盗墓行为激怒，显灵弄塌了洞穴，于是落荒

而逃。其实，就现在来分析，因为恭陵的封土是用黄沙堆成，那股黄烟只不过是沙子塌陷时形成的灰尘。沙子具有流动性，自然不能承受太大的拉力，因此，在盗墓贼的洞穴挖到一半时就塌陷了。

这应该说是恭陵的幸运。但是，幸运并没一直伴随着恭陵。恭陵的重要陪葬墓哀皇后墓被盗了，这事发生在1998年，是有个叫张少侠的人带头干的。

张少侠早就听说了恭陵内有大量陪葬品的事情，对它垂涎三尺很久了，可是李弘的陵墓因为有流沙的保护不能轻易得手，于是他便把盗墓对象选在了旁边的哀皇后陵。他认为，既然李弘的陵墓陪葬品众多，他的妻子是殉夫而死，一定也会被风风光光地下葬，陵墓里面的宝藏肯定也少不了。况且，哀皇后陵没有那么多的防盗措施，比较容易得手。

1998年1月21日夜，即腊月二十三，附近大大小小的村庄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张少侠和自己的亲信许尔兴、刘克军、刘江海、宋彦军、范为民五人开始行动了。

趁着夜色，由张少侠开车，六个人带着刘江海准备好的绳子、耙子、探铲等作案工具，来到顾县镇一预制板厂内，捎上竹竿、铁锹等物，驱车至哀皇后墓南侧实施盗掘计划。车子停下后，六个人从车里跳出来，他们拿着工具对着一块空地一阵挖凿。这块空地，正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唐恭陵中的皇妃墓穴……

但大唐皇家优质墓葬工程，使他们的计划暂时受阻：土质坚硬，下挖根本无法进行。随后，在22日、23日夜，他们又分别进行挖掘，还是没有成功。反复商议后，他们决定运用爆破技术进行盗掘。1月30日夜，他们携带电线、炸药、雷管、引爆器及探铲等作案工具，熄了车灯，摸黑悄悄窜到哀皇后陵南侧，使用压缩爆破法等现代爆破技术进行盗掘。“轰”，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沉睡千年的太子冢的宁静被打破，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开……

之后狡猾的犯罪分子并未即时盗墓，而是将洞口虚掩，而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第二天晚上，他们才来到现场，挖开洞口，却失望地发现昨天的爆炸并没炸到应有的深度，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对哀皇后墓继续施爆。

几天之后，张少侠等人又来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对坑洞实施爆破。

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了。张少侠等又纠集了黄健刚、杨清斌等前来帮忙盗挖。2月4日凌晨一时许，沉寂的夜色里只听

张少侠突然发出疯狂的低吼：“挖到了！挖到了！”众盗墓贼围过来观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蓝颜色东西闪闪发亮，虽然张少侠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宝贝，但还是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怀中。

其他盗墓贼见状，也都开始趴在地上疯狂地扒拉着，最终盗掘出了让他们的心脏难以承受的大宝贝，诸如彩绘陶俑、瓷壶、瓷罐等，他们匆匆忙忙将哀皇后墓室内多达60余件的国宝装在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中，仓皇逃离现场。

1998年2月15日上午，恭陵墓地业余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哀皇后墓南侧有白灰痕迹。他有些奇怪，遂沿此线向下搜寻，结果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洞口。

保护员觉得非同小可，迅速将情况汇报到偃师市文管会。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樊有升协同正在偃师检查工作的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郭引强亲赴现场了解文物被盗情况，同时向偃师市公安局报案。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得知恭陵被盗一事后，在反映发案情况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河南从速破案，追回文物，挽回影响。

要知道，此时的哀皇后墓几乎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

2月15日，勘察过现场后，洛阳警方立即决定：控制海关出口，抓紧侦查，重点定在周围地区有走私文物案底、突然暴富的人身上，并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是一次时间的竞赛，显然，罪犯们跑得更快。

排查进行到第五天，哀皇后墓附近村镇的排查工作基本完毕，仍旧是一无线索。但就在当天晚上7时许，偃师市刑警大队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打来电话的是副大队长李全安：“我已经联络到一位知情人，将马上赶往他家进行协查，请立即安排警力支持！”

2月19日晚上7时，在一次排查中，有人向李全安透露，在洛阳市的一个乡里，有兄弟二人一夜暴富。突然发大财的人无论怎样遮掩，总也难以平复脸上痉挛般的喜悦，难以克制向人展示的欲望。

不到半个小时，李全安已经来到了知情人家中，警方在详细摸查中获得了破获“2·15”大案的重要线索。“线人”透露：洛阳市山化乡汤泉村的刘江海、刘克军兄弟二人，于春节前后曾经向知情人询问过文物买卖行情。这段时间，他们趾高气扬，出手大方，花销明显反常。

获悉这一重要线索，李全安立即向总部汇报，坐镇指挥的领导当即指示，要求李全安率两名侦察员进入汤泉村秘密核实线索、实地调

查。最后将刘江海缉拿归案，成为破获这一惊天盗墓大案的关键。

据刘江海交代：就在盗墓当天，张少侠等人就将包括蓝釉灯在内的64件国宝分类打包装箱。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少侠将文物转移藏匿，随后联络倒卖文物事宜。在被他们挖出来的古代瓷器中有一个瓷灯，上下各有一圆形托盘，像是灯座，瓷灯通体蓝色。张少侠挖出这件瓷器后就放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警方立即联系专家。专家分析，被盗哀皇后墓属于唐朝墓穴，张少侠极为喜爱的蓝色文物很有可能是随葬的灯座。如果为通体蓝色，很有可能是极为罕见的蓝釉器物，相当珍贵，很可能就是只有记载而从没实物的蓝釉灯。而烧制这种蓝彩器物的呈色剂钴，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代的一种装饰原料。不仅如此，蓝釉器物的烧制、上色也极为困难，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果这个蓝釉灯确实像专家分析的那样，将是全国首次发现的通体蓝釉器物。

警方根据刘江海这个线索，先后设计抓捕了张少侠、许尔兴等重大嫌犯，并抓获了多次倒卖文物的老手，本名陈正贤的阿然。

数小时审讯后，陈正贤交代，通过他和“老于”的联系，文物已经倒卖到了北京，蓝釉灯也很快脱手，共得赃款36.6万元港币。

这样，国宝蓝釉灯和众多文物的去向基本明晰了。

警方分析，由于陈正贤收到的是港元，蓝釉灯和众多文物很可能已经出境。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求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

2月26日，洛阳市公安局领导前往北京汇报案情，并请公安部协调有关单位抓捕“老于”。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查明“老于”原名于润明，手机注册地在天津。

抓捕小组立刻行动，赶赴天津将于润明逮捕归案。于润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购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别卖给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贩子，只有国宝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后，经请示公安部，并动用国际刑警，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国宝被追回后，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鉴别，看着一个个精美绝伦、见所未见的文物，专家们不由自主地惊呼：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这批文物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文物的价值，实际已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恭陵前，11名盗墓贼被就地正法。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国家一级文物，30件国家二级文物，12件国家三级文物，这些文物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服装服饰，以及雕塑、烧制、施釉、彩绘工艺的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这些文物与唐恭陵墓葬品相比，还只是九牛一毛。

这批被盗文物中，仅一件“马上人”彩俑在黑市上就价值1000多万元。

千年古尸遭毒手

在我国，有很多收藏古代文物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内的文物大部分来自于正规渠道，比如民间人士的捐赠、考古发掘等。但是，也有一些文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是因为盗墓贼的盗墓而被发现的。珍藏在荆门市博物馆内的“战国古尸”，就是因举世震惊的“中国第一古尸案”而被发现的。

荆门市四方乡位于江汉平原西部，南端与楚国古都纪南城毗邻。由于当地地处江南，交通发达，气候适宜，所以自古就是我国经济、农业的繁盛之地。随着经济的繁荣，那些有钱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死后也会有很多陪葬品陪葬。这就是该地区古墓众多而且藏有珍宝的原因。在这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高大的楚庄王墓、妃子墓群等300多座楚墓，无封无堆的平地墓葬更是无法统计。

纪山古墓群历尽人间沧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朝代的悲壮更替。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它依然基本保存完好。虽说历朝都有盗墓贼垂涎于个中财宝，也有不肖子孙“小打小闹”，但都没有形成“气候”。有史料记载，当年秦国军队攻打纪南城不破，秦军泄愤“火烧夷陵”，曾经焚毁了楚王家陵园的一部分树木和表面建筑，但并未挖掘墓葬。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财神爷”（文物贩子）背着成捆成箱的钞票在乡村游说引诱，四方乡的部分村民躁动起来。“要起水

（赚钱），找死鬼（挖古墓）”、“辛辛苦苦忙一生，不如晚上挖个坑”之类的顺口溜在村民中广为流传，一股群众性的盗墓黑浪突然在这里掀起。

“郭家岗1号墓”被盗就是有着众多人参与的盗墓事件，是由几批人分别进行的。

“郭家岗1号墓”被盗于1994年正月。那一年的春雨特别多，绵绵不断地竟然下了近半个月。这天上午，湖北省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文保员李太彪，两腿泥水赶了好几里路到四方派出所报案，声称郭店村一座特大古墓（后定名为“郭家岗1号墓”）被盗掘。四方派出所所长王海林一听古墓被掘，联想到近来盗卖文物猖獗，当即约请乡干部，带着干警戴清堂直奔盗墓现场。

“郭家岗1号墓”位于四方乡南约4公里的207国道西边1公里的一片油菜花地里。在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中央，被人为地掘开了一个直径约1米多的大洞。洞里黑咕隆咚，令人望而生畏，洞口周围散放着挖出来的五花粘土，足足弥盖了1分多地。在新翻出来的墓土中，掺杂着一些从墓中凿出来的黑漆棺木碎片。

文保员李太彪、民警戴清堂和所长王海林先后被绳索吊下墓洞中勘查。当他们拿着手电筒查看陵墓时，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高达5米的墓室被从中间掏了一个直径2米多的大洞，足足可供三四人同时活动。墓室的头厢、边厢都已经被盗墓贼破坏。安放在正室内的棺椁被斧头等利器凿开了一个不到1米的洞。棺椁内并无尸体，也没有一件完整的陪葬品，只发现了破碎的陶片和衣服碎片。墓葬内有很深的积水，他们在积水中摸了半天，试图发现一些线索，可是除了几片衣服碎片之外，什么也没捞到。盗墓贼真是做得干干净净。

由于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古墓被盗的事件，所长王海林在多年的破案过程中掌握了许多关于墓葬的知识。他根据现场陵墓的规格来判断，这个陵墓应该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墓葬，里面一定有很多陪葬品都被盗走了。

在警察抓紧时间破案的同时，还有许多人在暗地里忙活着。他们一边把盗来的珍宝想方设法销赃，一边对盗墓罪行进行掩盖。参与这次盗墓的人数十分庞杂，盗墓过程也很复杂。最早发现这个墓葬的是郭店村六组组长侯传洲和砖桥村九组村民冯卫。

这两个人对盗墓十分在行，经常盗掘当地的一些古墓，可是一直没有碰上过什么大墓。2月，他们二人再次相约外出寻找古墓，经过一番仔细探索，终于发现了位于郭店村任大冢子和郭大冢子之间油菜地里的一座大古墓。二人对这个大墓的发现都十分兴奋。当晚，他俩

即邀约了一伙人赶来盗掘。但他们还没挖到1米深，就被郭孝平和本组的几个村民轰走。第二天，好奇的村民纷纷赶到现场看热闹，郭孝平等人开始预谋盗掘此墓。

2月22日晚上，郭孝平和本组村民李华邀约其他六人，悄悄赶到油菜地掘墓。待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本组青年李立新带着另几个村民赶来，争着要挖。双方当场发生争吵，最后以“谁也挖不成”而散伙。

2月23日晚上，乡党代表、村民组长索祖才及其弟索祖贵，村民李立新、易诗武、何忠元、廖启发、易诗雄等9人，冒着鹅毛大雪，将“郭家岗1号墓”掘穿。黎明时分撬开外棺，打开墓室头厢，盗走镇墓兽、青铜鼎、漆木杯等205件珍贵文物。这伙人为了不惹麻烦，决定尽快把这些陪葬品出手，最终只卖了2万多元。

郭孝平在第一次盗墓失败后，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陵墓。但是，第二天晚上见有那么多人去盗墓，又有势力强大的村民组长做后盾，就没敢去。2月24日深夜，郭孝平迫不及待地邀约庞青龙、刘和清、郭永成、杨连发4个村民再次钻入墓中。这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享受到了上一拨盗墓贼的成果。他们见墓室的前厢已经被盗，就直接走进了墓室的边厢，从里面盗出了1对木桶、1个皮鼓、1只铜鸟、3个古瑟、1根矛、2个铜砣。这些文物被郭孝平联系的一个文物贩子买走，共得款13000元。这些盗墓贼走时为掩盖他们的盗墓罪行，又把土填了许多进去。

经过这两次盗墓之后，古墓被盗的事情很快就在当地悄悄地传开了。很多人都把目光盯在了这个古墓上，等待着再盗的时机。

2月27日晚上，细雨纷纷。村民郭永昌邀约陈必华、郭永成、郭永全、刘兴明和砖桥村的盗墓老手李宜海六人，带着铁锹、斧头、泥筲子、绳索等作案工具，再次到“1号墓”“复水”（重新盗掘）。直到次日凌晨4点，才将回填的洞中泥土掏尽。他们几个人轮流下墓打捞，只从外棺摸出了一件约40厘米长的木桶，就再也没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见没有收获都非常气恼，就决定打开棺椁拿里面的陪葬品。在一阵乱斧之下，原来外棺就已经被打开的棺椁没过多久就被凿开了一个可供人出入的大洞。冲在前面的几个人赶紧拿着手电筒往里面照，待看清棺材里的情景后都被吓得退了下去。原来，棺材内躺着一具完好的女尸。他们大为惊恐，纷纷缩回了手。胆大包天的李宜海见尸体的头上挽着一个髻，头发还是完完整整的。于是，他一边说“这把头发兴许还能卖个大价钱”，一边就狠狠地将这束千年古发一把扯了下来。这时候，他们中间突然有人提醒：“毁了古尸要杀头

的！”李宜海等一伙盗贼便急急忙忙地用稻草将棺木盖上，又朝洞里掀了一些泥土，仓皇逃离现场。

可是，回到家中的李宜海很是不甘心。他觉得费了那么大力气却只得到一把头发很是划不来，就又动了盗墓的心思。鉴于上次盗墓，其他人害怕的教训，他这次找到了与他经验一样丰富的郭孝平，企图强强联合。3月7日下午，盗墓贼李宜海来到郭孝平家。郭孝平说：“油菜地里的那个大墓里，听说还有一具尸体，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据说那尸体还是好好的，你想，过了几千年尸体还不烂，那死鬼口里肯定含有什么宝贝呢。”李宜海双目发亮神秘地推测。郭孝平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再加上本来贪心，就立即答应了李宜海的再盗请求。

这天晚上，李宜海、郭孝平带着本组村民李立新、李华、何忠元、陈必强、庞青龙、郭良银、杨连发再次来到了陵墓。这些人中，郭孝平、李立新等已经是第三次来盗墓了。他们清理好被回填的洞口后，就派了四个人下去。这四个人打开虚掩着的棺材，果真看到了李宜海说的完好无损的女尸。他们求财心切，顾不得许多忌讳，对着女尸的身体以及口、鼻、耳等器官一通乱摸，并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见没有收获，便询问上面的郭孝平怎么办。这时候，郭孝平从洞口窥探到尸体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愤愤地叫道：“没有宝贝，这死鬼身上穿的盖的也要值不少钱！”“对，先把死鬼弄上去，再把她的衣裳扒下来！”李宜海等人附和道。看看原有的棺木洞口太小，尸体拖不出来，郭孝平立马出洞回家，拿来做木匠用的斧头、凿子，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洞口扩成米筛大小。李立新把床绳锁在古尸的颈子上，上呼下应，拉的拉，送的送，一会儿工夫，就将这位在5米多深的地底下安睡了两千多年的“先祖”胡乱扯到了地面上，甩在泥水中。这时，女尸几乎是赤裸着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身上的衣服由于年代久远，又深埋地底，突然与空气接触，瞬间就变得十分脆了，再加上运输过程中的拉扯，衣服碎片都掉在了棺木内外。令他们惊吓不已的是，这具身材匀称修长、十指纤纤的千年古尸竟然丝毫没有腐烂，四肢关节都能弯曲，肌肉用手指一按还能弹起来。面对此情此景，盗墓高手们一时也惊呆了。

面对着这样的场景，左右人似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一具保存完好的千年女尸遭到他们的破坏，倘若事情泄露出去，每个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就连最为胆大的李宜海也不做声了。还是郭孝平比较镇定，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一定不能透出半点风声。为了掩盖罪证，他还提议把这具女尸拖到别的地方去掩埋。由于附近也有其他的墓葬因盗墓而留下的坑洞，他们便决定把女尸扔

到那里面去。众多盗墓贼拖着这具女尸的脖子，穿过一片荒野，将她扔到了一个坑洞里。为了更安全，他们还在坑洞里填上了厚厚的土。

然而，盗贼们并没有因此而终止犯罪。他们鱼贯窜入“1号墓”坑，将“先祖”穿的、盖的珍贵文物——夹棉花的丝绸棉被、丝绸衣服折腾成手掌大小的碎片，花花绿绿地装了整整一箩筐和一撮箕。又在头厢、边厢里打捞一通，摸出了典型的楚式乐器“虎座鸟架鼓”的残件（皮鼓前已被盗走）：两只栩栩如生的漆木凤鸟、两只虎座和两根鼓槌。之后，盗墓分子才满足地撤离了现场。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的确不错，由于参与盗墓的人数众多，肯定有人是保守不住这个秘密的，一些传闻便在村庄内传开了。

王海林随即带领民警展开调查。不久便有村民含糊其辞地告诉专办民警：墓中可能挖出了一具完整的古尸。听到这一消息，王海林立即将案情向沙洋公安分局、荆门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荆门市公安局接到汇报后十分重视案情的进展情况，还专门请来了四位考古专家勘察现场。考古专家来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确定，这座墓葬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古墓，根据墓葬的规模，可以判断里面有很多的陪葬品，而这些陪葬品全被盗墓贼盗走了。

3月9日一大早，四方派出所大门口出现了一份举报材料，上书：“挖大墓的至少有十几人，其中有郭店三组的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墓内有存放完好的古尸体（女尸）、竹书、丝绸等数不尽的古物，价值无法估计。”这份举报材料没有署名，可能是因为这位知情者怕被人报复。专案组经过一天侦查，证实了这份举报材料的可靠性。紧接着，又有几封举报信被偷偷地送到专案组。其中一封信详细地介绍了参加盗墓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并列举了郭孝平、索祖才、索祖贵、陈传道、李立新、李华、易诗武、易诗雄等人的名字。专案组的民警们结合其他的材料以及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这封举报信情况基本属实，遂决定在3月10日子夜抓捕相关盗墓人员。

3月10日晚12点，“零点”抓捕行动开始了。当天晚上烟雨濛濛，刑警科也派出三人参与抓捕行动，派出所干警和分局侦查员共10人，冒雨向郭店村三组闪电出击。路经郭孝平姐夫家门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人见到有人询问撒腿就跑。民警戴清堂认出这人正是要抓捕的对象郭孝平，便紧追上去，其余干警见状也及时围堵过来。终于在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将郭摁倒在泥水里。

此时，郭的姐姐、姐夫、爱人等七八个人拿着铁锹、木棒赶来干扰执法。他们有的抱住警察的腰，有的拖住警察的腿，试图挽救郭孝

平，这些人的无理取闹实在太过猖狂。无奈之下，王海林所长只得鸣枪示警，但是并没有吓退这些疯狂的人们。又经过十几分钟的撕扯和较量，干警们才冲出人群将郭孝平带走。

然而，抓捕郭孝平的一场意外冲突惊动了其他盗墓贼，他们如惊弓之鸟连夜逃遁。

凌晨2点，泥猴似的郭孝平被带到四方派出所。这小子一进派出所，就躺在值班室的水泥地上翻来覆去直打滚，又哭又闹，声嘶力竭地叫嚷“冤枉”。吵得干警家属和周围的居民都不能入睡，怎么也制止不住。

面对这样一个泼皮，一位民警急中生智，“唰”地拔出手枪，大喝一声：“把他拉到纪山墓地枪毙算了！”另外几名干警心领神会，一拥而上，扯起郭孝平就要往外拖。望着黑洞洞的枪口和威严的干警，气势汹汹的郭孝平顿时吓瘫了。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一边叩头一边哆哆嗦嗦地对干警们说：“不要枪毙我，我有罪，我坦白！”待郭孝平静下来之后，干警们端来热水让他擦洗浑身的泥水，又找来一件棉大衣让他披上。接着，第一轮审讯开始。

这时的郭孝平扮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很快就交代了他于1993年7月伙同其弟和邻近江陵县的三名案犯盗掘一座古墓的犯罪事实。其实，这起案件早已了结，江陵的三名主犯已在1993年冬被判刑，其弟郭孝元也被押送劳教。当时，因考虑到郭孝平家庭的实际困难且又是初犯，才对他免于刑事处罚。后来，经审讯人员多方面做工作，双方一直较量到天亮，郭孝平才又吞吞吐吐地交代了自己曾经参与盗掘另外三座古墓，参与销赃文物10余件，得赃款2000元的犯罪事实。但让人气恼的是，无论干警们怎样介绍优待政策、怎样耐心启发，郭孝平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参与盗掘“郭家岗1号墓”，也根本不知道该墓被盗的情况。

第二天，专案组先后接到了9名盗墓贼的投案，并抓获了3名潜逃的盗墓贼。从这些人的口中，专案组得知他们盗得的文物已经都被卖出去了，郭孝平确实参加了盗墓。但是，这些人中却没有一人参与盗女尸，因此对女尸的下落一无所知。

这样，郭孝平就成为警方手里知道女尸下落的唯一的人。要想查找女尸的下落，就只有从他口中找突破口了。公安人员对郭孝平进行了八次审讯，但都没有任何成果。无奈之下，干警们只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他们认为，郭孝平的妻子可能也是知情者，便对她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长达半天的说服，郭妻终于承认丈夫参与了盗墓，但不知详情。她给丈夫写了一封规劝信，劝他坦白交代所犯罪

行，争取宽大处理。

当郭孝平看了妻子的信后，两眼湿润了。他也许是受了妻子的感化，吐露了盗墓的事情，但对女尸仍是闭口不谈。他知道，那是保住自己性命的关键所在。

4月11日，一位参与盗尸者迫于压力投案自首，并坦白了参与盗掘“郭家岗1号墓”的经过，称古尸被郭孝平等拖出来后就不知去向了。紧接着，再次提审郭孝平。郭孝平见自己的罪行已经被同伙揭发，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只得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经过这次提审，民警得知，郭孝平将女尸身上的丝织品卖给了一个叫文昌海的长沙人。郭孝平还供述：文昌海，满脸络腮胡，身高体壮，行动诡秘，专以贩卖文物为业，此人有“大哥大”（手机），说不准还有武器。文昌海两次接头、提货都是驾驶一辆银灰色吉普车。

4月14日上午，荆门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从泥坑中发掘了这具千年第一古尸。这位被转移、藏匿达39天的古尸重见天日的时候，虽仍未腐烂但浑身已经发黑，伤痕累累。她的臀部、小腿、右手、踵部等处的皮肤大面积破损，髋关节、颈部骨骼已被拉脱，那截绳索依然系在她的脖子上，绳索下有一道深深的勒痕。但是，就是这样，这具女尸的肌肉仍旧富有弹性，四肢仍能弯曲，可以想象她在地下时保存得是多么完好。经专家鉴定，这具女尸活着时生活在战国时期，距今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这具女尸是我国发现的外形、皮肤、骨骼等保存最完整的年代最久远的一具湿尸，是稀世珍宝。

1995年5月23日，“郭家岗1号墓”的盗墓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主犯郭孝平、李华、李立新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参与此案的另外十几人也均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几经周折，干警们终于查出：文昌海，32岁，曾是长沙市某纺织企业职工，已被开除一年多了，此人居无定所，1993年5月至12月，因贩卖文物被沙市（今荆州市）西区派出所收审。

6月30日上午，追捕组终于查出文昌海在其弟文昌洪的原居住地活动。当日下午3点，两名公安干警化装成卖香蕉的商贩蹲在一香蕉摊旁，注视着马路上的动静。另两名侦查员扮成过路歇凉者，把守在该楼的出入口。另有民警守候在楼梯口的另一隐蔽处负责接应。下午，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了楼梯口，车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4名侦查员见状，尾随二人上楼。民警操着一口江陵话喊了一声：“文昌海！”文昌海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在确认了此人的身份后，民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文昌海，并给其戴上了手铐。

经审讯，文昌海交代丝织品包装在一只灰色密码箱里，藏在荆州邮电局汽车修理厂厂长王海鹰的办公室里。当晚9时许，侦破组又一鼓作气驱车荆州，抓获窝赃犯王海鹰，将女尸身上的丝织品缴获。至此，经过公安干警的艰苦奋战，“中国第一古尸案”终于宣告破获。

三彩牵出盗墓案

2004年夏，美国华盛顿市市民哗然：从白宫到地方，从国会要员到初进学门的孩子，从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仰慕崇拜的古文物研究专家到略知一点汉唐文化的人，莫不对在白宫不远处美国弗里斯展览大厦首次展出的中国文物精品感到震惊。

在不绝如缕的人群中，人们对唐代制作的一匹大型三彩骆驼更是驻足长观。连欧共体来美国参加某联席会议的官员们，也闻讯于会议间隙参观了包括远从夏、商、周直至明清时代出土的历代中华文物精粹。三彩骆驼缘何有如此轰动效应？原来，它是中国迄今出土文物中体积最大、色彩最佳、形象最真、姿态最美、制作最好的一只三彩制品，尤其是它的长期隐秘不露。

世界许多文物专家、教授和数以千计的古文物收藏家，早就听说数年前中国公安部门曾破获一唐代帝王墓被盗挖特大案件，起获一尊三彩骆驼，但侦破过程、有关细节，哪怕是“骆驼”的出土照片，外界连一点影踪也概莫能知！1997年正值香港历经百年沧桑回归祖国怀抱，又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8周年，尤其是喜迎中共十五大的胜利召开——三喜临门的大吉大利大喜大庆之际，有关部门决定把中国最好的国宝之一——一尊唐代三彩骆驼，从专门珍藏该物的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启运，由专人保卫，秘密护送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据不完全统计，开展第一天，仅在三彩骆驼前合影留念的参观者即达1000余人。三彩骆驼轰动了世界。

1997年6月27日，当三彩骆驼密送北京的时候，有些精通文物的专业人员已经觉察到它的身世不凡。是的，这样的绝世珍品肯定不是侯王将相的佐品，更非一般官宦豪门所能拥有的，它的品级证明只能是唐代万民之尊的帝王墓中的珍贵殉葬品。那么，三彩骆驼到底是哪位帝王陵墓的陪葬品呢？是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母后武则天，抑或是唐代哪个帝王的爱子，或者是大圣天尊武后皇帝的娇女？它又是怎样走出千年墓穴，跨过1300多年的历史隧道，走进20世纪90年代末的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呢？在它身上，藏着一个世人难悉的出土

之谜。

在历史上，唐中宗李显其实是个站在女人背后的君王，他的一生被两个女人挟持——母亲武则天和妻子韦氏。这位软弱的皇帝死后葬于定陵。定陵，位于陕西省富平县北15里的宫里镇三凤村北的凤凰山。凤凰山由三个东西排列的石灰岩山峰构成，靠北围绕着一个半圆形的高峻山梁，中峰由山梁正中向南伸出，形似凤头，左右两峰对峙，尤如凤凰展开的双翅。从南远望，仿佛一只美丽的凤凰在浩瀚无际的太空翱翔。中宗定陵地宫就在凤凰山下。

在正中山梁凿石穴为墓，并按乾陵的制度，凿石雕各种石像。原有石刻50多件，已经战乱及附近居民盗石材凿器，陵园及四门石刻几乎被洗劫一空。现仅有南面一个石狮、一对石人比较完好，东门及北门虽然有石狮、石马，但都残破不堪，而且没有王宾立像，那些乾陵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陈设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如同模制的石人石马之类的雕像。

定陵也有一通无字碑，其高大不亚于乾陵的碑，但遭到了破坏，被镌（juān）作72个碾地磙子。虽然没有留下尺寸记录，但从改镌的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它高大的程度。它与当时的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只能看做是旌饰陵墓之物，而后代帝陵又没有沿用，就只能看做是陵制中的一点差异。

定陵亦有陪葬墓，陵园周围20公里，有节闵太子重俊，五位公主：宜成、长宁、成安、定定、王同皎及永寿韦锣。八个陪葬墓皆为皇族，反映了唐室的衰微，统治阶级皇族内部不稳，君臣离心离德。

陵园为长方形，坐北朝南，地形北高南低，由南面向北分为多层台地，而以陵墓为最高点。

1997年3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买卖三彩的案件。3月17日，许多古文物专家已经济济一堂，聚集在市公安局一间足有1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他们不仅带来了各种鉴定古文物的有关仪器，而且还带来了照相机、录像机。他们按照市公安局领导的要求：要一次到位，当场鉴定出结果！文物鉴定专家惊得目瞪口呆：中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土过如此规模的唐三彩碎片。此刻，当早上的霞光刚刚爬上西安巍巍的古城的时候，许多古文物专家先就外部彩釉作了初步甄别鉴定，认为其颜色调配绝非一般民间艺工所能操作，系唐代皇室的专门御工御窑能工巧匠手下之品，其色泽、其匀度、其耐蚀耐损的程度，都充分显示了唐代高超的技艺水平。然后，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将碎片摆放了差不多五六十平方米，然后东拼西凑，整整用了8个小时，拼对出几个很不成形的物体。面对初步拼凑出略具真体感的三

彩物件，他们纷纷表示：不是唐代譬如唐太宗、武则天的帝王陵中之物，起码也是与帝王关系至亲至密的贵人墓中的珍品！

这些代表唐代最高陶瓷工艺水平的三彩对象的归属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3月17日深夜，一场审判与反审判的激战进入高峰，凌晨4点半，犯罪嫌疑人张红朝终于在预审员的攻心战中败下阵来，作了初步交代。

原来，本案另一犯罪嫌疑人杜虎三在煤城铜川混不下去便南下富平县，想发点文物财或找点零杂事做做。这天凌晨他便溜到富平县留坝乡、华朱乡、宫里乡一带，举目所见，在那野草萋萋的原野中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古墓、古碑。他找了一个封尘最小的墓头，在墓头周围来回转了七八圈儿，仔细察看墓座的外貌，做好下手的准备。

此后，他便找到之前在西安的酒友张红朝，两人一拍即合。杜虎三之所以找张红朝一起干，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张红朝家住西安，便于匿赃，而且西安是古文物倒卖走私的一个集中地，容易将货及早出手、及早发财。

经过一天的周密设想和准备，第三天，还在似明似黑的黎明时分，杜虎三就性急地起了床，悄悄地拍醒了还在打鼾熟睡的张红朝。二人将短把铲、锹、刀、绳等作案工具，分别装进两个长条形大宽带双用旅行包内，继之乘晓月余辉，奔向长途汽车站。半个小时，汽车便开到富平县城关镇。等到晚上10时许，杜、张二人摸黑来到留坝乡与宫里乡之间的唐王朝显贵们的墓群之间。他们东寻西索，好半天才找到杜虎三日前探好的那座小型墓陵。二人你一铲，我一锹，直挖了两个多钟头，弄得汗水淋淋。他们连铲带挖、边捡边堆地掘出不下千八百块陶片。由于泥厚黏难挖，不免磕磕碰碰，撞碎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三彩物件。

之后，杜、张二人将地面上的唐三彩碎片先装入筐中，又将墓穴中堆放好的碎片一袋一袋运上来，整整装满了11个竹筐，外加一塑料编织袋。他们趁着夜色，连夜用摩托三轮将赃物运往西安。

虽然张红朝交代了罪行，但杜虎三坚决不承认，只说自己和张红朝到富平，从当地农民手里买的这些碎片，并没有盗墓。不久，杜虎三在拘禁期间脱铐而逃。

为了尽快破案，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处第三科科长雷尊都又将寻找勘查作案现场的人员兵分两路：孙建林几人押着张红朝去寻找被挖墓穴现场，自己率领张君等人去富平县城内文物局，请他们根据情况予

以帮助，从更广泛的范围寻找作案人的走向和作案现场。

雷、张等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文物局，局长老杨迅即陪同雷尊都等直奔宫里乡。这里是近几年来富平古墓被盗最严重的区域。老杨介绍了两三天前，宫里乡的东下仇村10号陪葬墓有可疑迹象。护墓和联防治安队员们在巡逻中发现附近有旅游鞋印，并在远处发现唐帝王的驸马王同皎的墓冢被歹徒开掘的洞口，洞穴也很深。

听到这里，老雷心弦陡地一颤：杜虎三和张红朝所穿的鞋正是旅游鞋，且盗墓所得的唐三彩，光碎片即十余筐，绝非驸马王同皎的墓冢所能拥有。于是，现场的大体方位可以基本划定，杜、张所挖掘的古墓，肯定就在以10号墓为中心的附近地区。

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局等部门派来的专家在取证、研究、化验、分析发掘的遗物后一致认定，宫里乡10号古墓就是竹筐内出土唐三彩片的源地。张红朝在物证前也承认：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地点。

同年6月，杜虎三在山西落网。杜虎三的归案，使案情昭然若揭。尽管杜虎三仍对犯罪事实避重就轻、遮遮掩掩，但人证、物证均在，其犯罪事实确凿，预审人员笔录翔实可靠，杜虎三最后不得不认罪。

那么，10号墓中的“主人”到底是哪位显贵呢？

据中国唐代《风水卜易经》记载，这块地方——云缭雾绕的凤凰山下，是一个属于“附雅”（即陪葬贵人）的“物象”水文的宝地。文物人员据史证实，此墓系唐中宗李显的陪葬墓。而墓葬主人，应该说是李显的女儿。可李显女儿颇多，10号墓的真正主人，又是这些公主中的哪一位姣姣者呢？这一疑问却成了悬案，因为既没有公主史料可查可考，又无野史辅证，更未从10号墓中发现墓志铭及载有主人身世、生平、历史的石碑、石碣或其他有关遗物。因此，此墓是唐中宗李显的哪个女儿的陵室，断难论定。

战国宝马遭盗掘

俗话说“七十二陵八十二台，不知赵王哪里埋”。在邯郸县与永年县交界部的丘陵地带，有三大陵墓，邯郸县境内又有四大陵墓，分布在三陵乡一带。《邯郸县志》记载：“战国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葬于此。”

前386年，各路能工巧匠在邯郸大北城西南建成了一处高大的建筑，看起来像一个临时的行宫，但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地方必定还有更大规模的动作。于是，赵王迁都的消息开始在邯郸城里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到处翻飞。

赵王，即赵敬侯，名章烈侯子。前386年即位。元年，赵始都邯郸。

消息很快得到确认。一天，从南边大路过来大队喧腾的人马，掀起滚滚的黄尘。人马簇拥着一辆华贵的辇车，车上便是新登基的赵敬侯。他刚刚平定了公子朝的叛乱，没有在原来的都城中牟多加停留，就按着既定目标，浩浩荡荡地直奔邯郸而来。对这个新都他充满期许，幻想着能给他未来的国君生涯带来好运，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运，江山永固。

赵国都城邯郸像一张巨大的伞盖，将赵国之前的邯郸的样貌遮了个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水泼不进，只允许人们瞻仰作为伞盖的张扬。只是，伞盖恢恢，也有疏漏的时候。赵敬侯到这里的时候，书写在竹木简上更早时候的甲骨文，他或许没有看到，而刻写在甲骨上的零星文字，隐秘地透露了这个城市的起源。安阳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写着“王往于甘”，这个“王”，说的是商王武丁；“甘”，说的正是邯郸。一本叫《竹书纪年》的书里也留下了商纣王在邯郸建离宫别馆的记载。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同时又是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勾连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商纣王在朝歌自焚而亡，朝歌逐渐陷落，而他曾嬉戏作乐的邯郸则悄然崛起。舍弃旧都中牟，是因为中牟几近赵魏两国边界，邯郸北距中牟不远，又深入赵国内地，优势不言自明，赵敬侯怎能视若无睹呢？更何况赵国都城还在晋阳时，一次赵氏家族内乱，起因就是当时的卫国贡500家到邯郸，按每家5口计算，邯郸一下子能够安置2500口人，其实力可以想见。应该说，邯郸的交通、经济状况相比中牟而言，更适合赵国的发展。

从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到前222年赵国覆灭，在这中间经历了八个王侯，其中七个均埋在邯郸境内。既然有王侯葬在此地，那么盗墓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1997年10月18日21时许，邯郸县陈三陵村一村民悄悄来到赵王陵2号墓下放土夹子捕捉野兔，突然发现陵台古冢上有人影晃动，便不顾一切地奔回村去报告。村支书马上拨通了县公安局“110”报警电话，40分钟后，巡警队员们就驾着警车赶到墓地。

在墓洞内正挖得起劲的盗墓分子，没有听到顶部同伙的呼叫。这

时盗墓人刘晓民、熊素灵、孙金龙等已挖至30多米的深处，又由于有人在洞顶向他们输氧气，所以他们在洞底挥铲剜土忙乱异常，一点儿也没有听到同伙喊他们撤退的声音。当刑警一行七八人突然袭至墓穴时，刘等正为挖得珍宝而高兴。他们忽见洞顶有人打下一道白亮亮的手电柱光，未及明白，便听有人猛振着嗓门儿朝下喊：我们是公安局的，都上来！

被盗的就是赵王墓群中的2号墓。

邯郸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迅速成立了“10·18”赵王陵墓被盗案侦破领导小组。他们根据被盗现场勘查分析，这伙人绝非初次盗掘古墓文物，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更大的专业犯罪团伙。于是，刑警们兵分两路出击，追捕当夜出逃的盗墓人。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山西侯马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很快便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原来，远在此案发生的半年前，孙金龙、刘晓民即伙同另一盗墓人王春保，组成一个专盗赵王墓的掘墓集团，先后两次到邯郸赵王墓，进行疯狂盗挖，盗走了青铜马、金缕玉衣片等墓中陪葬物。此盗墓案由大文物贩子杨巍（系北京人）一手策划。

就在获此线索的第二天凌晨，这个杨巍竟鬼使神差地用暗号频频呼叫起一个自首的团伙成员、爆破能手K，让K“速到江苏邳州去做生意（指参加盗墓活动）”。

干警们不顾劳顿，先后转战江苏省邳州市和山东省苍山县，终于将杨巍擒获。

就在此时，3月份与杨巍一起盗掘赵王陵墓的另一主犯王春保，因盗掘江苏省铜山县楚元王墓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专案组决定移师江苏，突击提审王春保。

王春保如实坦白：1997年2月，他与杨巍、孙金龙、刘晓民等几个“盗墓专业户”在预谋第二次盗掘江苏铜山的楚元王墓时，与山东、江苏团伙发生内讧。杨巍见自己无从插手，便提议北上邯郸盗掘赵王陵。

3月份几人赶到邯郸，杨出面找来五个河南人就动工了，领头的自称叫“万森”。他们挖了五个晚上，炸开风筒进入墓室，万森发现墓道里有一具散碎的骷髅，手一捏即成粉末。这个“经验老到”的盗墓人据此判断此墓可能元末明初已被盗过，“油水不大”了，于是，他带着那帮河南人撂下杨巍他们撤走了。

对于万森说的“油水不大”，杨巍和王春保并不认可，他们不肯就

此罢手，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已经投入了不少钱，不想没有任何回报。于是，杨巍又从河南、山西唤来八个“掘墓工”，继续向前推进，他还从涞源调来了一辆吉普车，20多天盗挖不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9点以后用车将人和工具拉到现场。挖到墓底9米多深后，又横向掏掘了8米。

4月7日凌晨2时许，随着“叮当”的声响，盗墓人的眼中闪出了贪婪的绿光：三件造型各异的青铜马！再往前挖，宝贝滚滚而来——一块兽面铺首、一副纯金腰牌，还有209枚金缕玉衣的散片！

在昏暗的墓穴深处，孙金龙悄悄地对刘晓民说：“咱们把青铜马交给上面的杨巍，玉片和金牌先埋藏起来，以后自己再来取。”狡猾的杨巍在墓顶上看到了出土的青铜马后心中窃喜，但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仍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什么破铜烂铁，不值钱！”他给了“掘墓工”2000元当做路费，众人便作鸟兽散了。

孙金龙、刘晓民等佯装回家，当晚又返回墓地，取出了金缕玉衣散片和金腰牌，迅即返回老家山西侯马。就这样，200多件价值连城的赵王墓文物，分成两路流失了：杨巍得手的三件青铜马和一块兽面铺首，转手给了“后台老板”李强；孙金龙、刘晓民回山西老家后，由王春保等人将上述文物暗藏在一个秘密角落，吃喝一顿后，王春保想起了绰号“能人”的袁伟祥。袁伟祥系老牌文物走私贩，其人精练老到，经验丰富，联络广泛，与港澳等文物不法之徒据说有“内钩”，既出手快又能卖出高价，所以王春保立刻想到他。但王春保同袁不太熟，于是找到河南文物贩子刘坤玉，由刘做中间人接线搭桥，这时，袁伟祥正在安徽省的安庆、桐城一带处理一批走私文物，听到消息后马上从安徽桐城赶到山西。一番讨价还价，刘以12万元的价格，从王春保等手中购下了金腰牌、玉衣片、玉圭，共计259件（片）被盗文物。刘又以36万元倒卖给袁伟祥，袁倒手将文物卖到了境外。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特别是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那两个从“掘墓工”手里得到玉片的文物贩子刘坤玉和袁伟祥推断，赵王陵墓中的宝贝应该远不止这些，于是决定再一次铤而走险，再盗赵王2号墓。然后就有了10月18日晚东窗事发的那一幕。

至此，赵王陵2号墓数次被盗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可是被盗的文物又在哪里呢？

1998年秋天，赵王墓被盗特大案案犯刘晓民、熊素灵、孙金龙等被邯郸市公安局刑警队巡逻队员擒获。但是，令执法人员和记者特别遗憾的是，当时被中国考古学家颂之为“罕世孤品”的青铜马、金缕玉衣和纯金带钩等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以及考古与收藏价值极高的一批

国家级珍品，却均不幸被黑手转销国外，从而给邯郸公安局刑侦人员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一直在顺藤摸瓜的邯郸警方得知，那个取走青铜马的李强已潜逃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避风”。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迫其回家并追讨文物。万般无奈之下，李强于1998年3月偷偷潜回国内。到北京后，他先后通过不少关系找邯郸警方“投石问路”，甚至不惜花巨资欲打通“关节”，保那些文物贩子“过关”。4月17日，“活动经费”已快用尽的李强慌里慌张地南下郑州，希望再搞最后的一次交易，并弄些活动资金。在郑州，他通过一个文物走私“老相识”，在金水路一私点买到一只宋朝宋徽宗年间制作的夏日磁枕，价格2万余元，然后即乘车前往山东青岛市。在那里，他想卖给从海上来的文物走私者，价格起码可以翻一番。

可他哪里想到，他在郑州暗中交易的情况，已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的便衣警察瞄得清清楚楚，但遗憾的是，当干警们奔赴李强住的雨光饭店捉拿李时，却已人去屋空。据李下榻饭店的服务员讲，李早订好了去青岛的车票，现已离开宾馆多时。

凄凄惶惶犹如惊弓之鸟的李强，正在列车的颠簸中进行着各种幻想，不曾想，几名公安人员走过来，核对好他的身份后，亮出拘捕证。

原来，青岛铁路公安处接到郑州公安局金水分局要求协助的电讯后，立即布置任务，此刻，未费吹灰之力，即将其擒获于车厢之内。

李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4月中旬，他在北京燕京饭店，将那三件造型逼真的赵王墓青铜马以18万元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得知这一消息，邯郸警方立刻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追讨文物。

半个月后传来消息：被李强出卖的青铜马等文物已从美国运抵香港，将有专人护送到北京。5月6日凌晨3时许，一直停在宾馆一公里外观察动静的一辆红色宝马车载着三件举世罕见的“战国宝马”，静静地驶进宾馆。经现场文物专家和邯郸警方验证，所交还的文物正是赵王陵2号墓被盗的三件青铜马和一个青铜铺首。

李强落入法网之后，邯郸市公安局又派富有刑侦经验的刑警王宏晋、马英君、申编生三人急赴安徽桐城另一犯罪嫌疑人袁伟祥家中。

王宏晋等向袁的家人首先讲明此案关系重大，指出袁伟祥如能晓理明义，迅速将被盗的赵王墓中的文物原件交回，积极配合公安人员，从法律上讲，是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的，但如果拒不交出，情节加重，后果自负。

袁伟祥的家人表示：袁现在不在家（实际上已潜逃国外），等他回来，我们一定催他赶紧送回所盗窃的文物。

其实，袁伟祥和李强一样，在知道赵王墓被盗案东窗事发、众盗墓嫌疑人纷纷落网后，心神不安，坐卧不宁，于是慌慌忙忙潜逃国外。但是，袁伟祥心里也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自己总不能整天提心吊胆地流落在异国他乡吧。

这时，袁伟祥又从国内得到消息：邯郸市公安局已发出国际追捕令。对此，袁伟祥惊恐万分，感觉末日已到，危在旦夕！

恰在此时，袁又从家乡得知，公安人员已去其家数次做工作，令其必须速速交回从赵王墓中盗走的文物！

袁伟祥更是心惊肉跳、心乱如麻，他深深感到大势已去，可能很快就会被警方捉住，何况，家中人此刻也必定为其忧愁不安。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袁伟祥终于在1999年5月向安徽桐城公安局发出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与政府配合。1999年5月25日，桐城警方通知邯郸方面，袁伟祥委托律师已将金缕玉衣散片等文物，交给了桐城公安局。

1999年6月2日，王宏晋等一行三人三下桐城，终于使下列国家瑰宝完璧归赵：金缕玉衣玉片258枚，赵王所佩铭文金台饰一只，玉圭……

1999年6月17日上午10时，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中年警官手提黑色密码皮箱，缓步走进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会议室，200多件流光溢彩的稀世之物跃进了众人的眼帘！500多天的追剿，2万里路的围捕，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

四天后，中央电视台郑重宣布：震惊中外的“10·18”邯郸赵王陵墓被盗案全部告破，流失海外的200余件珍贵文物悉数重归祖国怀抱。

陪葬陵墓难幸免

前207年12月，刘邦所率义军率先攻入秦都咸阳；前206年被义军盟主项羽封为汉王，封地为汉中、巴蜀（因此在战胜项羽后建国时，国号定为“汉”）；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定陶城边的汜（sì）水北岸称帝，7月建都长安。

登基后，刘邦采取的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

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具有决定性的贡献。他死后便葬于长陵。

长陵，又名“长山”，也叫“长陵山”。位于西安市中心以北约20公里、咸阳市以东约20公里的窑店镇三义村北的咸阳塬上。整个陵区由陵园、陵邑和功臣陪葬墓组成，北王九嵕，南临渭水，气势雄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陵是刘邦生前为自己修建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对陵园四周进行测量，发现陵园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为780米，周长3120米，与文献记载大致吻合。当年东西并列着两座陵墓：西边是高祖陵，东边是吕后陵。陵园内建有寝殿、便殿。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供宫人侍奉。

刘邦陵冢位于陵园偏西处，形如覆斗，系夯筑而成。底部东西153米、南北135米，顶部东西55米、南北35米，封土高32.8米。陵前有清乾隆年间毕沅所书“汉高祖长陵”碑。《汉旧仪》记载说汉代皇陵地宫是“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此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六车六马，皆藏之。四方外涉，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长陵至今尚未发掘，地宫内部结构不得而知。

吕后陵在高祖陵东南280米。其封土形状与高祖陵相同，冢高30.7米，底部东西150米、南北130米，顶部东西50米、南北30米。此陵与高祖陵“同茔不同穴”，即埋在同一墓地，但各自起坟。这可能是为了表明刘邦与吕后关系密切的缘故吧。再西，是其子惠帝刘盈的墓地——安陵。

长陵以东是陪葬墓区，绵延达15里。根据史书的记载，萧何、曹参、张耳、田蚡、周勃父子等功臣贵戚大都陪葬于此，唐代诗人唐彦谦有诗云：“长陵高阙此安刘，祔葬累累尽列侯。”这些累累连绵的坟冢，从某种角度再现了汉初文治武功的盛况。

1966年，在长陵附近出土一批玲珑精巧的玉琢小件，其中一件骑手驭马奔驰在刻有云纹的托板上，观之有天马行空之感。

长眠于三秦地下的汉王刘邦，生前无论如何不会料到，1998年夏秋之交遭受了一场虚惊。

8月正是陕中大热季节，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的村民魏明、尹行想趁早晨的片刻凉爽，赶到自己承包的玉米田里，准备再耪（pǎng）一下地。谁知锄头尚未入土，魏明突然发现10米开外的一片玉米似乎少了许多。前一天还好端端的庄稼此刻竟东倒西歪，走到

近前，他不由惊呆了——地上出了一个5米左右的深坑。

魏明正忐忑不安，只见同村的尹行拨开玉米叶子，喘着粗气向他跑过来，满脸惊疑地说：“老魏，坏了，我那块大田被炸了。”惊疑半晌，两人才几乎同时说出一句话：“赶快去报案！”

不到一小时，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文物派出所的7名干警，在所长苏东明的率领下，赶到案发地——正阳乡后排村汉王刘邦陵宫附近的一片原野。

长陵气势雄伟，内中秘密难测，盗贼缘何知道墓穴之门在此处，进而炸穴？带着种种疑问，干警们开始了艰难的勘查。

被炸开的地洞直径约1米，深约5.2米。几个洞大同小异，系用TNT一般炸药装置所爆破。从现场泥土纷落痕迹和洞内土质状况分析，案发时间为昨天午夜12时左右。从遗留的尚可辨认的10余处步痕、鞋迹看，作案的是一团伙，男性，在三人以上。

可惜的是，收集到的鞋迹“破案含量”不高，因都是这一带几乎所有农民所共穿的赭红色塑料底式的布鞋。更令干警们遗憾的是，他们把浮土都搜遍了，被炸的洞中竟没有发现一丝遗物。干警们顺理推断，建议暗中设伏、蹲点守候。为稳住盗墓人，魏明、尹行等农民故意装做不知此事，不到出事地点干活。

“作案人昨天刚刚炸开洞，还没来得及用锄、锹等细挖探掘陵墓。墓中的宝物尚未找到，他们决不会罢手。”挥着热汗的干警们望着深坑认真地剖析着。

“对，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吧！”干警们顺理推断，建议暗中设伏、蹲点守候。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出事的玉米田中竟没有一丝动静。半个月过去了，经过化装的文物派出所的蹲点干警们，一个个晒得皮肤黝黑、脸上脱皮，也没有发现一点异常。

“静中有动！”渭城分局的领导一再叮嘱侦破人员要“耐得住寂寞”，越表面风平浪静，越是鲸鲨窥视猎物的关键时机！

果然，9月30日，国庆节的前夕，在万人休闲欢庆的气氛中，就着忽明忽暗的月光，几只黑影飞快跳入一个月前被炸开的洞内刨掘起来。干警们猛扑上去，对着洞口一声厉喝，锹声立即停了下来。六名作案分子一个个爬上了坑沿儿，头发上、脸上、身上满是尘垢。

在预审室里，作案人吉水平、消新城、杨占军、王金虎等供认不讳：他们是有预谋进行盗墓取宝的小集团。为求得准确地址，他们搜

查了不少市、县志，以及其他文物资料，测定这一带很可能就是汉高祖刘邦及其嫔妃的陪葬墓地，其中肯定埋藏着许多贵重文物，所以决定盗墓。作案人还一一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特别是如何挖坑、填装炸药、装置引爆、实施爆炸的细节。但是，他们矢口否认他们挖出了帝王的陪葬品，其中吉水平甚至交代说："我们连汉王刘邦的一只纽扣也没挖到。"

绝不能掉以轻心——干警们经过反复实地勘查，无数次审问、分析，发现6名作案人确实是在挖掘帝陵的初始阶段被抓，刘邦陪葬墓中的陪葬品确实没有露出地面，没有造成流失。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魏明、尹行等人将丰收的玉米打入粮囤，当那被炸得遍体疮孔的洞穴被一一填平，当辛勤的秦川农民准备好优良的麦种，行将播种冬小麦的时候，西安市公安局文物缉查处副大队长刘华清，却听到了一条惊人的信息：有人准备私下拍卖一批价值高达10多万元的高级出土文物。

——电话里，传来了一位女性举报人的声音。

从语音中听得出来，这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女子。她说，她并不十分清楚这批出土文物到底是些什么，以及其他详细情况。但这个情况（私下拍卖）绝对是真实的。

这个女人还敦促公安人员赶快行动，否则，文物有可能转移到外地拍卖。

哦？刘邦墓被炸的消息刚刚传来，余音尚在耳中萦绕，这里又出现这么贵重的文物要拍卖，绝非巧合。刘华清眉头紧锁思索着。

经过进一步侦查证实，要拍卖这批文物的货主不远不近恰在咸阳，而且正好在刘邦墓所在的同一个辖区。经过追踪侦察，卖方说这是一批真正的"鲜货"（指刚刚出土的文物），绝对是"高层次"的"宝物"（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而且"要量有量"（数量较多，成交可观）。但是，卖主反复强调，此批货只向广东客人和港、澳同胞出售，内地人或者当地人一概"免开尊口"。

几经周折，伪装成买主的干警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张锁元抓捕归案。张锁元系咸阳市渭城区人。1998年中秋节前夕，他听说在汉王刘邦墓前的大平原上有人炸洞，心头一阵惊喜，暗想：这不是财神爷叫门儿来了么。他原想打听打听炸洞者是谁，与炸洞者一起盗墓取宝，但觉得与炸洞者素不相识，怕不好打交道，于是便只身一人，偷偷摸摸地到被炸的玉米地中暗中窥探。说来也巧，在一个洞旁的浮土中，他竟发现一片面积三四厘米见方的彩色陶片。呀，这不是和临潼秦始

皇陵墓前出土的兵马俑一样的玩艺儿嘛。想着，他急急走回村，找到村民徐养民、何永利、崔民主，几个人蹲到一棵大树下，密谋赶紧准备就洞挖掘，走在炸洞者取宝的前头，以免炸洞者抢先把墓宝盗走。

不过这时风声已紧，他们只好暂时蛰伏下来。当先行炸洞的吉水平等六人被拘捕之后，当长陵东北部100余米处、被炸的洞口被农民刚刚填平复原之时，张锁元等不早不晚，就在那个节骨眼上连夜出动，疯狂地掘刨起来，直挖至子夜1时许，才挖出第一个守卫刘邦墓的陪葬品——彩陶武士俑。接着，便是第二只、第三只……直至挖出第107只，张锁元等才将洞口又作了填埋修整，看看一切恢复如旧，然后乘着黎明前的星光月色匆匆遁去。

天网恢恢，盗掠文物的犯罪分子终究没能躲过法律的制裁。107件刘邦墓陪葬彩陶武士俑已完好无损地被西安市文物部门珍藏起来。这些白步兵俑、骑兵俑和乐俑等组成的汉代兵马俑，造型精美、多姿多彩。威武的武士俑，身披铠甲，有的背上还挂着方形箭囊。重见天日的武士俑以另一种方式守望着长陵。

蓟县古墓被盗记

蓟县，古称渔阳，春秋时期称无终子国，战国时称无终邑，秦代属右北平郡，唐朝设蓟州。新中国成立后，属河北省辖县，1973年9月划归天津市，相沿至今。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地处京、津、唐、承四市之腹心。蓟县许多古墓的被盗与我国清朝时的大贪官和珅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说，若和珅活到现在，一定可以获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就是最贪的贪官。他的贪不仅在清朝无人可比，就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和珅这个名字到现在似乎已经成了贪官的代名词。

和珅（1750—1799），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住北京西直门内的羊肉胡同。年纪轻轻就被乾隆重用，28岁就担任了军机大臣等要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和珅可以说是十分有才的，他不仅相貌英俊潇洒，学识也十分渊博，还十分善于察言观色，很懂得讨乾隆的喜欢。前前后后，和珅共得宠20多年，成为满清第一宠臣、第一权臣。在多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权势与心机到处收受贿赂、收敛钱财。他的家产

甚至比国库还要多上许多倍。但是，他最后卷入宫廷权力斗争中，而那个对手就是后来的皇帝嘉庆。因此，他的斗争必然会失败。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乾隆皇帝）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20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也是和珅儿媳妇的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家拥有土地80万亩、房屋2790间、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玉器库2间，其他布庄、粮店等店铺几十处，财产的三分之一就价值2.22亿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而乾隆时期，整个国家的年收入才只有7000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国家年收入的近十倍。因此，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尽管嘉庆查抄了和珅的家产，但是，并没有查抄他的儿子丰绅殷德的家产。因为丰绅殷德的妻子就是嘉庆的妹妹。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后，和府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一般情况下，皇帝在登基之后都会马上为自己修建陵墓。也就是说，活人为自己准备身后事。和珅也效仿皇帝，在他还未亡之时便给自己选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来营建自己的陵墓。这块风水宝地就坐落在现在的蓟县。据史料记载，和珅十分重视陵墓的修建。因此，陵墓的规模十分宏大，其豪华程度竟然能够与皇家陵墓相比。到嘉庆年间，陵墓还未修好。和珅死后，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埋在这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并不敢把被皇帝赐死的父亲埋在如此豪华的陵墓里，于是陵墓一直空着。后来，这个陵墓成了丰绅殷德的陵墓。

蓟县有座和家坟，相传就是和珅家族的陵墓。这个陵墓占地50多亩，由上百座古墓构成，规模十分宏大。但是，具体哪座是丰绅殷德的陵墓却不得而知。因为有着和珅的关系，这些古墓成为了盗墓者觊觎的对象。盗墓贼认为，既然和珅是个大贪官，那么他死后的家产有很多可能被放在了陵墓里。在陆陆续续的盗掘中，曾经发现过一些玛瑙、瓷器等陪葬品。这就给盗墓者增加了信心，他们一心要找到那座传说中拥有无数财宝的陵墓。

终于，和氏家族墓地大规模被盗案发生了。2001年，赵松海组织

了一批人盗掘了八座古墓，其中的大量陪葬品失踪。

赵松海由于经商不善，亏了很多钱并欠下了大笔债务。为了摆脱困境，他把希望压在了盗墓上。他早年就做过一些盗墓的勾当，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盗墓者。他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蓟县境内有许多古墓，并得知这些古墓中很有可能就有和珅生前修建的陵墓，便“慕名”而来。来到蓟县后，赵松海结识了当地人祁某。颇为巧合的是，祁某也是一个以盗墓为业的人，并对当地墓葬有一定的了解。这两个盗墓贼碰到一起，要发生什么事情，便可想而知了。祈某告诉赵松海，官庄村的东后子峪经他长期观察可能存有一大片古墓，很有可能就是和家的墓地，但墓葬的具体地点还需要进一步探查才能确定。赵松海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当即就与祁某约定一起打听查找墓葬的具体情况。在查找的过程中，他们结识了同是当地人的卢某。卢某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盗墓队伍。为了更加省时、更加精确地探测陵墓位置，这伙盗墓贼还用上了探测仪。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赵松海等人仍旧无法确定陵墓的具体位置。而且当时并不是盗墓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正值初秋，陵墓坐落的位置正好处于一片庄稼地中。由于有庄稼的阻碍，盗墓很难施行。因此，他们决定先做准备工作，等秋天庄稼收割完毕再盗墓。

在这段时间里，这三个盗墓贼谁也没有闲着。为了以最快的速度盗墓，又不被人发现，同时确保能够顺利地盗取墓葬，赵松海专门从内蒙古请来了在盗墓界很有名望的大春、小春等专业盗墓人。祁某、卢某则在蓟县准备了许多盗墓用的专用工具，比如铁锨、铁镐、探头、钢钎、斧子、撬杠、提篮等。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陵墓所在地的庄稼也已经收割完毕。没有庄稼的阻碍，他们认为，盗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几位专业盗墓者的带领下，这群盗墓贼展开了新一轮的查找陵墓的行动。但是，尽管有许多盗墓专家坐阵，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虽然这些人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可是对陵墓的线索一无所获。

这些人里，最不想放弃、最不死心的就是赵松海，因为他在这次盗墓中不但已经花费了手头的资金，连做生意时攒下的老底都搭进去了。他见直接寻找无结果，便想通过其他的方式，从外围下手争取能够得到一些陵墓的信息。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提到过，盗墓贼会通过与当地老乡聊天、攀谈进行摸底，了解情况。当然，他们并不会明目张胆地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而是拐弯抹角地旁敲侧击。终于，赵松海从当地的一位老者口中获得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那位老者说，在一块田地上有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标记的墓葬群。这个墓葬群的来头可能不小，因为曾经有来自北京的人祭拜过。赵松海听到这个消息十

分兴奋，他想有墓葬群，而且有北京的人祭奠，那不说明这个墓葬群可能与和珅的陵墓有着重要的关系吗？

赵松海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当晚就带着人去老人所说的那片田地勘察。他们用钢钎等工具不断地向地下试探，果真发现了墓葬群，并确定了墓葬群的详细位置、陵墓的大小等具体情况。

赵松海等人的盗墓行动正式开始于2001年11月。他们一共进行了五次盗掘。赵松海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在第一次盗墓时并没有到达现场，而是在远方对盗墓队伍遥控指挥。而盗墓者为了不过多地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大多是从晚上11点多开始挖掘，第二天天亮前离开。他们用钢钎测探好古墓内棺椁的位置，并测量好棺椁离地面的距离。待做好这些工作后，就号召所有盗墓者从墓室的侧面入手进行发掘，直接挖到棺椁所在地。挖到棺椁后，他们就用斧子等利刃将它们打开，取走里面的陪葬品。因为有先进的工具，同时又有专业的盗墓贼作为技术指导，这使得盗墓行动进展十分迅速。在这次盗墓中，他们窃得明末清初白釉酱口罐2件，清代包金发簪、翠手镯、翠佛头各1件。

第一次盗墓得手后，赵松海面对着丰富的随葬品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亲自来到了盗墓现场，直接参与了盗墓活动——11月的一天深夜，赵松海亲自出马，带领众人去盗墓。这次的盗墓并不顺利，他们刚刚对两座古墓挖掘了一半，就惊动了当地的百姓被他们报了案。警察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赵松海等人仓皇逃跑。

但是，利益的驱使并没有让他们把警察的威慑力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一干人等见事情平息了下来就又开始了盗墓。第三次盗墓也发生在11月，赵松梅带领着一些同伙，盗掘古墓两座，窃得清代银托鲁宾石戒指、包金錾（zàn）花手镯、翠帽花、翠佛头各1件，翠琥珀朝珠1串、宝石6件以及部分衣物。

第四次盗墓发生在12月的一天深夜，赵松海再次带领众人以同样的方法盗掘古墓两座，窃得清代松石串、翠佛头各1件。

2002年1月，赵松海的手下董付生等5人再次来盗墓。当他们正挖掘古墓时，民警赶来，董付生见状立即逃离了现场。

这伙盗墓贼从2001年10月一直干到2002年1月，前前后后共盗掘了八座古墓，得到了大量的陪葬品。

可笑的是，这伙盗墓贼虽然做的是死人的买卖，但却十分迷信。为了避邪，不被陵墓内的灵魂所惩罚，他们将盗墓工具的木制把手全部都染成了红色，就连盗出的陪葬品也要用大红的布包裹起来，以起

到震慑的作用。

盗墓成功后，需要把盗得的随葬品出手。赵松海把出手的地点选在了唐山。赵松海的销赃之路走得并不顺。他们刚到唐山就受到一伙人的抢劫，随葬品都被这伙人抢走了。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盗得的财宝被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走了，赵松海十分不甘心。他通过自己在唐山的朋友，很快就摸清了那伙人的底细，并向他们追讨财宝。与此同时，赵松海也正在受着警方的追捕。

盗墓贼接连光顾这个古墓群，引起了蓟县公安机关的重视和注意。公安机关对此地进行了现场的实地勘察，确定这座古墓群为清代墓葬，其中有八座古墓被盗。公安机关立即对此事立案侦查，并成立了专案组。干警们通过多方努力，抓获了卢某、祁某。根据这两人交代的情况，专案组民警奔赴唐山市，将赵松海及其他几名盗墓贼抓获。蓟县警方通过对赵某等人审讯得到的信息，确定了内蒙古的盗墓贼的下落，并远赴内蒙古将他们抓获。至此，这起重大的蓟县古墓被盗案落下了帷幕。

赵松海被捕后，十分后悔自己的盗墓行为，配合警方破获了抢劫案，追回了被盗文物16件。其他文物因为已经被他们卖掉而无法寻回，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伙盗墓贼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2002年，蓟县法院对“蓟县古墓盗窃大案”作出宣判。赵松海等10名大盗犯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至11年，并处以不同程度的罚金。

第三篇　盗墓与反盗墓

盗墓和防盗措施是针锋相对的。盗墓行为猖狂不断，防盗措施也进步不断。防盗措施稍有新花招，盗墓贼很快又有了破解技术。于是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总体上看，防盗措施始终处于被动和落后状态。

第十六章　盗墓是危险的死亡之旅

盗墓活动凶险多

中国民间盗墓者分布各地，人数众多，其行动大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古代一般是两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

同伙之间的相互诡诈，是盗墓者面临的一个凶险。这两人多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这就是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亲戚的原因了。

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较少，这也许是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作不知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欲远远大过人的理性。所以盗墓者的合伙，除了关系极好的朋友之外，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独吞宝藏自相残杀。合伙人数最高限定在五个人以下，除了保密的原因之外，防止因为分赃不均所导致的内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盗墓者和别人合伙，最需要对方讲究“义”字这个前提。一方如果见利忘义，起了邪念，那么另一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必死无

疑。

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无法抑制人的邪恶之心，所以盗墓者之间互相残杀的例子多不胜数，舅舅和外甥之间、叔伯和侄子之间等等、铁哥们儿之间，不断上演着人性的悲剧。

相比较而言，在墓室外等候的人总比进入墓室盗宝的人占有生存的优势，如果墓室外的人想独吞宝藏，很容易就能做到。而在墓内盗宝的人要想独吞宝藏，则要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在墓穴中取宝的时候，将一些珍宝偷偷掩埋，等待时机第二次盗取，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还有的人将一些小的金银玉器生吞到肚子里面，第二天从大便中排出来，这也是极其凶险的做法。金银玉器一旦吞食下去，极可能危及生命。

1961年发掘的武则天乾陵陪葬墓的永泰公主墓时，在墓道的第六号天井内，发现了一具只剩下一堆骨架的死人残骸——坐状，男性，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骨架旁边放着一把斧头，尸骸的头骨掩藏在墓道的淤土中，头骨北面一米远处堆放着大量的金玉饰品，墓穴中有多处人为盗挖的痕迹。

通过这个片段我们可以推想：百余年或者数百年前，盗贼甲和盗贼乙是关系亲密的合伙人，当他们发现了这个永泰公主的墓葬之后，欣喜不已。于是日夜谋划，制订了合理而又严密的偷盗方案。一天夜间，他们摸黑打通进入墓穴的盗洞。盗贼乙进入墓穴掠取宝藏，分几批将宝藏运送到地面。地面上的盗贼甲看到成堆的宝物，顿时起了歹心，便将二人平分财宝的约定抛在脑后。盗贼乙将大部分的宝物全部送上地面之后，怀揣余下的宝物，摇动绳子，示意上面的盗贼甲将他拉上去，眼看接近洞口地面，盗贼甲双手一松，盗贼乙惊叫着跌落下去，脑袋重重地碰在旁边的淤土上，顿时昏迷过去，斧子扔在了一边，身上的宝物洒落一地。盗贼甲赶紧将上面的土填埋下去，将下面的盗贼乙活埋致死，携带众宝逃之夭夭。可怜的盗贼乙，只能化做冤魂，在墓穴和永泰公主长期做伴了。

这种由于人性的贪欲所导致的凶险，杀伤力极高，防不胜防。

挖坟盗墓遭报应

自古以来，盗墓都属于“暗夜中勇敢者的游戏”。作为一种最见不得光的职业，任何社会制度的主流舆论，对于盗墓行为都持反对谴责

的态度；各个社会时期的法律，对于盗墓者的惩戒都是很严厉的。如果盗墓者没有案发暴露，很难受到法律严惩。这个时候，社会道德和人类伦理的合理威慑，就会发生作用了。社会通过法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对盗墓者进行惩戒。甚至用了最恶毒的杀手锏——“诅咒”，设计出了让盗墓者“遭报应”的人生结局——盗墓者大多不得好死。

报应，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现象，中心思想就是讲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易·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此来规劝坏人尽早弃恶从善，洗心革面，不要再做伤天害理、忤（wǔ）逆人伦之事。

报应，是古代民间对盗墓者最厉害的惩戒诉求，他们希望恶果尽快降临到盗墓者的身上，让他们遭受掘人祖坟所带来的严惩。在中国古代盗墓传说中，报应与“死复生”、“僵尸”一样，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报应存在的主观条件，则是古人意识鬼神概念。无论在正史、野史还是民间传说中，都流传着盗墓者遭受恶报的故事。古代民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盗墓者在挖盗坟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现象，比如雷电狂风，疾雨大雾，或者一些神异动物的暗示等等，对盗墓者作出警告，劝其尽快罢手，否则将会遭到严酷的报复。

天衣寺的僧人福闻挖盗了坟墓之后，趾高气扬，借助当地豪强的势力强抢乡民的财产。乡民气愤不过，聚集了20多人在道路上伺机报复福闻，将福闻乱棒打成了肉酱。而参与行凶的众人，因为当时刑法不明，再加上法不责众，只是各自受到了杖责。

《涌幢小品》是明朝人朱国祯所著的笔记体小说，里面记载了一则盗墓者身患恶疾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张十五的宋朝人，家境贫寒。看到园中有古墓，于是发掘，将里面的铜镜等随葬品洗劫一空。时间不长，竟然得了“瘇（zhǒng）毒”，每天狂叫“杀人”，直至死去。

清朝文学家袁枚编撰的《子不语》，记述了好多稀奇古怪和神怪荒诞的奇闻轶事。其中一则名为“掘冢奇报”的小故事流传甚广：

杭州有一位墓葬巨盗朱某，是盗墓圈的大腕级人物，技艺高超，经验丰富，一生之中盗墓无数，掠宝无数。朱某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陈述盗墓经历时，说道：“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绿僵、毛僵之类。”他所进过的陵墓，有“圈门石户，广数丈，中有铁索，悬金饰朱棺”，以及“朱棺甚大”、“有四铜人如宦官状，跪而以首承棺，双手捧之，土花青绿”等情形。

在一般人眼里，盗墓者不忌讳鬼神，不怕因果报应，属于无神论者。其实不然，朱某虽然干着盗墓的勾当，肆意扰乱阴人的居所，却

是一个信奉鬼神的人。每次在挖掘墓葬之前，总要向神灵或者卜算能手占卜询问吉凶与否，以及墓穴中随葬品的丰厚多寡。

西湖边上，有一座岳王庙，供奉着岳飞的牌位。一次盗墓前，朱某去岳王庙问卦，岳王对朱某说：“汝发冢取死人财，罪浮于盗贼。再不悛（quān）改，吾将斩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盗取坟墓，掠取死人的钱财，罪大恶极，超过了一般的盗贼。你如果再不悔改，我就会将你杀死！

这个警告，是十分严厉的。朱某听罢惊吓得半死，从此决定改恶从善，金盆洗手，永远退出盗墓行业。

常言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年过后，朱某对于自己立下“退出盗墓界”的誓言逐渐淡忘，岳王对他的严厉警告也已不放在心上。心痒难耐的他，决定复出江湖，重新开始他的“盗墓传奇”。

按照惯例，朱某在行动之前寻神问卦，向西湖水仙打听墓葬珍宝的多寡。西湖水仙告诉朱某，在某塔之下有一处大富豪的坟墓，里面藏宝丰富，掘之可得千金。

朱某一听便动心了，不顾岳王的警告，与同伙前去盗墓。朱某找了半天，经神灵指点才找到。掘开后发现，下面有一口石质大棺材，很沉重，六七个人根本扛不出来。坚固异常，无法打开。后请来附近庙里一位有秘招的和尚帮忙，却因此出事——没成想“高僧”竟然被墓穴中的妖怪生擒活捉、撕裂吃掉了。寺庙里找不到人，以为是被朱某谋害的，便去官府告发。结果朱某因为这个官司弄得家破人亡，悔恨之下，于狱中上吊自杀。

盗墓是一种极端无耻、极不人道的犯罪行为，应该遭受恶报。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人们对盗墓者都是极其痛恨的。在社会道德层面上进行强烈的谴责，也就是凭借岳飞之口，对朱某进行严厉警告：盗墓者不得好死！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良心谴责之下，盗墓者即使一朝暴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从朱某所陈述的经历来着，他确实堪称“以发冢起家”的盗墓专家，而最终遭遇恶报的情形也极端悲惨。当然墓中“青臂出，长丈许”的说法，只能是经过夸张渲染的传闻。以上这些宣扬盗墓遭恶报的传说之所以盛行，是与社会舆论对盗墓行为的否定分不开的，它与官方法律、宗法制度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打击盗墓、维护社会人心稳定的屏障。

盗墓报应一说，除了恶报之外，还有规劝、告诫的意思。这种劝诫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出于对报应惩罚的恐惧和敬畏，有些盗墓者

金盆洗手退出了盗墓行业，有些盗墓者为了悔过，又将得来的财宝完璧归赵，送回墓中。

《太平广记·墓冢一》中记录了一个叫杨知春的盗墓贼，把盗来的东西送回墓内后，又主动向官府自首，结果避免了人身意外。

这事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当时有一具千年僵尸，因坟墓崩塌而得以复活。僵尸复活后，也不吃饭，喝水吸风就能生存，时人称他为“地仙”，也有人叫他“狂人”。僵尸经常在吴、楚、齐、鲁一带出没，知道地下什么地方埋藏有金银财宝。

有两个盗墓贼求卦地仙，得知盛唐县地界有一座叫“白茅墓”的古墓，里面埋藏着大量的金银珠宝。盗墓贼纠集了十个人前往盗窃，杨知春就是其中之一。

当他们进入墓穴的时候，看见墓穴里面一共有四间墓室。东边的墓室，全部摆放着刀枪、弓箭等兵器；南部的墓室，全部是丝织品，中间有一个梳妆台，分为上下两个格。上面摆放着上等的布匹，布匹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周寿王所赐锦三百匹”。下面一层，全部是金银珠宝、玉石宝器；西边的墓室，全部陈列着漆器，漆面光滑鲜艳，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北面的墓室里面，停放着一口玉石制作的棺材，里面躺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少女，皮肤红润有光泽，牙齿如贝壳般雪白整齐，头发乌黑稠密，就像正在睡觉的真人一样“俨然如生”。玉女的身材，高矮适中，胖瘦得体，就像画上的美女一般。棺材里面的衣服被褥、绣鞋罗袜散发着缕缕清香。用手抚摸玉女的身体，还带有体温。棺材的前面，摆放着一个银质酒樽，里面装满了美酒。盗墓者竞相饮酒，酒味甘甜芬芳，是人间少有的佳酿。

喝了墓中的酒后，盗墓贼开始搜罗里面的金银玉器、绫罗绸缎。女尸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玉环，盗墓贼都争着去抢摘。杨知春劝同伙不要摘了——已搞到了不少财宝，不要再为一只玉环再抢了。同伙并不理会他，其中有一个盗墓贼情急之下，竟然用刀将女尸的手指砍了下来，断处竟流出赤豆汁一样的血来。杨知春于心不忍，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规劝了同伙几句。同伙怀疑杨知春靠不住，担心他心肠太软，嘴巴不牢，将盗墓的事情泄露出去，于是起了杀心，要将他杀死。

这时候，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同伙们举刀砍向杨知春的时候，瞬间互相之间变成了陌路仇人，九个人互相残杀起来。经过一番惨烈争斗，九个人全部死去。杨知春认为这是墓主显灵救了他一命，于是立即将已经收拾好的财宝，放回到墓穴中，按照原来的样式摆放整齐，钻出墓穴，用土填埋好后，到官府自首报案，将盗窃的过程和情况详

细禀报官府。官府于是派了20多人，将古墓修葺完善，但是墓志铭始终没有找到。

第十七章　反盗墓技术
——黑暗中隐藏的杀机

绞尽脑汁防盗墓

《晋书·索綝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陵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畜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

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坚固陵墓、防盗机关、诅咒恐吓、秘密埋葬、疑冢假坟、厚养薄葬、不留骨灰等。

防盗绝招是薄葬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盗墓贼横行，盗墓风潮迭起，其根源就在于国人的厚葬之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多达数百件的大型墓葬。进入阶级社会，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特殊体现便有厚葬一条，被列为四书之一的儒家经典《中庸》中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人死之后要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对待他，这才是孝道的体现。因此，古代人会把最珍贵的宝物与墓主人葬在一起，使之成为随葬品，跟随墓主人长眠地下，墓葬中的文化遗存往往代表了当时社会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古代中国人也乐于用繁褥奢华的丧葬来显示死者和生者的显赫权势。

历朝历代，以帝王为首，人们无不在修建墓葬时竞相奢华，以显示生者的孝道和死者的尊荣。然而，厚葬之风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那就是吸引了无数追逐利益的盗墓者。“丰财厚葬以启奸心”，墓中丰富的随葬品极大地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很多人因发掘古墓而一夜暴富。盗墓，甚至可以维持一个政权、一支军队的开支。于是一个个利欲熏心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突破道德的约束，无视法律的制裁，铤而走险，加入盗墓者的行列。于是便出现了“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这种令人惊讶而又是必然的现象。

另一方面，古代的鬼神之说认为墓葬是人类死后的安魂之所，人们为了死后继续享受生前的尊荣，也会将墓葬修建得富丽堂皇，宛如人间的殿堂。汉代的大型墓葬仿照人生前的殿堂建造，墓室最多的可达十多个。唐代帝陵之雄伟甚至可以占据整个山峦。墓中的随葬品更是汇集了当时的奇珍异宝，重达数百斤、代表中国古代青铜制造工艺巅峰的司母戊方鼎，做工精巧、质地昂贵的金缕玉衣，黄金质地、工艺精湛的草原牌饰，这些象征时代与民族的物质文明载体，无不被用做随葬品深埋地下，长伴死者。长眠于骊山的，不光是秦始皇，还有他生前喜爱的玩物。在秦始皇陵中，发现了珍禽异兽坑，坑中动物骸骨密布，它们都是为秦始皇殉葬的。唐太宗李世民曾下令将钟爱的王

羲之作品《兰亭序》随葬昭陵，致使“天下第一行书”就此湮没。先秦时期的贵族阶级更是用人来殉葬。

厚葬引发盗墓狂潮，人们有目共睹，但却很少有人提出相对合理的解决办法。其实，从根本上杜绝盗墓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薄葬。

汉文帝是最早提出薄葬的皇帝。《汉书·文帝本纪》中记载：“遗诏曰：‘联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汉文帝名刘恒，汉高祖第三子。早年封代王。封地在今山西。太尉周勃等人平定吕后之乱后，迎立他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以节俭而著称，在位的23年里，坚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减轻赋役，省略刑狱，使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又采取措施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从而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便是在临死前遗诏中也念念不忘厚葬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要身体力行改变这种社会现象，命令“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这就是中国古代依山为陵的开始。

对于自己建陵一事，文帝一改前代帝王移土起冢的惯例，选中了灞岸白鹿原北麓做自己的陵寝，下诏依山为陵，不另起坟。他主张薄葬，反对国丧扰民。生前，他曾敕令治丧期间，民间“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书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文帝驾崩之后，丧仪十分简单，灵柩远至陵园，迅即入土为安”。附近的百姓对此十分不解，许多人甚至怀疑墓穴内并无灵柩。但文帝又是一个好皇帝，于是在好心人中便流传起一个“天葬汉文帝”的美丽传说。宋朝时候，霸陵附近更是建起了一个莫灵庙（又称莫爷庙），进行纪念。

西汉成帝也下旨薄葬。与文帝不同的是，成帝禁止厚葬是因为当

时社会上奢靡之风日盛，皇帝不得不下旨提倡节俭，禁止婚丧奢华。但成帝的薄葬命令只是针对百姓。他自己依旧厚葬，大兴土木，征发徭役。

仿佛是为了继承祖先遗志，东汉时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纷纷标榜薄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一股薄葬的风气。先秦的大禹、墨子、庄子，西汉的文帝，东汉的光武帝等人都要求或者实行过薄葬，但并未对社会上层厚葬形成冲击，薄葬仍属于反传统的个人行为，正所谓“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实施范围广，延续时间长。

魏晋时首倡薄葬的是曹操，他临终的遗命就是：“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是中国最早将薄葬事宜具体化的诏命。曹操本人就是当时最大的盗墓贼，曹氏集团的发迹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曹操设置的专门负责盗墓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曹操当然深谙树大招风、厚葬之墓最易被盗的道理。曹操去世时正是三国鼎立初具规模之时，遗命薄葬既可防范盗墓贼，又能减轻负担，将精力用在对抗吴、蜀两国上。

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继承曹操遗志，继续提倡薄葬。曹丕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未有不发之墓这一事实，他在生前留下这样的遗命：“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曹丕的薄葬可谓至极，堂堂皇陵，棺椁仅能容身，随葬品只使用陶器，便是寻常百姓丧葬也不会如此简略。更值得一提的是，曹丕死后，下葬事宜严格按照他遗命所说，真正做到了薄葬。

当时，薄葬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士族的家规和一般平民百姓的自觉行为，以法令的形式推行以节约社会财富，以支持战争和应对灾荒，如478年北魏孝文帝下诏：“厚葬送终，则生者有靡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朕今宪章旧典，只案先例，着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当时具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士族对薄葬也采取拥护态度并定为世代相传的家规。如刘宋时张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恩𬨎车，诸子以焉”。亲友对薄葬的支持更进一步体现在敢于拒绝皇帝和权贵对逝者官爵与助葬费的馈赠上。当时还有许多支持薄葬的社会舆论，提供理论根据，使之形成史上罕见

的现象。如皇甫谧在《笃终论》中说："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

而到了隋唐盛世，仍有人不断提出薄葬，他们中的代表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唐一代的帝陵也多依山为陵，其原因是李世民认为依山为陵能够节省修陵的人力和开销。他在诏书中说道："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盗墓贼求的只是珍宝，如果墓中没有值钱的随葬品，盗墓者还能来偷盗吗？因此唐太宗要求自己死后，陵墓中不藏金玉、俑和豪华器皿。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乱世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很多皇帝依旧标榜薄葬，尤以明清两代为多。只是这个时候的薄葬多是皇帝崇尚英明节俭的面子工程，因而很少提到防盗之事。

历史上提倡薄葬的帝王众多，但真正身体力行、践约薄葬之实的却并不多。第一个提倡薄葬的汉文帝，虽然他大力提倡薄葬，但《汉书》记载，修建霸陵竟动用民夫数万人之多，地宫中的随葬品更是"多获珍宝"。

正史中记载魏文帝曹丕的陵墓果如他遗命中所说的那样，可曹操是否真的薄葬正史中却没有记载。但野史中广为流传的七十二疑冢倘若属实，那曹操的薄葬也是一个谎言。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丧乱的缘故，帝王们的墓葬也不封不树，以致今天我们也难寻其踪影，看来是真的做到了薄葬。

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薄葬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昭陵占地面积达2万余公顷，周长60千米，地面上礼制建筑齐全，城垣环山起伏，石雕林立，建造这些地面建筑和石雕便要耗费惊人的人力与物力。地宫内的随葬品更是奢华，盗墓贼温韬便在盗掘昭陵时发了一笔横财。唐太宗的陵墓修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还随葬了珍贵的钟繇、王羲之等前代大书法家的真迹，可见李世民的薄葬之说并未付诸实践。

至于明清两代帝陵更是修建得奢华异常，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无一不是辉煌壮丽，陵园至今仍然巍峨绵延。

迁户守陵最有效

薄葬是最简单的防盗措施，但是却被弃于一旁而不用。也许是因为薄葬不能够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影响，所以厚葬之风难以抑制，为了防止陵墓被盗掘，就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其中，用人力守护墓葬来防盗，是最有效的反盗墓方法。

中国历来就有“守冢”的习俗，也就是守墓。即在墓葬的旁边安置棚户人家，负责看守，一则尽孝道，二则防范盗墓。两汉时期，父母长辈去世后，儿女就有“守孝三年”的习俗，为双亲守墓三年。更有节义孝子，守墓时间长达十年。

帝王的陵墓有“迁户守陵”的方式，也就是将一定数量的人口迁移到自己的陵墓周围，进行居住、生活，看守陵墓。西汉时期，淮南王刘长由于身犯了谋反之罪，被汉文帝流放四川，在途中自杀。于是，汉文帝十分伤心，以列侯的身份将刘长安葬，并且将30户人家迁徙到刘长陵墓前，为其守灵。列侯如此，那么地位身份比列侯更尊贵的王公乃至皇帝，迁户守陵的人数就更多了。

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时期皇帝即位一年后，就要考虑陵墓的建造了。选定墓址之后，就要规划陵邑的建设。所谓陵邑，就是在墓葬旁边修建城市，陵邑的规模很大，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这种防盗的方法，效果良好。盗墓者一般行动隐秘，盗掘对象大都是偏远、荒凉的陵墓，对于处在繁华之地的陵墓，因为人多眼杂，不会轻易得手，所以也就不会向这些陵墓下手。

迁户守陵制度除了防盗，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将原来六国的王室贵族，作为人质全部迁徙到咸阳守灵，以此要挟六国臣民不敢造反。汉朝建立后，刘邦大量分封诸侯，造成了诸侯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为了加强统治，刘邦施行迁户守陵制度，将各地的豪强全部迁移到关中地区，以此要挟各地诸侯，不得擅自妄动。这样既消弱了地方力量，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被迁移守陵的人因为没有享受国家的俸禄，只是被动地迁移，变更了生活地点、生活环境而已。这些人对于墓葬的情况十分熟悉，往往监守自盗。于是，守陵防盗的办法也破产了。

既然迁户守陵不可靠，那么就动用武装力量来守卫皇陵。在明代，为了防盗，国家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专门设立了神宫监军，对皇帝的陵墓实行严格的保卫工作。神宫监军下面分设各个部门，有类似于现代巡警和警卫部队的巡山军、巡逻军，还有御女军、御马监

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组织严密，部门全面，人数众多，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明嘉靖年间，除了上述组织之外，还另外设立了“永安营”和“巩华官”，兵力分别为4000人和3000人作为机动部队。平时在教场操演练习，一旦发生情况，就能迅速地执行任务，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石椁铁壁齐上阵

除了隐藏墓址、虚设疑冢之外，将棺椁和墓墙建造得坚不可破，也是一种防盗手段。

关于“石椁为葬”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檀弓上》：孔子在宋国居住，有一天看见司马横魋（tuí）在为自己制作石椁，便好奇地询问，才知道横魋已经制作三年了还没有完成。孔子感慨地说：“要是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早点死了烂掉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秦始皇“发北山石椁”；《汉书》卷三六《刘向传》也记载，汉文帝有过“北山石为椁”的愿望：有一天汉孝文帝行经霸陵，感慨万端，说道：如果在北山修建石椁，应该十分坚固，后人“岂可动哉”。汉文帝设想死后安葬，以石为椁就是防止盗掘的最有效方式。

石椁，即石板制成的棺椁。水库式墓穴墓主人的棺椁一般为石制，至少最外层的椁是用厚重的石板制成，然后再用上等木料制作一层或多重棺置于其内，木棺石椁的缝隙用粘性胶状物漆封其间，以阻止渗水入棺毁坏尸体与陪葬器物。若封闭得好，这类棺椁对尸体的防腐性能和防盗作用远胜于纯粹的木棺木椁。

用石椁者历史上并不罕见，现有无数石棺石椁出土。

石质棺椁的运用，确实曾经作为普遍的防盗措施。而铁壁来防止盗墓者的入侵，可能是更为有效、更容易操作和更为常用的防盗手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铁壁，并不是真正用铁打造的铁壁，而是以石门封闭，后设顶门石的形式做成的防盗措施，做成之后犹如铜墙铁壁。此种方法比较普遍也比较简单，一般多用于券洞墓，特别是帝王的陵墓多用此法。

春秋晚期的晋国赵卿的墓葬，在墓墙的四个角落，每隔一米深，就放置一块重约50公斤的大石头；在椁室周围，堆积着严密紧凑的砾石。墓穴内也堆积着厚约1.2米的砾石层。这种防盗措施别说偷偷摸摸的盗贼，即便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时候，也感到费工费力，十分不容易。考古工作者预计，这些砾石是有意填上的，目的就是为了防盗。

原来，细碎的积石十分容易坍塌，盗墓者很难在上面挖洞，即便侥幸挖洞进入，稍微不慎就有可能丧身乱石之中。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椁室总深8.2米，上部3.1米夯筑，下部5.1米凿于岩石层中。墓穴的四壁堆有积石，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大块石料沿着墓穴的四壁垒砌，一直到坟墓的顶部封死。石料中间的空隙用鹅卵石填充。这些石料都是从全国各地征调采集的，不仅大小、形状不同，连石质也不一样，有的经过粗略加工，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未经加工。一般的石块200多公斤，最重的400多公斤。像这样的重量不一、形状各异、石头质地也不同的石材，杂乱笨重，在墓穴中垒砌，其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其防盗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石料中间添加容易滚动的鹅卵石，更是增加了盗掘的难度。考古工作者在挖掘中山王墓的时候，工程进展十分艰难。我们可以想象，当盗墓者挖掘到这类墓葬的时候，除了退缩，还有什么妙法利器穿石而过呢？

历史上最著名的铁水封门的墓葬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乾陵位于今陕西乾县北梁山的主峰之上。1985年12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乾陵进行了全面的勘测，而对乾陵墓道的发掘工作却始于1966年。《唐会要》中记载：“乾陵元宫（地宫），其门以石封闭，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说明乾陵地宫入口处用巨石封门，不仅如此，还用铁水浇灌，封死墓门。通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考古工作者基本摸清乾陵墓道的情况。乾陵墓道长63.1米，宽3.9米。在长长的墓道上，用长约1.25米、宽约0.5米的石条由外至内呈阶梯状叠砌，最多的一级可达39层。据估算，石条至少有3000余块。石条之间用铁细腰固定，每个铁细腰重量达5公斤至10公斤。再高温熔化锡铁浇铸缝隙，使这3000余块巨石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庞然大物。与文献中记载的“乾陵玄厥石门，冶金固隙”相吻合。号称古今第一盗墓贼的温韬曾盗遍唐代关中帝陵，遍取其中珍宝，只有对乾陵束手无策。《新五代史·温韬传》中记载：“唯乾陵，风雨不可发。”虽然文献记载中温韬盗掘乾陵未遂的原因是天气——风雨大作，但我们可以想象进入墓葬的唯一入口处的封门巨石，在阻止温韬进入时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巨石封门与铁水浇灌双剑合璧，真的能保证墓葬固若金汤、安泰

千年吗？事实证明，无论人们采用怎样的防盗措施，最终都难以抵挡盗墓者肆意的破坏。

刘去盗掘魏襄王墓时，虽然遭遇了铁水封门，但这位猖狂的盗墓者竟然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铁水铸封的墓门凿开，最终盗得墓中珍宝。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另一种破解铁水封门的方法。“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羊粪浇之，方开。”这是一位盗墓者的自述，这个盗墓者对铁水封门的墓葬，采取的方式是用羊粪汁涂在铁汁上，如是这样很多天，铁水溶解，墓门自然打开。

无论石砌墓壁、巨石封门还是铁水浇铸，都是为了起到加强墓葬的外围防盗功能，但最终只有少数的墓葬能够逃脱被盗劫难，像唐乾陵那样风雨不动安如盘石的陵墓更是稀有。

塞石流沙效果好

用巨石堵塞墓道，往往令盗墓者望而却步。

塞石墓是常见的墓葬形制，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流行，直到明清时代，仍可见塞石墓的踪影。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还以塞石墓为特色。尤其是大型塞石墓，防盗效果极佳。夜间盗墓的人一般不从墓道进入墓室，也很少采用大揭盖的方式打开墓室，而是在封土上挖盗洞，当盗洞接近塞石墓外侧的石块和碎石时，盗墓者便无法前行，即便费尽力气搬开塞石，也很可能被上方滚落的石头砸伤。北方地区的大型塞石墓，墓室全部以石料为建材，坚固异常；南方墓葬的塞石则单纯是为防盗，土坑墓的墓壁与木质棺椁之间填充石块，以此来阻拦盗墓者。

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墓道采用竖井式。在封闭墓道的时候，夯土中夹筑三层石板，石板之间有用碎石填充相隔。这种防盗方式，的确达到了“石椁铁壁”的防盗效果。

西汉昌邑王墓位于山东巨野红土山，墓室墓道上面平铺方石一层，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墓道里面垒砌了两道石墙，靠近墓门的

地方也有一个石墙封门，三道石墙各厚约一米，可谓铜墙铁壁。

乾陵是塞石与流沙相结合最为成功的陵墓。乾陵与一般帝陵不同，它是以山为陵，就是说从半山腰开凿墓道、甬道，在山肚里修建前、中、后墓室。《旧唐书·严善思传》载：“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1960年，当地农民在山上炸石，误将乾陵墓道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但没有接近墓门。陕西考古人员闻讯后，进行了清理并对周边进行了钻探勘察。勘察的结果是乾陵墓道、甬道的确用条石封砌，石条之间用拐状的铁栓拴牢，前后、左右加固，隙缝灌铸铁水。连续几十米长的甬道都是如此，可谓固若金汤。

乾陵作为唐陵中最为坚固，防盗措施最好的陵墓，从705年到1960年间1255年的漫长岁月中，乾陵所在的梁山顶上从未断过盗墓者的身影。温韬一干人马来到乾陵盗掘时，史书上的记载是归结到天象异兆的出现才阻止了盗行。事实上作为一个军阀哪里怕什么天象异兆？真正的原因是防盗方式有效，即墓穴中“皆积沙壅之”。史书记载，在修建乾陵的时候，每挖一车土，即刻从十里之外拉来一车沙子，回填到墓穴当中。于是，墓穴中本土不复存在，全部被流沙填充。如果填土，土一受潮就能相互粘合，方便打盗洞，挖一个隧道就能够进去。沙子松散干燥，不容易粘合，无法打洞。除非将里面的沙土全部挖出来，否则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进入。大凡盗墓之人，一般都是用很短的时间进行挖掘盗宝，不会长时间挖掘里面的流沙。所以即便是本领高强的盗贼，挖而无功后无法进入墓穴，也会随即舍弃而去。

温韬盗掘未能成功，黄巢攻破长安后，又率领一干人马欲掘乾陵发一笔横财，号称四十万众连劈带凿地折腾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未能成功，只好弃之不顾，灰头土脸地撤出陵区。

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孙连仲率一团人马，在乾陵周边埋锅造饭安下营寨，也曾想学著名盗陵将军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代乾隆、慈禧陵而发了大财的把戏，以军事演习做幌子，动用烈性炸药炸开了乾陵墓道上方的三层坚石。但孙连仲却没有孙殿英的运气好，随着一阵爆炸声，一团黑烟腾空而起，成直立状在空中扭结。一阵大风袭来，霎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接着一阵龙卷风呼啸而来，现场的7名山西籍与12名河南籍官兵，被卷入天空，在天空转了几个大圈，然后被重重地抛到20里外的荒野中，一个个口吐鲜血，气绝而亡。孙连仲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忙找当地一个阴阳先生卜了一卦，卜辞是“主大凶”。孙的谋士又说当年温韬“风雨不可发”的典故，认为是武则天的幽灵在冥冥中作怪。面对这个一代美女加烈女的突然发威显圣，孙氏尽管身披戎装，手提盒子炮，但也不敢骄横蛮干地直逼则天皇帝的龙床，只

好令手下买来水果和几个肉夹馍，在陵前祭奠一番后宣布收兵。因而，乾陵成为大唐王朝关中十八座帝陵中唯一没有被盗掘的陵寝。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防盗成功的个案，是很了不起的。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州龟山汉墓、北洞山西汉楚王陵，使用的也是这类手段，将数量众多的巨石从山上采下，运到陵区封堵墓道，但却未能摆脱被盗的命运。

在徐州北洞山出土的西汉楚王墓，墓葬的墓道北段和中段，都用了三列三层的塞墓石封填，各个塞石之间用凸凹的关节相咬合，每个塞石重量都在3吨到7.8吨之间。前雨道近墓门处有三列三层9块小型塞石，其后有双列双层8块大型塞石，大型塞石重约7吨左右，前室的北面又有双层4块大型塞石。但是，如此巨大严密的塞石封堵形式，并没有使盗掘者却步，他们或将塞石击断，或将其拖出，最后仍然把墓室洗劫一空。

与塞石墓相比，流沙墓的防盗效果要略胜一筹。流沙墓出现的时间较晚，大概在春秋时期，南方地区墓葬比较流行这种方式。其具体做法是挖掘墓坑，然后将棺椁放入墓坑，用炒干的细沙填埋墓坑，最后再用填土将墓顶夯实。炒干的细沙流动性很强，对于依靠挖盗洞进入墓室的盗墓贼而言，细沙是最好的屏障，一旦挖到细沙，细沙便会自动流动、堵住盗洞，从而将盗墓贼拒之墓外。大型的流沙墓不仅防盗功能强大，而且相当危险，很多盗墓贼在挖到流沙层后被沙子掩埋，再也不能离开。

195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战国中期魏国王族的异穴合葬墓，在对墓室结构最为完善的2号墓挖掘过程中发现，在椁室两侧和邻近两墓道处，墓墙全部用巨石垒砌，墙内充填细沙，最后填土夯实。考古人员测量，沙土的堆积高出地面8米，深达将近百米，填充的沙土体积达1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当盗墓者深挖盗洞的时候，流沙会源源不断地将盗洞填埋，除非盗墓者将所有的流沙运送干净，否则只能“望沙兴叹”了。可是要将1000立方米的流沙挖净，谈何容易！这种以柔克刚的防盗墓方法，的确起到了良好的防盗效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2005年对河南上蔡大路李乡郭庄村的一座大型战国时期楚墓进行清理发掘。这座墓葬规模宏大，出土器物均属珍品，其中仅精美的青铜器就有上千件。更难得的是，这座墓葬防盗设施十分完善。墓中有多处盗洞，但墓室内的随葬品依旧非常精美、丰富，说明多数盗墓者都被这座墓葬精妙的防盗设施难倒，被拒之墓外。这座大型楚墓所采用的防盗方式就是塞石和流沙并用。

郭庄楚墓墓室深达17米，距地表5米向下的深度都用炒干的细沙填充，积沙之多，堪称国内发现之最。干沙不仅可以防腐，更重要的是有防盗功能。此外，细沙的里面，靠近棺椁的地方累积了很多大小不等的石块，其中最大的可达165公斤。砾石整齐地堆放在椁室四周，盗墓贼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都无法突破积沙与积石的双重防线。

除此之外，郭庄楚墓还有其他严谨的防盗措施，即便盗墓贼侥幸穿过积沙积石障碍，也难以到达椁室。如利用巨石封门，这是一种简单而常见的防盗方法，流行时间很长，一般大型墓葬都会采用。另外，郭庄楚墓还在积沙之内放置了假棺来迷惑盗墓贼，而真正的棺椁却放置在一个隐秘之处。如果沿墓道顺直而下，只能找到假棺，真正的棺椁依旧难寻踪影。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清理发掘，发现这座被誉为豫南第一大墓的郭庄楚墓的墓室上共有从战国时期到近代的盗洞12个，最长的盗洞长达27米。其中最大的一次破坏，盗墓贼竟然采用了大揭盖的方式。大揭盖一般是只有专业的经相关文物部门批准的考古单位在发掘墓葬时才会采用的方法。有时大规模盗墓的官盗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打开墓葬，但由于这种方式对发掘的人力要求很高，也过于招摇，因此一般的私盗不会对墓葬进行大揭盖，而会在不起眼的地方开盗洞。然而，也正是这种大揭盖的方式才能避开塞石与流沙的机关，盗得墓葬中的宝物。

塞石、流沙防盗方法流行于战国到两汉时期，例如长沙地区的诸侯等级大墓一般都会因地制宜地采用这些有效的防盗方法，如果没有大量的沙子，则会用炭替代。这种方式还可以防潮、防腐。

伏设暗箭与刀枪

从主动防御与被动防御的角度来说，塞石流沙技术应该是被动的反盗墓方法，伏设暗箭与刀枪，则是主动防御的方法。这一防盗措施见诸史书记载的当从秦始皇陵为始。但要设置此类暗器需有个先决条件，即墓室必须宽大敞亮，有一个刀出箭发的空间。秦始皇陵地宫属于翻斗式的竖穴墓，据考古钻探，内中情形与已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形制基本相似，只是比马王堆墓葬更加宏大、复杂。刀枪劲弩类的暗器，马王堆这样的大型墓室还无法施展，只有秦始皇陵这种超大型地宫才能摆开，并起到射杀的作用。

具体设置和实施方法是：先把强弓劲弩安装在墓室两壁，呈张弓搭箭状，每件弓弩搭载一箭或数箭，箭头皆用毒药浸泡，达到人触之即伤、伤之即死的程度。然后以具有高强度承载能力的绳索固定，弓弩后部再于壁上固定一钩状物，以让绳索穿过，绳索的另一端固定于门上隐蔽处。绳索拉成对角线，若是左壁，绳索的一头则接于墓道的右门；若是右壁，绳索则接于左门。当盗墓者开门时，若开右门，则左壁上的弩绳索被拉断，绷紧的弓弩之弦疾速驰之，利箭即出，射杀的方向正好是门道右侧；若开左门，以同样的原理给予射杀；若两门齐开，则两壁弓弩一齐封闭门道，射杀进入者，从而形成了第一道阻击防线。

只要盗墓者打开墓门，由门的转动而牵引的弓弩之箭就会全部射出，就会射杀盗墓者，即便盗墓者没有全部被射杀身亡，或侥幸躲过了一劫，还有第二道防线等着他。具体方法基本与前同，只是在墓门之后铺设多块翘板，并进行掩盖伪装，使盗墓者无法辨别与其他地方的异同。镶在墓道两壁的弓弩牵引绳索以隐蔽的方式接于翘板之下，或高于翘板，成为绊索。当盗墓者破门而入踏上墓道时，翘板自然上下启动，绳索因外力压迫而断裂，弓弩之弦瞬间松开，利箭自动发出，直射墓门方向，一时箭如雨下状，盗墓者非死即伤。若遇绊索，以相同的道理予以射杀。因箭头用毒药泡过，只要轻轻划伤或擦过一点皮毛，盗墓者也难有活下去的希望，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当第一块被踏过的翘板或绊索所引弓箭发完之后，若还有幸存的盗墓者继续前行，则无疑会踏到第二块、第三块以及更多的翘板。如此这般，固定在墓道两壁的弓弩便可形成多波次发射，势如连弩，张而复发，直至将暗藏在墓道内所有的利箭射出，将盗墓者全部射杀。

因为秦始皇陵未被发掘，所以秦始皇皇陵内安装的弓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弓弩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山桑，应该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弓弩的射程当大于600步（相当于现在的831.6米），张力也当超过12石（相当于现在的738斤）。如此具有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

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汉唐陵墓所继承，并发展到在棺椁内安装轮机，以射杀盗墓者。

在棺椁内壁安装数个像现代滑轮一样的工具，滑轮一边置弓弩毒

箭，绳索通过滑轮连接弓弩与棺椁盖板，这就是轮机。一旦盗墓贼进入地下宫殿揭椁开棺，绳索将通过轮机引发弓弩数箭齐发，射杀染指棺椁者。

由于盗墓者揭椁开棺之力远远大于脚踏翘板的能量，绳索又通过轮机的旋转产生一种新的爆发力，二者结合，将产生一种比在战场上靠士兵双臂张弓还要威猛几倍甚至数十倍的力量，箭发之后可射穿人的身体，凡触及者难有活命的希望。

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所著的《茶香室四钞》中，于“高柴墓”条下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冯马儿是当时的一个坟墓巨盗。有一次他在盗取一个陈州古墓的时候，挖到了一个石刻，上面写着“逢马而破”，这更加坚定了冯马儿的掘墓信心。当挖掘到墓室的时候，毒烟喷射，利剑乱飞，都被一个轮机机关控制着。冯马儿将机关损坏，进入墓室，搜罗到了金铸禽鸟及若干龙鳞状的玉甲片，以及其他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那种情形想起来令人惊心动魄，不寒而栗。好在是“逢马而破”，要不然多少个冯马儿，都要葬身于毒烟乱箭之下了。

在墓道内安置持兵器偶人，以砍杀盗墓者。偶人的形体或用木雕或用其他材质做成，呈鬼怪状，手中各持刀剑，周身绘彩，显得狰狞恐怖，令人望而生畏。若有盗墓者进入，则持刀挥剑予以砍杀。具体实施方法仍然依靠绳索的一张一弛作为推力，绳索或系于门上，或系于地下的翘板之上，原理同弓弩射杀法。但毕竟木人与手中的刀剑运作起来更加复杂不便，因而总体效果没有弓弩杀伤力大，主要起威慑恐吓作用。假如不用绳索而改用现代高强度的弹簧构件，根据拉伸蓄能以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突然释放一种巨大的弹力，让木人从原地弹出，手中的利剑或许能发挥更大效用。

可惜铜铁结构的弹簧是近现代产物，古代并无弹簧应用技术的先例。1978年，湖北考古人员在随县发掘战国时期的大墓——擂鼓墩曾侯乙墓，从墓室中发现了20个木陀金弹簧器。经鉴定，弹簧分为黄金与铅锡合金两种制成，但质地都很软，仅具弹簧外形，并无弹性。此器到底用途何在，尚不清楚。

水淹墓穴设机关

除了防盗措施之外，有些墓穴还设计了一些凶险的机关，对于不

请自来的盗墓者进行坚决的反击。这些方法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使很多盗墓者都葬身在了阴森恐惧的古墓之中。储水防盗，是墓中“击盗”机关之一。

《玄怪录》是一本著名的传奇志怪小说，由唐人牛僧孺编撰，其中就有一个“储水击盗”的故事：

有人从路上的车辙中看见碾压出来的花砖，揭开观看，知道下面有古墓，于是纠集了十几个人，一起到县衙，向县令请求在道路旁边居住，并且开荒种地。庄稼长起来后，盗墓者用庄稼作为掩护，开始日夜挖掘。打通了盗洞进入墓穴中，看见有三道石门，全部用铁水封死。

其中的一个盗贼善于念经施咒，斋戒后，第二天用法术将头两道墓门打开。这两个墓门之间摆放着数百个铜人，手持刀枪剑戟，制作精巧，栩栩如生。盗贼又斋戒了三日，将最后一道门用法术打开，从里面出来了一个黄衣人，对盗贼说：“这是汉朝征南刘将军的坟墓。刘将军生前有大战功，去世后，皇帝特敕在这里修建墓葬，我等奉命护葬，并且铸造了铜人铜马，维护将军生前的威仪。你们来到这里，必定是为了盔取钱财珠宝。这个墓葬，真的没有你们所要的东西；而且官家的墓地，也不会有珠宝陪葬。你们又何必用神咒苦苦相逼呢？如果你们不停止行动，免不了双方都有损伤。”黄衣人说罢返回，墓门又自动合上了。盗贼再次诵咒，连续好几天不停地念诵。墓门再次开启，这时，一个青衣人又来传话，规劝盗墓者及早罢手，盗贼不听。青衣人返了回去，两扇门又自动关闭了。不一会儿墓穴中涌出大水，盗贼大多被淹死，只有一个人拼命游了出来，到官府自首，说清了事情的原委。官府派人去查看，看见中门内有一个石头做的大床，上面的骸骨，都已经漂浮于水上。

小说毕竟掺杂了文学虚构的成分，就现实中而言，墓穴中蓄水防盗，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属于并不多见的防盗方法。

在通常情况下，陵墓地宫要选择干燥之地，严防地下水渗入，若有水渗入则被视为“不吉”。万历皇帝的定陵，在修建时因地宫渗水，万历帝几次前往视察，心怀恼怒，差点改换位置。而道光在清东陵修建的地宫，因渗水严重，惹得这位皇帝龙颜大怒，最后下令拆毁已建好的陵寝，索性跑到清西陵重新建造了陵墓。因帝王的陵墓地宫大多要深入地下数十米，渗水成为必然。为解决这一难题，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先在地下挖掘大渠，大约占到墓地的一半，用石子填充约占墓地的一半，实以石子，然后铺上瓦甑再用陶瓷烧制的水管衔接，抑制通到山下，最长的可达半里之遥，用来排水。这种方法，至少从秦始皇

陵地宫的修建就开始应用，后来历代帝王陵寝多效法此道。

如此这般，又引出了新的麻烦，墓主本意用管道疏通渗水，结果被人发现，沿着水管直接掘进了墓室，所料未及，适得其反，悲惨的后果可想而知。

被发掘的自然是中小型墓葬，若是帝王陵墓，其排水设施较为复杂，沿着水管盗掘要比从其他位置入手还要困难得多。当年秦始皇陵“穿三泉”，地宫渗水颇多，处理的方法就是用陶制管道，由地宫通往离陵墓几里远的一个叫“鱼池”的大渊中释放。直到现在，“鱼池”仍可见水。据说当年秦二世关闭墓门后，数百工匠被困在地宫活活憋死，只有一个青年石匠，设法钻入管道内向外挣脱，居然爬到了“鱼池”中，成为数百工匠中唯一的幸存者。

盗墓者沿着管道进入墓室进行盗掘，这是很容易就想到的办法。但是，在没有其他办法将墓室内的水排出的情况下，索性也就不再顾及，顺其自然了。自然，这样的后果就是用不了多久，墓坑内就会积满渗水，深度可达几米。若是空间宽敞高大，水的浮力足以将棺椁漂起。曾侯乙墓，墓室水深达3米多。考古人员发掘时，陪葬棺全部被水浮起，或侧翻，或倒扣，无一完整者。而清东陵中的康熙、乾隆、咸丰、慈禧等陵墓被兵匪打开时，地宫内水深皆在2米以上。三位皇帝的棺椁都被浮起且已游走别处。或许正是鉴于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原因，有的墓主索性来个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将棺椁浸入水中，并设置暗器，以防盗墓者入侵。于是，一种隐蔽的轮式飞刀应运而生了。

通常的方法是在依山之地或高坡下挖墓坑，有的为崖式竖穴，有的为券洞样式，形式不限，大小不限，有的券洞墓只有一层石门，有的多达三四重石门，这与墓主的财力、地位有关，与所运用的方式、方法无关。但所有这类墓葬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当地下涌出水流或渗出清水时，他们并不用塞石和白膏泥等粘性物堵塞，而是任其自流，直到水位达到平衡为止。外观看上去，与水库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中间用石或木墙隔开，四面置厚重石墙，上有平式或券式封顶而已。看似这样一个蓄满水的墓坑，却暗藏杀机，比其他反盗墓方式要厉害得多。

在历史上，真正有计划蓄水隐藏暗器的陵墓，远要比那位汉征南将军的设计巧妙得多。如上所说，蓄水墓的棺椁为石料所制，密封放于石床之上渐渐被地下水浸没。当陵墓建成后，便在甬道和墓室的地面铺设铁木合成的地板，地板之上斜插尖状刀片，刀片有规则地成排成行遍布墓内的各个角落。在刀片之间，每隔几尺安装一部由叶片刀组成的转轮。转轮如同北方常用的链式水车，或如南方的龙骨水车。

每三部转轮为一组，相互贯通相连，下设翘板，板与轮上的链条相接。翘板之上又有翘棍，每棍约三尺多长，暗藏刀锋，不规则地立于翘板之间，上有链与轮相连。也就是说，整个墓内遍布水车样的带刀转轮与丛林状的翘棍刀，一旦盗墓者涉水而入，必踏动翘板或擦动棍刀，板、棍一动，转轮即动，飞刀在水中旋转开来，将入侵者的身体一刀刀划开，在鲜血涌动与惊恐的哀号声中，进入者非死即伤，再也难有作为。为了诱敌深入，还根据盗墓者贪婪的本性，专门设置明器以吸引对方眼球，即故意把一件或数件器物放于明处，以绳索拴之，或吊于顶，或放于壁上。绳的另一端则与带刀的转轮和暗藏锋刃的翘棍相连。盗墓者一看有宝物在前，便忘乎所以，上前抢夺，结果是绳断板翘，转轮滚动，飞刀旋转，翘棍摇晃，盗贼难有逃生之机，必死无疑。

1933年4月10日北平《晨报》报道：彰德城（今河南安阳洹上村）西北35里的东灰营村，正在发掘两座古墓，一为袁天罡墓，一为赵简王墓。袁天罡墓在东灰营村后岗岭的最高处，周围长度大约59尺。墓穴的四壁，全部用青砖砌成，墓穴内有一个清水池子，水里面藏有锋利的钢锥。相传李家坡的李某是一个盗墓贼，伙同他人曾将坟墓掘开，从里面取出金冠、金剑和其他金银器具20余件。他们见到有一把利剑悬挂在墓穴顶部，有两个人手持利刃想把悬剑的绳子砍断，没想到落水而死。同伙将他们的尸体捞出来发现，尸体被水池里面的钢锥扎烂了。从此以后，尽管人人知道墓穴里面藏有珠宝，但是也没人敢去盗取了。

袁天罡墓地处山岭的最高处，在这样的地势上建造一个深不可见底的水池，按照当时的施工技术和施工条件，难度十分大，因此此传说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不过墓穴悬剑的说法，恐怕是墓主处于防盗的考虑，设计这样一个机关，对冒险前来的盗贼加以惩戒。

作秀装穷巧掩饰

会下象棋的人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就要舍弃次要的保护主要的，就像壁虎受到了攻击，自动断开尾巴逃生一样，丢尾巴总比丢掉性命强，这就是典型的“舍车保帅”。大自然给予了人类无穷的智慧，在墓葬的防盗措施上，人们也用了“舍车保帅”的策略。

古人在建造墓穴的时候，挖造上下两层墓室。上面一层存放一些廉价的陪葬品。其实，这一层是为了迷惑盗墓者，真正贵重的陪葬品

则放在下面一层。这样，一旦盗墓者进入，他就会专注于上面一层的陪葬品。尽管不值钱，顶多嘀咕一声“这个主儿真小气”，贼不走空，盗墓者没有白忙活一场，廉价就廉价吧，满足了盗窃心理，心满意足地离开。这样，下面的宝藏就得以保全。

西周时期的一个地窖，就是采用了这种防盗方式。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这个地窖的时候，发现地窖里面是一些不值钱的陶器，已经被盗贼“光顾”过了。考古工作者清理地窖的时候，要比盗贼仔细得多，他们发现地窖底部的土不是生土，有人为夯实的痕迹。于是判定下面还有人为的建筑物，继续向下挖掘，果然挖出了第二层地窖，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原来，值钱的东西都在这里呢！

地窖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墓葬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这个地窖给了考古学家一个崭新的思考，他们从此在挖掘墓葬的时候，清理完墓里面的东西了，还不算完，习惯性地要将地砖下的泥土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二层墓葬，以免遗漏。

世间的坟墓无数，防盗措施也是一再更新，但再高明的防盗技术到最后也会被破解，于是墓主反其道而行之，大打亲情牌，发明了一种“温柔”的防盗手段，通过“哭穷”来打动盗墓贼的恻隐之心。

但事实上，历代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谁都不甘心让自己死后成为一个寂寞之人。嘴上说不往墓穴里面放值钱的东西，实际上“一个也不会少”，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做法，并没有起到良好的防盗作用。

汉文帝曾想在骊山之上建造一座露台。他询问主管设计建造的官员，这个露台要是建成的话，要花多少钱？工程负责人报告说大约需要一百金。汉文帝听罢说，耗资太大了。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产阶级的家产。他想到自己现在身为一国的皇帝，拥有全天下的财产，富有四海，为什么还要耗费钱财来满足一个人的私欲呢？于是，就下令停止修建露台。

连房子都舍不得花费巨资兴建的汉文帝，怎么会对自己的陵墓建得过于豪华呢？这是明摆着的事。汉文帝生前立下诏书，告诉群臣自己死后要施行薄葬，不要什么陪葬品。历史上的许多记载都显示，汉文帝的陪葬品，都是些不值钱的瓦器，根本没有金、银、铜、锡之类的随葬品。

一直主张薄葬的汉文帝陵墓并没有避免被盗掘的命运。西晋建兴年间，还是有盗墓者抱着侥幸的试试看的心理，进入了汉文帝的墓穴，结果盗得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

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汉文帝的所谓薄葬，其实是一场政治秀和道德秀。汉文帝依山为陵，就是为了防盗，也为自己的薄葬作了反面的注解：你薄葬了，成穷人了，干吗还在坚固的山石上费工费力开凿墓葬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或许汉文帝和其他前代君王相比，真的节俭薄葬了。但是作为一国之主的君王，再怎么节俭，里面的宝物也比寻常百姓的多，这足够让盗墓者趋之若鹜、铤而走险了。

还有一种情形更是让人啼笑皆非，竟然将自己的“薄葬”遗言，写在了墓门上。除非盗墓者是瞎子，否则看到墓门上的“哭穷”，说不定会“知薄而退”呢？

关于“哭穷”，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徐州的龟山楚王刘注及其夫人的合葬墓。为了劝阻偷盗者，墓道外侧的塞石上写着一段情真意切的“穷人告白”。虽然他情真意切地对盗墓者哭穷，终究没有躲过被盗挖的厄运。

诅咒恐吓也上场

事实证明，像龟山汉墓这种哭穷式的“跪地求饶”根本不起作用，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破罐子破摔，撕破脸皮，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古墓的防盗也是一样，我好言相劝，不要挖我的墓，你非不听。那我就诅咒你，你要是敢破坏我的墓，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现有资料仅山东济宁汉墓石刻防盗咒语“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一例。这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里也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许作为一个盗墓者，过得就是今天不想明天事的日子，那些恐吓诅咒所起的作用真可谓微乎其微。盗墓本身做的就是被人诅咒、被人骂的缺德事，从事这些危险游戏的家伙们，根本不理这一套。不过，还真有催命的咒语，就出现在埃及法老的陵墓中。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国王的陵墓上镌刻这样一句墓志铭：“无论是谁骚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的翅膀将在他头上降临。”从表面上看，虽然这句咒语读来有点毛骨惊然，无非是想告诫那些企图窥视墓穴的后人，望而却步，但是咒语却神奇地应验了。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及其同伴进入图坦国王的墓穴，此后不久，卡特就由于被蚊子叮咬感染而神秘死亡。此后一直到1935年，与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工作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21名人员先后死于非命，这些人中包括主要发掘人卡特的助手、秘书及其家属等，这个咒语的传说便不

胫而走。究竟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医学界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结果。

刻上咒语对于目不识丁的盗墓者来说，根本没有效用。于是墓葬中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吓唬人的玩艺——镇墓兽。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此种器物外形抽象，构思谲诡奇特，形象恐怖怪诞，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迄今出土的镇墓兽共约200件，均为战国时期文物，以战国中期为多。我们通常看到的天王俑，其实也是镇墓用的。一手持着宝剑，一手托着镇妖的宝塔，脚下还踩着小鬼。这样的护法天王，面目狰狞，在黑咕隆咚的墓葬中碰见了，冷不丁一看还真能把人吓个半死。

为防泄密用哑巴

清西陵泰陵的方城南墙中，有一个洞口被称做古洞口，是登明楼、上宝顶的必经之处，古洞口内有一个小院落，迎面与琉璃影壁相接。因为这个小院的前半部分呈弧形，酷似月牙，所以又叫做“月牙城”，俗名又叫“哑巴院”。

为什么叫“哑巴院”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故事。“哑巴院”迎面的琉璃影壁是进入墓穴的隧道口，封闭墓穴的出口处是整个陵寝的最后一道工序。按照历代惯例：凡参与修筑墓穴晚期工程的工匠，当皇帝的梓宫（棺椁）入葬后，怕他们泄露墓内秘密，一个也不准活着出去，都得给死去的皇帝殉葬。

清朝已革除了殉葬这一恶习，但是封闭墓穴的这批工匠放出去又怕他们泄露了进入墓穴的位置和墓穴的秘密，导致加剧将来有人盗墓，于是监工大臣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叫哑巴来完成这最后一道工序。这样完工之后即使把这些哑巴放出去他们也泄露不了秘密。于是在建陵将要竣工，只剩下封闭墓穴和修筑月牙城这最后一道工序的时候，监工大臣们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哑巴聚集到这里来做封门的前后工程。但监工大臣们还是不放心，叫这些哑巴们白天休息晚上做工，使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整天迷迷糊糊地不知干了些什么。完工之后，把这些哑巴发配到边关服苦役。因为月牙城是哑巴们修建的，所以人们又叫它“哑巴院”。

月牙城在方城以北，因为它的形状如同一弯新月，故而取了这个

形象而动听的名字。福陵月牙城周长234.3尺，高16.5尺，城内空旷、沉寂，只有北墙正中镶嵌的一座彩色琉璃照壁，为这座空城增添了一点生气。这座照壁又叫“月牙影壁”。正中的“盒子”内镶有象征富贵的牡丹花及花瓶，枝叶繁茂，五光十色。据说，这座照壁是地宫的入口。

另传，当年地宫建成后，把所有工匠集中在月牙城，给他们每人吃上一种药，这些人立即都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

月牙城这种建筑形式是清代陵寝的一大特点，在明代及其以前的陵墓中是没有的。它是方城和半圆形宝城之间出现的一个特殊空间，并在此修建了“蹬道”，以上下方城和宝城。

殉杀工匠最残忍

中国古代的殉葬习俗出现在距今约4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常有人殉葬现象，多者可达几十人。进入商代，这种残忍的丧葬制度空前发展，将贵族生前的奴隶、妻妾、近臣等殉葬墓主人。商代人的灵魂观念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中仍然长存不息，而墓葬则是墓主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殉葬的奴隶、近臣等人在阴间仍能陪伴、侍奉墓主人。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商王朝的都城所在，这里发现了商代的大型宫殿遗址和王陵，一般的大型墓葬中都有殉葬者几个到几十个不等，有的大墓中人殉数量可达二三百人。

汉代之后，统治者虽然明诏废除人殉制度，但殉葬现象却始终存在，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时常发生殉葬现象，如后燕慕容熙的妻子苻氏死后，慕容熙竟然要求其嫂子张氏殉葬。

使殉葬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制度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代从朱元璋开始，规定残酷的后宫殉葬制度。据记载，朱元璋次子死后，朱元璋下令其王妃侍妾殉葬，被迫殉葬的竟有38人，而明成祖朱棣死时也有30多个妃嫔殉葬。对于妃嫔殉葬，明代法令中有明文规定，贵妃以上封号、生子并被封为藩王以及功勋之女可以不必殉葬，其余妃嫔无一可免。这种残忍的制度一直到明英宗才将其废除。然而，继明朝入主中原的满清却重新启动人殉。直到封建社会灭亡，人殉制度才真正消亡。

在历史悠久的殉葬史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殉，殉葬的人既不

是墓主人生前忠诚的奴仆，也不是亲昵的侍妾，而是那些为贵族修建陵墓的工匠。他们之所以悲惨地沦为殉葬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墓葬的隐秘，防止被盗。

这种将工匠和知情人就地处决的旧例恶习，一般出现在早期帝王级丧事中，并美其名曰“殉葬”。实际上，这是为了防止知情人泄密而采取的灭杀活口的行为，是一种反盗墓手法。这种方法是极其违反人权的，虽然工匠被诛，却依然也难逃盗墓者的黑手。用古话说，这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在历史上，有些君王为了避免陵墓的秘密外泄，常常在工程竣工之时为了一己私利，将成千上万名工匠役夫全部杀害。

相传阖闾死后，他的儿子夫差在虎丘山为阖闾修建墓葬。墓葬修建完毕后，夫差害怕这些工匠泄露墓葬秘密，心想，“这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的墓葬地址，如果有一天他们利欲熏心，结伴挖盗坟墓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出一条毒计。有一天，他召集了参与阖闾墓修建的一千多名工匠，设宴请他们观看鹤舞。狂欢饮酒到深夜后，他命令手下官兵，将这些工匠全部杀死。

苏州西北阊门外虎丘，有一块石头可以容纳千人席坐，被称为千人石。千人石依山傍水，形状奇异。相传，千人石下面有一个万人坑，吴王夫差杀死造墓的工匠后，将工匠的尸体扔到万人坑。千年以来，每逢阴天下雨，千人石常有淡红的“血水”渗出，将四周的土地浸染得血红，所以千人石也叫“渗血石”。当然，石头是不会渗血的，这个现象有着科学的地质解释，是因为石头含有大量的氧化铁，遇到雨水游离出来，呈现红色的血水状。人们将这种现象和吴王夫差屠杀役夫的事情附会联系起来，表明了对这种残暴行径的不满。

通过杀死工匠来防范盗墓，手段残忍却收效甚微。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吴王阖闾葬后仅仅十余年，墓葬就被大肆盗毁。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期间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殉葬。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除了以未生育女子出宫不宜为由命令无数女子殉葬，还下令修建秦始皇陵的全部工匠殉葬，“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秦二世下令所有工匠殉葬的原因是担心熟知秦始皇陵内部结构的工匠将有关秦始皇陵的机密外泄，所以索性将之全部杀害，不留活口。

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陵内地宫规模宏大，机关重重，更有可以自

动躲避灾难的“游棺”，考古发现地宫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在这广阔的范围内，何处才是秦始皇的藏身之处？这样费尽心机的设计，即便是火烧咸阳数日的项羽也未能开启秦始皇陵的地宫之门。可是，一旦熟悉陵园内部布局，甚至是地宫布局的工匠将有关陵园的秘密泄露，那么，秦始皇陵还能历经2000多年保持完好吗？秦二世正是感受到修陵工匠的威胁，才下令将所有工匠殉葬。

传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派人秘密把秦始皇灵柩运入墓中，然后令修建的工匠到墓中领赏。那些工匠、征夫、刑徒刚一进入墓葬，秦二世便下令关闭羡门和外羡门，将所有工匠困在墓中，无一幸免。

元朝皇帝元宪宗死后，为了防止墓葬秘密外泄，不但进行了秘密下葬，而且还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1259年，元宪宗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死亡，大臣们用毛驴驮着宪宗的尸体，运送到成吉思汗墓地旁边。为了保守秘密，护卫的士兵见人就杀，沿途被杀者竟多达2万人，其暴行令人发指。这和屠杀役夫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防止盗墓。

传说当年慈禧入葬时，负责大臣从工匠中挑选出81人负责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完事后从另一预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心里明白这是要将他们殉杀。其中有一个石匠，老婆刚为他生了儿子不久，不想死。他干活时有意走神，脚下一滑，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监工以为石匠真的死了，便令人将尸体扔到荒山坡上的乱尸堆里。就这样，这名石匠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是不是所有的采用殉葬预防就能确保墓葬平安呢？实则不然，《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关于南朝时期齐国齐献武王死后将修墓和参与下葬的工匠尽皆杀死的故事。“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齐献武王下葬后杀死了全部工匠，却不想工匠的儿子也知道墓葬所在。齐献武王虚葬、殉杀工匠一系列防盗措施付诸东流，最终墓葬还是被盗一空。

防盗无毒不丈夫

古人反盗墓的手段多种多样，虚冢、崖墓、流沙墓、火坑墓这类墓反盗的成功概率相对较高。但其中问题也有，就是设计过于复杂，一般人家也难以做到。但有一种方法却比较简单——在墓内置放有毒

物质，形成毒墓；或在尸体涂上特殊物质，制造尸毒。盗墓贸然进入这种毒墓、接触尸毒，便会中毒死亡，轻者也会成了废人，遭到所谓的报应。

古籍中，“毒墓”的记载很多。刘去盗掘战国古墓魏襄王冢时，除了发现墓是铁汁浇灌之外，在打开后还有惊人发现，里面竟然喷出一种有毒气体：“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墓中冒出的气体是黄色的，气味辛苦，刺人眼鼻，令人无法进入。刘去派人在外面等了整整七天，这些气体才散尽。可以肯定，这些气体不是简单的墓中长年积淀的二氧化碳等气体，而是毒气。

《酉阳杂俎·尸穸》记述：“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墓内冒出的气体，竟然把天上飞过的鸟儿都毒死了，可见墓毒之厉害。盗墓者大骇，再也不敢进入这座古墓。

王充《论衡·死伪》记述：“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发其棺，取玉柙印玺送定陶，以民礼葬之。发棺时，臭憧于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到棺前查看的官员，竟然让棺中散出来的臭气给熏死了，可见其气不是臭而是毒。王充在书中推测了“毒气”来源：“臭闻于天，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未为怪也。”

古代人常使用的特殊“毒物”是水银。水银是一种液态金属，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别名：铅精、姹女、汞、流珠、赤汞、砂汞、灵液、活宝，从这些丰富的叫法中，就可知道水银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应用。

水银用途广泛，还是古人常用的尸体防腐剂。在秦汉及之前的陵寝中，使用水银的记录较多，齐桓公墓内便置有“水银池”。水银蒸发形成的毒气，给盗墓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括地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齐桓公墓在临菑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墓葬被盗于西晋末年，此时距齐桓公去世已经有900多年，墓内仍有很重的毒气，以致人不能进入，盗墓者们只能在墓外等了几天，然后牵着狗在前面带路，才进入齐桓公墓。齐桓公墓中的墓毒，就是那座水银池。

为什么墓葬中的墓毒多选用水银呢？由于毒是封墓之前安放好

的，所以必须保证修建工匠的安全，也就是说修墓者不会中毒，而让盗墓者中毒。那么，如何才能使墓中之毒准确“识别”同样处在墓室中的修墓者和盗墓者呢？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墓毒在放置之时并没有毒，或这种毒在当时对人体的危害微乎其微，而在日后长年封闭的状态中，毒素逐渐挥发，形成足以致命的毒，以毒杀后来进入的盗墓者。什么样的物质毒性大又具有较强的挥发性呢？当然首推水银。建水银池就是利用水银的挥发气体毒杀妄图盗取墓中随葬品的盗墓者。

水银，化学名称为汞，密度很大，易蒸发，是一种有毒的银白色一价和二价重金属元素。它是常温下唯一的液体金属，游离存在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辰砂、甘汞及其他几种矿中。常常用焙烧辰砂和冷凝汞蒸气的方法制取汞。水银很容易被皮肤以及呼吸道和消化道吸收，是一种可以在生物体内积累的毒物，口服、吸入或接触后可以导致脑和肝损伤。纯水银的毒性要低于其化合物的毒性，毒性最高的汞有机化合物是二甲基汞，人的皮肤只要接触数微升的这种物质，就会致死。因此，水银成为古代墓葬防盗措施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置水银反盗墓设计的陵墓中，最著名的当是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陵使用的水银量惊人，注满了陵内的整个地层，成了一个可怕的“地下毒河”。试想，在密封空间内，如果有盗墓者侵入，谁还能活着走出来？

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无损勘查。通过科学勘探，考古工作者们在秦始皇陵地宫上方发现一个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强汞区，这个强汞区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的中央地区。很显然，这就是秦始皇陵地宫中水银铸就的百川江河大海。地宫内水银之多，在80多米高的封土上仍能探测出。经过周密分析，专家得出推论，地宫中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

有学者推测，地宫中的水银可能多达几吨甚至上百吨。那么，这上百吨水银从何而来？这将是秦始皇陵的又一个谜团。

与墓毒相比，还有一种更加匪夷所思的可以置盗墓贼于死地的毒，那就是尸毒。尸毒，顾名思义，就是墓主人尸体中的毒。为何已经死去的墓主人尸体中会含有毒素，这些隐藏在尸体中的毒又是怎样发挥其神奇作用毒死盗墓者的呢？其实这些所谓的尸毒就是朱砂。

朱砂，朱砂又称辰砂、丹砂、赤丹、汞沙，是硫化汞的天然矿石，大红色，有金刚光泽至金属光泽，属三方晶系。朱砂主要成份为硫化汞，但常夹杂雄黄、磷灰石、沥青质等。朱砂有无镇静催眠作用，认识不甚一致；有解毒防腐作用，外用能抑制或杀灭皮肤细菌和

寄生虫。朱砂中汞的含量高达86.2%，是炼汞最主要的矿物原料，毒性自然很高。朱砂为汞的化合物，汞与蛋白质中的疏基有特别的亲合力，高浓度时可抑制多种酶的活动。进入体内的汞，主要分布在肝肾，而引起肝肾损害，并可透过血脑屏障，直接损害中枢神经系统。汉代以来，尤其在魏晋时期，很多人痴迷于炼丹和服食丹药，认为服食这种以朱砂为主要原料炼出的丹药可以长生不老。尤其在弥留之际，会大量服食，一方面可以治病，另一方面可以在死后起到尸体防腐作用。人死之后，生前服食的朱砂沉积在骨骼中，经过一段时间，沉积的毒素散出，于是就形成尸毒，成为墓葬防盗的有力武器。

尸毒不仅会在墓内挥发出致命的毒气，甚至还会给墓葬外的周边环境带来危害。《太平广记》中记载：一次，曹操出兵征讨匈奴，路过一片寸草不生的高岗，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指出这里应该是一座大墓，墓主人死前服了生礜（yù）石。这是一种有毒物质，墓主人死后，这种物质从尸体内蒸发出来，形成毒素，导致墓葬外草木不生。曹操下令将这片土岗凿开，下边果然是一座古墓。

如果说人们生前服食朱砂是为了死后尸体不腐，只是无心插柳地起到防盗作用，那么，也有一些墓葬中的墓主人在死后口含一些毒液，专门对付那些胆敢盗取随葬品、亵渎墓主人尸体的盗墓贼。元代著名盗墓贼朱漆脸就遭遇了这样的尸毒。

为了防盗，古人在下葬前会给逝者服剧毒物质。若干年后，当盗墓者进入墓中搬动墓主人尸体时，尸体腹腔内的液体受挤压喷射出来。幸运者如朱漆脸，因为年代久远，毒液的毒性大大降低甚至不具有毒性，原来足以致命的毒液仅灼伤了朱漆脸的皮肤。不幸者则会中毒身死墓中。

尸毒往往与遗体防腐相结合，一般防腐的药材在体内沉积日久，便会形成毒素，盗墓者一旦靠近尸体，便会被尸体中散发出的毒素毒伤甚至毒死。无论墓毒还是尸毒，都是杀伤力极强的防盗方式，这种防盗方式不仅仅要保护墓葬免遭盗劫，更要严惩盗墓者，令后人不敢觊觎。

不管古墓中的“毒”是哪来的，但“毒墓”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后世盗掘者或考古专家都会小心谨慎，防止“中毒”。一般情况下，考古人员在设计考古发掘方案时，针对高规格的古墓都会考虑是否有毒气或机关，提前备好有特殊功能的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在确证没有威胁生命的安全隐患后，才会打开墓室和棺椁。2007年初，考古专家在开启安徽六安双墩1号汉墓时，即考虑到墓内有毒气或机关的可能，但由于此墓早在唐代即遭到严重破坏，最后并没有意外发生。

第十八章　虚墓、假墓与疑冢
——墓中有墓，冢中有冢

遍设疑冢乱视线

防止墓葬被盗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当然是不让盗墓者找到真正的墓葬。保护墓主人死后不被侵扰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当然是不让盗墓者找到墓主人的棺椁。于是，人们想出很多隐蔽墓葬的方法，其中最令盗墓者难以琢磨的便是疑冢。茫茫深山之中，坟冢林立，不知哪一个才是埋藏墓主人棺椁和稀世珍宝的真冢。

疑冢，即是为迷惑人而虚设的坟墓，也是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即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

可能没有人能够想到，孔圣人竟然是最早设置疑冢防盗的人。宋代孔传的《东家杂记》一书中记载了圣人孔子的疑冢："先圣坟西有虚墓五间，皆石为之。世传先圣没，戒门弟子为虚墓。后果遭秦皇发冢，有白兔出于墓中。始皇逐之，之曲阜西北十八里沟而没，鲁人因名其沟曰'白兔沟'。"这条史料说明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为了防止当时孔子学说的反对者发掘孔子坟墓，在孔子墓旁边设了五座疑冢来迷惑试图盗墓的人。当时儒家的学说不过是一家之言，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再者说，孔子的观点并非人人赞同，还有很多反对派。联系这一背景，弟子为其造假坟，迷惑盗墓者还是有理由的。不管这样的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为了防止惨剧的发生，反盗墓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然而区区五座疑冢并没能免除孔子墓葬被盗的厄运，200多年后的秦始皇还是发掘了孔子的坟墓。

设置疑冢的防盗方式流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军阀混战，少数民族南下，地方割据势力并起，加之气候变迁，自然灾害纷繁，瘟疫肆虐，使这漫长的40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乱

世。乱世多盗贼，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盗墓盛行的时期。为了防止墓葬被盗，人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防盗方式。设置疑冢，这种古老的防盗方式也被魏晋之人竞相采用。

在设置疑冢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曹操。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事，为世人所熟知，但曹操的真正陵墓在哪里，迄今为止，我们仍是无法确定。

曹操设置疑冢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盗墓。但也可能与其生前一贯奸诈多疑的性格有关。

《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年少时曾与后来的敌人袁绍一起搞了一个恶作剧。有一户人家结婚，晚上夫妻合拜入洞房。曹操叫袁绍“站岗放哨”，自己潜入主人家园子，偷看新郎新娘的床上之事。不料看得正起劲，被主人发现，大喊：“有偷儿至！”于是主人家的家丁把园子团团围住，曹操被包围了。但曹操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只见他从袖内抽出一把利刀，一手拽住新娘。主人见状瑟瑟发抖，不敢动弹，反而求他放人。曹操此时却指着躲在树后的袁绍说：“偷儿在这里，你们为何不去追？”袁绍一听，转身就逃。主人也急忙带众家丁去追赶。这时的曹操，放开新娘，旁若无人地走了。

曹操性格上的多疑，《三国演义》多有演义成分，但有许多史料可以证实：曹操有一个同乡叫恒邵，过去与他有私仇。曹操得志后，恒邵向他请罪，跪在庭前。曹操说了一句：“跪而解死耶？”结果还是把他杀了。《魏书·张绣传》记载，曹操的一个侄子曾为张绣所杀，后来曹操为了打败袁绍，以摆脱军事上的劣势和被动局面，不得不释怨招徕张绣，封他为侯，食二千户。但一俟消灭袁绍，地盘巩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出言逼迫张绣自杀。曹操在临死之前，又把张绣的儿子张泉杀死，以绝后患。凡是有宿怨的，曹操都猜忌，不放心，至死也不放过，所以《曹瞒传》中说，“故人旧怨”大都被曹操报复杀死。

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在其死后也得到了体现。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应该说，曹操设疑冢是相当成功的，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没弄清他的墓地所在。人们都认为，曹操设疑冢，正体现了曹操的“奸雄”本性。清代诗人陆次云就曾写诗讽刺道：“疑冢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邱。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正平是三国时名士祢衡的字，被江夏太守黄祖所杀，葬于武汉长江中的鹦鹉洲。诗的

意思是，曹操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费尽心机。而祢衡只有一座三尺坟，却历千年而安然无恙。当然，今天，鹦鹉洲已被江水淹没了。

因为曹操死前曾叮嘱其侍妾、歌伎们要常常登铜雀台望其西陵墓田，所以清代诗人查慎行写了一首很有名的七绝："分香卖履独伤神，歌吹声中繐帐陈。到底不知埋骨地，却教台上望何人？"讥讽曹操设了那么多疑冢，到底让其姬妾们向何处眺望呢？

宋代诗人俞应符对曹操的这种行径甚为不齿，他在《七十二座疑冢》一诗中，以厌恶的口气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

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毕竟没有人肯花那么大的力气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挖掘。再说，即使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掘开，能肯定曹操的尸体就葬在其中的一座坟墓里吗？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篇《曹操冢》，为我们解开曹操墓葬之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原文不长，兹录于下：

>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暗。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间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众所周知，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多是采自民间故事和传说。这篇《曹操冢》，肯定也是道听途说，不过却也言之凿凿。意思是说，先后有两人在许昌城外的河里洗澡，下水后却变成死尸浮出，尸体好像是被刀斧砍过一样。地方官为弄清真相，便令人从河的上游截断水流，水落石出，见水下的石崖上有洞，洞口设置着以河水作动力的转轮，轮上排有锋利的刀子。人们将轮子卸下，进洞发现一块小石碑，上写篆字，仔细看，才知是曹操之墓。于是人们将棺材劈开，将里面的遗骨抛出。墓中的金银财宝全被人们取走。

如果这则故事是真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曹操的遗体是运回许都安葬的，所谓七十二疑冢，没有一个是真的。

但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曹操的《遗令》。在《遗令》中，曹操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墓地的位置——"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怕人掘墓，又公开其墓的具体位置，这不是缺心眼儿吗？

曹操死于洛阳，自河南洛阳至河北临漳的路程比从洛阳到许昌要远一倍。既然不是就地安葬，那么，曹操灵柩有归葬临漳的可能性，也有归葬许都的可能性。

如果说这个可能性存在的话，蒲松龄所记载的故事就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近代史学家邓之诚在其《骨董琐记》里又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据说磁县有个农民叫崔老荣，此人在鼓城镇西15里的墓葬地挖坑时，墓坑突然塌陷。他继续挖掘，发现一个石室，外有石门，石门旁有许多死人的遗骸。县官陈希贤闻知后，派人向石室内倾倒硫磺，然后再派人进去，发现石室四壁就像刚刚粉刷过一样。石室中央有一石棺，棺前有石刻的墓志铭，说明是魏武帝曹操的墓。在此之前，附近曾发现这样的石室十余个，但均无石棺，所以，人们认为这才是曹操的真冢。

根据此记载，可知这个“曹操冢”规模很小，仅容一棺，虽然有墓志为证，但不像是一个已贵为王的曹操的坟墓。况且，曹操下葬时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曹丕刚刚继魏王位，汉献帝给曹操的谥号为“武王”。“武帝”之号，是曹丕称帝以后才改的。而此墓志言曹操为魏武帝，要么是曹丕称帝之后才安葬其父，要么是后人的伪造。到底邓先生所记是否确实，尚未被学术界确认。

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官吏参加者等内容。这一石刻是目前唯一一件反映西门豹祠情况的实物。后赵建武年间是335年至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同时《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建造年代正是后赵建武年间。考古专家认为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正是曹魏时期西门豹祠原址上重修的西门豹祠。

然而，在河北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市的漳河岸边，就有五处西门豹祠，哪一处西门豹祠是后赵建武年间的西门豹祠呢？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水经注》上有这样的记载，漳水经过武城城南向东流去，又经过西门豹祠前向东北方向流去。此可以判断漳河在经过武城时是东西流向，武城在漳河北岸，西门豹祠应在武城的东南方向。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就在距离武城遗址约10里的河北临漳县丰罗镇漳河大桥南侧，在一处隆起的土台上立着一块宋代西门豹祠碑石，碑文描述这里曾经是一座西门豹祠。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内容如下：

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磁县地处冀南，周围方圆30多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墓冢。《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根据多处墓志铭和墓形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考证表明，从424年到578年先后有东魏、北齐在磁县、临漳邺镇一带建都，其间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葬于此地，逐渐形成了大型古墓群。

另据磁县出土的墓志看，墓的主人也均为北魏、东魏、北齐时人，所以《磁县志》这样记道：“民国以来，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是北朝时的王公要人……疑冢之说不攻自破。”

既然之前找到的都不是曹操的真墓，那么曹操的真正陵墓在哪里呢？

1998年4月，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的空地里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对于寻找曹操墓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河南安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如获至宝，因为年代久远，这块石碑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考古人员对石碑进行了拓片，并对石碑记载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块墓志铭，内容是后赵建武年间的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的是，鲁潜墓志首次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鲁潜墓志记载：“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从墓志记载来看，是以高决桥为起点的，高决桥现在的位置据考证可能是在安阳市安丰乡，然后从高决桥向西行1420步，再南下170步就到了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再从西北角西行43步，再向北250步，这就到了鹿泉墓的灵堂。按位置记载来说，魏武帝陵和鹿泉墓的关系大概就是200多步，相对是比较近的。如果鲁潜墓志同鲁潜墓的距离太远，对于曹操墓，鲁潜墓志的记载就失去了坐标意义。考古人员在鲁潜墓志发现地进行考古调查，认为鲁潜墓应当距离鲁潜墓志发

现地不远处。然而，这一带的地层已经破坏，鲁潜墓已经无迹可寻。随着鲁潜墓志古碑被发现，曹操墓的范围逐渐缩小了。被野史和传说混淆视听的曹操墓，似乎有了云开雾散的迹象。那么鲁潜墓志记载的高决桥在哪里呢？

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曾从水路前往祭奠其父亲，水路就是指沿漳河溯流而上，而西高穴村的位置正好在漳河南岸，距离漳河很近。河南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研究员通过实地查勘与考古论证，认为曹操墓葬的区域就在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往北方圆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潘伟斌把这片遍布着庄稼的平地称作曹操陵园区。这片区域距离邺城遗址30里左右，同时在河南安阳市丰罗镇西门豹祠以西一个地势较高的岗岭上，遍布着沟壑与山脊，同曹操《终令》的描述相吻合。潘伟斌描述，1700多年前，这片土地应当是一片高岗，只是到了现代，才通过土地平整改造成农田。这样的地形今天还可以通过一些残留的地形原貌看出来。因为这片高岗比漳河要高出10多米，因此不可能以漳河水去灌溉，应当是一块贫瘠之地。潘伟斌介绍说：这个地方北有漳河，难免有山梁，往西北也是一个山区，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好，北高南低，往东过来一点也非常低。据说曹操遗令中说，在他墓前留空房的地方作为陪葬墓的位置，现在根据位置表明前面地方比较平坦，应该是比较适合做他的陪葬墓位置。

2006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就在专家认定的曹操陵园区域的西高穴村，惊人地发现了一处墓葬。它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一空。考古人员与同一时期的东汉王陵作比较，认为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墓，级别至少是王侯级。这座大墓的方位就在鲁潜墓志出土的东南方约1公里处，考古专家大胆推测，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或其陪葬墓中的一座。同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曾被盗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武帝家用”铭文。曹操死后，被尊为魏武帝，而“武帝家用”铭文牌说明这是曹操生前用过的器物。那么，这个大墓是不是鲁潜墓志所描述的曹操墓可能所在的范围里呢？

综合曹操墓葬的各种考古依据与信息，潘伟斌绘出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图。在这幅图中，邺城铜雀台、鲁潜墓志出土地、东汉大墓、西门豹祠以及武城和漳河同曹操墓可能的地点，同史料记载最为吻合。

曹操墓在邺城西原已经是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曹操统一北方后，邺城成为他进行统一战争的战略大后方，邺城随之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因此曹操去世时将墓地选择于此。曹操在世时他本人并没有代汉自立，而且一生中树敌太多，不可能把墓地选在当时的首都许昌或者洛阳附近，而老家亳州远离中原，接近

孙权的吴国，极易被孙吴偷袭。从安全考虑，曹操也最可能把墓地选在自己的封地邺城。这个结果有两种，一种就是曹操墓能够被揭开，另外一种也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如果曹操墓没有被漳河的洪水冲掉，那么曹操墓仍然存在中华大地上，仍有被揭开谜底的那一天。

虚冢设疑是烟雾

千百年来，建造墓葬的人和盗墓者斗智斗法，盗墓和反盗墓技术层出不穷，不断改变也不断革新。虚葬，是一度流行的防盗之法，在盗墓日益猖獗的时代，虚葬的具体形式也一变再变，继疑冢、障眼法之后，另一种虚葬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虚冢。

虚冢，只是秘葬方式之一种，又称假坟、虚墓、虚葬、潜葬、潜埋。说白了，就是造若干假的墓穴，而将真尸葬地隐匿。

虚冢与疑冢、障眼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疑冢是遍立假冢，迷惑盗墓者，在设置疑冢时，造墓者已经向盗墓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墓主人的遗体并不在这些疑冢之中。障眼法的本质与疑冢相同，多具棺材同时出殡，真正的墓主人遗体可能在其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令人们不知真正的棺材所在，只是障眼法使用在出殡过程中，疑冢用在下葬过程中。虚冢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虚冢不是迷惑，而是骗。

设置一座墓葬和双层墓葬是虚冢的两种表现形式。设置墓葬令盗墓者以为这就是墓主人和珍贵随葬品的埋葬之所，但当盗墓者费尽心机打开墓葬时，却发现这是一座空墓。设置双层墓葬，即一座墓葬有真假两座墓室，盗墓者进入的往往是设在明处的假墓室，结果一样一无所获。

与疑冢和障眼法一样，虚冢也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虚冢，当属十六国中赵国第三任统治者石虎的墓。

东晋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后赵（319～351年）始主石勒，字世龙，羯族，上党武乡人。初归效刘渊，据有襄国。石勒后杀前赵（304～329年）末主刘曜称帝，拥有冀并幽司豫兖青徐雍秦十州之地。

在当时的十六国中，后赵最为强盛。石勒当了15年皇帝，于333年病死。死后，石勒采取“虚葬”手段，处理自己的后事，夜里偷偷下

葬，“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

史上记载石勒的葬事相当低调。《晋书·石勒》记载，石勒病危时，曾下遗诏：“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

石勒的葬事与曹操所为如出一辙，秘葬的同时施行薄葬。据说石勒的墓内没有金银宝珠宝随葬，丧事也极为简单，官员参加丧礼都不被允许，以绝世人掘陵取财之歹念。

石勒的反盗墓手段，其实在其死之前已搞过“试验”，石勒葬母时便是“虚葬”。《晋书·石勒》记载，“勒母王氏死，潜窆（biǎn）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另据时人所记，石勒秘葬在渠山，当夜从城里同时抬出了十多具棺材，以迷惑老百姓。后来朱元璋“十三城门出棺”，是否是受到石勒秘葬方式的影响，现在不能肯定，但其反盗墓的灵感，应该是一致的。

石勒死后由其第二子石弘继位，可能儿子太年轻了吧，让其侄儿石虎夺了皇位。石虎废石弘为海阳王，自立“大赵天王”，并迁都于邺。

石虎死后葬在显原陵。从史料记载来推测，显原陵亦为虚冢，石虎并未葬在陵中。《资治通鉴·晋纪》记载，东晋穆武帝升平三年（359年），前燕皇帝慕容儁做了一个梦，梦见当时已经去世的石虎咬其膀子，慕容儁醒后大怒，一怒之下竟然命人去挖掘显原陵，欲鞭尸泄忿，没想到气势汹汹的慕容儁兴师动众地挖开显原陵后，墓中却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石虎的遗体。慕容儁知道上当后更加恼怒，于是“购以百金，邺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

最后，石虎的一名嬖（bì）妾对慕容儁说，石虎葬在东明观下，慕容儁下令挖掘，“下度三泉”，终于挖到石虎的棺椁，于是下令开棺、鞭尸。慕容儁指着石虎的尸体大骂：“该死的胡人，死了还敢吓我。”最后将石虎的尸体投入漳河之中。慕容儁第一次发掘的显原陵就是虚冢，第二次在东明观下发掘到的坟墓才是埋葬石虎的真墓葬。石虎的虚冢虽救了他一次，却也没保护他永享安宁。

虚冢与疑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墓内没有尸体。为了让盗墓贼相信虚冢内的尸体是墓主人，有些虚冢甚至会找一些真正的人骨来

代替墓主人遗体。当盗墓贼挖到虚冢时，虽然里边微薄的随葬品令盗墓者大失所望，但看到棺椁内盛放的尸体，盗墓者也就不会怀疑这座墓的真假了。

虚埋潜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流行，一些墓葬的主室中没有发现人骨，而耳室中却常能发现棺材和人骨。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这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衬葬，即身份高的人的墓葬中陪葬其他人。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墓者设置的虚冢，用来迷惑盗墓者。

有些墓葬在建造时将结构设置为双层，上层为虚冢假墓，下层才是放置墓主人尸体和珍贵随葬品的真正墓室。盗墓者挖掘盗洞，一般是从地表向下挖，从墓葬上方打盗洞，这样，盗墓者首先进入的便是上层墓室，也就是造墓者修造的假墓室。这样，隐藏在上层虚冢之下的真正墓室就得以保存，墓主人真正的尸体也会免遭劫难。

衣冠冢也是虚冢的一种特殊形式。衣冠冢，即葬有死者的衣冠等物品，而并未葬有死者遗体的墓葬。这是因为死者的遗体无法找到，或已葬在另一处，再于此地设衣冠冢以示纪念。但另一方面，衣冠冢也可以起到虚冢的作用，当盗墓者满怀希望地打开一座墓葬时，却发现这仅仅是一座衣冠冢，而真正的墓冢却不知所踪。

孔明秘葬无踪影

千百年来，盗墓与反盗墓之间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这样的较量从未间断地持续着。无论人们设计怎样巧妙的防盗措施，最终也难逃被利益驱使的盗墓者盗掘的厄运。但有这样一种防盗方式，却有效阻止了盗墓者染指墓葬，甚至运用现代高科技的勘测技术，都难以定位墓葬的精确位置，这就是秘葬。

秘葬，又称潜葬，指人死后秘密埋葬，不让任何人知道墓葬所在，墓葬上方不封不树，外表看来，丝毫不像墓葬。秘葬是一种特殊的安葬习俗，即便是显赫人物安葬，也不会留下任何关于墓葬具体位置的文字记录，令盗墓者无从下手。

秘葬的防盗效果很明显，但秘葬的墓葬并不多见，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厚葬的风气和视死如生的习俗不允许人们如此草草安葬死者。按照汉族传统礼教的习俗，丧葬是一个复杂的礼仪过程，一般大型墓葬上方都建有专门用来祭祀的享堂等地面建筑，高高矗立

在封土旁边，昭示着这里埋葬着显贵人物，也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此处地下有财宝。这不仅仅是权贵的炫耀，更是对死者的尊敬。

中国古代很多文献都记载了蒙古族的秘葬习俗。蒙古人的墓葬之上不仅没有建礼制建筑，连作为坟冢最基本的封土也没有，而且还要在死者下葬后纵马踏平墓葬的地表。不仅如此，有时为了保证墓葬所在的秘密不泄露，甚至还会将前来送葬的人杀掉。

采用秘葬下葬的不仅仅只有蒙古人，也并非始于蒙古族兴盛的宋元时代。早在三国时期，中原地区便已有秘葬，而采用秘葬的竟然是诸葛亮的坟墓。

诸葛亮一生恪守礼法，他为何要采用这种与汉族传统礼法背离的下葬方式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提防觊觎墓中珍宝的盗墓贼吗？

事实上，诸葛亮墓的秘葬并不同于蒙古族的秘葬。首先，诸葛亮墓中应该没有可以吸引盗墓贼的丰厚随葬品。诸葛亮品格高尚，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之表率，一生忠于蜀汉，清高廉洁，一心治理蜀汉，自己却不置其他营生。他在给后主的上表中说道：“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及至去世，果如生前所言。因此，并没有贵重之物可以随葬。而且诸葛亮去世于234年，当时正在行军作战之中，诸葛亮意外病逝，迫使蜀军不得不提前撤兵。如此状况，诸葛亮自然不能以繁琐礼节风光下葬。所以，诸葛亮墓葬应该是简单的薄葬。



诸葛亮

相传诸葛亮因为魏延夜闯，延寿之法被破坏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遗书后主刘禅，嘱其在他死后，将尸体入棺，由四名士兵抬着向南走，杠断绳烂之处便是他的葬身之所。

对于这位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的最后遗言，刘禅岂能不遵？于是他命四个关西壮汉，抬着他的棺一直往南走。这四个汉子抬了一天一夜后，终于体力不支，但是此时杠未断，绳也未烂。四个人商议后，将诸葛亮的棺就地掩埋。回去后，他们报告刘禅，说将丞相棺掩埋于杠断绳烂之处。刘禅听了报告后觉得不对劲，怎么这么快就会杠断绳烂呢？于是将四个人抓起来严加审问。四壮汉经不起皮肉之苦，只好招认。刘禅大怒，以欺君之罪将四人杀死。由于诸葛亮下葬时只有四个人知道，而这四个人被杀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墓葬的具体

位置了，可谓是绝对的秘葬。

这个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后人为了渲染诸葛亮之机智，认为这一切都在诸葛亮预料之中，因为孔明早已料到，自己死后蜀国必为司马氏所灭，而蜀国灭亡后司马氏必来挖他的坟墓，所以他在生前为死后“导演”了这出戏剧，以保自己死后的安宁。

如今，全国有多处诸葛亮墓和诸葛亮祠，学术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天陕西省勉县西郊20里处的诸葛亮墓是真墓。墓葬上有历朝历代修筑的祠庙，尤以明清两代为多。陵园内苍松翠柏，一如锦官城内的武侯祠。

第四篇　盗墓惊天奇闻

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会遇到鬼。这话对盗墓者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他们从事的这一“行业”，要求他们必须夜里行动，并且是与死人打交道。盗墓盗多了，难免会遇到“鬼”。在中国的盗墓史上，还真有这种事。在盗墓者盗掘坟墓之时，墓主人竟然能开口说话。这的确是奇异之事。但还有更为奇异之事。有的盗墓者，看到墓主虽然离世年代久远，但面目却如生人一般，甚至对她们进行奸污。

在我国封建社会，帝王将相大都对墓地的风水比较迷信，这也就有了盗墓史上层出不穷的挖祖坟事件。有些帝王想让自己的江山稳固，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掘开政敌的祖坟，鞭尸、暴尸事件一再发生，令逝者不得安宁。

但是，盗墓者有时也能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他们在盗墓时，竟然还盗出了我国文化史上的惊天奇闻……

第十九章　中国盗墓史上的“活见鬼”现象

诡谲无比鬼吹灯

俗话说“人点蜡，鬼吹灯”，传说人的身上有三盏油灯，一盏在头上顶着，另两盏在肩膀上。这就是人身上的阳火，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千万不要回头或者向两边张望，如果将油灯吹灭了，便给鬼招了魂。叫名字的并不见得是人，有时会是漂泊无归的野鬼，来招路人的魂魄。人身上亮着的三盏有阳气的灯，能够震慑野鬼，可一旦身上的三盏灯熄灭了，野鬼便没有了忌惮，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路人的魂魄勾走。

在盗墓时，也要点一盏灯，如果鬼不让你盗墓，就会把灯吹灭。这是一种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协议。盗墓者掘开墓葬，进入墓室时，要在墓葬的东南角放上一盏灯，墓室内的鬼魂是否同意盗墓者的行为，就看点着的这盏灯了。如果墓中的鬼魂同意盗墓者的偷盗行为，对其盗墓行为不加以干涉，这盏灯就会长明不灭，那么盗墓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墓内随葬品席卷一空。可一旦东南角的灯灭了，那么表明墓室内的鬼魂会干涉盗墓者的行为，盗墓者就要立即离开，从此再不能觊觎这座墓葬，否则性命堪虞。因为那盏灯是墓中的鬼吹灭的，鬼吹灯的目的是为了警告盗墓者，这座墓葬不允许他染指。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中的无稽之谈，相信很少会有人信以为真。但盗墓本身是一种背离道德的偷窃行为，盗墓者内心难免自责和恐慌，更何况盗墓是一种与死人打交道的营生，在素来信奉神鬼的中国，盗墓者进入墓葬，直面死者时的内心恐惧可想而知。所以，也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大多数盗墓者都愿意相信“鬼吹灯”，而“鬼吹灯”事件在盗墓过程中也屡有发生，这便给这一奇特的盗墓现象渲染了神秘的色彩。

那么，“鬼吹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存在，何以会出现“鬼吹灯”现象？“鬼吹灯”究竟是盗墓者的恐惧心理作

祟，还是另有隐情？

其实，“鬼吹灯”是可信的，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用现在科学的解释来说，就是点一盏灯看看里面的氧气是否充足，如果连灯都点不着，或者刚点燃又很快熄灭，说明里面的氧气很少，下去了就是送死。

在古代，灯一般以松油为原料，近代的盗墓者一般会用蜡烛照明，无论是油灯还是蜡烛，都是利用火来起到照明作用。众所周知，物体燃烧的必备条件就是可燃物、达到燃点的温度以及氧气。古墓深埋地下数百甚至上千年，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空气自然无法流通，而一般的小型墓葬都要埋藏在地下一两米左右，大型贵族墓葬往往深入地表可达十几米甚至二十米。在离地面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地下，又没有良好的通风，缺氧则是必然的了。盗墓者开启尘封的古墓，只是在墓顶开凿一个仅容身体穿过的小洞，短时间内进入墓葬的空气有限，无法让充足的氧气进入墓室。因此，墓葬中缺氧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当盗墓者将灯放入墓葬的某一角落，灯很快就因墓室内氧气不足而熄灭，这便是被后人传得诡谲无比的“鬼吹灯”现象。

一旦出现“鬼吹灯”现象，盗墓者必须尽快离开墓葬，这并非是鬼魂阻挠，而是墓中缺氧，人长时间停留在缺氧环境中，很容易发生危险。这便是那些无视“鬼吹灯”继续盗墓的盗墓者们命丧黄泉的原因。

灯可以警报墓内缺氧，另外，因为偷坟掘墓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大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灯也会起到照明作用。因此，对于盗墓者而言，一盏灯是盗墓的必备工具。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一篇中，讲述了一个盗墓世家子弟朱真盗墓的故事。在朱家世代相传的盗墓工具中，有一件叫做“皮灯盏”的油灯，其作用便是在盗墓时照明。朱真在盗掘周胜仙墓的时候，点亮了这盏皮灯盏。由于周胜仙墓是一座新坟，墓葬被盗时墓内空气流通尚好，皮灯盏未灭，朱真便顺利地盗空周胜仙墓。不仅如此，先前假死的周胜仙还因此复活，这说明墓葬中有充足的氧气。

“鬼吹灯”并非神鬼作怪，而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只是因盗墓的神秘诡异而被人们传说得玄乎其玄。无论“鬼吹灯”是否存在，盗墓都是一种可耻的、被世人唾骂的不道德的行为，都是不足取的。

二百年后仍如生

在盗墓史上，一些离奇古怪有、不可理解的“活见鬼”现象很多，至今仍传得神乎其神。

最离谱的“活见鬼”，是汉高祖刘邦的长陵被赤眉军掘开后，同陵异穴里的皇后吕雉之面色如生，结果遭到了这些人的奸污。当时吕雉辞世已经200余年，尸体经历如此长的时间都没有腐烂，很是让人惊异。

1972年，当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辛追夫人在度过了2000多个地下春秋后重现世人面前时，全世界都为中国古代精湛的尸体防腐技术感到震惊。辛追夫人以其鲜活的面容和富于弹性的肌肤让世界见证了湿尸防腐的精妙。

当年湖南省博物馆与湖南医学院联手，通过现代技术对辛追的尸体进行保护，注入尸体血管内的显影剂可以正常流动，尸体的各个关节也仍能活动自如。

再后来，借现代模拟技术，根据辛追头骨结构，专家描绘出了她50岁、30岁、18岁、6岁时的面貌，发现辛追生前年轻时是一个标准的美女，实乃古今奇观。

古代贵族在棺椁的制造上，往往采用具有芳香防虫功效的樟、柏、桐等材质，汉代所用棺具质量很高，棺壁及顶、底板均系整材，套棺内外髹漆，内棺盖口还用胶漆封固，赋予棺椁良好的密闭性。他们还认为“金玉生寒”，用金玉殓葬可使尸身不坏，于是有了玉衣、玉棺之说。皇后吕雉死时就是身穿金缕玉衣。

为了防止细菌分解尸体，死者在入殓前，先要用香汤沐浴尸体再用酒擦洗。这样不仅可以使尸体变得“香美”，还有一定的消毒作用。酒的喷洒则会在封棺后加速棺内氧耗，建立缺氧条件。同时用洁净的内外衣和单被紧紧捆束尸体，也有助于隔离空气，对尸体的早期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中国古代还有用汞、砷防腐的习俗。马王堆女尸有两个明显特点：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棺液（外部水汽渗入形成）沉淀物中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成分，对尸体细胞起到了固定作用，成为古尸不腐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入葬时对墓穴深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封建贵族是极为重视深埋的，视厚厚的土层为最好的庇护，他们的墓穴又深又大，并且要求不泄气息。墓室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有效地同外面的空气隔离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保持恒温。这样做可以延缓或避免尸体腐败的进程。

由于防腐技术可以使死者如生，“活见鬼”现象便接二连三地在官方文献和稗（bài）官野史中出现了。

当年被刘邦封为“长沙王”的吴芮之墓，被掘开后的情形，也让人惊诧不已。吴芮秦时被封为番阳令，楚王项羽封之为衡山王。刘邦即位，将临江改长沙，加封他为长沙王。史载，吴芮为官一方，深得民心，刘邦称帝后第二年（前201年）病死，被厚葬在长沙城北。

吴芮的墓很高大，郦道元的《水经·湘水注》记载，“县北有吴芮墓，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及佳憩也”，墓旁还建有祀庙。

《太平御览》中记载：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

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好像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十六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

吴芮后被“更葬”，被迁葬家乡瑶里（今安徽休宁、江西景德镇一带），遗迹尚存。吴芮墓被掘一事，正书、野史、地方志、族谱等史书多有记载，实是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的一大离奇之事。

尸体变异长指甲

死了多年的人，手指甲居然长到了背上，如此之长，实在罕见。但这确实发生在东晋人卞壶的棺材里，委实让盗墓贼大吃一惊。

卞壶（281—328），字望之，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为东晋初年著名武将。辅佐东晋成帝司马衍有功，官至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48岁时为国而死，死后被厚葬于现在的南京朝天宫一带，并修建有卞公祠，竖御赐忠节坊，牌坊前的水井被称为忠孝泉井。

据史书记载：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墓，剖棺掠之，壶尸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卞壶是战死在东晋成帝咸和三年

（328年），坟墓被掘则是在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期间相距85年。在这样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如果防腐处理得好，“尸面如生”当是可信的。比如，刘表就因为有大量香料陪葬而像活人一样气色很好。但后面的记载“爪生达背”，也就是说入葬之后，指甲还在像树根一样不断地生长，以至到达于背，就显然有些离奇了。或许是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原因，也有可能是盗墓者看错了，或许真的是长得像爪子似的树根。然而，由于没有实物，这一切都成了不解之谜。

尸体上的指甲能长出来，迷信的说法是葬到了“养尸地”。“地书谓纯阴不化之地，年久尸不化，名曰养尸，主凶。”葬此地尸体不腐，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过去风水先生认为，此地不宜葬。

还有一说，是人死后尸体没有及时下葬的原因。《子不语》中“秦中墓道”称：“秦中土地极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凤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即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尽，然后葬埋，否则有发凶之说。尸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气，三月之后，遍体生毛，白者号白凶，黑者号黑凶，便入人家为孽。”

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均一点道理也没有。

盗掘陵墓遇诈尸

在众多的“活见鬼”现象中，盗墓者发现的“女鬼”数量远远超过“男鬼”，在已经被盗掘的清室皇陵中，那些高高在上的“龙”全都变成了一堆枯骨，而盘旋在“龙”之下的“凤”却有两“只”在死后经年依然栩栩如生。

在孙殿英率领着他的部下对慈禧的定东陵大肆劫掠时，使用了威力巨大的炸药，结果大部分帝后的棺椁被炸药爆炸后产生的巨大震动损毁了，而唯独慈禧的棺椁安然无恙，以至于当孙殿英的十多名士兵前去盗取慈禧棺椁中的宝贝时，居然是用刀劈了半天才得逞。为什么慈禧的棺椁如此坚固呢？原来，慈禧棺木是用一种极为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的，它产自西南原始密林，质地细腻，清香馥郁，可历时百年而不朽烂。棺椁表面漆有49道金漆，漆完后，还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以佑护亡灵。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竟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现出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慈禧的内

椁，也采用红漆滇金的方式制作。如此里三层外三层地制作这个棺椁，自然能够确保其足够的抗震动的能力，也许再发生比爆炸更大的震动，慈禧的棺椁也会安然无恙的。

棺椁能够在爆炸声中安然无恙固然奇怪，但肯定不会引起盗墓的士兵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的心思全都集中在慈禧棺内的宝贝上。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实实在在把盗墓的士兵吓得半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孙殿英的士兵在劈开慈禧的棺椁后，到底碰到了什么事情？

原来，当孙殿英的士兵撬开慈禧的棺盖时，棺内刷地射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宝蓝、微紫、嫣红、嫩绿等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如同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整个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只见一个面容鲜活的女人，身穿华丽富贵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上顶着一株翡翠青梗金肋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2尺的玉枕放着绿色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4两有余的宝珠，金光闪烁，流耀含英。整个棺内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慈禧青丝如墨，颧额隆耸，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可是，这种景象瞬间就消失了，只见棺中慈禧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又如同冷水没于沙滩一样，忽然之间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颧骨突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有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突然露出……

“诈尸啦！”一个士兵在神经极度紧张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恍惚觉得慈禧已蹦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掐住了他的脖颈。他在情不自禁地大喊之后，先是一蹦老高猛地向后一仰，“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他士兵闻听这突然的一声叫喊，一股冷气自下而上窜入头顶，头发炸竖而起，“哗”的一下向地宫出口蹿蹦而去。极大的紧张使所有的人只顾向外奔逃，虽然后来被孙殿英给制止住了，但慈禧入葬20年而尸体不腐，确实让人感到惊奇。那其中有怎样的奥秘呢？

原来，慈禧尸体20年保持不腐烂，完全得益于遍布她全身周边的各种珠宝玉器。首先，慈禧的口中便含有一颗很大的夜明珠——这颗珠分开是两块，合拢起来则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根据古书上的记载，夜明珠除了会发光，还能解百毒、趋吉避凶，能防腐，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所以古代的君王都以拥有夜明珠为傲。慈禧不仅口中含有一颗夜明珠，其身边不同地方还放置有8颗夜明珠，看来，这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慈禧尸身的新鲜不腐。其次，慈禧的棺椁下面有一口“井”。这口“井”并不是盛水的井，

而是风水“穴”位。慈禧生前曾亲自来这儿点“穴”，把她最宝贵的18颗珍珠投置“井”内，以示息壤（即传说中一种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的土壤）。后来考古勘探表明，慈禧棺木下方确实有一股地下水脉，富含汞等重金属。正是因为下面有重金属，所以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的滋生，才能够保证慈禧尸体20年不腐烂。

第二十章　中国盗墓史上四大文化传奇

不凖盗出“汲冢书”

“汲冢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盏明灯。自古至今，它屡被后代史书引用、被史学家拿来做自己史论的证据，似乎历史的探古非它不足以成立，非它便少了些底气。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汲冢书”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多潜行于暗夜之中。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第二年，许多方士、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历史上称此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秦始皇、李斯都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诸侯国史记的被毁，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大残缺和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断裂与缺失。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这便是“汲冢书”的发现。

“汲冢书”，顾名思义，就是汲冢里出的书。而“汲冢书”的发现地，就在古汲地——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孙杏园镇娘娘庙村。

这个因使著名文献“汲冢书”重见天日而闻名于史学界的人，并不是什么专门研究历史或是考古的人，他竟然是一个叫做不準（zhǔn）的西晋盗墓贼。同大多数盗墓贼一样，不準盗掘古墓是为了偷取墓中珍贵的随葬品，获取不义之财。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打开一座古墓的同时，也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不準盗掘的古墓位于汲地（今河南汲县西南），因此后人将这座古墓称为“汲冢”。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的一天夜里，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被称为中国史学界幸事的大事。一个叫不準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偷偷地在这里掘开了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魏王的墓冢，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简牍上的文字弯弯曲曲，迥异于晋代的文字。后来统计共有十万余言。不準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準把竹简点着用来照明，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拿了一些可换钱的物品跑了。

盗墓贼不準并不知道，当他打开这座墓葬的大门时，为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研究作出了怎样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不知道，当他不经意间点燃简牍片时，又给历史带来怎样难以弥补的损失。

后来，当地人在墓葬附近发现了零散的简牍片，便报告了当地官府。官府派人前往搜集，将墓葬中随葬的和墓葬外散落的简牍片收了起来，数量之多，竟然装了满满几大车。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被载入《晋书》之中。

古代的简牍是一种将文字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竹片间用皮条穿缀。由于墓葬中随葬的简牍埋藏日久，皮条腐烂，竹简散落凌乱。为了这批珍贵的古籍，西晋委派专人整理，将竹简上所用的战国文字释读为隶书。当时负责整理工作的是西晋著名学者荀爵、傅攒。

这部“汲冢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考订，确定“汲冢书”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它记录了上自夏建国、下至魏襄王时期的历史。

“汲冢书”中包括很多晋代或流行或散佚的古代文献，经整理确定的文献有《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l篇、《巢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图诗》1篇、《杂书》19篇、《穆天子传》5篇。其收录的古籍大多散佚不全，只有《穆天子传》保存完好。

晋惠帝时期，也就是公元300年前后，学者卫恒等人对“汲冢

书”进一步整理，将之编为编年体史书，即《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就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竹书纪年》所用纪年依次为夏、商、西周、晋，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在随后几年的永嘉之乱中散失，后来流行的都是当时的手抄本。《竹书纪年》一直流传到唐代，学术界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宋代时这种手抄本也亡佚，今天留存下来的《竹书纪年》是南宋时期的刻本。因此，学术界将之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汲冢书”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幸事，它填补了战国时期列国历史的空白，许多史料都可以与《春秋》等史书对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可还是有许多史实梳理不清。

《竹书纪年》的出现，订正了《史记》中的错误，使《史记》中某些含混的记载串联起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竹书纪年》在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史学的独立。在汉代，统治学术界的是经学，史料也被归纳在经典范围内，汉晋两代知名学者无不擅长经学。《竹书纪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资料，推动了史料整理和编年的进步，史学研究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发现，终于，史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究竟为什么亡佚？什么时候亡佚的？这成了不解之谜。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可能的结果是，整理者整理后，便以为原件不大有用了，所以亡佚。

此书是以后史学研究的一座灯塔。古代最大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后，到了西汉初年，一些战国遗老凭记忆默写儒家经典，就是后世所说的今文经。虽说能弥补一下缺撼，但对战国时各国历史却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这是中国文化史的顿挫，它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了古史文化延续上的断裂和历史的残缺。

西楚霸王藏《孝经》

盗墓者将黑手伸向古代墓葬，却歪打正着发现古代文献，除“汲冢书”外，著名的《孝经》等著名文献资料散佚之作也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

《孝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经学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孝经》过去是读书人必修的一本书。《孝经》共分18章，是儒家十二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之分，其作者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孔子，又有人说是曾子，还有称是汉初人所作。《孝经》的发现，堪称又一文化传奇，其发现和传承，亦具有戏剧性。

秦始皇焚书时，儒家经典毁坏殆尽。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学术界称之为古文经。但是十三经中关于《孝经》古文经，却有其他来历。北宋学者曾这样记载：“又有自项羽妾墓中所得《古文孝经》。”这句话明确说明《古文孝经》来自项羽妾之墓。而在此之前，隋代的傅奕记在《老子解序》一书中记载项羽妾之墓在北齐时期被人盗掘，墓中出土了文献，但是文献中却未提到《古文孝经》。综合两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北齐时项羽妾的墓葬被盗，而这座墓中出土了《古文孝经》。这无疑为《孝经》的古文经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更传奇的是，人们由此推测出土《古文孝经》墓葬的墓主人就是那位演绎了荡气回肠的霸王别姬的项羽爱妾虞姬。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

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失而复得《兰亭序》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没而复得，得而再没，在中国盗墓史上同样极富传奇色彩。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乘龙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345～347年），曾置宅于临川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今临川市文昌学校内），宅内挖有生活用井和练习书法用的洗墨池，对此南朝刘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临川内史荀伯子的《临川记》和宋朝文学大家曾巩的《墨池记》均有记述。《墨池记》全文285字，介绍了墨池来历，颂扬了王羲之苦练书法的精神。“文革”期间，墨池遭毁。2002年6月，抚州市政府引进外资500万元，重建洗墨池，恢复旧貌，供游人观赏。

王羲之擅长书法，少从卫夫人（铄）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行书《兰亭集序》、草书《初月贴》、

正书《黄庭经》《乐毅论》最著名。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为行书法帖，精品中的精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

该文共28行，324字。据说他当时写《兰亭序》时，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写出的字遒劲有力，婀娜多姿。文章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序》，把它作为珍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智永和尚，智永临死时又郑重地传给心爱的弟子辨才。

却说唐太宗晚年酷爱书法，尤其喜欢王羲之的字。唯一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得到《兰亭序》，心中怏怏不乐，连做梦都想到它。

中国古代的领导者往往非常重视智慧和谋略。他们知道，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仅仅有权力或力量是不够的，还要有计谋。必要的时候，还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

为了找到《兰亭序》真迹，唐太宗派人四处寻访。最后，终于打听到《兰亭序》真迹收藏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和尚辨才手里。于是他下令把辨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做僧官，以优厚的待遇供养他。唐太宗便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接近交谈，有一次借着闲谈的机会聊到《兰亭序》，并态度和蔼地多方诱劝辨才承认收藏了《兰亭序》，但辨才并不为之心动，只承认以前在先师智永处见过真迹，自师父死后，又几经丧乱，就不知《兰亭序》的去向了。唐太宗只得把辨才放回原寺。唐太宗仍不死心。有一次他和大臣房玄龄密商说，《兰亭序》真迹肯定在辨才和尚手里，你不妨找个聪明有计谋的人，代我到辨才那里设法取来。

房玄龄当即就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去办这件事。萧翼是梁元帝萧绎的曾孙，为人狡黠多诈。当唐太宗要他去取《兰亭序》时，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要公开派他去，二是请皇上借给他三四件王羲之的真迹字帖，以便见机行事。这两个要求唐太宗都欣然答应了。萧翼拿了三四件王羲之的真迹之后，便乔装打扮成一个穷困潦倒的山东书生，搭乘商船来到浙江绍兴。日落时分，他来到了永欣寺，故意在庙廊里观看壁画。辨才看见萧翼一派落魄书生的模样，顿生怜悯之心，便主动打招呼。萧翼说他是北方人，这次是带了蚕种到南方来卖，凡有寺庙的地方，都顺便来观看一下。辨才邀他入房交谈。谈话间，辨才很赏识萧翼温文尔雅的风度和丰富的知识，对他很敬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萧翼被辨才留宿在寺庙里。以后数天中，萧翼经常带酒到寺中和辨才一块儿饮酒作诗，终日欢乐异常，二人感情极为融

洽。

一日，萧翼与辨才谈及书法，称有几件祖传王羲之法帖，但不知真假，想请辨才鉴定真伪。辨才不知是诈，看后便告诉他这些祖传之物确系王氏真品，但非珍品，随口说出他藏有《兰亭序》的事情。萧翼表示不相信，称《兰亭序》真迹早已失落。辨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便和盘道出他得到《兰亭序》的经过，还把藏在房梁上的《兰亭序》取出给萧翼品鉴。萧翼故意称真迹是赝品，迷惑辨才。

这么一来二往，萧翼把《兰亭序》秘藏于房梁上的地点摸准了，一日趁辨才不在寺内，萧翼便窃《兰亭序》逃回京城，把真迹献于李世民。据说辨才发现《兰亭序》被盗，气得大病了一场，不久圆寂归西。此即盛传的“唐太宗计赚《兰亭》”。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如获至宝，把它放在座位的旁边，朝夕观赏，并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

但是，另有一版本与此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兰亭序》之新说。

《兰亭序》真迹第一次消失，在公元4世纪，被郗昙带入墓中。

郗昙出自书法世家，是晋代和王羲之一样有名的书法家。其父郗鉴亦工书法，其兄郗愔的书法造诣更深，善章草，代表作有《至庆帖》。后世有评论，称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不如郗愔的好。《兰亭序》怎么能到郗昙的手里？看看郗、王两家的关系就明白了。

原来，郗鉴是王羲之的老岳父，也就是说，郗昙是王羲之的小舅子，王羲之是郗昙的姐夫。因为这层关系，《兰亭序》落到郗昙的手里应该不意外吧。据说，除了《兰亭序》，像王羲之的正书《乐毅论》也为郗昙收藏。郗昙死后，将《兰亭序》等一批墨宝带入了自己的墓中。

南朝时有个叫做于丹徒的军人盗掘了郗昙墓，得到了王羲之等书法家的手书。后来于丹徒盗墓东窗事发，王羲之的珍贵墨迹也被没入官府。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唐朝。李世民生前收集了很多前代书法名家的真迹，死后便将这些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入陵寝。五代时堪称中国古代盗墓第一人的军阀温韬盗掘了唐太宗的昭陵，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的墨宝才再次流传人间。

盗墓贼为了利益盗掘墓葬，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使许多湮没的典籍重现人间。虽然这不能称为盗墓贼的功劳，但今人却该庆幸，正是

这种偶然的机遇，才使我们今天还能领略那些历史典籍、名家真迹的神韵。

书法大家盗《笔势》

爱好书法，本身又是书法家，为了得到自己的心爱之物，竟然利用盗窃手段达到目的的人，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这其中就有一个叫钟繇的大名士，此人便是钟会的父亲。钟繇这位名人，怎么会与盗墓贼联系了起来，可能不少人都会有怀疑，但事实就是这样。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魏文帝时与当时的名士华歆、王朗并为三公。有二子：钟毓、钟会。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候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

法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旭、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法家，早年竟然为了学习书法而“掘墓盗书”，做过盗墓贼。只是他盗墓的原因也颇合他名士的身份——他不是贪图古墓中贵重的随葬品，而是为了一本书法著作——东汉末年书法家蔡邕的《笔势》。

蔡邕（133—192），字伯喈（jiē），陈留圉（yǔ）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蔡邕是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名声很大，是名闻天下的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在文学、书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关于他的很多故事，如听琴、三绝碑、哭董卓等，家喻户晓。蔡邕一生精于书法，是“飞白体”的创始人，《笔势》是蔡邕所著的关于书法理论的一本著作。175年，他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了石碑46块，立在太学讲堂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五经”，成为两汉时期书法的典范。对于蔡邕的成就，钟繇十分仰慕。蔡邕被杀后，凝结他毕生书法心得的《笔势》辗转落到曹魏时期一个叫做韦诞的人手里。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制墨家，擅长草书、飞白体，并自创了“剪刀篆”。

钟繇和韦诞同殿为臣。一次，他到朋友韦诞家做客，发现其家藏有蔡邕的遗墨，欣喜若狂，不惜千金要买，但韦诞视其为心之最爱，决不相让。由于求之不得，钟繇便对此事耿耿于怀。后来，他得知韦诞死后将遗墨带进了坟墓，不禁起了歹心。他重金收买盗墓贼于黑夜偷偷挖掘了韦诞墓，将蔡邕遗墨盗出，自此据为己有。

之后，他发奋研读、练习，终于学习到蔡邕书法的精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然而，他夜盗同僚之墓的偷鸡摸狗的勾当却成为他一生洗脱不掉的污点，为后人所诟病。

然而，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钟繇置自己朝中大臣、名士的颜面于不顾，为了一本书法著作而让人盗挖同僚的墓冢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钟繇盗墓得蔡邕遗书的故事，见于一本叫做《志林》的书，这本书成书于西晋时期，作者是当时的名士虞喜。就成书时间来看，《志

林》成书时间比这个故事并没有晚多少年，可《志林》遗书不过是笔记而已，虞喜也不是专攻历史的学者，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唐人张彦远在一本书名为《法书要录》的书中写道，钟繇的书法得传于蔡文姬，而蔡文姬自然是学自其父蔡邕，这种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

从时间上看，韦诞卒于253年，钟繇卒于230年，韦诞死时，钟繇早已作古，当然不会出现钟繇盗韦诞墓的怪异之事，《志林》中记载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

钟繇书法效法蔡邕，因此后人牵强附会编造了这个钟繇盗墓的故事。后世人通过考证文献记载，给钟繇翻了案。但这个故事却说明，在三国那个乱世，盗墓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即便是那些衣冠楚楚的文人士大夫，也有可能是墓地中的夜行人。

第二十一章　中国盗墓史上的挖祖坟真相

寻地误挖自家坟

挖祖坟这种陋习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屡屡上演，主要是因为人们迷信风水的结果。人们大都相信，一个家族之所以会兴旺发达，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葬到了一块风水宝地。相应地，对于帝王家族而言，也相信如果他们的祖坟葬在了龙脉上的话，那么在龙脉的保佑下自己的家族的皇位就会千秋万代。如果龙脉断了，或者祖坟被挖了，那么就意味着自己的家族和国家的衰落。所以，在古代，不论是王侯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相信陵墓风水的存在。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所以历史上才会屡次出现挖祖坟的事件，其目的就是使被挖祖坟的家族从此一败涂地。当然，对于挖帝王的祖坟，其政治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从政治和心理上来打击自己所要反对的帝王。不可否认，挖祖坟的行为和帝王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却又似乎有着某种合理性。

郭璞《葬书》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与坟墓，一直是连结在一块的。

过去，人死后要请风水先生（堪舆家）择卜墓址，如果葬到了风水宝地，可保子孙兴旺发达、官运享通，永世荣耀。如果葬到真龙天子穴，那就不得了了，要出皇帝了。虽然风水一说涉嫌迷信，但古人就是相信。

所以，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犯了风水大忌。

古人对祖坟的看护相当认真，新坟也要三年守孝。在今天看来，这是古人讲孝，是对长辈的尊重。但古人却认为，这事关家运和风

水，不可粗心大意，坟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白下琐言》（卷五）称，“芮氏兄弟皆诸生。庚寅，其祖墓上石楠树，百余年物也，为守墓者盗伐，项气大伤。其年，父子三人皆病卒。”仅仅是祖坟上长的一棵百年老树，被守墓人盗伐，便惹下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此事太蹊跷了，并不可信。

也有人因为过于贪图“风水宝地”，而坏了祖坟风水的。

《子不语》（卷三）“介溪坟”条，严介溪为其妻欧阳氏卜葬，召门下风水客数十人，嘱曰：“吾富贵已极，尚何他望？只望诸君择地，生子孙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来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孙贵寿，与公相埒。”介溪命群客视之。一客独曰：“若葬此，子孙虽贵，但气脉太迟，恐在六七世后耳。”俱以为然。介溪买成。开穴，中有古坟墓志，摩视之，即严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骇，急加封识。然自此严氏大衰，且籍没矣。此事严后裔名秉琏者所言。

严介溪老婆死后，本想给她找一块风水宝地，以保将来子孙能像他一样大富大贵。便找来门下几十个风水先生，为他卜择宝地。有一个风水先生不到一个月就给他找了一块宝地，严介溪让大家去看看，一起参谋一下，大家都说这块地好，缺点是要过六七代后才能大发。严介溪相信此说，便买下了这块地。但在掘挖墓穴时发现了一块墓志，仍知是严家七世祖坟。严介溪大为吃惊，赶紧让人把土埋上。但为时已晚，地气外泄，严家从此败落了。

这种因为寻找风水宝地，把自家的祖坟挖开的，实属巧合，偶然中把风水也弄坏了。

一统天下占周墓

秦国原是处于西陲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家，为何它能一跃而起就一统天下了呢？据说是沾了龙脉风水的光。这一说法可能不会被大家所接受，但还有更为离奇的说法：秦王占据了周天子的墓穴，所以才使得秦国从此鸿运当头，最终得以一统天下。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提出来，那也是有“理论依据”的：考古学家在考察咸阳塬上的“周陵”时，竟然发现西周王陵和战国秦君墓同穴。

“周陵”位于咸阳城北6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周陵中学内。除了外

园墙，南陵和北陵共享的陵园园墙以及两陵各自的墓道，还发现了6处建筑遗址、27座外葬坑、161座陪葬墓。现在的陵墓共有南、北两座，南陵外形为截锥体（即“覆斗状”），平面基本为方形。北陵距南陵145.8米，北陵外形基本为截锥体，方锥体略圆，平面基本为方形略圆。两座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在封土四面的中部各有墓道一条，平面均为梯形。

一直以来，人们大都相信“周陵”为西周文王、武王墓的合称，南为周文王之陵，北为周武王之陵。周文王陵底部周长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毕沅所立的碑石。陵北100米处为周武王陵，底部周长285米，高12.3米。两个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献殿、木牌楼经过修葺和彩绘。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曾于2004年发现了周公庙遗址群，而且还伴随着发掘出土了一些甲骨文字，价值非凡，也让考古界更为坚信此处就是西周王陵。

但是，后来随着新考古成果的不断发现，先前所作的推断似乎又动摇了起来。因为考古队在陵园内的地表发现了散落的大量残砖块、瓦片，并在残瓦片的外表上还发现有粗绳纹、细绳纹、篮纹以及素面等。根据有关资料推断，素面圆瓦曾存在于战国早期，到了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很少了。结合以往的文献记载以及此次考古的调查勘探成果，有些考古专家认为所谓的“周陵”其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某代秦王陵，而非传说中的周王陵。

这些考古专家提出的理由如下：

第一，历史上的考古文献记载倾向于此处是秦王墓。《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云：“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

第二，根据陵园的布局分析，这座墓符合秦墓规制。因为墓为东西方向，东西方向的“亚”字字形符合战国晚期秦王墓的特点。此外，根据陪葬坑内所陈列器物的次序比较混乱等情况来判断，墓葬应该不是西汉时期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过程当中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根据其纹路等特征被专家鉴定为战国晚秦时期的器物。

鉴于以上理由，这些考古专家认为，所谓的“周陵”其实应该为“秦悼武王或者秦惠文王”的墓。既然“周陵”并非周王陵墓，那么周陵到底在哪里呢？

一般来说，周朝之后的陵一般有封土，历史文献对此记载也很多。但是，周王陵则是不树不封的，而文献对此也少有记载，因此寻找的难度很大。所以，综合分析这几种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是，最初的墓穴原址是周王的陵墓，因为他们不树不封，所以战国时期的秦王又在其上修建了自己的陵墓，由此便造成了同穴的特有历史现象。

随着问题的日趋明朗，占墓穴讨鸿运的说法在一些风水术士嘴里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战国后期的发展趋势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偏安一隅的秦国在不占据天时、地利的情况下，竟然一举消灭了其他列国而一统天下。如果真是因为陵墓风水的话，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劳，恐怕与他的老祖宗选择陵地是分不开的。

秦皇改名断王气

俗话说，大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就有了这样的担心，他总是担心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被别人给抢了去。当始皇帝听到统治天下者，皆因祖陵葬在龙脉上的说法时，他动了心。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绵延千秋万代，使自己家族的子孙永远能够当皇帝，秦始皇想尽了各种招数在全国各地来挖掘龙脉，以避免有人再度称王称帝。但是却事与愿违，造成了天怒人怨，天下大乱。很快，人们揭竿而起，奋起反秦，秦朝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王朝。

那么，秦始皇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挖断龙脉，让人们奋起反抗呢？

春秋战国时代，丹阳是楚国的属地。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楚国江南地带，并设置会稽郡，管辖今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丹阳也被改为了云阳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云阳县邑，不知让秦始皇费了多少心思，甚至不惜代价地来破坏此地的“王气”。

秦始皇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原因。当初，他在东巡路过丹阳境界时，随从史官便占卜称云阳有“王气”。因而，秦始皇害怕丹阳会出皇帝，来与他争夺江山，所以就立即下旨来破掉丹阳的“风水”。为了破坏掉丹阳的“王气”，秦始皇下旨将带有“王气”的“云阳”县名改为“曲阿”。第二个举措，就是将“会稽驰道”经过丹阳的地段改得弯弯曲曲——“截直道使曲”，故意把直道修成弯道，其目的也是为了破丹阳的“王气”。

秦始皇为了断云阳的“王气”，各种措施都实施得很到位，但并没有阻止“王气”的升腾。方士的预言最终还是不幸应验了。在秦始皇死后432年（222年）时，丹阳出了第一位皇帝——三国吴大帝孙权。孙权（182—252），字仲谋，原籍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后祖辈移居曲阿（今江苏丹阳司徒镇）。祖父孙钟在丹阳司徒以种瓜为生，死后被葬于司徒白鹤山，其父孙坚死后被葬于丹阳司徒吴陵港，墓叫“高陵”。

到了南朝，丹阳又出了两代开国皇帝。其中的一位是萧道成，字绍伯，小名斗将，是南朝齐高帝，丹阳访仙镇萧家巷人，享年55岁，死后被葬于丹阳胡桥狮子湾“泰和陵”。另一位便是萧衍，字叔达，史称梁武帝，也是丹阳访仙镇萧家巷人，549年在一场大祸中身亡，享年85岁，被葬于丹阳荆林三村巷“修陵”。

其实，无论秦始皇是否断云阳的“王气”，都会有后来的王侯将相出来代替秦朝。因为残暴的统治让百姓无法生存，严酷的制度使百姓苦不堪言，新的统治力量代替旧的统治力量，这是社会的发展规律。

一把大火断龙脉

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富力强后，自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至现咸阳市东北20里的古都咸阳。在风水学家看来，咸阳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它以九嵕山为祖脉，以渭河平原为明堂，以渭水为朱雀，关住了九嵕山的来气而聚成正穴。这样，咸阳介于九嵕山以南，渭河以北，山水相互映照。

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以后，在都城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太多，而先王的皇宫又小，下令在故周都城丰、镐之间渭河以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之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宫殿。

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了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秦始皇还把渭水引入都内，象征天河，以皇宫标示

北极星，告知世人咸阳是帝都，宫殿是天子的住所不可动摇，把整个都城建成一个宇宙图式。不仅如此，秦始皇死后把自己的皇陵选择建在渭河平原东北的临潼，南依骊山、北跨渭河，形成气度不凡的皇家气派。

工程未完成秦始皇死了，秦二世胡亥调修建阿房宫工匠去修建秦始皇陵，后继续修建阿房宫，但秦王朝很快就垮台了。

但是，有人却说，秦始皇依靠龙脉，附之以阿房宫等宫殿的宏伟设计却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这是真的吗？

项羽在秦末时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在前207年的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中统率楚军大破秦军，之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更是以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阿房宫后，无限感慨地歌咏：“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为了寻找项羽火烧秦宫的证据，2002年考古学家来到今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东起巨家庄，西至古城村的阿房宫遗址上，开始了探索。虽然采用多种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是，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没有发现阿房宫被火烧的痕迹。既然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大火留下的痕迹会不会被风霜雨雪侵袭掉呢？为了搞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阿房宫考古队来到了汉代长乐宫的遗址。东汉末年，长乐宫也和汉代其他宫殿一样，逃不过被焚毁的命运，两千多年过去了，这里被火烧过的痕迹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么，是不是流传了两千年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入关以后，移恨于物，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化为灰烬的说法不真实呢？

经过考古学家的精心勘测，他们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阿房宫遗址，并不是阿房宫的整个宫殿，而是前殿遗址，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台基上面西、北、东三面已有夯筑土墙，墙顶部有瓦的铺设；夯土台基上面没有建筑南墙。三面墙里面没有发现秦代文化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从路土分布的情况来看，人们是把夯筑台基用土从南面运到北面，再从北面开始往南逐渐夯筑台基。专家由此大胆地推测，阿房宫的所有工程只有前殿建成了台基，其他工程尚未动工，阿房宫没有建成，也没有像史书记载那样被项羽放火焚烧！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项羽是对咸阳采取了烧、杀、抢虏的政策，然而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火烧阿房宫。《史记·项羽本纪》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

灭。”在这里也只字未提火烧阿房宫。火烧的很可能是秦朝的其他宫殿。《史记》中的另一条记载也从侧面证明阿房宫并未建成：“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但是，这年七月陈涉、吴广就反了。前后就这么点时间，显然建不成阿房宫。

阿房宫前殿都没有建成，前殿夯土台基上面也就没有宫殿建筑，所以项羽放火烧一个没有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子，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传说认为项羽烧了阿房宫是错误的。

当初项羽并不想让秦始皇在地宫里安息，也为了不让后人知道他的盗墓行为，就在挖掘完宝物之后放了一把火，试图把陵墓整个烧掉。幸而，项羽所发现的秦始皇陵墓只是实际陵墓的一小部分，陵墓本身各个墓室之间又有很好的防火设施。因此，秦始皇陵墓地宫才能保存至今，并没有因项羽的火烧而遭到毁灭性破坏。虽然没有烧阿房宫，火烧秦始皇依据龙脉所建的咸阳城里的宫殿却是不争的事实。

隋炀帝挖土掘坟

在中国的盗墓史上，有很多皇帝为了阻止政敌抢夺自己的江山，就去掘对方的祖坟，比如前面提到的秦始皇为了断掉云阳的“王气”而改其地名，修其道路。在挖别人祖坟方面，隋炀帝杨广也曾干过。

隋炀帝杨广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登上皇帝宝座以后，隋炀帝本性显露，对民众实行残酷的暴政，激起了天下人的公愤。于是，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其中一支便是太原的李渊家族领导的。

在得知李渊家族反隋的消息以后，隋炀帝深知李渊家族实力雄厚，他不去反思自己的暴政，反而幻想用挖断李渊家族龙脉的方式来打击李氏集团，然而，他不仅没有找到，还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真是可悲可叹。

李渊起兵以后，他向长安民众“约法十二条”，除此之外，大隋各项苛刻的法令也都被废除了。当时，隋大臣阴世师、骨仪等按照凡是犯上作乱者都要发掘他的祖坟、污辱他的祖先的法令，命令京兆尹寻找李渊的五服祖墓所在地，将其全部挖掘开来，并将尸骨抛在野地里。李渊对此非常痛心，每一提及必定流泪。

据说阴世师颇懂阴阳风水，在派兵士去挖李渊在河东老家的祖坟那天下午，当兵士刚挖开李渊祖父李虎的坟墓，突然，从中跃出一条硕大的青蛇，蛇身有水桶粗，那蛇高昂起头，哧哧地呼啸着冲向兵士们。兵士们纷纷闪开，阴世师挥剑上前，不料蟒蛇吐出一团雾气，阴世师当时便昏倒在地。当时，在蟒蛇身边还有大小不一的三条青蛇和两只金蟾，四散逃避兵士们的赶杀。一只金蟾跑开了，其余的则全被隋军的刀剑杀死了。当李渊的军队攻克长安以后，投降的兵士供认了阴世师的恶行，李渊悲愤不已，立即命陇西公李建成把阴世师等人斩杀于朱雀道。

李渊的祖坟被隋炀帝挖掘了，可是隋炀帝并没有达到打击李渊家族的目的，更没有断掉李家的“王气”。随着岁末农民起义军的不断兴起，大隋王朝最终被李唐所取代。

火烧水灌太原城

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并逐渐进入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唐朝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宋人有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北宋王朝除了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之外，还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特别是当宋太宗听说，当时仍被北汉统治的晋阳出过好几个皇帝，是个“龙城”之后，更是亲自带兵攻下太原城，并火烧太原城，再水灌太原城……

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太原故国、北朝霸府、天王北都、中原北门、九边重镇、晋商故里……“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只要来过太原的人，都会深深地陶醉在它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中。

“叔虞百里，居之河汾。帝刻桐叶，天书掌文。礼以成德，乐以

歌熏。天子无戏，唐有其君。”这是南北朝时期流落北国的大诗人庾信写的诗《成王刻桐叶赞》。诗中描述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叔虞施政有方，国富民强。叔虞传位于其子燮父，燮夫见晋水之源奔流不息，哺育人民，遂改国号为“晋”，这便是晋国的由来。

因为在上古时代，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国，隋末起兵于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得天下以后，把新兴的国家命名为“大唐”，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直到今天旅居海外的华人，都以唐人后裔为荣，甚至把大片华人聚集地命名为“唐人街”。追本溯源，唐文化的发祥地就在山西太原。

太原，是我国北方的文明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交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十万年之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太原的土地上。义井和东太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告诉我们，在七八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早期，太原的先民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殷商时太原为古国北唐，考古学家曾在太原许坦村一带，发现了商代的文化遗址，定名“许坦型文化”。史传太原的肇始者台骀，因治理汾水、开拓了太原盆地，被尊为“汾水之神”。鲁昭公元年（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国荀吴率兵北征，打败占据今太原一带地区的无终及赤狄别族人，太原地区始入于晋国版图。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显赫于世的晋阳古城问世于汾河晋水之畔，迄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晋阳古城在战国初期，曾做过赵国的都城72年之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设置了太原郡，郡治晋阳。汉代并州刺吏部设治晋阳，这也是太原称并州之始，太原简称“并”亦来源于此。是时，太原已成为全国十三州部治所之一，闻名遐迩。南北朝时，晋阳又是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始终保持着“霸府”的地位，高欢、高洋父子坐镇太原、遥控朝政。隋代，太原是全国的第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唐朝初期的几位帝王曾数次扩建晋阳城，并相继封其为“北都”“北京”，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三京”，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发迹于晋阳，或以此为国都，一时间太原名声显赫于举国，传为“龙城”。

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来到太原城下指挥攻城。晋阳城高大坚固，使得宋军损失惨重，内外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殿前指挥使部虞侯石汉卿阵亡，大将李汉琼、荆嗣、呼延赞、韩起重伤，以下将士伤亡者更多不胜数。当时，主要是由于宋已统一中原，平定南方，倾全力攻晋阳一城，晋阳孤城难守，北汉主才不得已降宋。自此，北汉十州全部归入宋的版图。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分裂的小王朝被消灭

了。

由于憎恨太原军民对宋军的顽强抵抗及恐惧太原“龙城”的美誉，宋太宗遂下令火烧晋阳城，又引汾、晋之水夷晋阳城为废墟，一座历经1476年悠久历史的古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太原旧城被毁后，宋太宗又命将太原治所从榆次迁到唐明镇（今山西太原）。逃出城的百姓逐渐聚集到这里定居下来。三年之后，新的太原城在距古晋阳城北四十余里的唐明镇重新崛起。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赵光义派三交都部署潘美在唐明镇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修筑城墙，兴建太原城。宋初修建的太原城是一座土城，城池周长5.28公里。筑四门：东曰朝曦；南曰开远；西曰金肃；北曰怀德。城西南至现迎泽大街北边，西至现新建路东边，后小河、东后小河是当时北面东边的城壕。据说赵宋在新修太原城街道时，都筑成丁字街，取其谐音，“钉”破“龙脉”，使太原不再出现“真龙天子”，危及赵宋天下。并忌讳使用“晋阳”、“太原”名称，而设为紧州军事，派潘美、杨业把守。

金代诗人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事》在讲到此事时说：“南人鬼巫好机祥，万夫畚锸开连冈。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旧的晋阳城平毁了，但太原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变。当时辽据大同，建辽契丹又为游牧民族，其骑兵可以随时南下太原，太原街道修成“丁”字形对阻遏辽骑兵的驰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风水宝地难享受

大宋王朝的皇帝中，对风水亦迷信的人不止一个。宋神宗赵顼（xū）就是一位很讲迷信的皇帝。

宋神宗，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年）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1067～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20年。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皇帝如果没

有“龙种”，那更是犯了江山社稷的大忌。赵顼先后生了不少儿子，但接连夭折。有人告诉他，可能是京城开封周边的坟墓太多，阴气太盛，影响了皇家风水，压住了赵姓宗室。于是打算强迫民间把这里的坟墓给迁走。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听说后上书，谏阻些事，才避免了大规模“挖祖坟”事件发生。《宋史·王安礼传》记载如下：

> 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宋朝人对风水的迷信，不逊唐朝。《挥麈（zhǔ）后录》记述了宋朝人范择善葬父的故事。

范父去江西上饶，病死于途中的寺庙里。寺里的老和尚听说后告诉范择善，“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免搬挈之劳。”老和尚懂风水，说这穴风水好，主后人富贵。至此以后，范择善骤然显贵起来，官做到京城，在朝中任要职。于是范择善就想将父亲骨骸迁回家乡安葬。这时寺中主僧还健在，一再力劝范择善不要放弃那块吉地也。范择善不听寺中主僧善言，最后还是迁葬其父亲遗骸。谁知才迁葬不久，范择善因说话不心得罪了权相秦桧，不等他回京销假，秦桧已指使言官上奏，攻击范择善以迁葬为名谒告于外，骚扰州县。朝廷听信谗言，将范择善迁谪至死。实际上，范择善官运不济，不碍迁葬，直接原因是得罪了当朝权贵秦桧。

过去人相信命，祸福在天，命里有的会到来，没有的得到了反而不吉。风水宝地也是一样，不该得的，祖坟葬了风水宝地主凶。

李朱之争清得利

李自成与崇祯在挖龙脉上两败俱伤，这也成就了清军将领多尔衮。在他的功业基础上，顺治皇帝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开创了大清王朝的历史篇章。

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

他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闯将，勇猛有识略。崇祯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

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崇祯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luò）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

崇祯十三年（1640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由于起义军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反吴三桂，导致满清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农民军在吴三桂和满清军队的联合夹击下败亡，李自成也死于非命。有人说李自成和崇祯皇帝的两败俱伤是因为互断了对方的龙脉，才使满清的多尔衮捡了一个大便宜，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明皇族朱氏的龙脉之说，据《朱祖璋系年要目》介绍，朱元璋祖居江苏省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元太祖元年（1206年），为了逃避官府的苦役，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就携带全家老小，逃到泗州、盱眙一带，居住在古泗州城北13里的孙家岗。《泗虹合志》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杨家墩家有个洼窝，朱初一经常卧于其处。有一次，一个道士路过此处，见了这个地势说，“葬于此处，后代可出天子。”道士的徒弟追问原因，道士说：“你若是不信，就拿个枯树枝栽在这儿，十天之内就能起死复生。”朱初一偷偷试验了一下，果真如此。于是，朱初一把道士的话告诉了儿子朱世珍（朱元璋的父亲）。十年后，泰定四年（1327年）朱初一病死，如道士所言，葬于此。半年后，朱世珍妻陈氏即怀了朱元璋。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登上皇位后，便追尊他的高祖为玄皇帝、曾祖为恒皇帝、祖父为裕皇帝、父亲为淳皇帝。朱元璋强烈的光宗耀祖思想，促使他不惜代价筑祖陵，似乎非此不能达到巩固大明王朝的目的。于是在1386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带领文武群臣和工匠到泗州城北杨家墩开始修建祖陵。以后陆续增修，经过28年，耗费大量资金，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把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墓全部修建成功。至此杨家墩改称明祖陵。

李自成攻破此处后，为了破坏明朝的龙脉，将明祖陵破坏得一塌糊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打击李自成起义军，崇祯皇帝竟然也派

人挖了李自成的祖坟。

李自成从小苦大仇深，和一些穷苦百姓参加了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和有智慧，得到高迎祥的赏识，最后接替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首领，所到之处，百姓云集响应，一时间朱家天下摇摇欲坠，李氏“帝王之相”隐隐可见。此时，崇祯帝不知听了何人建议，希冀用伐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断其“龙脉”，泄其“王气”，以使“贼势当自破矣”，从而挽大厦于将倒。看来，明朝廷以为只要掘了李自成的祖坟，破了李氏“风脉”，李自成兵败就无疑的了。

因事情重大，所以内监在米脂县传旨时倒也费了一番心机：为了不走露风声，内监特地扮成一个生意人，来到县衙之后跪在地上声称，自己在卖蒜时，忽有士兵将蒜抢走，所以前来请县老爷做主。随即，就见内监双膝挪动爬至知县边大绶身前，以手按着边大绶的脚悄声说道：“有诏旨。”边大绶大吃一惊，随即将内监唤至二堂。来到二堂，内监又让边大绶屏退左右，然后道明身份，取下帽子，从帽子裂缝内取出诏旨。边大绶明白了要做什么，该怎么做了。

两人重又来至大堂。边大绶故作恼怒，喝道：“卖蒜被抢，实乃小事，尔竟如此作态，难道想恫吓本官吗？”随即命衙役将内监逐出公堂。

为了准确地找到李家祖坟，边大绶首先找到了曾参与埋葬李自成家人的李的同乡李诚。开始，李诚不肯告知，后来经过拷讯，李诚给边大绶提供：“记得李闯王的祖父下葬掘土时，地下面有三个空穴，其中的一个空穴尚发现有一只黑碗。当时用土填了两个空穴，在其中一穴安葬，并用黑油点灯放在墓内棺前。因此，只要找到那个置有黑碗的坟墓，便是李闯王的祖坟。”

得到李诚提供的线索后，边大绶立刻下令寻找，但是，一连掘了数座坟，都没有找到李诚所说的黑碗。当时，天色已晚，难以下山，他们就坐在李自成家的旧窑中烤火。翌日凌晨，他们又挖了数家坟冢。到了正午时分，果然在一墓中发现黑碗，照李诚所说，它必然是李自成祖父的坟墓了。挖出来的骷髅如黑墨，额骨上长出了六七寸长的白毛，其状极恐怖。在李自成祖父坟墓的左侧下方还有一座坟墓，据李诚指认它是李自成父亲李守忠之墓。墓的正顶长有一棵榆树，粗如臂膀，枝叶诡异。边大绶命人砍下榆树，不料树倒墓开。墓中竟盘着一条白蛇，“长尺有二寸，头角崭然”。役卒上前捕捉，将蛇置于练总郝光正行装袋内。役卒把棺木打开后，只见所有的骨节都变成青铜的绿色，额骨上也有六七寸长的白毛。其余七八座墓中骷髅上也都有白毛。边大绶为了断李自成的“龙脉”，还派人在旧址上边的大小垴

（nǎo，小山头）之间挖下宽20米、深5米的大壕，他命人将骨骸“聚火烧化”，并把周围“大小树木一千三百余棵悉数斫伐”。

边大绶把挖李自成祖坟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了向陕西督军汪乔年呈报的塘报中，汪乔年得知后，嘉奖边大绶：“据来报，知闯王墓已开，可以制贼死命。他日功成，定当首叙以酬。”

当李自成得知祖墓被汪乔年挖掘的消息后，切齿痛恨，发誓道：“必杀汪乔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大军进逼襄城，汪乔年赶往襄城防守。当李军兵临城下时，官军三路军马主帅一一逃走，士兵溃不成军。汪乔年所率守城兵卒不足1000人。二月二十七城陷，双方在城内展开巷战，汪乔年亲上战场，“手刃三人”。汪乔年自刎时被俘，便破口大骂，被割去舌头，终被处以磔刑（肢解躯体）。

边大绶在掘墓之后，解职归里。

南京定都短命亡

南京，战国时楚威王始置金陵邑，以为“王之地也”。南京简称“宁”，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之称。211年，吴大帝孙权在石头山金陵邑旧地筑石头城。229年在此建都，名“建业”，都城周长约11公里，开始了南京的都城史。晋灭吴后，于太康三年（282年）改建业为“建邺”。建兴元年（313年），为避司马邺之讳，改为“建康”。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以建康为都建立东晋（317～420年），南京从此成为正统中华文化的中心。东晋以后，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相继在此建都，史称南朝。南朝是东晋之后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的总称。它们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其中最长的不过59年，最短的仅有23年，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个时期。南朝与此前的吴、晋合称“六朝”。南京城西北濒临长江，东有“龙盘”紫金山，西有“虎踞”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环抱，形势极为险要。

关于南京的风水，当年蜀国军师诸葛亮顺江而下时，看到金陵古城，不禁失声惊叫：“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东晋大臣王导也曾说：“建康，古之金陵。”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座王气旺盛的古城，定都于此的六个王朝却都短命——东吴58年，东晋

103年，南朝宋5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后来，明初定都于此，二世而终，仅仅50余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维持了11年。有人认为，楚王埋金以镇王气，风水没了；有人认为，是秦始皇斩断地脉，断了龙气。到底有没有这种事？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城还没有成为城的时候，就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先是吴王的属地，后来被越王占领。接着，楚王又赶走越王，驻军江边的狮子山。有一次，楚王巡视自己的疆土，登上狮子山，环望四周，看到此处风景雄丽，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可是，楚王的脸色突然由晴转阴。大臣们忙问原因，楚王烦躁地说：“这地方风景虽好，但王气太盛！”大臣们表示要想法子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这里再出帝王，于是征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一巫师来应征，设计了一个方案，即在狮子山上埋一批黄金，用黄金镇压此地的王气，可保不再出帝王，此乃黄金“镇王气”。楚王同意后，大臣们马上操办在狮子山顶挖坑砌砖，埋下一批黄金。

按皇家习惯，一般地上的建筑物称为宫，地下的建筑物称为陵，埋金子的地方自然就叫“金陵”了。这个地方最早的名字就是叫“金陵邑”，“邑”是比“州”级别低、比“县”级别高的军事重镇的建制。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金陵”这个名字。

还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斩断地脉，断了龙气。

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金陵。秦始皇深深被这里虎踞龙盘的气势所吸引。但是，陪同左右的方士常生、仙导却沉默寡言。秦始皇问：“金陵形胜，气象万千，两位何故沉默寡言？”两位方士忧心忡忡地对秦始皇说：“金陵地形险要，气势磅礴，乃龙脉地势，王气极旺，若不采取对策，五百年后会有天子坐镇！”

秦始皇大惊失色，他自认为自己是始皇帝，自己的子子孙孙永为天下一统的皇帝，金陵如果有别的天子出现，那不是要断掉自家的皇族血脉吗？于是赶紧询问对策。两位方士指着不远处的方山说：“方山地处金陵东南，你看，方山顶部平坦如官印，人称天印山。天印，自然是上天赏赐的官印，决定了金陵之地的王气兴衰和吉祥命运。断了方山龙脉，就是阻隔了金陵的王气。再引淮水贯穿金陵，通达长江，让这条秦淮河冲尽王气，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皇帝之位也就可以千年万世、万万世了！”

秦始皇见金陵城北的狮子山、马鞍山气势宏伟，于是让李斯命人凿断石头城山岗以泄王气，以致龙脉断裂，并将金陵改称为“秣陵”。“秣陵”意为饲马的草料场。自此凡定都南京的王朝，皆以短命收场，明代也于第三朝迁都北京。近几年，南京的经济明显落后于周边

区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这两种说法只是传说。南京之所以没有出现定都于此的强大王朝，还有更为深刻的地理、经济、人文的原因。从地理上来说，南京依山傍水，虎踞龙盘，易守难攻。在此处建都的天子们，一开始就着眼于“守成求稳”，缺乏攻略开拓，问鼎中原的进取雄心。南京处于东南一隅，一道长江“天堑”把它与辽阔的北中国隔断，最易于偏安苟且。

从经济上来说，江南向来为鱼米之乡，富庶的经济条件反给统治者提供了加速腐败的温床，使“后主”们沉醉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上苑”。除了地理、经济等外部因素外，还有其内部因素。这几个把国都建到南京的王朝，他们大都乐于享受安逸的生活，没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决心和志向。诸多原因，使得六朝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掘祖坟以绝后患

可能受朱元璋的影响，明朝朱氏皇帝多迷信，特别是倒数第二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竟然想去挖女真人的“祖坟”救国。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帝王陵寝全部捣毁了，以泄女真人“王气”，断其龙脉。

女真族勃兴于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唐朝时称黑水靺鞨，女真族生活在黑龙江一带，以渔猎为生。辽朝统治者长期向女真人索要珍珠和狩猎用的“海东青”（一种猛禽），鱼肉女真百姓，终于导致女真族叛乱。1115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国建国后，展开以辽五京（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西南，西京——今山西大同）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五京失守，辽朝随即灭亡。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1075—1135）即位后，挟灭辽之威，很快席卷而南，于天会四年（1126年）灭亡北宋。女真在消灭辽朝和北宋后，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长期对峙。金朝在实行猛安谋克等独特制度的同时，也采纳了内地的很多政治制度。完颜亮（1122—1161）在位期间，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以失败告终。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金朝后期，统治集团极其腐朽，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同时又

受到蒙古帝国军队的不断打击，最终亡国。

金国共传十帝，历120年。就是这个只统治了半个中国的“百年王朝”，其所营建的帝王陵在中国皇家陵寝文化中，却占有颇为辉煌的一页，特别是陵寝的风水格局，堪称经典。据说，朱元璋在营建南京孝陵前，曾派了智谋和尚和后来策划燕王朱棣篡位的姚广孝等人前去考察。因为明之前的元朝是“秘葬制”，没有帝王陵规制可作参照，金帝王陵就成了很好的范本。

金陵遗址位于房山区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云峰山下，距市区48公里。云峰山又称九龙山，因其有九条山脊如九龙奔腾而得名。共葬金代“始祖”至章宗等17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比明十三陵早200多年。对于金陵，史书记载不多。金海陵王完颜亮从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开始至十月，在云峰寺旧址建三个墓穴，安葬了他以前的3个皇帝。

金朝的帝王陵本来已卜选在黑龙江，是完颜亮千里迢迢迁移过来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帝王陵“搬家运动”。据说，当年海陵王到九龙山一带狩猎，到山下的大红谷时发现了一头鹿，就跟着追，但追着追着鹿却不见了，闪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发金光的寺庙。海陵王觉得奇怪便进了寺院，但更奇怪的一幕又出现了，恍恍惚惚间，海陵王看到金太祖、金太宗等几位逝去的先祖竟然坐在香案上。后来得知，此寺叫龙城寺，正好位于九龙山的中峰——“龙头”上。

海陵王诧异之余觉得这是祖宗显灵，是大金国都城迁出阿城、定都燕京、盘定中原的吉祥征兆。就这样，远在黑龙江的祖陵，随都城一并迁到了燕京，中心陵址就择在显灵之处的九龙山龙城寺。

至章宗末年（1208年），金陵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均已建成。金陵区分帝陵、妃陵及诸王兆域三部分。大定年间陵界为78公里，大安年间为64公里。陵域设有围墙，每隔一定距离建有土堡。金以后，陵墓无人守护，地上部分逐渐残毁。

但从《大金国志校证》、《金虏图经·山陵》等史书记载来看，金帝王陵的择址不是这么简单，“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意，遂命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周。”从中可以看出，是海陵王在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命令堪舆师找了一年后，才找到龙城寺所在的这块风水宝地的。所谓海陵王看到金太祖坐在香案上，应该是后世的附会之说。

从堪舆术来说，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前面至少要有两座“山”，即“朝山”、“案山”，左右还应出现“护砂”。所谓“朝山”，就是朝臣站

立的地方，“案山”则是皇帝放办公桌“案几”的场所；从位置上来说，“案”近而“朝”远。九龙山的九条山梁由高到低，依次顺势展开，中峰正前方是高耸的山壁，近处则是一处中间低平、两边凸起的山岗；东侧有连绵不断的山头，西侧则分布着多个小山包。当时主峰下，泉水环流，终年不息；层林重叠，紫气缭绕。

过去的风水先生一直认为，金帝王陵所在的九龙山是风水宝地中的经典，300年后也能保女真好运，兴旺发达。远方高耸的山壁是“朝山”，近处低平的山丘则是“案山”，左右连绵山岗无疑就是天然“护砂”了，即“左青龙”、“右白虎”。所以说，九龙山的山形地貌正好与这些风水要义非常符合。

由于龙城寺所在位置正是“龙头”，海陵王便把寺给拆毁了，将开国之君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金太宗完颜晟的和陵（后改称恭陵）营建在此处。破土后，海陵王亲自督工，命工人昼夜赶凿山体，有不少人挨了海陵王的鞭子。

三个月后睿、和两陵率先建成。此后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等多座有号没号的帝王陵陆续建起来了，形成了一片帝王陵区。有意思的是，海陵王自己在死后却被赶出了这块风水宝地，未能享受到他亲手督建的“家园”景致。

海陵王完颜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以狂暴好战出名的荒淫好色之君。

完颜亮，即金废帝，女真名迭古乃，字元功，金代第四位皇帝，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杀人狂，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完颜宗干次子，母大氏，史称海陵王。完颜亮在位12年，在位期间为人残暴，杀人无数但严肃吏治，能够听取臣下的某些有益建议。迁都燕京之后，完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金王朝的统治。在金朝历史上，完颜亮的确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1161年，完颜亮在南宋境内的瓜州渡江作战时死于内乱，时年39岁。

其父宗干为金太祖的庶子。太祖死后传位弟弟完颜晟，即金太宗。太宗死后，传位于太祖嫡孙完颜亶，即金闵宗（后改为熙宗）。完颜亶的父亲早逝，依女真的风俗，其母再嫁给小叔子，完颜亮的父亲宗干。

因为有这一层“兄弟”关系，完颜亮与完颜亶是一块长大的。完颜亶登上皇位之后，完颜亮也不甘寂寞，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登上皇位。于是他处处培植阿里出虎这样的亲信。

到了皇统九年（1149年）腊月，要废熙宗的人已经结党行事。从前因送礼一事被杖责一百的大兴国，因为和完颜亮的心腹尚书省令史李老僧是亲戚，于是和完颜亮结党，他当时正在伺候熙宗在寝殿内的起居生活，总是有意无意地乘夜从主事者那里带皇宫钥匙回家，大家习以为常。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要报答完颜亮之父完颜宗干的旧恩，徒单阿里出虎是完颜亮的姻亲。腊月初九丁巳，此二人值班之夜，大兴国用皇宫钥匙打开所有宫门，和完颜亮、秉德、唐括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至寝殿。熙宗本来常置佩刀于床上，这天夜里大兴国先取之放到床下，等到事发，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众人拜完颜亮为皇帝，时年27岁，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并假称熙宗想要商议立后，召众大臣入宫，杀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先后诛杀女真宗室贵族以及金太宗子孙70余人，完颜宗翰子孙30余人。当上皇帝后，野心勃勃的海陵首先迁都燕京，后迁都汴京，欲称霸整个中国。

完颜亮称帝后，使金国逐步汉化。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族人才，以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统治。天德三年扩建燕京城，又以都城“僻在一隅，官艰于转输，民艰于赴诉”为由借以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于天德五年让女真贵族们离开白山黑水间的上京来到南京，此举加速了女真的封建化及与汉族的融合。史载“营南京（燕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贞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作为金朝的都城，并将诸宗室亲族及其所属诸猛安尽数迁至中都及山东等地，以防止反乱。天德三年，罢世袭万户职，以改变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的状况。仿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对科举进行改革。贞元二年复钞引法，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元年（1156年）颁行正隆官制，同时又颁行“续降制书”，补订法律，与熙宗时的皇统制并行。

但与历代篡位的帝王一样，海陵王的缺点与优点一样大，嗜杀成性就是一点。当了皇帝不久，就将与他意见不和、反对他的皇室宗亲杀掉了100多人。虽然政治改革推进了，但后宫的隐患也埋下了。

与金国名将兀朮一样，海陵王也是南宋政权的老对手。他在18岁被封为“奉国上将军”后，父亲宗干就送他到金军统帅兀朮的帐下，有意历练儿子。凭着显赫的战绩，海陵王先后晋升为骠骑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但海陵王十分好色，有“淫遍天下女色”的恶名。

他看上了叔母，竟然把叔父弄死了，收叔母为妃。所以《金史》称，“（海陵）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

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

正隆三年，营建南京宫室，征调各路军兵，准备南侵灭宋，统一中国。据说他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因宠臣梁珫“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金史·梁珫传》），“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即兴题诗：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正隆六年二月，他从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海陵王亲自督大军渡淮河，出庐州（今安徽合肥）。命工部尚书苏保衡率水师由海道直趋临安（今浙江杭州）。十月，任东京留守的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发动叛变，称帝于辽阳，改元大定，废完颜亮。乌禄的妻子曾被完颜亮看中，其妻为保其命及清白自尽身亡。海陵王在后院起火的情况下继续南进。苏保衡所领的水师行至胶西陈家岛时，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完颜亮所率大军在采石矶希图渡过长江，为宋虞允文所败。他于是率兵还和州（今安徽和县），趋扬州，计划从瓜洲渡江。先一日，军中发生叛变，海陵王被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砍伤，最后用绳勒死，以大氅裹尸而焚。

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四月，降封为海陵郡王，谥号为炀，所以又称海陵炀王，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地中。被海陵王所弑的金熙宗于大定十九年被供入太庙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正月，海陵王又再被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40里。

开兴元年（1232年），蒙古人围攻金都城汴京，老皇帝哀宗完颜守绪弃汴京都城，留老母丢妻妾，出逃到蔡州。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宋、蒙两股军队，一南一北夹击金国。其时，城外杀声震天，国破在即。完颜守绪连夜传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此即是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短的，连半天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登基朝贺仪式才结束，帝号未定，宝座未热，蔡州即失陷，完颜守绪在轩中上吊自杀（国破家亡，自杀成义，史上亦称完颜守绪为义宗）。听说皇帝上吊，有500多臣子、军士也投河自尽，现场十分惨烈。新皇帝完颜承麟随后又被乱兵所杀，金国宣告灭亡。

起初，蒙古人视金为敌国，进入北京后，出于报复目的，盗掘捣毁了金帝王陵。但在完成统一中国后，蒙古人认金国为一家，对金帝王陵进行了整理，还装模作样地定期祭祀，金帝王陵一度成为元时有

名的“京西八景”之一。但在金亡388年后，隔了一个朝代，到了朱由校当皇帝的明朝天启二年，金帝王陵却因为“泄王气、断龙脉”一事，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史称“天启掘陵”。

当时，女真后裔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女真建州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在东北建国，国号“金”（清政权前身，史称“后金”）。起用这个国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复兴当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明天启年间，因后金政权崛起，明皇惑于术士之说，认为后金兴起与金陵“气脉相关”，遂拆毁了金陵地上建筑。清初对有的陵墓进行了修复，还特设守陵户，春秋至祭。乾隆时又进行修复，但后来遭到严重损坏，金陵地上部分几乎无迹。从1986年开始，北京市文物部门对金陵进行踏勘，测定出金陵在大房山支脉云峰山的具体位置。

当时后金定都辽阳，一派生机，对大明王朝已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明朝时由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腐败透顶，社会混乱，义军四起，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朱由校听信后金是“金国余孽”，其兴起是300多年前入葬的京西金帝陵“王气太盛，女真龙运未绝”的说法，遂采纳了破风水、断龙脉、泄王气的“妙计”。

通俗地说，此“妙计”就是挖努尔哈赤的“祖坟”。

天启二年、三年，朱由校先后两次派人去九龙山掘陵搞破坏，从地上到地下，从里面到外面，辉煌一时的金国帝王陵全给毁了，不留一座。在砸毁全部地面建筑后，又掘开各陵地宫，用散落在地的石柱、栏杆一类的建筑构件和乱石塞死。

为了彻底绝断女真王气，经堪舆师指点，在金太祖睿陵所在的“龙头”上动土，硬“砍”掉一块，龙头下所谓的“咽喉”部位也被掘挖一个大洞，让女真这条“龙”成为死龙。

为了彻底破坏掉女真的“王气”，又在各陵址上建起了多座关帝庙，以此来“镇”住女真的王气。还特别在睿陵原址修建“皋塔”一座，请来与岳飞一道抗金的南宋名将牛皋，与关公一起给大明王朝“抗金”。之所以要在睿陵原址建“皋塔”，是因为“气死金兀朮，笑死牛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所建的庙、塔遗迹至今尚存。

有人起初怀疑此事，因为《明史》上没有记载。实际此事是真实存在的，见于清康熙二年玄烨御制碑文，碑称“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康熙讥之是“明惑形家之说”、“厌胜之术”。金国帝王陵让朱由校破坏掉了，女真的“龙脉”也让他挖断，但最后却是朱姓天子大运不在，自己的王气泄了，被满清夺走了江山。为何？康熙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

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

天聪十年（1636年），后金易名为大清，更加强大了。1644年，清政权最终结束了朱元璋一手开创的大明王朝，一直到267年后的1911年，清朝的“龙脉”才真的断掉了，为民国所取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就此终结，中华博大精深的帝王陵寝文化也成了千古绝唱！

挖祖坟绝断起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的开支，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而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广东、广西等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导致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群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起来的。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

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纷纷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人，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洪火秀，原为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人，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1864年在天京病逝，太平天国在他死后不久也灭亡了。

对太平天国并无敌意的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载："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洪家祖辈只是农民，为何洪秀全会富贵煊赫至此呢？这跟洪家祖坟选址有无关系？洪秀全的败亡是否与祖坟被挖有关系？

洪秀全的祖坟位于芙蓉嶂山上，芙蓉嶂位于芙蓉镇之北，海拔360米，处于群山之中，山峰重叠，状若芙蓉。又因绵亘于平原之背，一字排开，宛若屏帷，故称芙蓉嶂。山之南，有"白水秙（lǚ）"，又名"西山瀑布"，其状如同白练，自50米高处分五级泻下，溅石飞花，倾注入潭，其声轰轰。曾有文人墨客咏之为"峭壁中悬一段云，青山横为玉龙分。势倾河汉难窥测，声杂风雷骇听闻。当暑向人寒瑟瑟，凌空触石雨纷纷……"。

如果没有风水大师赖布衣，恐怕外地人永远都不知道芙蓉嶂是块风水宝地。

赖布衣，原名赖风冈，字文俊，自号布衣子，故也称赖布衣，又号称"先知山人"，江西定南县凤山冈人。生于宋徽宗年间（1100～1125年），九岁即高中秀才。曾任国师之职，后受奸臣秦桧陷害，长期处于流落生涯中。赖布衣的足迹几乎踏遍祖国大地，凭着精湛的堪舆理论与技术，一路怜贫救苦，助弱抗强，留下了许多神话般的传说，"风水大师"的名声不胫而走。香港、广州、英德等城市都由赖布衣勘定选址。传说赖布衣所著《青乌序》刚刚脱稿就被南华帝君的使者白猿取走，多年后传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凭它辅佐朱元璋成就了帝业。又有传说孙中山先生的祖坟也是赖布衣勘定的。后来赖布衣看破红尘，遁隐山林，长与青山白云为伴，不见其踪。赖布衣被尊称为赣南四大堪舆祖师之一。

赖布衣少年时就得到父亲赖澄山的真传，18岁就行走江湖，以风

水相术为生。他在粤北群山中发现“龙脉”南延，气势磅礴，十分高兴，决心要跟踪“龙脉”。他沿着“龙脉”出南雄，过曲江，下英德，越清远，入花山北部山区，来到芙蓉嶂。他见气势不凡，认为此乃龙脉之“结穴”。临行时口占偈语一首：“头顶芙蓉嶂，脚踏土地坛。右有覆船岗，左有莺蜂窦（‘窟穴’的意思）。鳌鱼把水口，狮象守门楼。谁人葬得中，代代王公侯。”原来这山南麓有三个小山岗突起，居中的土地坛最大；左、右两边的分别名叫覆船岗、莺蜂窦。正南面约一公里之遥，又正好与三座山岗相对：其中间一座名鳌鱼岗（后人讹传为鲤鱼岗），左、右两边相距各几百米处，有“狮”“象”两山，均以形似而得名……赖布衣在芙蓉嶂住了几天后，便告别村民离开。听说他又跟踪“龙脉”，以后去过南海、顺德、番禺、宝安，直到九龙又住下一段时间，然后租一小船去海南岛，从此销声匿迹而不知所终，只有他留下的诗在花县一直流传。

清朝嘉庆年间，有洪姓一族全家从广东梅县石坑镇迁到花县福源水村定居。在他们迁到这里不到两年的光景，洪老汉便逝世了，初葬于福源水村附近。洪老汉的二儿子洪英伦稍懂风水相术，他得知芙蓉嶂的风水诗后，于是便按照诗中所指，到芙蓉嶂察看，见果然为风水宝地。于是选定位置，把父亲尸骸迁葬到此，重建了坟墓。墓形像一座太师椅，用青砖砌结，正中有花岗石造的墓碑，碑上款刻“嘉庆二十年秋谷旦吉日重修”，正中是“清显祖考讳公三洪公大人墓”，落款是“祀男英绎、英伦、英缄、英纬，孙会玄同立”。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赖布衣的预言是否真的能变为现实了。1851年，洪公三的第六代传人洪秀全在广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定都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应了赖布衣“六百年后必有王者出”的预言。但赖布衣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洪秀全只当了13年天王，太平天国就失败了。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清廷派人挖了洪秀全祖坟的缘故。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一路势如破竹，这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极大恐慌，他一方面下罪己诏，稳定人心；另一方面却又下令查明“逆贼”洪秀全、冯云山、韦正的祖坟，先经广东花县、广西桂平发掘……密饬各州、县明察暗访，“务得该首逆及从逆诸三代确实坟墓，悉加掘毁，并其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消逆焰而惩大憝”。花县知县牟宗龄收到上谕后，即奉命急将洪秀全之祖坟掘毁。

洪秀全的祖坟虽然被毁了，但是，或许是芙蓉嶂积聚的王者之气太强的缘故，洪秀全还是当了13年的天王，直到病死。虽然清政府挖掘洪秀全的祖坟后，并没有立即使太平天国运动停止，但是给自己争取了几十年苟延残喘的机会。

为称帝自扒祖坟

中国古人对风水的迷信程度，从明朝以前的挖祖坟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满清王朝对风水也格外讲究，如清东、西二陵陵址的卜择，都充满玄机。清朝帝王也干过挖祖坟败人风水的事情。如乾隆盗明陵的楠木，主观上也是彻底破坏朱姓明朝的天子龙运。

在历史进入民国时期，挖祖坟仍不时发生，甚至出现在一些民国要人的身上。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对风水就颇讲究。辛亥革命后爆发的最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白朗起义”，由河南人白朗、李鸿宾、宋老年等人于1912年发起的，反对袁世凯的统治。1914年起义失败。

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声势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于9月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11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2000人，消灭了进入豫西的官军，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县城。袁世凯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调集20000多人进行围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军的包围，于3月7日一举攻克湖北老河口，歼敌2000余人。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白朗军长驱入陕，攻占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渭水西进，由陇县进入甘肃省境。陕西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得到补充。乘势攻占天水，麾军进入甘南地区。欲由此入四川，被川军阻击。白朗军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主力队伍疲惫不堪，军纪松弛，大小头目思乡心切。于是决定沿原来路线折回河南家乡。官军追击堵截，白朗军一路苦战，伤亡惨重，及回到河南鲁山、宝丰一带，已溃不成军。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石庄与官军搏战，负伤身亡，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民间传说，袁世凯为镇压白朗义军，遏制其势头，听信风水先生的鬼话，盗掘了在河南宝丰县境内白朗的祖坟。据说，白朗的祖坟葬到了与东晋陶侃祖坟一样好的牛卧宝地。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实行帝制，改元“洪宪”，当了83天皇帝，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据说袁世凯的“皇帝梦”事出祖坟的风水，风水先生帮袁家看好了祖坟风水上的毛病。

事情还得从袁世凯的经历说起，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致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所有差事。袁世凯知其势不吉，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

袁世凯从小就十分迷信，做事经常看相问卦、测算风水。袁世凯迷信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排挤，这可能是祖坟风水出了问题，于是请风水师给祖坟“会诊”。风水师看了后表示，袁家祖坟系真龙结穴处，贵不可言。但因为“龙穴”四周筑了围墙，因而“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当务之急就是拆掉祖坟的围墙，袁世凯信以为真，于是派人拆掉自己祖坟的围墙，让祖坟看起来更正、更有龙势，让龙脉更加鼎盛。民间有歇后语“袁世凯刨坟头儿——祖坟不正”，说的就是此事。袁世凯三年后果然当了“皇帝”。这应该是风水先生抬高自己水平的附会之言。袁世凯官场受挫，是因为他与醇亲王载沣有矛盾。载沣摄政后，自然要挤走他。袁世凯出生河南项城，但他死后葬到安阳，据说与他三年隐居有关，此期间他为自己卜择了一块“牛眠之区”，即现在的墓地。

袁世凯非常相信风水学说和相命之术，甚至决定他用人的取舍就是以面相为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有人向他举荐颇有才干的吴鼎昌为财政总长。但袁世凯认为：“此人背后可见腮，曹操就是这样的骨相。”有才而不能受重用，吴鼎昌后来只做了一个造币厂的厂长。

袁世凯有一只朝鲜国王赐给他的由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他非常喜欢。一次，茶童给他送茶，见他还在酣睡，就直直地去看床上的袁大总统，看了一会儿眼就花了，越看眼前就越模糊，脚下一绊，将茶杯摔个粉碎。袁世凯被惊醒，见茶杯摔碎了，就生气地大声训斥茶童，并问怎么回事。茶童怯生生地说：“刚才我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

大总统您呀，而是一条玉爪大金龙。金龙全身闪闪发光，正要腾空飞起。”袁世凯听后怒容全消，变得异常平静，顺手在床上拿了一件值钱的东西赏给茶童，并对茶童说：“此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长逾丈许，蜿蜒曲折，形似龙状。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要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查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沾沾自喜的袁世凯在各界的“大力呼吁”下，终于决定称帝。

为了打破自己家族寿限不超过57岁的宿命，他将祖坟移往了河南省安阳市北门外5里远的洹水之滨。这里原是当年袁世凯被贬职后“隐居”的地方。慈禧太后为安抚袁世凯，曾将这里赐名为“养寿园”。养寿园是袁世凯下野后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居住时修建的一所花园。占地200亩，内置花园，园内引洹河之水，小溪长流，山林峻美，被称为北国名园。园内建有养寿堂、谦益堂、五柳草堂为代表的八大景观27处建筑。建筑特点是中西结合，独具一格，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和观赏价值。后因战乱被毁。这养寿园地形奇特，四周低洼、中部隆起，远远看去犹如一只大鼋鱼伏卧在那里。所以当时老百姓都传说袁世凯是甲鱼转世，人们称袁世凯为“老袁”，实指他是“老鼋”。这些牵强附会的传说本不足信，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好恶情感，几句通俗的歇后语也记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轶闻。

1916年初，袁世凯恢复帝制，名洪宪皇帝。称帝断了各路军阀当权的梦想，前云南都督蔡锷领导护国军誓师北上讨袁。袁世凯为避免国家分裂，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袁世凯病逝后，遵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将其葬于河南安阳市洹水北岸。陵墓由北洋政府筹资兴建的，后称“袁林”或“袁公墓”。

中国龙脉有几何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许多山脉雄峻非凡，气势磅礴。忽而直插

青云，云烟缭绕；时而奔腾起伏，千姿万态；时而舒展缓落，伏首苍田；或而隐踪匿迹，身形不见。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风水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将逶迤奔腾、形象万千的山脉称之为龙脉，比喻是非常恰当的。风水术上所说的龙，本义就是指山脉的动态气势。山脉在地质学上的术语叫地表皱折。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上虽然见不到山峰，但地底下照样存在着复杂的地表皱折，只是那里的地表皱折在表面上看不到而已，也就是说平原也有龙，只是藏在地表底下不露真身。

山脉是在宇宙星体的引力和地球深处的高温高压相结合而凝成的地应力的作用下逐渐隆起而形成的，其间还有地表水天长地久冲刷的功劳。所以，凡山势雄伟的地方，都是地球表面的高能场分布的地带，同时也是水源较为丰富的地带。地表上的高能场分布，大体上与山脉的坐向是相一致的。这种能量场在风水术上就叫做“龙气”，龙气是地应力、地电场、地引力、星体引力等复杂成分组成的综合场。

龙气有吉有凶。这种能场的强度和频率与人类生理、心理所要求的域值是否相一致，是划分煞气和生气的主要标准。对人类身心健康有害的龙气叫做“煞气”，对人类身心健康有益的龙气就叫做“生气”。

风水术强调“葬乘生气”，那么，生气要怎么样去寻找？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总结，风水术的先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山脉的形状和走向与风水的关系上，苦苦地探索了几千年，终于在晋代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用于寻找生气的理论和方法，郭璞所写的《葬书》，就是关于寻找生气问题的一篇总结。唐代的杨筠松，在承继郭璞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堪舆实践经验，写出了《撼龙经》、《疑龙经》两部寻龙专著。杨公的二龙经，是堪舆家寻龙的主要经典和理论根据，成了所有习堪舆者的必读之书。

按照风水师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龙脉正在西进和东出的状态中，西进方向的是黄河流域，华山地区是大龙喝水和出口处；东进方向的是长江流域，黄山地区是大龙喝水和出口处。这两个区域以后会形成中国新的大龙脉。

中国有三大干龙，以长江和黄河为界，长江以南的干龙叫南干龙，长江和黄河夹送的干龙叫中干龙，黄河北面的干龙叫北干龙。三大干龙同是昆仑山南干龙的分枝。所以说，昆仑山是中国所有龙脉共同的祖宗。三大干龙是各级枝龙的总纲，想要探寻清楚龙脉的来龙去脉，就要先了解三大干龙的分布区域和基本走向，才能认清龙祖龙宗。

北干龙所分布的地域，包括新疆、内蒙、青海、甘肃、山西、河北、辽宁、吉宁、黑龙江等。

中干龙，包括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山东等。

南干龙所在区域包括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

三大干龙的总体走向大体上都是从西往东到海为止，有的则延伸到大陆架的岛屿。三大干龙从昆仑山往东延伸的过程中，或南或北，一路分枝劈脉，孕育出各级枝龙，孕结出成千上万的富贵之穴和大大小小的垣局，有如群星撒落，星罗棋布在神州大地上。

三大干龙中，北干龙和中干龙的分法古今大相一致，唯独南干龙未被取得共识。杨筠松认为：江浙地区最平坦的当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五府。嘉兴、松江的龙脉发自天目支脉，到杭州凤凰山分出，沿江东北曲折而行后消失，到高亭忽然耸峙，进入海宁、海盐；稍微靠中行走的有崇德、桐乡、嘉兴、秀水、平湖、松江，尽于西余等九峰。稍靠外行走的，从上海到吴淞、江口为止；沿海往西靠内行走的，有苕水，各城郡都是西天目的分支。湖州的龙脉发于东天目支派，成为临安、余杭；从安吉出发，经武康、归安，终止于乌程，广德以及宜兴的离墨山是正龙尽头。长兴弁山是大龙的尽头，都为南干龙的分枝。常州是发于京口的支脉，接连丹阳，岗阜隐隐隆隆的是毗陵，与晋陵相连属，支脉是夫椒、锡山；从晋陵沿太湖向东南行约60里有洋山，方圆45里到天平山向东稍南断伏，过金山。而金山出狮山，狮山又出索山，自此向东都是平原，30里后聚为吴都。丹阳与武进交于滨江，再分支江阴；沿江往东偏南，虞山出现，便有常熟。北边是大江，南面是昆湖，中间是平原；东南是昆山，东边是嘉定、太仓，到吴淞、江口而止。

而明代的刘伯温考称：南干龙一脉，从峨眉山沿江东行后，一开始不知结局。从通州泛海勘察后，才发觉海盐一带的山脉是南干龙的尽头处。因为天目山虽为浙右镇山，但山势并未截止，而是蜿蜒而来，右挟黟山，左带苕水，直到海盐的长墙山、秦驻山之间才终止。于是，以平松诸山为龙，左抱长江、淮河、泗水，以庆绍诸山为虎，右绕浙江曹娥之水，都朝拱着海盐。后边的脉气乘湖东出，前后以朝鲜、日本为岸，使南干龙成为最大的干龙。

有人认为，杨筠松和刘伯温的论断都很有道理。但南干龙并未止于上海或海盐，真正的南干龙龙脉在福建继续延伸入海，到达台湾岛后仍未到尽头。

山是龙的势，水是龙的血，因而，龙脉离不开山与水。自古以来，山环水抱之地都是风水宝地。即便是抛开风水学、龙脉说的观念不谈，任何人在这种山奇水秀的环境中成长、生活，都是一种和谐、

和乐的享受。

第二十二章　中国盗墓史上耸人听闻的辱尸事件

伍子胥鞭尸雪耻

在中国的盗墓史上，有很多盗墓者盗掘坟墓，并不是为了盗取墓葬里的财务，而是为了报仇雪耻，最为著名的，当属伍子胥掘墓鞭尸发泄私愤一事了。

伍子胥（？—前484），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名员（yún），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一说是今监利县人，今县城大车站外有其雕像；另一说是襄樊市谷城冷集区沈湾（原系光化富乡村，1949年划归谷城）人，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伍子胥的哥哥叫伍尚。《伍子胥·奇谋战圣》称：伍子胥是姑苏城的创建者。他的祖父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气。

伍子胥是中国史书着墨比较多的人物之一，本来就是一位历史名人。从中国的盗墓文化史来说，他也是重量级的。掘开了人家的陵墓不说，还要拿着皮鞭，朝尸体发泄，可谓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

伍子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盗掘者，根源在其出走吴国之前，与楚平王结下的仇恨。

《左传》记载，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因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其父、兄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发誓要搞垮楚国，以报仇雪恨。

在伍子胥入吴之前，跟随楚国太子建到齐国，后又到郑国。太子建和晋国君王私通，要做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伍子胥劝说建，郑国以忠义对待他们，他们怎么能背叛郑国呢？但是太子建说他已和晋国说好了。就不听伍子胥的劝说，后来被郑国知道后，郑国国君就把太子建杀了，伍子胥就逃亡到吴国去。出了郑国都城，出了昭关之后还

有一条河隔着。伍子胥看见没有船，内心非常焦急，突然划出一条渔船渡了伍子胥。下船之后，伍子胥怕他说出去，就对渔翁说不要把事情说出去。渔翁非常伤心，诚心渡伍子胥，还落得怀疑。因他非常敬重伍子胥，也没有抱怨。渔翁就把船滑到江中心自沉了，以绝伍子胥的疑心。伍子胥看到后大哭，说是他害了渔翁。但有的书上说渔翁没死。后来伍子胥要灭郑国为太子建报仇，渔翁的儿子就唱了一首歌，仿佛是老渔翁对伍子胥唱的，伍子胥想起他的恩人在郑国就班师回去了。

前506年，在孙武攻破楚国城池，成全吴王“春秋五霸”地位后，伍子胥也寻得了弑父兄之仇的机会。

伍子胥回到楚国郢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探楚平王墓之所在。不知是因为战乱找不到知情人，还是因为楚平王早有预料而采取了保密手段，墓地一时难以找到。这令伍子胥心情十分糟糕。就在他坐卧不宁、心绪难平的时候，他的手下报告说有一个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自己知道楚平王陵墓的具体位置。但是老人说完就走了，因此只是知道大体的位置在东门外寥台湖，具体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伍子胥听完士兵的报告，就带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郢的东门外寥台湖。只见寥台湖平原上一片衰草，湖面上大水茫茫。坟在何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伍子胥心急如焚，可这湖面方圆数十里，怎么去找？

一转眼的工夫，天就要黑了，可是伍子胥和他的部下仍是一无所获。看着士兵们面露疲惫之态，伍子胥不由得心灰意冷。准备再找一个时辰，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先撤兵明日再来继续寻找。伍子胥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能找到楚平王的墓地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就算把寥台湖掘地三尺，他也在所不惜。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伍子胥仍然没有找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之中他感觉今天就是自己的复仇之日。于是，他命令士兵在湖边稍作休息。就在伍子胥坐于地上陷入沉思之时，有个老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只见此人五六十岁年纪，身体清瘦，目光如炬。伍子胥隐约地感到，此人绝非凡人，一定是来帮助他的。于是他急忙起身，迎上前去。

伍子胥猜得没错，这位老者的确知道楚平王的墓埋在何处。

老人不等伍子胥说话，就带伍子胥和士兵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老人家在一个乱草丛生的地方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随着老头儿的喊声，队伍在一个土堆前驻足。这个

圆秃秃的土堆并不高，也不抢眼，上面长满了杂乱的青草。

“给我挖！”随着伍子胥的一声令下，众兵士拿出工具，挖了起来，挥镐抡锨的士兵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

约摸又过了一个时辰，一口棺材终于破土而出。

伍子胥从腰间抽出一把宝剑砍了下去，原本极为坚固的木材在剑下显得不堪一击，剑落之处，木屑乱飞，七剑落完，棺板尽去。

“啊！”随着大家的惊叫，伍子胥不禁对天长叹，原来这棺材之中只有衣帽，却不见楚平王的尸体。

“不忙，这是一个疑棺，楚平王老奸巨猾，至死还不忘骗人，真是可恨到家了。但是你骗得了别人，岂能骗得了我。大家别着急，真正的棺材在下面。”老人言语间渐露悲愤之意。

于是众人移去空棺，果见真棺。经过一番刀斩斧砍，一具尸体终于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具尸体由于埋了一段时间了，已开始腐烂，面目也有些模糊。但伍子胥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楚平王。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伍子胥看到了楚平王的尸体，多年怨恨涌上心头，不禁怒气冲天，他从背后抽出九节铜鞭，对着尸体，狂抽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三百下。直抽得肉烂骨碎，伍子胥的怒气还未消。他又用脚践踏尸体，同时大声责问道：“谁叫你信谗人之语，杀我父兄，你有今天，纯属咎由自取！”

做完这一切，伍子胥已是浑身无力，“扑通”一声，跪于地上。此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大仇得报的伍子胥这才想起来还不知道老人的来历呢！于是就和老人攀谈起来。原来老人当年和几十名兄弟奉命为楚王造墓，可楚王怕人发掘他的坟墓，就卸磨杀驴，对老人和那些负责给他修陵的工匠狠下毒手。那些为楚王修了半生陵墓的人都成了楚平王的刀下之鬼，只有老人侥幸逃了出来。这些年来，老人一直在想如何为当年那些冤死的兄弟报仇。无巧不成书，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伍子胥率兵攻回楚国，于是老人知道，自己的大仇可以报了，这才自告奋勇地为伍子胥带路。伍子胥这才明白，自己和老人原来乃是同病相怜之人。

掘墓鞭尸，在惩罚或是复仇的手段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但这一手段也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的感叹。但是关于伍子胥鞭尸楚平王，还有另外的传说，

在《伍子胥变文》中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 昭王弃城而走，遂被仵相擒身，返缚昭王。“你父坟陵，今在何处？”昭王启子胥曰：“我父平王，已从物化，负君之罪，命处黄泉。事既相当，身从脔割，父愆子替，何用尸骸？请快雠心，任从斧越（钺）。”昭王被考，吃苦不前，忍痛不胜，遂即道父之墓所。子胥捉得魏陵，脔割捥取心肝，万斩一身，并诛九族。子胥唤昭王曰：“我父被杀，弃掷深江。”遂乃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帝，并悉总取心肝，行至江边，以祭父兄灵，曰：“小子子胥，深当不孝，父兄枉被杀戮，痛切奈何！比为势力不加，所以蹉跎年岁。今还杀伊父子，弃掷深江，奉祭父兄。唯神纳受。”子胥祭了，发声大哭，感得日月无光……

由以上我们可得知，伍子胥是从楚平王的爱子楚昭王的口中知道楚平王坟墓的具体位置并对其进行掘墓鞭尸的。

大汉皇后遭奸辱

为什么盗墓史上奸尸现象出现很多？除了因为盗墓贼的变态和女性容易遭受性侵害这一传统性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女尸不腐的比例相对高于男性也有直接关系。从现代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发现，出土的完好尸体多是女性。

盗墓中的奸尸行为在干尸身上一般不会发生。与死人复生现象一样，盗墓中出现奸尸行为也是让人惊讶的；与死人复生现象不一样的是，奸尸行为在事实上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什么不可信，更非什么不解之谜。

在《中国盗墓史上六宗罕见“辱尸”事件》一文，其中的一宗“辱尸”事件，就是赤眉军“奸吕雉尸”。这一历史记载出现在《后汉书》里，“列传”中的第一传是刘玄、刘盆子两人。刘盆子传中细述西汉末年赤眉军当年的作战行为，其中就有此事：

> 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众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我们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看出，赤眉军在盗掘汉朝王陵时，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长陵并未能躲过劫难。尤为惨痛的是，皇后吕雉竟然遭到了奇耻大辱——尸体让赤眉军奸淫了。而且，除了吕

雉这位当年天字一号女人外，其他被掘开帝王陵内的皇后宠妃们的尸体，赤眉军也没有放过一具，奸尸行为令人发指。这些当年只有帝王一人能“幸”的后宫女人，肯定是死也没有想到会被一群农民性侵犯。

《后汉书》编撰者范晔在书中还交代了引起赤眉军淫兴的原因——这些女人身着金缕玉衣，死了多年仍栩栩如生。试想，这些能进入皇帝后宫的女人，生前应该是非同一般的美，难怪那些整天在男人堆里的起义者会如此这般。当然实际原因不可能是生理动机一条，其辱尸心理应该很复杂。当年，吕雉逝世时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活着时身体也应该不光鲜了，何况至赤眉军盗墓时已逾200年了，应该很丑了。所以说，辱尸泄恨应该是直接动机。此事发生在2000年前，可见中国盗墓贼的奸尸行为，还是颇有历史渊源的。

也许有人说，《后汉书》所记未必真实，联系一下当年的现实就可知道几分真相。人吃人应该是最不可能的吧，但赤眉军起义年代，偏偏这样的事情就颇常见。“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众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闹饥荒的时候，人吃人的事都能发生，赤眉军奸尸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搜神记》卷十五中讲了17则与墓冢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是讲冯贵人死后七十余年尸不腐颜如故一事：“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汉桓帝刘志（132—167），东汉第十位、倒数第三位皇帝，他是汉章帝曾孙。皇后为窦氏，当时外戚梁冀专权。146年，外戚梁冀毒死9岁的汉质帝，立14岁的刘志即位。刘志从小就对梁氏不满，他即位后，就想方设法地诛灭梁氏。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5人一举歼灭了梁氏，5人同日被封侯，被称为“五侯”。五侯比外戚更加腐败，他们对百姓们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四处怨声载道，汉政治更加衰颓，国势益弱。汉桓帝统治后期，一批太学生看到朝政败坏，便要求朝廷整肃宦官、改革政治。宦官气急败坏，在延熹九年（166年）与德扬天下的司隶校尉李膺发生大规模冲突。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200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

刘志35岁时病死，葬于宣陵。死后谥号孝桓皇帝，庙号为威宗。

史书记载，刘志后宫有嫔妃五六千人，冯贵人即是其中之一。从《搜神记》的文字中，可以知道，死了70余年的冯贵人尸体不仅容颜如故，而且还有一点体温。那些盗墓贼见色起淫，先后轮奸了她。奸尸时，盗墓贼争先恐后，因为先后顺序问题，互相之间大打出手，残杀了起来，这才导致盗墓事发。

这则故事表述的真实性值得推敲。盗墓贼“发冢”在汉灵帝时，汉灵帝叫刘宏，为汉章帝刘炟的玄孙。刘志虽然后宫佳丽如云，但却没有一人给他生下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已升为皇太后的窦氏便于168年迎解渎亭侯刘苌（cháng）的儿子刘宏即位。刘宏当时只有12岁，窦太后学起了吕雉“临朝听政”。刘宏也当了22年皇帝，189年死亡。如果冯贵人冢被盗时，真已下葬了70余年，那么她病死时间至少在119年前。而此时，刘志并没有当皇帝，甚至还没有出生呢，可见《搜神记》的故事情节真的是荒诞不经。

但是，虽然故事的表述有问题，冯贵人的尸体遭奸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史书上有记载。《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汉纪·孝灵皇帝上》记载，熹平元年（172年）六月，窦太后病死。因为窦氏家族获罪遭诛，朝议窦太后的下葬规格。有人欲以贵人规格葬之，与冯贵人配祔（葬同一陵区），而不宜以太后身份与桓帝刘志同葬一块。廷尉陈球表示强烈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冯贵人的墓曾遭盗，魂灵受到了“污染”。原文是：“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这“魂灵污染”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因为“骸骨暴露，与贼并尸”？言下之意很明显，冯贵人遭盗墓贼辱尸了。

从人类的性心理角度来说，奸尸行为确是客观存在的，是性变态使然，应该是“恋尸癖”的一种。不少性学家都将盗墓史上出现的这类奸尸记录，当做人类性变态的佐证来处理。如中国开设性博物馆第一人刘达临教授就曾把中国古籍上的这类文字作为其研究“性变态”的特例加以引用和分析。

唐朝戴孚所著《广异记》有这样的记载：“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

宋朝周密所著《齐东野语》：宋嘉熙间，周密近属赵某宰宜兴。宜兴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县斋前红梅树下。赵某遂命发之。女颜色如生，虽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之为之惘

然心醉，舁（yú）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柔和，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疲薾不可治文书，其家人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矣。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

清朝俞樾的《耳邮》里也有相关记载：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淫，遇妇女问价，贱售之，不与论所直，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瘗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翌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笮，邻人排闼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发其衾，则一裸妇，近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

另外，清朝景星杓的《山斋客谭》也提到：“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一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启之，见女貌如生，将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且园高其佩之妹也。”

盗墓贼奸尸救人

由于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盗墓贼奸尸的现象很多，这方面的情节也被大量地移植到了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去，成为一种有趣的创作类别。明代文人冯梦龙所编、中国古代著名世情小说“三言二拍”中“三言”之《醒世恒言》就有这样的故事。其中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朱真盗墓”的情节写得十分详细逼真，为研究盗墓史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其故事为：

唐代长安城内的曲江池，北宋汴京城内的金明池，都像现在城市里的公园，是大家娱乐休息的地方。宋徽宗年间，金明池边开了一座叫樊楼的酒店，店主是范大郎，他兄弟叫范二郎，长得一表人才。这天范二郎到金明池畔游玩，在一处茶坊中见到一名漂亮女子，这女子便是18岁的富家小姐周胜仙。她与范二郎一见钟情，她回家后就患了相思病。

周胜仙整日茶饭不思，觉得身体不快，害起病来。她父亲外出未归，只有母亲在家陪护，几乎请遍了汴京城中的名医也没有将女儿的病治好，好不容易才明白女儿害的是心病。母亲为了要稳住女儿，只得当面答应女儿嫁给范二郎，并央人到范家说媒。范家自然愿意，连订婚礼都送来了，周胜仙好不欢喜。这是三月间的事。到十一月间，周胜仙的父亲回来，知道这件事情，当即反对。觉得范家只是个开酒店的，周家财大势大，门不当、户不对，有失体面，并把周胜仙的娘臭骂一顿，当即就要退还范家的定礼。周胜仙躲在屏风后面听父亲骂母亲，不肯将她嫁给范二郎，一口气没上来，气倒在地。周胜仙从小娇生惯养，还有心脏病，倒下去就四肢冰凉，竟然毫无生气地死了。做娘的痛哭流涕，做父亲的也觉得愧疚，把女儿房中的一切珠宝细软也全部随葬了。

这事让一个盗墓贼上眼了。周家请来的挖坟筑穴人中有个叫朱真的，出生于盗墓世家，公开身份是“打坑子人（挖墓穴者）”，暗里身份是盗墓贼。知道周胜仙的陪葬丰厚，便在筑坟时多留了一个心眼，做好手脚，以便盗掘。

朱真家境贫寒，回家就告诉他娘，有一笔财富等着他。他娘一听儿子准备去盗墓，连忙劝阻，告诉他盗墓的罪可不轻，发现了是要砍头的，还说：“你爷爷二十年前就是干盗墓的行当。一次掘开一座坟园，刚把棺材盖打开，那尸体就望着你爷爷笑。你爷爷受到惊吓，回来四五天就死去了。”朱真不听，说道：“各人命运不同，我今年几次算命，都说我会发财。”说着，就从床底下拖出一包东西，有挑刀斧头，装油灯的罐子，一件蓑衣。到夜晚二更时分出门前，他对娘说：“我回来时，敲门响，你便开门。”就这样，朱真乘下大雪，悄悄离家往坟场去“干活”了。

朱真摸黑来到周胜仙的墓地。原来下葬的时候，他依照事先留下的记号，用挑刀把石块挑开，用两根长针把砌好的砖块慢慢移开，一下子挖到棺材。这时他用蓑衣将洞口盖住，黑夜里根本看不出坟墓已被挖，然后取出火种将油罐灯点起，再用刀挑开棺材上的命钉，把棺材盖推向一边，朝躺着的周胜仙作三个揖，说一声：“小娘子莫怪，我今天暂时借你些富贵，将来再给你积功德。”便动手将周胜仙头上戴的珠宝首饰一件件取下。将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都收入包裹中后，看着周胜仙的那一身衣服还值几个钱，就把自己的裤带解下，一头系住周胜仙的脖子，一头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将周胜仙尸体抬起，把她的衣服脱个精光，连内裤也不剩。

朱真还是个光棍，周胜仙虽然死了，脸色白，但到底是美人坯子，脸蛋娇美。朱真淫心顿起，色能壮胆，当即脱下裤头奸了周胜仙

的尸体，鼓捣了几下，想不到周胜仙突然睁开双眼，双手把朱真抱住。原来周胜仙一心牵挂范二郎，见父亲不准，生生气死，其实只是一种假死，现在得到阳和之气，冲击了五脏六腑，刺激了中枢神经，当即醒转，却把朱真吓得半死。

周胜仙便问："哥哥，你到底是哪个？"朱真听她开口说话，就知她不是鬼，急中生智，连忙说："姐姐，我是来救你的。"周胜仙本就聪明，看了眼前的一切，就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只是说："哥哥，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范二郎，我一定重重谢你。"朱真本想把周胜仙一刀杀了灭口，转意一想，别人都是花钱讨老婆，现在这里现成的一个漂亮娘们儿，我为什么不把她骗到手呢？于是，他对周胜仙说："你不要慌，我带你回家，帮你与你的范二郎相会。"就这样，他是把工具、东西收拾好，背着周胜仙走出坟墓，又将坟墓复原。回到自己家门口，在门上敲了三下，他娘把门打开，看到周胜仙着实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把尸体都驮回来了。"朱真三言两语解释完毕，就把周胜仙带到自己的卧房里面，用一把明晃晃的刀子逼着周胜仙说："你得依我两件事，我便带你去见范二郎。第一，你在房里不准做声；第二，你不准出房门。"周胜仙连说依得。朱真出来又对他娘交代一番。就这样连哄带骗，朱真这个泼皮霸占了周胜仙，每当她问起范二郎的消息，他总是搪塞她，范二郎病了，病好了就会来接她。周胜仙知道朱真是在骗她，整天想着脱身的计划，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

周胜仙逃出朱家，就寻樊楼酒家，有热心人一直把她带进樊楼酒家。范二郎正在酒店柜台上算账，突然听到有人叫："二郎万福！"赶忙抬起头来，一看是周胜仙，便以为是她鬼魂现身来缠自己，吓得大喊捉鬼。慌乱中抓起店中的一只汤桶对着周胜仙当头砸下，正好打在太阳穴上，周胜仙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这回是真的死了。

盗墓贼朱真是财色双丰收，盗墓得了一大笔财宝，还赶上"奸尸"这桩艳事。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朱真的盗墓，周胜仙也复生不了。但可惜的是，在周胜仙复生后去找情郎范二郎时，范二郎却将她当鬼打死了。

悲情皇后难安息

我国古代社会十分推崇佛教和道教。那时的人们大都相信人死后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死者只要能占有生前的一切，

死后的灵魂就还会继续着前世的生活。所以，王侯将相、达官贵人都讲求厚葬。但是，随着厚葬的风行，盗墓活动也越来越猖獗。那些随尸体一起埋入地宫的珍宝不仅没能供灵魂享用，反而被盗墓贼盗掘一空，甚至还给尸体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盗墓贼为了获得棺椁内和死者身上的财宝，就剖棺取尸，把死者的遗骨丢得到处都是。有时，几个盗墓贼为了抢一件宝物，竟对尸骨撕扯起来，弄得尸骨七零八落。

同治皇帝的陵墓被盗掘时，盗墓贼们见到皇后的尸体保存完好就认为她的肚子里一定藏着金玉之器。为了获得这些东西，盗墓贼把皇后的尸体拖出来，用刀把她的肚子剖开了，并且在里面一阵翻腾，内脏流了一地。

位于清东陵内的惠陵是同治皇帝载淳与皇后阿鲁特氏的合葬陵，1945年遭兵匪盗掘。民国政府闻讯后派员去地宫查看，发现载淳的尸体早烂得仅剩一具尸体骨架，阿鲁特氏被抛尸棺外，但尸体完好未腐，面容如生，其时距她下葬已70年。据称盗墓贼听说她是吞金而死，在第二次光顾惠陵时，将她的衣服全部扒光了，开膛破肚……如果她的尸体与载淳一样，早早成了一堆枯骨，这种不幸就不会发生了。

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是同治帝的结发之妻，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比同治年长两岁。阿鲁特氏是蒙古人，家学渊源，擅长诗文，端庄贤淑，颇有母仪天下的风范。这样一位皇后却遭到同治帝母亲慈禧太后的忌恨，婆媳关系不和，阿鲁特氏因此饱受慈禧的虐待甚至凌辱。

当年，在为同治帝择后时，慈安看好出身名门的阿鲁特氏，而慈禧则中意员外郎家女儿富察氏。同治帝比较倾心阿鲁特氏，而且慈安的地位也高于慈禧，所以阿鲁特氏最终成为皇后，富察氏则被封为慧妃。

大婚后，阿鲁特氏与同治帝恩爱情笃。阿鲁特氏贤良淑德，但由于其性格直爽，不善阿谀，又是慈禧昔日政敌郑亲王的外孙女，因此慈禧并不喜欢她，甚至对她屡次刁难，试图破坏她与同治帝之间的感情。慈禧在宫中广布心腹密探，监视这对小夫妻的言行举止。慈禧见同治帝很少到慧妃宫中去，对慧妃遭到皇帝的疏远和冷落，颇为不满，便对同治帝说：“慧妃贤慧，虽屈居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同治帝不敢违背母命，又不想亲近慧妃，便独居乾清宫。慈禧多次萌生废后的念头，由于大臣阻拦才作罢。

新婚的阿鲁特氏独居宫中，形单影吊，郁闷不乐。慈安便时常将她召到钟粹宫，和她谈心拉家常，百般安慰。同治帝非常敬重皇后，皇后更爱自己的夫君。阿鲁特氏每次见到皇上，必笑脸相迎，慈禧反倒说皇后“狐媚以惑主”。

此时，两宫太后仍然把持朝政，同治帝外不能亲政，内不能与相爱的皇后朝夕共处，心中烦闷，抑郁成疾。同治帝有病，阿鲁特氏心中着急，想来探望，却慑于慈溪淫威不敢前往。慈禧责怪她“妖婢无夫妇情”。同治病势垂危之际，阿鲁特氏偷着去看望，并亲手为同治帝擦拭脓血，慈禧又骂她：“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阿鲁特氏左右为难，怎么做也讨不出好来。据《崇陵传信录》载，一次阿鲁特氏去探望同治帝病，流着眼泪倾诉独处宫中、备受虐待之苦。同治帝安慰她说：“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小夫妻的这些话被尾随而来、在外偷听的慈禧听到了，勃然大怒，立刻闯进屋来，抓住阿鲁特氏的头发，一边打，一边往外拽，并扬言要备大杖伺候。同治帝看到皇后当众被辱，心中又怜又急，竟昏死过去。自此，同治帝病疴沉重，已然病入膏肓。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因病驾崩。同治帝无嗣，继帝位者是同治的族弟，称为光绪。

阿鲁特氏性格耿直，不善逢迎。她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从大清门迎娶的皇后，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没必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且，她有意无意地几次刺激、激怒慈禧，致使矛盾更加尖锐。一次，阿鲁特氏陪慈禧看戏，“演淫秽戏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一来阿鲁特氏表现得不听话、不顺从，二来反衬出慈禧好淫乐、格调低俗，从而加深了对阿鲁特氏的怨恨。阿鲁特氏身边的人劝她要处处讨慈禧欢心，要善逢迎，只有和皇太后搞好关系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否则于己不利。阿鲁特氏则表示：“敬则可，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慈禧是通过选秀女进入皇宫的，最忌讳别人提从大清门而入，大清门是她心头永远的痛。有人将阿鲁特氏的话偷偷地告诉了慈禧，慈禧勃然大怒，认为是故意蔑视自己，因而对阿鲁特氏“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

阿鲁特氏因为同治先逝，自己又屡受慈禧虐待，不堪忍受，又认为自己以寡嫂的身份居住在宫中很是尴尬，自杀身亡，死时只有22岁。虽然阿鲁特氏生前饱受欺凌，可她毕竟贵为皇后，身后事丝毫没有怠慢，入葬惠陵。

阿鲁特氏死亡当天，两宫皇太后谕内阁：“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

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遽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这是清廷官方公布的死因，但说得含糊不清，难以让人信服。

震惊中外的东陵第一起大盗案发生在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地宫和慈禧陵地宫。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东陵地区的一些土匪、不法分子趁时局动荡、政权交替的混乱之机，制造了东陵的第二次大盗案。这次被盗的陵寝有康熙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和慈安陵。被盗陵寝之多，损失之惨，比上次更为严重。

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界日报》载："三十四年十二月清三陵被盗，同治惠陵，棺两口。一同治，一陪妃，尸体俱面目如生。金棺前供桌上同治翠印一、金表一。棺内外珠宝、玉翠、金属等品，用麻袋装出，再用香炉量分，金子约二十余斤。"

又据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华北日报》载："惠陵盗犯供词略称：三十四年十一月间，奉司令命，征集民夫挖掘惠陵，用炸药把石门炸开，第一层有四个架子，分列两旁。一边是皇帝翠印一颗、皇后翠印一颗，一边是书籍及印刷板之类。第二、三层没有东西。第四层有棺两个，用斧锤等将棺劈开，由皇棺内取出半斤重金墨匣一方，重四两金八卦一个，美国赠品四边镶白珠可走半年之金表一块，朝珠白绊各两串，二十四颗的白珠子两串，翠扳指一个，金火盆一个，翠烟袋一支。在后棺内取出凤冠一顶，白玉镯、金镯各一对，翡翠、珍珠、玛瑙及木质朝珠各一串，重三两金九连环一件，凤凰簪子一件，玛瑙扳指、金镶白珠戒指、翠牌各一个，长翠簪一件，其他零星物品无法统计。"

孝哲毅皇后棺内的这些随葬品以及同治帝棺内的随葬品全部被盗走了。

惠陵被盗后，由于东陵当时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盗口一直到1952年清东陵成立文物保管所时才堵砌上。由于洞口长期未堵，当地许多百姓都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阿鲁特氏面目如生，遗体丝毫没有腐烂，被盗墓者拖出棺椁，扒光衣服，身上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社会上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盗墓贼们为了取金子，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可怜的阿鲁特氏皇后死后竟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阿鲁特氏一生短暂而悲苦，死后还惨遭辱尸，可谓是大清朝命运最悲惨的皇后。

第五篇　盗墓之外传

在中国盗墓的历史上，盗墓者与防盗者的博弈一直在进行着。在众多的帝王陵墓中，有哪些陵墓是盗墓者们觊觎已久的？哪座陵墓是中国第一陵？谁的陵墓是防盗效果最好的？楼兰古国为何突然消失？楼兰古墓群为何不得安宁？本篇将对这些疑问作详细的阐述。

第二十三章　盗墓者攻不破的陵墓——撼山易，撼墓难

防盗最强南越王

拨开历史的迷雾，在记忆的深处，中国的南方一隅，曾经有一个雄踞一时的政权——南越国。它始建于前203年，在秦朝灭亡后，由南海郡尉赵佗于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所建立。前196年和前179年，南越国曾先后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外藩”，于前111年被汉武帝所灭，传国五世，历时93年。

在这短短的93年中，文献对这个转瞬即逝的国度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它的精神生活与物质文化到底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人们也不甚了了。在记忆之中，南越国似乎并没有举世闻名的青铜器，也没有精美绝伦的玉器，并且南越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蛮荒之地，然而王陵的发现，把人们的视线又一次拉回了南越国的故土之上……

1983年6月9日，这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这天，位于象岗山的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宿舍楼的建筑工地仍像往常一样施工着。中午时分，几名工人正挥舞着铁锹铲土，意外发生了：他们手中的铁锹发出“哐啷”的声响，触碰之处则金花四溅。他们一边埋怨自己运气不好，挖到有石头的地方，一边顺手刨开石头上的泥土，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却震惊了世界。这几名工人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是类似屋顶的几块巨石，巨石中间似乎还有缝隙。他们还不知道缝隙下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按照往常的做法他们必须利用机械把这些巨石挪开。或许是天意，这一天，具有文物保护经验的省政府基建办公室邓钦友科长正在这个工地附近检查工作，他听到工人们的嘀咕，就来到这里。当他趴在地上透过巨石的缝隙往里面一看，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古代的一个墓葬，于是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队。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群工人和那个普普通通的科长，揭开了沉寂数千年的一个秘密。

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得到消息，很快派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经勘查，这是一座石室古墓。考古人员感到事关重大，迅速向文管会作了汇报。20分钟后，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来到了象岗山。他掏出装有五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从缝隙中向下窥视。随着手电筒光柱不断移动，麦英豪先是看到了用石块砌垒的墓壁，硕大的石制墓门，墓室中一堆凌乱不堪的器物。在这堆零乱的器物中，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格外显眼。麦英豪将手电的光柱停驻在这几件器物上，上下打量，从形制、特色等多方面观察判断，这应是2000多年前汉代的一座石室墓葬。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当天晚上10点，麦英豪率领几人悄悄来到象岗工地，令考古队员黄淼章拽着一根绳索从裂隙进入墓穴探个究竟。借助手电的光亮，黄淼章穿过一条过道，跨入厅堂的一个耳室，眼前的景物惊得他目瞪口呆：只见硕大的铜壶、铜缸、铜提桶、铜钫和无数的玉饰零乱陈列于一层辨不清质地的零碎器物之上。这些器物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十几分钟后，黄淼章根据麦英豪的指示，怀抱一件大玉璧、一个铜编钟、一个陶罐，来到了墓室的裂缝之下，先让上面的考古人员把文物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布包提了上去，然后自己借助绳索钻出墓穴。

正所谓好事多磨，这座墓葬的发掘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然而这都不重要，让所有关注这个墓葬的人最难熬的就是如何最快地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墓葬，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年的9月22日下午3点左右，在墓主室发掘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一名考古队员意外地在墓主的胸腹间发现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龙纽金印。当用小毛笔轻轻拂去金印上的尘土慢慢地翻转时，“文帝行玺”四个刚劲有力的小篆顿时映入眼帘。一个古老重大的历史悬案解决了！原来墓主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mò）。

赵眜，《史记》称为赵胡，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孙子，号称“南越文帝”。

谜伴随着这枚龙纽金印而来。人们此时最想了解的莫过于南越国了，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神秘的王国。虽然历史文献对其有一些记载，但却很少有实物来佐证，尤其是来自皇室的物证。就在历史即将抹去人们心中那些许的记忆的时候，象岗山上传来的消息却重又燃起那些渴望探寻南越国秘密者的激情。让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文档吧！史籍上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位王名叫“赵胡”，指出他是南越国开国皇帝赵佗的孙子，可象岗山上发现的金印上赫然刻着的是“赵眜”，难道是史籍搞错了？这个疑问的解决似乎不用花费太多的时

间。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南越国与中原地区的西汉王朝在语言上截然不同，因而对于赵眜的名姓也是根据使臣的口述记载下来的，这中间必然存在对地方方言理解上的出入。令人称奇的是目前粤方言中的一个土音中“眜”的发音仍有几分像“胡”，可见2100多年前某位使臣就是依据“胡”的音陈奏的。这位叫“赵眜”的南越国王留给我们的记忆是神秘的。从稀疏的历史记忆中发现，这位赵佗的孙子身体是不太好的，但即便如此他仍不忘贪图享乐，因此赵眜在位时间比起他的爷爷来说差远了。赵眜在位16年，从汉武帝建元四年至元狩元年（前137～前122年）。赵眜在位期间自称“南越文帝”，死后谥曰南越文王。这一时期，南越国名义上为汉朝藩属，实际上则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由于赵眜不懂治国，且在位时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因此，南越国国力在他的手上日趋衰微。为了使自己有生之年能继续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纵情享乐，他将太子送给西汉朝廷作为人质，这就为后来南越丞相吕嘉发动叛乱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是导致南越国灭亡的直接原因。虽然赵眜治理国家不怎么样，但他对自己死后的陪葬品的要求却很高，象岗山上出土的珍品就是最好的证据。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会想方设法避免自己的墓葬被人盗掘。如果说赵眜在治国方面没有多大能耐的话，那么他在防盗方面则可以说是堪称楷模了，因为他的墓历经2100多年而完好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帝王陵墓中的奇迹。

赵眜采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逃过了盗墓贼的搜寻？他的墓室结构是不是本身就有防盗功能？

研究赵眜的地宫时会发现，即便是盗墓贼找到赵眜的墓葬，要想盗取墓中的东西也绝非易事。这座深山之中的南越墓葬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墓葬之中所蕴藏的奇珍异宝使得无数人魂牵梦绕，欷歔不止。而其中的许多件随葬物品更称得上是“中国之最”，堪称国宝，各界专家学者也毫不吝惜地冠以“稀世罕见”、“国之瑰宝”等美名。神秘的南越王陵之中到底埋藏了哪些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呢？

我们不妨进入王陵地宫，进行一番饱览。

当我们迈入赵眜的地宫时才发现，赵眜墓的形状有点像个“甲”字，方向是头北脚南。那个“田”字就是墓室，伸出来的一竖是通向墓室的通道，即墓道。墓道是长方形的，填满了黄土和大石块，大概是古人在封墓以后再填进去的，目的是防止有后来者靠近墓门，防止盗墓。整个墓葬的最外围是一条斜坡形的墓道。狭长的墓道尽头，是两扇石头门，门上安有青铜铸的“铺首”——两个口衔门环的兽头。兽头纹样狰狞，颇有几分威严。

跨过一道石门坎，来到一个四方形的石屋子里，这是前室，它的四面都有门。进入前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屋子的图案。这种像卷曲云彩一样的图案，用红色和黑色颜料绘成，布满了四面墙壁和顶上的石质“天花板”。

前室南面是墓室的第一道门，北面是关得死死的两扇石门。东西两面的“门”，严格说来只是两个门洞。东西两“门”各通向一个狭长的石室。东边为东耳室，西边的叫西耳室，也是石头砌的。东边一间盖顶的石板已有一块掉了下来，就像开了个“天窗”。借着暗淡的光线，可以看到室内地上靠墙放着一列青铜钟，还有石头制的打击乐器——磬。室内还有其他大型的青铜器皿以及一些小件玉器、铜兵器和一个殉葬人。第二道石门后是安葬墓主人赵眜的地方，第二道石门下的门槛是用两段石条接成的；门槛就砌在地面的泥土上，是可以拆移的。打开第二道石门后就进入墓主人——赵眜的地宫。

地宫本身是长方形的，全部石砌，不过没有前室那些美丽的图案作装饰。在东西两面也各有一个门洞，显然又是通到旁边的墓室去的。墓室的后部还用石柱隔出一个小小的隔间，那里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铜器、铁器和陶器，像个储物室一般拥挤。抬头向上看去是盖顶的石板，石板下面，是压在石墙上的两排挑檐石。

在墓主人所在的地宫两侧和后端还各有一个墓室。东边的那间墓室里有4个殉葬人，还有许多精雕细刻的玉饰和一些铜器、陶器做随葬品，此外还发现了4枚印章。墓主所在石室西侧的墓室有7个殉葬人，殉葬人的随葬品少得可怜，除一两件简单残破的玉器外，每人有一面或两面铜镜。而备受人们关注的，则是墓主人身着的那件丝缕玉衣。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丝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且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以前我们多听说的是“金缕玉衣”。金缕玉衣又叫玉匣，汉代开始流行，三国魏武帝推行薄葬，后世遂止，所以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世界闻名，就是其中的精品。然而金缕玉衣到目前为止出土二三十件，丝缕玉衣却仅此一件，堪称孤本。所谓丝缕，就是穿玉的线是丝线。按规定，帝后所用为金丝，王侯所用为银丝，将相所用为铜线，按南越王的地位，应可穿银缕，但却是丝缕，而且玉衣的玉石质量参差不齐，玉片上的穿孔更是大小不一，手工较为粗糙。据此专家们估计，这玉衣不是西汉东园作坊制造的，多半是南越国自行制造的，很可能因为还没得到当时汉武帝的同意，所以只敢用丝缕，连铜丝亦不敢用。当年这件玉衣出土时，丝带早已腐烂，玉片散落一地。来自北京的考古专家采用前所未有的“竹签插取套装法”来整取玉衣，

并与同事合作，用了三年时间才最终将这件丝缕玉衣复原。

除了丝缕玉衣之外，墓葬中还出土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器物。它们有着强烈的异域风格，印证着南越古国对外交流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一批舶来品。其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典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前550～前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波斯药品。

而另外一件随葬出土的船纹提筒也显示出了独特的异域风情。筒身上有四组船纹，船上有扬起的风帆、戴羽冠的武士、裸体的俘虏、满载的战利品以及古代越族部落象征权力的铜鼓等。船的周围以及船底还绘有海龟和海鸟，反映了一只大型古越人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归来的场景。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墓葬之中还出土了5支大象牙，并排堆放，整堆象牙宽57厘米，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经动物学专家鉴定，出土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很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而墓葬中出土的11件铜熏炉和若干香料也被认为是来自东南亚的舶来品。这些珍贵的随葬物品都记录了南越国风雨变幻的外交历史及对外贸易历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在南越王的陵墓之中，还出土了世界最早的彩色织物套印工具——印花铜版模，以及中国最早的实用屏风、中国最早的平板玻璃、西汉最长的铁剑、西汉最大的绘画铜镜等奇珍异宝，数量众多，不一而足。

南越王陵的发现，开启了一座深埋于地下的千年宝藏，让世人重新领略了岭南南越文化的千年魅力。

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中国古代帝王似乎总有着炼丹求药以求永生的梦想。但往往却是永生不得，反而一命呜呼。这些传说中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显然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但是却始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没人能够说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成分是什么，又是如何炼就的。而南越王陵的发掘却为揭开这些问题带来了一线转机。

一位考古工作者发现墓室中散落着一些五彩斑斓的粉末物质，经过分析，原来是一些药石，计有紫水晶173.5克、硫磺193.4克、雄黄1130克、赭石219.5克和绿松石287.5克。除了这些五色药石，南越王墓里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铅丸和丹砂。在西耳室的药杵旁，发现了两

堆528个小铅丸。于是很多人会问：这批小铅丸具体是有什么用途的？翻遍古籍才知道，原来古代炼丹士炼制出丹砂和铅用于内服，能产生显著的镇静安神、镇逆定喘功效，使人自觉神清气爽飘飘然，有的服用这种“金丹”的人死了，竟被视为“仙去”。根据墓中出现的多达528枚小铅丸来看，人们有理由相信40多岁就去世的赵眛一定是服食这些含有剧毒成分的所谓“长生不老药”而中毒身亡的，可惜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苦苦寻求的“长生不老药”能让他如此短命。

南越王赵眛为了长生不老，还真是煞费苦心。在他陵墓的后藏室的铜提桶和一个异形壶里有花龟与水鱼的遗迹。而且王宫遗迹后花园的石池底淤泥层里，竟发现了数百只龟、鳖遗骸，叠压成层，厚达50厘米。其中有一个大鳖的背甲宽达44厘米，这么大的鳖，古人称之为“山瑞”。可见当时人们就将龟当做长寿的象征。

无论他怎么想方设法要让自己长寿，但他跟中国历史上所有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帝王们一样无知与愚昧，最后都死在了自己的“长生不老药”上，这可以说是对他们莫大的讽刺。

元朝秘葬无迹寻

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族人四处征战，是一个拥有雄图霸业的征服者。毛泽东称赞其为“一代天骄”。然如此伟大的征服者，在他死后也给后世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

自成吉思汗开始，蒙古大汗（即皇帝）就确定了一处专门的葬地，这个地方的汉文名称，在元代的文献中叫做起辇谷。根据近现代蒙古史学者的考证，“起辇谷”一词，是蒙古语“古连勒古”的雅译，而古连勒古正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之南，其准确位置为东经109度，北纬48度，即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以《史集》的记载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成吉思汗选择这里为他的葬地呢？原来，成吉思汗第一次称汗，建立自己的牙帐——斡儿朵，就在古连勒古（起辇谷）地区。正因为如此，起辇谷是一处神圣而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威震四海，人们称他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关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众说纷纭。

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10万大军进攻西夏。1227年正月，蒙古军队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同年六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去避

暑。西夏首都中兴府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粮食也没有了，西夏国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投降。然而就在西夏投降后，成吉思汗猝死在六盘山。

据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下诏修改的《元史》记载："二十二年（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但是，这些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不知成吉思汗到底是怎么死的，于是世人纷纷猜测。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后世大概有五种说法，且多与西夏有关。

一是"坠马说"。这一说法记载于《元史》中，是几种说法中最正统，也是最为多数人所知晓的。1226年秋天，成吉思汗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骑的红沙马被一匹野马惊着了，导致没有防备的成吉思汗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于是也遂便询问随从的将领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但是成吉思汗却十分要强，害怕被西夏人笑话。加之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他，成吉思汗听后，更加不愿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终病死了。

二是"中毒说"。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和元朝有过17年的交往。在其游记日记中这样记叙：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是民间对"中毒"却有另一种说法：成吉思汗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在陪寝时下毒致死的。

三是"被刺说"。这种说法与上面被俘西夏王妃有关。说这位王妃，在陪寝的时候，乘成吉思汗放松警惕，刺死了他。这一说法源于清朝康熙元年的《蒙古源流》。此书是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乾隆命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钦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这一说法也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四是"被咬掉生殖器说"。这种说法，既未见于正史之中，野史也没有相关记述，但却在外蒙古人中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也与西夏王妃有关。据说，这位王妃表面上虽臣服于成吉思汗，内心却不忘国仇家恨、不甘受辱。在陪寝当晚，借行房之机，将成吉思汗的阴茎咬掉了。一个65岁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

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

这种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仔细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成吉思汗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备条件的，陪寝时乃裸体，何处藏带凶器和毒药？即使带有凶器和毒药，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掉男人的要害处。

五是“雷击说”。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文章中透露，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的。“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因为这原因，蒙古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比之上者较为离谱。

那么，成吉思汗死在西夏灵州的军中，可是陵墓为什么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为了满足他生前的愿望。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看见这里水草美丽、鸟鸣鹿奔，不禁心旷神怡，连马鞭不小心掉落都没发觉，他的部下把鞭捡起想要交给成吉思汗，然而成吉思汗却说：“这里是强大王朝存在的地方，树木花草茂盛的地方，把马鞭就放在这儿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按照马鞭放的方向，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

不幸的是，成吉思汗却在即将攻克西夏都城的紧要关头，为了不动摇军心，骗取西夏早日投降，他留下遗嘱“秘不发丧”的命令，由少数亲信将灵柩秘密运到传说中被成吉思汗所赞美过的地方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亲信们在长途中见人杀人、见畜杀畜，一路上不知为此而残害了多少生灵。到了地点后把灵柩深埋，并将墓穴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还让群马在墓地上任意践踏，等第二年青草长起，与茫茫大草原融为一体，再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时才将军队全部撤走。他们为了让亲族想在祭奠他时找到埋葬地，就牵来一只驼羔，当着母骆驼的面将驼羔杀死并将血洒在墓地。骆驼有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每逢祭祀时，人们把那只母骆驼牵来，它徘徊哀鸣的地方就是陵墓的所在地。

据波斯人志费尼记载，墓中随葬品不乏金银和马匹，还有40多名盛装美女随葬。又据载，成古思汗的墓地后来成为一大片树林，即使是那里的老守林人，也无法找到确切的埋葬地点。

同时，这里是蒙古人极为尊崇的“大禁地”（蒙语称为“也可·忽鲁黑”），由禁卫骑兵1000户巡逻守护，在“大禁地”的外围有用无数支

箭杆插成的矮墙，严禁任何人靠近，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成吉思汗以后，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及拖雷等人，也相继埋葬在起辇谷。由于实行秘葬，至今考古界尚未发现蒙古帝王或贵族的墓茔，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可以说，成吉思汗去世780多年来，寻找成吉思汗陵的活动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不少寻找成吉思汗陵者，就是冲传说或推测之中的财宝而来。尤其近十几年来，匈牙利、波兰、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土耳其、韩国等十多个国家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竞相开展了寻找成吉思汗陵的工作，为的也就是这个从未面世的神秘宝藏。

事实上，陵墓中是否藏有宝藏，文献上并没有记载。是陵墓中真的没有宝藏，还是元朝统治者为了祖先的英灵不被打扰，故而在文献上没有留下丝毫的记载？史书中没有任何的相关记载，又怎会产生这样的传言呢？据说是和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件事是说有个波斯人写了一本叫做《世界征服者史》的书，他在上面提到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他的第一道令便是按照习俗为成吉思汗的英灵散发食物三天，并从氏族中挑选40名美女，她们穿着用黄金和宝石装饰起来的贵重衣服，与一些骏马一齐作为祭品。另外一件事就是西方的一个人看到忽必烈的弟弟死的时候，陪葬了大量珠宝、黄金等。西方的考古学者和探险家们据此推测，成吉思汗的墓葬中肯定随葬了更多的宝物。成吉思汗的陵墓是否存在鲜为人知的宝藏，都有哪些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成吉思汗墓葬中是否存在大量的稀世珍宝，目前看来这虽然只是个传言，但也足够叫那些有心人心痒痒了，因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各国，掠夺而来的珍宝大多都不知去向，所以，人们一直相信大量的宝藏就在成吉思汗的陵墓中。故而一次次考察，即便是无功而返也丝毫没有影响各国考察团对成吉思汗墓葬的兴趣，各国考察团依然前仆后继地奔赴草原。在众多的考察团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富翁穆里·克拉维兹的探险小组了。

2000年8月，美国的探险家、亿万富翁穆里·克拉维兹率领他的由科学家、考古教授和翻译组成的考古探险特别小组，信心十足地来到乌兰巴托寻找成吉思汗陵墓。2001年8月16日，探险队由此向外界宣布“找到了成吉思汗的陵墓”，墓地在乌兰巴托东北300多公里处的森林中，可惜后来被证明是匈奴墓。2002年4月，这个考古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北322公里处的肯特省巴士利特（音译）镇发现了一个由城墙环绕的墓地。这个古墓被称为“非常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陵墓”。

奇怪的事紧接着就发生了。4个月后，考古队突然宣布放弃挖掘行动并撤出蒙古。眼看胜利的果实就要收获，是什么原因让这位痴迷成吉思汗的探险家突然间放弃了多年的梦想？是什么力量迫使他草草收兵，并且如此慌张地撤出蒙古？据说是考古队受到了蒙古政府和民间的阻止。因为按照蒙古的传统观念，挖掘土地会带来坏运气，而触动祖先的坟墓会毁灭他的灵魂。所以，当蒙古国民众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强烈反对挖掘，蒙古国政府也勒令考古队停止挖掘并撤出那个地区。因此主要投资者克拉维兹不得不宣布停止考察活动。

真的是这样吗？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美国考古队开始发掘后，陵墓的墙壁中忽然涌出许多毒蛇，咬伤了一些工作人员，考古工作被迫搁浅，并且他们停放在山边的车辆也无缘无故地从山坡上滑落，考古队员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车无缘无故滑落是人为故意造成的，还是不可知的力量在起作用？奇怪的事相继发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因果循环？莫非真是成吉思汗显灵，逼退了美国考古队？

说天地有灵气，或许，其中还真有些说不清楚的缘由。

现存的成吉思汗陵园在伊金霍洛旗，是一个衣冠冢，号称“八白室”。八白室，顾名思义，是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的，建筑雄伟，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风格。八白室原来是八座白色的毡帐，是后来的蒙古人为了祭祀成吉思汗而为他建立的一座马背上的陵园。毡帐里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像，象征着墓地。这样的陵园既便于迁移，也便于祭祀，很符合游牧民族到处迁徙的特点。八白室迁移多处，最后迁到鄂尔多斯高原的伊金霍洛旗，里面有他的衣服、家谱，据说成吉思汗逝世前的最后一口气的灵魂也在灵塔里。但成吉思汗死后的遗骨究竟葬于何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也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穿山为陵很牢固

在南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传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出现了“迷魂阵”，就是南京的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此说法史书有记载，朱国桢的《皇明大政记》称，朱元璋下葬那天“而发引，各门下葬”。既然朱元璋生前都为自己的归宿找好了地方，选择钟山山阳的地块筑陵，谁不知道他葬在那里？为何要摆个“迷魂阵”？莫非朱元璋没有葬在孝陵，这只是他的一个虚冢？这个谜团，一直到了600多年后的一天，才有了新的发现。

2000年前夕，一座沉睡了600多年的石龟，抖掉覆盖在身上的泥土，以中华第一巨龟的雄姿破土而出。石龟是在美龄宫东侧的树林里被发现的，当时石龟与石碑身处二处，相隔数米，几乎被泥土与灌木丛湮没。据文物部门推测，这石龟的来历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该物就是制作明孝陵四方城中的“神功圣德碑”时留下的废品，因雕刻不满意而废弃不用。拿该物与现今四方城中的石龟相比，二者在雕刻手法上有所差异，前者粗犷而后者精细。

另外一种猜测，该物可能是原先为明孝陵制作的“无字碑”，与现今四方城内的“神功圣德碑”存在着对应关系。墓前立双碑，一碑有字，一碑无字，这种规制始于唐代帝陵，如唐太宗李世民陵前就立有双碑。建于明朝初年的凤阳明皇陵，是朱元璋为其父所建衣冠冢，墓道上有东西两座碑亭，西边碑亭竖立着朱元璋书写的皇陵碑，东边碑亭即是“无字碑”。朱元璋在为自己修建陵墓时对前朝帝陵规制作了一番改革，开启了新一代的帝陵形制，包括取消陵前双碑的形式。至此以后，北京明十三陵以及清代诸帝陵均仅一碑，有的有字，有的无字。

通过考古人员的多方勘察，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朱元璋就葬在独龙阜下数十米处，而且这座地下宫殿保存完好，排除了过去流传的地宫被盗之说。看来，朱元璋的孝陵被盗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事实上，600多年来，有很多盗墓者光顾了明孝陵，清嘉庆年间，更是曾有百余人乘夜色集体盗掘明孝陵，但是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明孝陵被盗过但仍然保存完好。是什么使得明孝陵能在数百年间屡屡躲过贼手？莫非是明太祖神灵大显，吓跑了那些贼子？还是地宫里暗藏了些杀人于无形的机关，挡住了盗匪的入侵？根据曾主持明孝陵申遗工作的南京大学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所教授贺云翱的深入研究，认为明孝陵之所以至今保存完好，是明孝陵的特殊防盗措施、历史机缘以及地理位置共同决定的。

经过勘探，明孝陵所在的独龙阜原本是一座坚固的石头山。有些皇陵是从上往下扒开一个深穴，建好后再封起来，但明孝陵却是横向凿入山体，从内部掏空建玄宫。这种横穴式的方法虽然工程浩大，但是十分坚固。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古代盗墓贼从顶部向下打盗洞根本不可能成功。在这样的设计下，墓道成了盗墓贼进入墓室的唯一通道。当时为了防止盗墓贼的光顾，他们必须隐藏好墓道，而为了隐藏墓道，修建明孝陵的工匠更是费尽心机。孝陵的墓道并没有按照常规进行设计，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正中间，而是偏向了东南一边，这种一反常规的设计使得许多盗墓贼无功而返。

除此之外，明孝陵宝顶高高的封土堆下铺设了厚厚一层圆润的鹅卵石。一方面便于雨水迅速渗透到宝顶排水设施中流出去，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样也是重要的防盗措施。这类似于古代一种流沙防盗法，当盗墓贼挖开一个洞时，鹅卵石就会从四面八方滚落下来把洞填满。另外，离南京城近也是明孝陵躲过贼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城里立即会知道，这使得盗掘活动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

明孝陵采用了三大有效的盗墓措施，也收到了非常好的防盗效果，但是如果遇上像东陵大盗孙殿英那样握有重兵和炸药的军阀，恐怕也难逃一劫。幸运的是，历史机缘却让明孝陵逃脱了这些大贼的魔爪。虽然明代以后南京城屡经战火，但每个新政权无一例外地对明孝陵加以保护。清朝建立后，通过保护明孝陵，有效消除了江南地区的抗清思想。甚至康、乾二帝每次下江南必定要来明孝陵祭拜，康熙还在陵前立了“治隆唐宋”的石碑。洪秀全、孙中山在南京成立政权后的第一件事也是祭拜明孝陵，以示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决心。或许，这一切，真的冥冥中自有定数。

七次遭盗仍未遂

钟祥，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位于湖北省中部、江汉平原北端，是中国楚文化发祥地之一。明世宗嘉靖皇帝曾御赐县名为“钟祥”，取“祥瑞钟聚”之意。历史上，曾先后有6个帝王在此“封王”，故钟祥还有着“帝王之乡”的称誉。

明太祖朱元璋有26个儿子，一个夭折，一个做太子，其他24个全部封了做王。郢靖王朱栋，是朱元璋的第23子，靖是他死后分封的谥号。

郢靖王生于明洪武戊辰年，即1388年。1391年册封为郢王，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冬月初一病逝，享年27岁。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月初六葬于宝鹤山之原（今钟祥市九里回族乡三岔河村四组皇城湾）。

明代先后有郢靖王、兴献王、梁庄王三位明代藩王分封在此，不过作为朱元璋23子的郢靖王还是分封在钟祥的第一位明代藩王。他与荆州的襄献王、辽简王以及武汉的楚昭王同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每临皇帝死去，不惜用大量的财力、人力为其建造巨大的陵墓。这些陵墓是中国封建时期对灵

魂信仰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同时，这种动用国家力量建造的陵墓，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和营造工艺水平，是中国丧葬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建筑典范。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元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吸取了以前历朝历代厚葬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朱元璋力主薄葬，反对厚葬，他曾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因此，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厚葬，到了明朝有了很大的收敛。已出土的明朝其他亲王墓都没有郢靖王墓的规模大、档次高。而且明代等级森严，郢靖王不可能擅自将自己的墓档次提高，那么其原因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郢靖王墓建筑规模宏大，完全符合明代早期亲王陵寝规制。据《兴都志》记载：郢靖王墓，在兴都城南20里清平村宝鹤山，妃郭氏合葬。享殿7间、东西厢10间、神厨5间、宰牲房3间、鼓楼1座、碑亭1座、棂星门3间、券门3间、红墙周回127丈、内官住宅1所。正德十一年（1516年）殿宇圮（pǐ）坏，朱祐杬命官修理。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嘉靖皇帝赐修葺，寝阁帷帐焕然一新。

1937年遭到侵华日军破坏，地面建筑损毁殆尽，现茔园仅存墓冢及部分建筑遗迹。此后，此处又历经战乱，然而靖王墓除地面建筑受损以外基本保持完好。

自1999年以来，文物犯罪分子利欲熏心，多次对郢靖王墓实施疯狂炸盗，盗洞最深达8米，其中两次炸穿地宫券顶，受损严重，墓室内文物保护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但是盗墓数次未遂。

2005年，广西桂林人黄某看了《南国早报》介绍钟祥古墓众多，梁庄王墓发掘出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文章之后，顿起盗掘之心。随后，黄某伙同龙某、潘某等6人于3月初窜至钟祥郢中城区，栖身于长坑街一旅馆。他们以参观为名，在市博物馆里了解到有关情况后，确定明显陵和郢靖王墓为盗掘目标。经踩点，他们发现明显陵无从下手，便将目标锁定为郢靖王墓。6名盗墓贼备齐工具，乘夜幕盗掘郢靖王墓，疯狂挖掘3米多深。

次日凌晨，附近村民发现古墓旁有很多湿土，遂向所在地的九里派出所报警。该所民警分析盗墓贼晚上还要来挖，便在各个路口布控。当晚8时许，警方当场将6名盗墓贼中的4人抓获，另2人仓皇逃走，不久之后也落入法网。

郢靖王墓遭多次盗掘，虽幸免于被盗，但是黄某的盗窃活动受到

了各级政府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地下文物免受盗掘，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钟祥郢靖王墓实地考察，一致认为：郢靖王墓位于偏僻农村，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加之当前文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盗墓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决定采取“抢救性发掘”的保护措施。

2005年4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对郢靖王墓进行抢救发掘的意见函》，同意组织对郢靖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5年11月28日正式开始发掘。

2005年12月26日，考古专家从墓地取出墓志铭。这是一块合墓志铭，由“盖”“身”两部分扣合而成，上面字迹清晰，四周都镌刻有龙凤纹，字迹上有朱砂。墓志铭曰：王，讳栋，太祖高皇帝第二十三子也……十二年十一月初一王疾逝，享年二十有七。妃郭氏，营国威襄公郭英之女。皇帝念骨肉之亲，不胜痛悼，辍视朝十有五日，诏有司治丧葬如礼，赐谥曰靖，遣使驰祭。以永乐十三年四月初六，葬于宝鹤山之原……由此证明，此墓的确是郢靖王朱栋的墓。

12月28日，郢靖王墓门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场考古专家无不感叹这是明代藩王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天后，王墓地宫正式开启了，这个神秘的王墓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古老的传说与眼前的现实神奇地吻合了。

墓内的棺木和尸体已经腐烂。但是从剩下的牙齿及骨头来看，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据《兴都志》记载，郢靖王朱栋死后，他的妃子郭氏痛哭说：“贤王舍我而去，我寡而无子，尚谁恃邪？念自幼嫔贤王，待如宾友，今安忍独生乎！”乃整妆对镜，自写其容，付谨密宫人掌之。遂自尽。朝廷闻而贤之，恤典加厚，将两人合葬在宝鹤山。

郢靖王墓的后室是王、妃合葬地。这里有一张大棺床，棺床上已经看不见棺木的模样，只是堆积着一些物品。而且，因为墓室中曾进过水，所有陪葬品摆放的位置都发生了改变。专家介绍说，两座棺木应该放置在棺床上，棺木的头部均朝着北部，郢靖王的棺木在东边，王妃的棺木在西边。后室里发现了两个青花瓷瓶，一个刻着龙纹，一个刻着凤纹。按当时的风俗，这两个瓷瓶应该是魂瓶，龙纹瓶摆放在郢靖王的头部，凤纹瓶摆放在王妃的头部，是给去世的郢靖王和王妃收魂用的。从现场情况来看，两个瓷瓶虽然进过水，但保存得相当好，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属于珍贵文物。在棺床上，还发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粉盒，上面有铭文，记载着制造年份，专家推测这有可能是王妃生前的用品。

在墓室的左右耳室里有6副腐朽的棺材，左耳室和右耳室各有3

副，棺木的头部均向着中室。殉葬者的尸体已经腐烂，骨头已经钙化，只留下一个殉葬者的头骨和牙齿，据此判断，殉葬者的年龄都很小。在耳室里，专家们还发现了6个瓷瓶和一些金银器，金银器均为殉葬者所佩戴的装饰品，主要有金簪、银簪、银花和金耳环，由此看出殉葬者是6位女子。在殉葬者的头骨下面还发现了金珠和玛瑙，应该是入葬时含在口中的。

据现场的一位专家说，王墓中有殉葬者，本已少见，而郢靖王墓中殉葬人数之多，更为罕见。6位殉葬者早已风化，只发现牙齿和饰品，他们的身份、年龄，他们为何成了殉葬品，这在史书中均无记载。遥想当年，因郢靖王早逝，王室一定发生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身份显赫的王子如此早就撒手人寰，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考古发掘现场的领队院文清教授介绍，朱栋之死可能与炼丹吃药有关。要知道，当时炼丹吃药比较盛行，特别是达官贵族为了练就长生不老之躯而沉湎于此。据史料记载，他的后辈明光宗朱常洛也是因吃丹药而莫名其妙死去的。

2006年1月5日，墓室清理结束，这座在地下沉睡了近600年的王室墓穴，终于真实地展现在考古专家们面前，恢宏的墓室、精美的文物，备受世人关注……

清孝陵未被盗掘

虽然清东陵遭到了毁灭性的盗掘，但是有一座陵墓却幸免于难，这就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的陵墓。

顺治，满族姓名是爱新觉罗·福临，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正月三十戌时生于盛京皇宫之永福宫，生母为次西宫——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承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1644年改元顺治，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即位于武英殿。福临是入关的清朝的第一位皇帝。14岁（1651年）亲政，死时年仅24岁。关于顺治之死，广为流传的是出家圆寂之说。

历史上喜爱佛教、宣扬佛教的皇帝很多，可是真正愿意丢开皇帝不做而返身皈依佛门的恐怕就凤毛麟角了。而清代顺治皇帝就是传说中真正皈依佛门之人。这件事究竟有几分真实可信的地方，今人也不

得而知。

据民间传说，顺治是因为受到精神打击，看破红尘，遂抛去帝位，遁入五台山削发为僧。在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1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

顺治出于对董鄂氏的偏爱，打算将皇位传给董鄂氏之子，可不幸此儿出生数月就夭折了。董鄂氏大受打击，同时加上皇太后雪上加霜的折磨，所以于顺治十七年八月抑郁而死，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于是抛去帝位，削发为僧。《清史演义》、《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诗人吴梅村也有暗示顺治帝出家的诗句。还有传说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曾对木降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但是较多的研究者认为，顺治帝并未出家，而是病死宫中。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四，朝廷曾正式向文武群臣宣布皇帝患了天花病。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载，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症势将不起。"命王熙赶写遗诏。初五，朝廷大赦天下并传令民间不许炒豆、点灯及泼水。但到初七深夜，顺治

帝还是驾崩了。

顺治帝庙号世祖。骨灰葬孝陵，与他合葬的，还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深得顺治宠爱的董鄂妃。孝陵位居陵区的主轴线上，后世四座帝陵依次分列左右，深刻体现了“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

顺治帝采取火化的方式入葬，这在清东陵诸帝中是绝无仅有的。据《五灯全书·茆溪传》记载，顺治皇帝是经茆溪森禅师举火焚化的。顺治皇帝笃信佛教，他死后自然希望按佛门规矩处理后事。另外，他也遵循了故土先祖之习惯，满洲塞外风俗就是火化。顺治皇帝死时，满族入关才十几年，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尚留用如初，皇帝火化并不以为讳。由此可见，顺治帝信佛但未出家，不过最终依照佛门规矩和自己民族的风俗，采用了火化的方式。

很多人认为顺治的孝陵除了三个骨灰坛外，几乎是一座空陵，这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所建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要过多的装饰，不要埋藏金玉宝器这样的文字，所以人们都传说孝陵是空墓，里面没有珠宝金银。可能这些事传入盗墓贼的耳中，所以孝陵地宫洞口已被人打进3米，还没有打通，这大概是盗墓贼灰心胜过侥幸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顺治的孝陵逃过了孙殿英之流的魔掌，成为东陵内连奶娘、侍卫墓在内，唯一没有被盗的陵墓。

第二十四章　让盗墓者垂涎不已的帝王陵墓

举国之力修秦陵

中国的帝王，生前生活奢靡，死后亦不愿节俭，把陵墓修葺得比生前住的宫殿还要豪华。厚葬成了中国丧葬文化的最典型特征。既然陵墓也有皇宫一样多的宝贝，而皇宫里的宝不敢抢也抢不了，那么盗墓贼自然盯上了这些满是宝贝的墓地，即使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危险也在所不惜。那么，众多帝王陵墓中，哪几座最值得盗墓者去冒险呢？换句话说，中国陪葬品最丰厚的帝王墓是哪几座？根据民间和史料记载来说，陪葬品最丰的有这么三座帝王陵墓：秦陵、茂陵、乾陵。

当年秦陵“坟高五十余丈”，折算成现代的高度为115米左右。秦始皇的地宫上面用“纹石”筑顶，堵塞了地下的泉流；下面涂有“丹漆”，起到防潮的作用。墓中建有宫殿及百官的位次。整个陵墓内灌注了水银，就像江河大海围绕一般，用机械动力使之川流不息。另外，上面还制造了日月天体的照明物……简直是一个被搬入地下的人间繁华世界的缩影。

像秦始皇陵墓这么宏大的规模，到底花费了帝国多少的人力、物力呢？

首先，所用石料的数量就无比惊人。数十万计的劳工从渭河北面的山上把石料运到打石场，而打石场的面积就有75万平方米。史书上记载当时的场面说，上万只铁锤凿击石材的响声，惊天动地。据说，当时运石料的人马使渭河都断流了。修建陵墓的土方也用量巨大。仅秦陵南面的一条叫“五陵”的护陵堤就长3500米，宽40米，高6～7米，土方量达100万立方米。这么大的土方量，从哪里取土呢？仅“鱼池”取土坑，周围延伸就长达4里，可见皇陵用土之巨。

再说所用的人力。秦始皇即位起开工修建陵墓，这个巨大的工

程，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在2000多年前，确实挑战了人类建筑力的极限。

关于秦陵陪葬品的数量，从秦陵的占地面积来看，其珍宝的价值和数量无法估量。《汉书》等史书也记载，“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一副棺椁，就这么值钱，那加上其他的文物，其价值不言而喻。秦陵兵马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样的一座地下宝库，自然会引来盗墓者光顾。虽然后世有众多的盗墓者慕名前来，但秦陵依然如故，我们若想知道秦陵的地宫宝藏价值几何，也许只能得到秦陵的发掘之日吧。

武帝茂陵陪葬多

位于关中腹地的咸阳，是西汉皇陵的主要集结地。西汉王朝，历经11位皇帝，建陵园11座，有9座位于咸阳塬上，其中最为显贵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故将其称为“五陵原”。古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记述，即指当年居住在这些陵邑县中的纨绔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的事情。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浩大的皇帝陵，只有秦始皇的骊山墓方能与之相比。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古代历史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帝王。在他54年的统治历程中，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他统治下的西汉帝国比罗马帝国还要强盛，成为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汉武帝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因此，这位杰出的帝王自然对自己的陵墓非常重视，动用了数十万人历经数十年才全部完工，用来显示出他一生的丰功伟绩。

汉武帝临终前对死后之事都作了安排。首先借故令太子母钩弋夫人自杀，以消除母后干涉朝政的隐患。其次，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上官杰为左将军。这四位大臣，谨慎、忠诚、精明能干，都是经过长期观察考验，足以寄托重任的心腹之人。历史证明，汉武帝临终的用人安排是妥当的，有“知人善任之英明”。

前87年，汉武帝寿终于长安五柞宫，入殓于未央宫前殿。死后第18天葬于茂陵。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的帝王，在营造自己的地下帝国时想必也一定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武帝倒也真是长寿，以至于连最初营造陵墓的工匠们都死了，他还好好地活着。

那么汉武帝为自己营建陵墓花了多长的时间呢？这要从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前139年）开始算，工程最后完成在他死的那年（前87年），前后持续了53年。

史书记载，茂陵开始筹建时，因工程巨大，施工人员和监管官吏众多，工地周围很快成为繁华闹市。前138年，茂陵工程进行到第二个年头的时候，汉武帝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成立茂陵邑。他让一些汉初的功臣贵族以及富豪搬迁到茂陵邑，茂陵邑与茂陵相隔数里，当时搬迁定居的文武高官、富豪、儒士有6万多户。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等都先后携家迁到茂陵邑定居。

这座宏伟的帝王陵墓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超乎想象。《晋书·索綝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还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

耗费如此人力物力的茂陵，到底规模如何呢？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这座巨大封丘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米。据《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上述与今测量数字基本相符。总占地面积计为56878.25平方米，封土体积848592.92立方米。陵园四周呈方形，平顶，上小下大，形如覆斗，显得庄严稳重。

茂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西汉其他帝陵。西汉帝陵一般高在30米左右，只有汉武帝的茂陵超出了当时的礼制规定。刘邦在世时定了汉陵制，"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但刘彻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丰功伟绩"比刘邦还大，所以营建了"唯茂陵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的陵墓。

当年的茂陵除了金字塔状的大型封土之外，在它的周围还有华美壮丽的陵阙、殿阁、房舍等。茂陵分茂陵园和茂陵园区，也叫内城和外城，内城里宫殿和堂馆一应俱全，而茂陵园区内包括陪葬墓，方圆可达数十平方公里。

在茂陵东南350米处还有一座名叫白鹤馆的建筑。白鹤馆是寝殿的附属建筑，以供墓主游乐，现在当地人都叫它白鹤冢，是一个不规

整的长方形土台，东西约为53米，南北40米，高5米，附近遍布汉代砖瓦残块以及红烧土。陵园东面是武帝的原庙，称“龙渊宫”，寝殿与原庙间有一条规整的通道。这个通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想知道这条通道的作用，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的祭祀活动吧。当时人们祭祀的时候，把先帝的衣冠由寝殿迎出，经此道送进庙中，接受百官谒拜，祭奠后又经此道将衣冠送回寝殿安放，可见此道的功能非同一般。

茂陵在建筑方面有许多奇特之处，例如在距离白鹤馆约500米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沟渠，长500米，宽10米，深5米。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古代长安地区有多雨的季节，如果不有效地将积水排走，那么陵墓很有可能坍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工程设计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水渠。一方面，多雨季节水可蓄于渠中，避免水害的侵袭；另一方面，干旱季节渠水又可用以浇灌园中林木，满足宫人用水的需要，一举两得，足见当时设计者的才能和智慧。此外，茂陵周围还建有供墓主游乐的“驰逐走马馆”和“西园”，不过现在地面上已经没有留下任何遗迹。

而今茂陵封土周围仅存留下夯土城的遗迹。考古查明陵园平面几乎为方形，东西长430米，南北宽414米。陵园四面中央各辟有一门，各门距陵墓封土均为100米左右。门外置双阙，每对间距为12米至16米。陵园附近修建了寝园，构成富丽堂皇的庙堂宫殿。

1975年，陕西考古人员在陵墓四周发掘出大量西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其中有虎纹和玄武纹条砖、丹凤纹和龙骨纹空心画像砖、大型青玉兽纹铺首和琉璃壁等，还出土了一块刻有12个字的完整瓦当。经考古学家分析判断，发现建筑材料之处就是当年的寝殿和便殿的所在地。

茂陵在汉武帝死后是否就安静下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汉武帝为了不让自己死后寂寞，还交代后来的皇帝特意制定了一套制度来加强茂陵陵园的管理，设有“陵令”、“寝庙令”、“饲官”、“园长”、“门吏”等官僚机构；再由于武帝生前好色，故而在他死了以后，又将大批的宫女安置在陵园内，使得侍奉陵园的人数竟然多达5000人。这些人居住在陵园中，侍奉汉武帝“灵魂”起居：早晨安排梳理洗漱的器具，白天则仍像汉武帝在世时一样准备三餐膳食，晚上还准备好睡觉的卧具。

陵园封土堆下的主要建筑是地宫，这也是每个瞻仰茂陵的人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他们都带着同样的问题来——地宫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与所有帝王的地宫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地宫中都有哪些宝贝以及这些宝贝还在不在？……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

案，必须要了解茂陵的地宫是谁修的，又是怎么修的？

汉武帝即位不久便任命张汤为茂陵尉，专门负责监修。张汤恪尽职守，严格按照汉武帝的要求进行地宫建设。他命令修陵墓的民工挖出40多米深的大坑，墓室高度也有6米多，四周每边长达8米。这里疑问又出来了：需要多少人才能挖这么深一个大坑？从坑中挖出来的泥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全部回填是不可能的，因为墓室是中空的，这部分泥土是多余的，且量还比较大，再加上我们在茂陵周围没有看到其他土丘，那每个人都会问：剩余的泥土都运到哪里去了呢？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要了解汉代挖泥土的工具都有哪些。从目前的资料了解，我们知道汉代是通过两种方式来挖泥土：一种采用“链斗”形状的设备来运土，就是在墓穴的顶部安装一个人工脚踏装置，利用诸如现在自行车链条驱动的原理（唯一不同的是在链条结上安装一个装泥土的木质斗），将土从深达数十米的地方运出来；另外一种方法是从墓穴的旁边开一个豁口，然后从这个豁口往外运泥土，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墓穴工程的早期，即在二三十米深的地方可以用此方法，当超过此深度的时候，只能采用第一种方法了。至于这些泥土的处理问题，古人也想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采用水冲法。具体办法是：从比陵墓地势高的某条河流挖一条渠道。将这条河流的水引过来，然后将多余的泥土倒入这条渠道。由于水的惯性，就可以将这些泥土运往很远的地方，而且还不会堆积到一个地方，这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考古工作者在茂陵沿途十几公里的地方都能找到与茂陵地下几十米深处土壤性质相同的土壤，且都有冲积的痕迹，可见所说的这种方法是真实的。

相对于庞大的地面建筑，茂陵的核心建筑地宫规模之宏大更是令人瞠目。据《汉旧仪》载：地宫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每边长二丈，墓室四面各设有能通过六匹马驾之车的墓道。各墓道门还埋设暗剑、伏弩等机关以防盗。这些机关的设置极其隐蔽。文献记载说：茂陵建成后不久，有个守陵的士兵想偷盗陵墓内的珍品，结果他连第一道墓门都没有过去，就被乱箭射死在墓门边上。可见整个陵墓机关设置的严密。

墓室内放置有梓棺。因为汉时，帝王的棺木一般用梓木制作，是置放皇帝尸体的地方，所以又称“梓宫”。汉武帝跟汉朝其他皇帝一样，也采用梓棺。汉武帝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置于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个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门”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五棺所用木料采用楸、梓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并设有便房和黄肠题凑的建筑，便房的作用

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简单地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

史载，梓棺内武帝口含玉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都雕刻着蛟龙鸾凤龟麟的图案，当时的人称之为“蛟龙玉匣”。相传，汉武帝将入地宫的时候，梓棺自动发出巨响，放出异常的芳香；羡门关闭后，墓道大雾弥漫，门柱也崩坏了，过了几个月墓道内的烟雾才消散。又传说，武帝入葬不久便现原形，对茂陵令薛平说：“我虽然死了，但仍然是你们的君主，你为什么让你的士兵在我的陵上磨刀剑呢？”薛平惊魂未定，汉武帝已经没有踪影了。薛平连忙询问左右，才知道陵墓前方有一块大方石，士兵也确实在此磨过刀剑。可怜磨剑者竟然因此无辜被杀，可见古代皇权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茂陵建筑宏伟，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称“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瘞臧之”。相传武帝的金镂玉衣、玉箱、玉杖等一并埋在墓中。后来有文字记载，说由于汉武帝在位时间长，到后期，陵墓内已经没有地方再放后来搜罗的稀世珍宝了。陵墓四周还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20多人的墓葬与之相伴。茂陵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虽然茂陵尚未正式发掘，但人们纷纷猜测，在事死如生、风行厚葬的汉代，这位君王的陵墓地宫之中必定是充盈着各种奇珍异宝。也难怪人们这样猜测，在许多史料中都有对茂陵地宫极尽奢华的描述。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所谓“珠襦玉匣”，就是金缕玉衣。因身份地位的不同，金缕玉衣连缀玉片所用缕丝的材质也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差别。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所以对其制作工艺的要求非常严格。

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制作玉衣时，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程序，再把玉片按照人体的不同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大的有9平方厘米，小的还不到1平方厘米。然后用金线穿过这些玉片四角的小孔，将所有玉片连缀在一起。按照2000多

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就拿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来说，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享玉片2498片，金丝1100克；其妻窦绾的玉衣比较短小，也用了2160片玉片，金丝700克。刘胜的一件玉衣，就是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的，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那么，汉代的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以玉衣做殓服呢？原来历代帝王都渴望长生不老、灵魂不灭，这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帝王们生前就费尽心机寻找长生不老药，或者命人炼制丹丸用以养生。即使死了，他们也不放弃这种求生的欲望，希望继续维持死前的生活。依古人的观点，人死之后会魂魄分离，魂气升天、形魄归地。而怎样才能使魂气升天，又要形魄不腐散呢？只有用玉。他们认为玉石是天地之精，有防腐功能，能使尸体不朽，玉塞九窍，可以使人气长存。

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汉代帝陵比其他时期的皇陵招来的盗墓贼都要多，帝王贵族不但达不到尸体不腐的目的，就连骨架都被人焚为灰烬。直到222年，魏文帝曹丕认为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于是下令废除了以玉衣随葬的制度，有关金缕玉衣的历史才算是结束了。

最大最牢属乾陵

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渭北山地，蕴藏着自然界鬼斧神工造就的山川灵秀。在这群优美峻秀、巍峨峭拔的锥状山峰中，分布着数十座中国汉唐帝王的山陵，给三百里的渭北山塬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其中，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因埋葬着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人而蜚声中外。唐代其他皇帝的陵寝和乾陵一起围绕京师长安成扇形。

从古都西安驱车，沿312国道西行约70公里进入乾县境内时，极目西北方向，就会看见苍茫烟云衬托着三座挺拔峻峭的山峰，呈北高南低之势，耸立于茫茫苍穹之下，远望就像一位新浴之后的少妇披着长发，头北足南，仰面躺在蓝天白云之下，这就是梁山，是有“历代诸皇陵之冠”和“睡美人”之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地——乾陵。

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

帝的合葬陵。里面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文物储藏最丰富而且没有被盗的帝王陵墓，被称为埋在地下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乾陵修建于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气势雄伟壮观。乾陵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梁山是圆锥形石灰岩山体，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1047.9米，乾陵就在北峰之上。梁山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乳峰”。据史书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墙，四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00多级台阶，其台阶高差为80多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乾陵”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唐高宗乾陵”碑，高2米，为清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立于清乾隆年间。此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上面有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与则天皇帝合葬之墓”等字。另外有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61尊。在中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是从乾陵开始才有了固定制度的，一直延袭到清代，历代大同小异。

乾陵陪葬墓共计17座。计有太子墓二（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王墓三（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彬王李守礼）、公主墓四（义阳公主、新都公主、安兴公主、永泰公主）、大臣墓八（王及善、薛元超、杨再思、刘审礼、豆卢钦望、刘仁轨、李谨行、高侃）。1960～1971年已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中书令薛元超、燕国公李谨行5座陪葬墓，出土珍贵文物4300多件。其中有100多幅绚烂多彩的墓室壁画，堪称中国古代瑰丽奇绝的艺术画廊，《马球图》、《客使图》、《观鸟捕蝉图》、《出猎图》、《仪仗图》等壁画，不仅对研究唐代绘画，而且对研究唐代建筑、服饰、风俗习惯、体育活动、宫廷生活、外事往来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乾陵的选址，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唐高宗登基不久，就派自己的舅父长孙无忌和专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为自己选择陵寝之地。一日，二人寻视到梁山上，只见此山三峰高耸，主峰直插天际。东隔乌水与九嵕山相望，西有漆水与娄敬山、岐山相连。乌、漆二水在山前相合抱，形成水垣，围住地中龙气。梁山乃是世间少有的一块“龙脉圣地”。

长孙无忌和李淳风选好陵址后，回京禀报高宗。袁天罡听说后，

极力反对。原来他曾为高祖选陵址到过梁山，深知此山风水的优劣之处。他对高宗说：“梁山从外表上看是一块风水宝地，但细看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梁山虽东西两面环水，能围住龙气，但与太宗龙脉隔断。假如百姓选祖茔于此，是可以兴盛三代，但作为帝王之山陵址，恐三代后江山有危。大唐龙脉从昆仑山分出一支过黄河，入关中，以岐山为首向东蔓延至九嵕山、金粟山、嵯峨山、尧山。今太宗已葬九嵕山，为龙首。陛下不可以后居前，况梁山又非龙首，而是周代龙脉之尾，尾气必衰，主陛下治国无力。二是梁山北峰居高，前有两峰似女乳状，整个山形远观似少妇平躺一般。陛下选陵于此，恐从此后为女人所控。三是梁山主峰直秀，属木格，南二峰圆利，属金格。三座山峰虽挺拔，但远看方平，为土相。金能克木，土能生金，整座山形龙气助金。地宫营主峰之下，主陛下必为金格之人所控。依臣愚见，若陵址定于此山，陛下日后必为女人所伤！”听了袁天罡一番宏论，高宗犹豫不决，遂退朝不议。早有亲信告知武氏，武氏听了十分高兴，她暗自思忖：小时候听父亲说，袁天罡说我将来能做女皇帝，看来要应验了。晚上，就给高宗吹了一阵枕边风，自然是褒扬长孙无忌，贬低袁天罡了。

第二天早朝时，高宗传出圣旨，定梁山为陵址。袁天罡一听，仰天叹曰：“代唐者，必武昭仪。”他怕将来受牵连，就辞官，出外云游去了。

陵址选好后，如何定名，群臣争论不休。有大臣建议：太宗山陵名曰昭陵，有昭示帝气之意，陛下陵就定名为承陵，以承接太宗恩泽。长孙无忌奏曰：“梁山位于长安西北，在八卦中属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帝。长安是陛下今世帝都，梁山自然为陛下万年寿域的天堂帝都，人间、天堂，天地合一，乾坤相合，主定陛下永世为帝王。依臣之见，就定名为乾陵吧！”高宗闻听十分高兴，遂定名为乾陵。长孙无忌哪里知道，袁天罡所言，是说梁山阴气弥漫，不能选作陵址。今定名为乾陵，岂不注定有女人为帝吗？后来的一切发展都应了袁天罡的预言。

传说毕竟是传说。据文献记载，弘道元年高宗死后，武则天遵照高宗“得还长安，死亦无憾”的遗愿，在关中渭北高原选择了吉地，命吏部尚书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韦泰真为将作大匠，动用兵士和民工20余万人，按照“因山为陵”的葬制，将梁山主峰作为陵冢，在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qú）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背石，驱以就功。”经过紧张施工，到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安葬时，主要工程竣工。埋葬高宗后乾陵营建工程继续进行。21年后，武则天

于神龙元年（705年）病故。在安葬武则天的问题上，朝廷发生了一番争论，中宗欲满足母后“归陵”的遗愿，大臣严善思极力反对。他说：“尊者先葬，卑者不宜动尊者而后葬入。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若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恐惊龙脉。臣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镌凿。动众加功，为害益深。望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以无知，合之何益。”宽厚仁慈的中宗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表示孝心，命人挖开乾陵埏道，启开墓门，于神龙二年五月将武则天合葬入乾陵玄宫。从此，乾陵成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一陵葬两帝的陵园。合葬武则天后，中宗、睿宗朝又将二太子、三王、四公主、八大臣等17人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园的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至睿宗朝初期才始告全部竣工。

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唐初，太宗李世民汲取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布置于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峦之上。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陵园仿唐都长安城的格局营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其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文献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经考古工作者勘查得知，陵园内城约为正方形，其南北墙各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60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乾陵历经1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乾陵地面的宏丽建筑已荡然无存。

《唐会要》记载，贞元十四年（798年），乾陵修葺时曾造屋378间。此后制置的120余件的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成为盛唐社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让人感受到它所体现的盛唐时代精神。从梁山南二峰的天然双阙起，往北依次对称排列。端立首位的是1对高达8米有余的八棱柱石华表，这是帝王陵墓的标志，其造型昭示着生命长存的理念和古代先民对人类生殖行为的崇拜。接着是1对昂首挺胸、浑圆壮观的石刻翼马，马身两翼雕以卷云纹，似有腾飞之势。翼马之北是1对优美的高浮雕鸵鸟，它是唐王朝同西域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象征。紧接鸵鸟的是5对配有驭手的石仗马和10对高4米左右的石翁仲（或称直阁将军）。传说翁仲姓阮，是秦朝镇守临洮的大将，

威震夷狄。秦始皇立翁仲像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的帝王以翁仲石像守卫陵园。翁仲之北是两通石碑，西边的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碑高6.30米，宽1.86米。碑文约5600余字，由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书丹，笔画初刻填以金屑，现今个别字的金迹尚在。东侧一通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碑身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左右两侧各4条。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两侧各线刻高4.12米的“升龙图”。碑座阳面线刻“狮马图”，长2.14米，宽0.66米。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为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无字碑唐时立，但不铭唐人一字，留下诸多待解之谜。

树碑立传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惯例，历代帝王更是不乏于此，然而武则天却是一个例外。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死后所树的碑上“一字不铭”，给世人留下了“无字碑”之谜，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世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一是“功德无量说”。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甚至于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自己的才能绝对高于高宗。她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在她的统治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她认为自己政绩斐然，彪炳史册，功绩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因而，武则天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盖过世。胡戟在《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中也曾指出“这座名闻于世的无字碑栉风沐雨，千余年来昂然挺立，它似乎象征着武则天对自己一生事业的信心，是有意留下空白，任凭世人评说吧！”

二是“左右为难说”。说武则天想到自己死后和高宗合葬，无论称呼自己是皇帝还是皇后，都很难落笔。若碑文刻上“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这让高宗情何以堪，而且李唐子孙定也不能接受；若刻“则天大圣皇后”，那是对自己的贬低，而且武则天也确实做了16年“大周”皇帝。所以她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一字不铭”，让后人评说吧。还有说武则天改朝后内心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

三是“自知之明说”。说武则天一生聪明机警，常有惊人之举，立无字碑，意在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武则天忙碌一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也有该否定的地方。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她能力挽狂澜，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天赋。但是在其统治后期，政治却日益腐败；加之“篡夺王位”和民间所谓的“荒淫无度”，或许武则天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碑文的褒贬对她来说都是难事，于是“立无字碑”是非常

聪明的举动，“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乾陵的巨大魅力不光在于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更在于它体内珍藏的无价文物瑰宝。关于乾陵地宫是否被盗和其中的珍藏一直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第二十五章　楼兰古墓群盗掘沧桑——遗失的灵魂

大漠文明骤消失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一个繁盛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民依靠天然的地理优势渐渐地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国家。它曾是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重要国家。然而，这个繁荣的国家约在1600年前却突然消失了。从此，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关于它的一点消息，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去了哪里。这个国家就是楼兰古国。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罗布泊以西。据现代考古发掘证实，楼兰古国曾在罗布泊边的绿洲上创造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楼兰古城旁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人们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

罗布泊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湖泊，被称为“会迁徙的湖泊”。蒙古语罗布泊即是多水汇入之湖。司马迁所记载的“盐泽”，指的就是罗布泊。罗布泊是古楼兰的生命之源。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罗布泊的迁移，使楼兰水源枯竭。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地引水进入楼兰。但楼兰古城最终还是被废弃，一种灿烂的文化也随之消失了。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的罗布泊考察。惊奇的是，他在寻觅水源的路途中居然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城，在后来的发掘过程中又有大量的陶器、文字、钱币、丝织品等文物出土。之后经考证，此处即为史料中所记载的楼兰国，被发现时，它已经深埋在沙漠之中大约1500余年。

史书上最早记载楼兰国的是《史记》，其后《汉书·西域传上》对楼兰国也有描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

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楼兰古城形似正方，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它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小国家，其都城位于今天新疆的罗布泊西北岸，约于公元前300年时建立。

楼兰古城盛极一时，然而真正令世界各地人士趋之若鹜和神往的却是它神秘消失的原因。事实上，历史上兴起于塔里木盆地一带的所有古城，包括楼兰在内，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即公元4世纪，消失于茫茫沙海之中。那么，楼兰消失之谜究竟作何解释？这一直是近代学者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

战争说。东晋是我国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时代，而楼兰古城恰好又生存于此时，又逢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中的重要性，楼兰国因此也成了各方都想霸占的战略要地。频繁的战争将楼兰文明一洗殆尽，民不聊生，楼兰国最终走向衰亡。有人认为楼兰是为丁零所灭，或者是被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所灭。但疑点是战争只能毁灭一城一池，不太可能使整个国家灭亡。

灾病说。疾病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楼兰人逃命的步伐，很多人相信瘟疫是致使楼兰消失的最终原因。相传这种瘟疫就是可怕的“热窝子病”，一个地域只要有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必然会殃及几乎所有成员。楼兰古城的人民就可能遭遇了这场不幸。附近曾发现过一些群葬坑，里面男女老少尸体像垒砖那样层层叠叠。

在罗布泊让人感触最深的是，所谓“沧海桑田”的变迁，可能并不需要预想中那么长的时间。如今在坚硬无比、绵延不绝的盐碱壳子上颠簸，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可以划船，还能打上1米多长的鱼。中上游的引水灌溉和水库的修建使塔里木河不再注入罗布泊，1972年罗布泊蒸发完了最后一滴水，成为一片死亡之海。

因为水的消失，一个湖的废弃乃至一个城市的废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并不鲜见。

历史上，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作为亚洲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气候恶化论是目前较占上风的论点，认为是自然变化造成国家大迁移。那具著名的楼兰美女在解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肺部沉积有大量沙土，说明当时气候已经开始恶化了。

获认同最多的观点，认为楼兰荒废最根本的原因是楼兰没有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守春认为，水的减少直到消失，除了气候变化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为原因。从历史上看，也多次发生过由于人口的增加，上游对河水的过度引取，使下游河流来水减少和河道不稳定，最终导致下游楼兰国被废弃的事件。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楼兰人为大兴土木以及其奇特墓葬形式“太阳墓”砍伐了大量树木，最终带来了生态恶化。“太阳墓”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的是一层套一层的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原木。木桩由内而外，粗细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形酷似太阳。据2008年初的资料，在已发现的七座墓葬中，成材原木达一万多根，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值得一提的是，发掘于楼兰的用佉卢文字书写的律法中，有这样的律条：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砍倒树苗者罚羊两头。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要生存下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

但楼兰最终还是湮没于风沙之中了。根据历史记载，楼兰国曾有几千人在一个叫善密的人带领下迁到义乌（今哈密一带），一部分人迁到了和田的罗普（罗布泊的转音），还有一部分人坚持生活在罗布泊内，一直到清朝末年。

1980年，穆舜英在新疆发掘的一具楼兰女尸，为原本如梦一般的楼兰文明又盖上了一层面纱，楼兰文明更显得神秘莫测。试想，在当时怎样才能使一具尸体在3800年后还保存得那样完好？然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高僧法显在公元400年取经时经过楼兰，那时的楼兰古国已是一片苍凉。西域本属干旱之地，青藏高原的隆起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旱情，沙漠化程度逐渐严重。楼兰文明消失之因至今众家争论不休，但上述的几种原因都不可能单一地将一片辉煌在瞬间摧毁，楼兰古城更有可能是在几种外力的交合之下销声匿迹的。另外，人类的急功近利，对利益的追逐也是导致楼兰消失的原因之一。

楼兰文明的消失，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种遗憾，然而遗憾过后，人们又不得不加以反思。战争、干旱、气候变暖、瘟疫，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现今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生存环境逐渐恶化。那么，人们是否会以楼兰为戒，对自身的行为加以适当的反省，以绝后患？

古人云：“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楼兰留下的“人与水的记忆”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过，看一

看今天的罗布泊，再看一看塔里木河下游大量因缺水而衰败的胡杨林，就不能不让人担忧，我们留给后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历史？

楼兰古墓难安宁

楼兰王国曾经有着非常强盛的历史，并且也深受汉族厚葬文化的影响。它的很多墓葬中都有丰富的陪葬品。于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楼兰遗址，就成了众多中外探险家以及盗墓贼向往的地方。

新疆的许多地方都流传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沙漠里埋有珍宝的故事。还流传着一些恐怖的传说，比如沙漠中有一座古城，里面满是金银，但如果有人捡了金子，就会突然刮起黑风暴，或者遭受无数野猫的袭击。还会有幽灵叫着拿了金子的人的名字，引他走向沙漠深处。这种恐怖的传说的确对当地的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当地人敢踏进沙漠去盗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物贩子徘徊在楼兰的周围，拿着大捆的钞票吸引着他们。在这些墓葬中盗得的干尸在当地就可以卖数万元，若是偷运出国更是可以卖到100万元。于是，就有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了盗墓活动。尽管沙漠似乎被古楼兰人下了咒语，也不断有人因盗墓而丧命。但是，这些并没有吓退接踵而至的盗墓者。每到夏季，许多人就牵着骆驼进沙漠寻宝。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千年等待，楼兰古城等来的不是人们对它的高度保护，而是越来越多的盗墓者手中的锄头。

1901年3月4日至10日，斯文·赫定雇用农民在楼兰城中13处遗址内随意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五铢钱，精美的汉晋时期丝织物，玻璃器，兵器，铜铁工具，铜镜，装饰品，料珠，以及犍陀罗风格的木雕艺术品。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汉晋木简、纸质文书即达270多件。随斯文·赫定而至的斯坦因又发掘了大量文物，仅汉文文书就达349件，不少文书有纪年，最晚的纪年为晋“建武十四年”（330年，实为晋咸和五年。晋建武年号终于317年。斯坦因正确地判断这时“这一小站同帝国中央当局的交通已经完全断绝”），其他还有不少佉卢文文书，一件粟特文文书。后来日本的橘瑞超在这里获得了汉文文书44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国内外史学界十分熟悉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楼兰史的研究。后来，考古学者在楼兰城内发现了晋代汉文木简，大量汉代钱币，罗马风格的

玻璃器，汉式陶甑，一枚贵霜钱，在城郊汉墓中发现了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绸织锦，也有西亚风格的毛织品。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楼兰和它所创造的文明一消失就是1600年。尤其是那个3800年前的白种“楼兰美女”及巨大的“太阳墓”墓地古墓沟的发现，将人们对初发现楼兰的惊喜引向深深的疑问：楼兰文明从何而来？楼兰的白种人从何而来又消散到了何处？一系列的未解之谜只有等待对楼兰的更多发现，但盗墓者洗劫之后还会留下什么？

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楼兰考察研究蓬勃展开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浓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发展色彩。先后来到这片地区的有沙皇俄国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贝格曼，美国的亨廷顿，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等，当年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人来到罗布泊，或进入楼兰古城，发掘附近的古墓。楼兰自然无法免除被一次又一次发掘、搜掠，文物被携走的命运。当年中国学者有幸进入这片地区考察的只有黄文弼、陈宗器两人，那是在中国学术界坚决抗争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作为中方团员，才取得了这一机遇。黄文弼在楼兰城东北发现的遗址，所获有西汉纪年的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陈宗器考察的自敦煌到罗布泊的路线，罗布泊的水文状况，在罗布泊地理研究中也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环境和其他一些原因，我国仅在这一地区的古墓沟和楼兰古城分别进行过为期不足一个月的清理工作。

罗布泊地区因为生态环境恶劣、缺乏生存条件而成为无人区。因此国家对它的保护相对少一些，因为恶劣的环境是一道天然屏障。但是盗墓人却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可以放心大胆地肆意挖掘，科考队途经的每处遗址，都有盗墓者光顾后留下的痕迹。

1998年3月5日，在楼兰，一个专业的盗墓团伙被破获。团伙的首领名叫阿布力孜·克里木，他在乌鲁木齐经营珠宝、古币。他为了能找到更好的文物，纠集了有盗窃前科的梁志刚等3人，买来新疆历史、文物、考古的专著研读，购买了汽车，找了向导、司机，大家分工明确，目标就是楼兰。

为了充分地对楼兰古城以及古墓进行了解，克里木找了几个同伙买来了有关楼兰古国、罗布泊等的相关书籍和地图，从中获得一些重要信息。为了加快在沙漠中寻找古墓的速度，他把自己的吉普车也开进了沙漠。克里木驾驶着汽车在广袤的沙漠里向东南方向的楼兰古城驶去。与他同行的还有库尔班、梁志刚等3人。库尔班常年盗取沙漠

中的石油等设施上的物资，跑过沙漠中的很多地区，对这里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自称是这里的活地图，还自夸罗布泊的野骆驼都认识他。梁志刚也曾经因为偷窃而入狱，出狱后仍然不务正业，靠着一些小偷小摸混日子。克里木找这些人做同伙是经过筛选的，可以利用库尔班熟悉地形的条件弥补自己这方面的缺陷。

他们开着吉普驶向目的地，白色吉普像一只羚羊在罗布泊地区的荒野上跳跃着前进。东南方遥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楼兰古城，大漠长风在戈壁上雕刻出无数的沟沟壑壑，是所有探险者都惊惧的迷魂阵。这里是汽车的禁区，但阿布力孜·克里木已经在这个地区奔波几天了，眼看就要接近楼兰古城，死也要见到东西，这就是强盗的贪婪。

在沙漠里，盗墓者有野狼一样出没荒野的本领和嗅觉。克里木的汽车在一个高20多米的雅丹台地上停了下来。这块台地很平坦，铺满砾石。这块雅丹台地和所有的台地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标志。几个人下了车开始挖起来。

几个人没有挖多久，沙土里就出现了一个用红柳枝、芦苇秆和碗口粗的胡杨木相混合而做成的类似房顶样的东西。库尔班得意地告诉大家，这个就是陵墓的盖子，从这里挖下去肯定有戏。几个人更加卖力地挖了起来。待把盖子上面及周围的沙土挖尽，一个完整的盖子形象就显现了出来。从它的形状大小来看，如果地下是个陵墓的话，那么这个陵墓的规模一定不小。克里木迫不及待地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掀开了盖子。灿烂的阳光像利剑一样射进了一个漆黑的大洞。待看清里面的一切后，克里木简直高兴得发疯。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他们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打开了已经沉睡了约2000年的古墓。

但是，面对着幽深的古墓，几个人推让起来，谁也不愿意先下去。他们都怕古墓里有什么机关或者是毒气之类而毙命。并且，这座古墓由于年代久远，未见天日，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阴冷之气，与外面的炎热环境形成极大反差，令人毛骨悚然。克里木无奈之下，想起了汽车里还放着专门为了试探古墓有无危险的活鸽子。他把鸽子放在洞口待了好长一会儿，确信里面没有毒气后，就把它杀了，扔进墓葬里，以鸽子的鲜血来避邪。做完这些，众盗墓贼的心里渐渐平缓下来，盗宝的欲望压倒了恐惧。他们举着手电，慢慢地顺着绳索滑到了陵墓底部。

透过手电的亮光，他们看到了陵墓内的地面铺的是一块颜色鲜艳、做工精致的彩绘地毯。虽然由于年深日久，地毯开始腐烂，但仍能看出一只高大威猛的狮子图案处在地毯的中央。众盗墓贼被这块精美的地毯吸引了，纷纷蹲下身来抚摸，并决定把它卷起来带走。正掀

起地毯的时候，一道刺眼的光芒从地毯下面射了出来。克里木仔细一看，地毯底下竟然是一具彩棺。克里木抑制不住地用“这口棺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句话来形容。

彩棺的木头碴子都是白的（其制作年代当属汉晋），棺木通体用红、白、黑绘花，并以菱形将棺木连成一个整体。它的狮纹毛毯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棺木是东方式的，两头绘有汉民族的朱雀和玄武。楼兰地区出土的干尸，大多以毛毡裹尸，以往从未见过这么华丽的棺材。彩棺盖子打开的一刹那，一具完好的男尸出现在了眼前。这具有着棕色头发的高大的男尸睡在里面，他真的像睡着了一样，十分安详，眼睫毛像一排小树林清晰可辨。墓主人当年一定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的皮肤与肌肉一点也没有腐烂、损坏，只像是因为缺少血液那样而显得苍白。男尸身上的衣服保存得也很好，不仅颜色鲜艳，像刚做好一样，而且没有丝毫的破烂迹象。既有保暖的毛料衣服，也有轻薄的丝绸衣服。贪婪的盗墓贼把这些衣服一件一件地都扒了下来，尸体上最后的一层白布留在了坑里。他们根本想不到的，就连这块裹尸的棉布也因为年代早、保存好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次被盗的文物共2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3件，二级2件，其余为三级。接着，他们搜刮了彩棺内一切值钱的东西。盗墓贼本来是想把那具彩棺一同拉走的，但是由于彩棺过于庞大，只得把它先留在了陵墓里，准备过几天再来把它运走。

几天以后他们又来了，把彩棺锯成了12块装车运走。

盗墓成功后，克里木马上联系到了西藏的大文物贩子尕玛桑珠，以100万元把彩棺卖了出去。这具彩棺后来经西藏进入尼泊尔，从而流落到了国外。

后来，克里木在楼兰古国盗墓的消息不知怎么传播了开来。当地警方立即对他及其同伙进行了缉捕、审讯。克里木紧咬牙关，拒不认罪，调查一时没有丝毫进展。库尔班开始时逃走了，后来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首。这样，克里木盗墓团伙的罪行才被揭开。

克里木被判处无期徒刑，库尔班被判有期徒刑8年。

此案告破后，在墓地进行现场调查的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感叹他们的厉害：“真想不通他们是怎么找到古墓的。”专家说，那是新疆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彩棺。

如果说克里木他们是合作盗墓的话，同样是以盗墓为职业的亚生其来克就是盗墓界的独行侠了。亚生其来克不像其他盗墓贼那样要找几个同伙，他喜欢单独作案。他凭借着对沙漠的充分了解以及丰富的盗墓经验，在尼雅这块沙漠中成功地盗得了许多宝贝。每当熟悉他的

人们看着他牵着两匹骆驼从自己居住的绿洲出发，越过塔克拉玛干中心的沙漠公路，向更远的西方沙漠前进的时候，就知道他又要去里面“挖宝”了。

尼雅这块沙漠历来都是考察队、探险队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它深处沙漠腹地，距离最近的聚居点新疆的民丰县也有140公里的路程。进入尼雅的困难关键还不在于它的遥远，而在于无论是多么现代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这片沙漠中前进。要想到达尼雅，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骆驼。因此，无论是100年前的斯坦因，还是现代的科学考察队，都要从民丰县出发，最后换成骆驼，整整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进入这片沙漠。这是已知的进入尼雅的唯一的一条路。大漠深锁着尼雅，至今只有极少数中外学者到过尼雅。

亚生其来克就这样从东向西横着进了尼雅。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像是从沙漠这一头到另一头的亲戚家里去串门。

亚生其来克到尼雅用了两天。不能在尼雅多待，最多挖上两天就得走。他要有足够的水保证能走出沙漠。就这样，从不张扬的亚生其来克在一个月里进行了三次沙漠之旅。在第三次，终于找到了苦苦寻找的东西。他在一个古墓里发现了一对保存完好的夫妻干尸，他们似乎都是白种人。男尸身高在1.8米左右，穿着十分华丽，全身都是名贵的丝绸，胡子和头发都是黄色的。女尸的头发也是黄色的，打扮得非常妖艳，脖子和耳朵上分别佩带着项链、耳环，也穿着华丽的丝绸衣服。从他们的装束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生前一定是王公贵族。

亚生其来克没有把女尸身上的首饰取下来，他知道，保存得越完好越能卖出好价钱，就把两具干尸分别绑在骆驼上。走了一段路，由于干尸不适应干燥的环境，男干尸的整条腿还是断了下来，亚生其来克随手把它扔在身后。扔在哪里他也忘了，后来怎么也找不到了。到了沙漠公路，他把干尸埋在公路边的沙山里，在路边的一家餐馆里住了下来等待买主。每具干尸的成交价是7万元。而它们被运出国后，价格就变成了100万元。

1999年，亚生其来克因为盗墓而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克里木与亚生其来克对楼兰古墓的盗掘只是盗墓大军的一个缩影。由于沙漠地域广大、人员匮乏、环境恶劣，使得楼兰古墓的保护困难重重。据当地的文管人员介绍，有些时候平均一个星期就会有两拨人来到这里盗墓。古墓的护理员介绍说，只要他们一天不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准有古墓被挖开。经常是这边的墓穴还没来得及掩埋好，那边的白骨又被翻了出来。于是，古墓群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裸露的白骨，以及从墓葬里扔出来的陪葬品碎片。现在的盗墓者手段高明，

他们改装摩托车或者开汽车，拉上足够的水和食物，用卫星定位仪指路，从喀什开始横穿沙漠，一趟下来就是两个多月，像梳头一样把沙漠中的遗址梳个遍。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者甚至展开了竞赛，往往是白天考古工作者清理墓葬现场，晚上盗墓贼频频作案。

楼兰古国曾经建立起了璀璨的文明，但瞬间又在世界上消失，它来自何方？又消散到何处？楼兰古墓内还有怎样的秘密？

这些都有待于将来的考古研究有新的发现。

唯愿楼兰古墓群的亡灵们能得到安宁。

参考书目

1.“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编委会.盗墓传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2.王双怀.陕西帝王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3.岳南，许志龙，商成勇.中国盗墓传奇.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4.搜奇研究中心.不可不读的盗墓传奇.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5.谢洪波.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之谜.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

6.文裁缝.绝版王陵：探秘帝王的地宫.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7.孙建华.盗墓史迹.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8.月明日.探秘中国盗墓.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8

9.倪方六.盗墓史记.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10.王子今.中国盗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11.岳南.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记.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